

波斯普鲁斯 / 译丛

土耳其

土耳其的崛起

(1789 年至今)

Turkey

1789 to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The Emergence of the Turkish Nation from
1789 to Present

[土耳其] 悉纳·阿克辛 (Sina Aksin) 著

吴奇俊 刘春燕 译 刘义 校

Presen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SSAP)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The Emergence of the Turkish Nation from 1789 to Present

[土耳其] 悉纳·阿克辛 (Sina Aksin) 著

吴奇俊 刘春燕 译 刘义 校

土耳其的崛起 (1789 年至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耳其的崛起：1789 年至今 / (土) 悉纳·阿克辛
(Sina Aksin) 著；吴奇俊，刘春燕译。--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 (2017.4 重印)

(波斯普鲁斯译丛)

书名原文：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 The Emergence of the Turkish Nation from
1789 to Present

ISBN 978 - 7 - 5097 - 9835 - 5

I. ①土… II. ①悉… ②吴… ③刘… III. ①土耳其
- 近代史 - 研究 IV. ①K37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4802 号

· 波斯普鲁斯译丛 ·

土耳其的崛起 (1789 年至今)

著 者 / [土耳其] 悉纳·阿克辛 (Sina Aksin)

译 者 / 吴奇俊 刘春燕

校 者 / 刘 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晓莉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郭白歌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11.875 字 数：271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835 - 5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4 - 4595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和致谢

土耳其学生在上大学以前所接受的历史教育非常不足。学校很少教授世界历史知识，对土耳其历史的教育也存在不足。对 20 世纪土耳其历史的处理尤其笼统和肤浅，一般以 1938 年凯末尔去世作为结尾。同样的肤浅和不足也困扰着人文和社会科学（不是确切的科学）。很难说这种情况是偶然的；可能是政府不乐于开化的政策所致，这一阴影笼罩着 1950 年以后的土耳其。

出于这一原因，我想写一本关于现代土耳其历史的小册子，来满足普通读者和学生的需要。这本书的土耳其文版本在 1996 年第一次出版，到现在已经是第五次印刷了。土耳其的日报《共和报》（*Cumhuriyet*）也刊登了这本书的内容以方便读者阅读。

英文版是在出版商克里斯托弗·赫斯特（Christopher Hurst）的鼓励和支持下推出的。按照他的建议我补充了几章内容（第 31 ~ 33 章），囊括了 1980 年以后的历史。我非常感谢他的帮助和鼓励。

同时也要感谢出色的译者德克斯特·穆萨奥卢（Dexter H. Mursaloğlu）和译本的编辑玛亚·迈纳（Marya B. Minor）。

最后，感谢爱里弗·阿克希特（Elif Akşit）、萨尔普·巴尔杰（Sarp Balcı）和爱诗丽·阿克辛（İşıl Akşin）帮忙与出版商通信沟通。

悉纳·阿克辛

2006 年 1 月于安卡拉

目 录

第一部分 导言：背景

第一章 前奥斯曼时期的土耳其人	003
第二章 古典奥斯曼时期	009
第三章 古典奥斯曼体系的变迁	016
第四章 奥斯曼土耳其文化生活中的问题	021

第二部分 困境中的帝国

第五章 通往坦兹马特之路	025
第六章 改革法令和青年奥斯曼党	037
第七章 第一个君主立宪制政府和大危机	043
第八章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	049
第九章 统一进步协会的组织特征和“3·31”事变	060
第十章 统一进步协会监督政府 ——从“3·31”事变到1913年	076
第十一章 立宪时期的主要思潮	092
第十二章 统一进步协会的统治和卷入一战	100
第十三章 独立战争	109
第十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114

第三部分 阿塔图克时期

第十五章 战争的结束和停战协定 (到 1919 年 5 月 19 日)	127
第十六章 从萨姆松到达马德·费里特政府的倒台	143
第十七章 第三立宪政府时期	159
第十八章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成立、内战及 《色佛尔条约》	169
第十九章 正规军走向胜利之路	178
第二十章 大胜利和苏丹制的废除	188
第二十一章 《洛桑条约》: 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	201
第二十二章 废除哈里发, 走向世俗主义	210
第二十三章 革命和反革命	217
第二十四章 文化革命走向前台	225
第二十五章 经济和政治发展	237
第二十六章 对阿塔图克及其革命的评价	246

第四部分 伊斯梅特·伊诺努和他的多党制

第二十七章 战前和战争年代; 伊诺努时代	255
第二十八章 伊诺努建立多党制	264
第二十九章 民主党时代	276

第五部分 军事干预及其影响

第三十章 20 世纪 60 ~ 70 年代	295
第三十一章 20 世纪 80 年代	307
第三十二章 20 世纪 90 年代	322

第三十三章 新千禧年	344
结 语	354
文献介绍	357
译名对照表	363
译后记	371

第一部分

导言：背景

第一章 前奥斯曼时期的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的三个故乡

匈奴人的游牧王国是第一个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突厥族国家（公元前 220 年到公元 216 年）。人们可以从这些年代了解到土耳其人是古代历史的“后来者”，一个相对“年轻”的民族。下面这些历史的里程碑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观点。

公元前 9000 ~ 前 8000 年，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出现。

公元前 6250 年，加陶岗（Chatalhöyük）市在安纳托利亚建立。

公元前 3500 年，苏美尔发明了车轮，埃及发明了帆船。

公元前 3000 年，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苏美尔文字——楔形文字。

当匈奴帝国建立时，古代希腊文明和亚历山大帝国已经走完其历史进程，罗马共和国已存在了近 5 个世纪之久。

匈奴人统治的第一片土地，土耳其人的第一故乡“中亚”，位于中国北面。匈奴人是游牧民族，以放牧为生。这些骑士在大草原上游荡，居住在圆顶帐篷里，为了寻找更加肥美的草地而随着季节迁徙。夏季他们迁移到高原和山坡上，冬季他们返

回到平原地区。他们之所以过着游牧生活，是因为干旱的大草原不适于农业种植。游牧对他们来说是生存的需要。适于耕种的地方在南部，即中国。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阻挡了游牧民族通往中国南方肥沃土地的道路。中华帝国修建的万里长城是保护南方农耕文明免遭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巨大屏障。这是一条长达 2400 公里（1500 英里）的复杂防御工事，相隔不远便有一座烽火台，并在之间铺设道路，以便守卫士兵可以快速到达任何一个遭到攻击的地方。

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人没有文字，对城市生活一无所知。人们认为他们缺乏国家的特征，被认为仅仅是部落联盟。在他们被驱散后，突厥部落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形成更程度的社会组织。突厥汗国（Göktürk kingdom）于公元 552 年在第一故乡建立，持续到 745 年。区分突厥汗国与匈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突厥汗国末期文字的出现。第一块土突厥语石碑发现于奥都斤山遗址（Ötüken），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730 年。除却这一点，关于匈奴的一切也都适用于突厥汗国。突厥汗国之后，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开始了。关于游牧部落被迫迁徙原因的猜想包括：干旱、人口的急剧增长、传染病在牧群中的肆虐。

第一波移民向西迁徙，到邻近他们第一故乡的地方，建立了第一个具备国家特征的成熟的突厥王国。虽然回纥汗国（745 ~ 940 年）具有城市、农业以及书面语言，但游牧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回纥人由萨满教皈依佛教。一些突厥部落继续向西迁徙，到达土耳其人的第二故乡——大概位于里海以东、咸海以南，在今天阿富汗的北部的河中地区（Transoxania）。土耳其人称之为河中（Maveraünnehir），公元 900 ~ 1150 年他们在这里逐渐皈依伊斯兰教。在此，他们建立了三个主要王国：喀

喇汗王国 (Karahan) 或黑汗王国 (Kara - Khanid) (940 ~ 1211 年)、阿富汗的伽色尼公国 (the principality of Ghazna) (963 ~ 1186 年) 以及塞尔柱王国 (The Great Seljuk kingdom) (1038 ~ 1157 年)。喀喇汗王国时代标志着土耳其文学的开端。两部代表性作品分别为: 尤素福·哈斯·哈吉普 (Yusuf Has Hacip) 于 1070 年写成的《福乐智慧》(Kudatgu Bilik) 和喀什格尔的马哈茂德 (Mahmut of Kashgar) 编著的第一部突厥语词典《突厥语大词典》(Divan-ü Lügat-it Türk)。

在 1071 年的曼兹克特 (Manzikert) 战役中, 塞尔柱王国对拜占庭的决定性胜利促使了奥古兹 (Oghuz or Ghuzz) 的土耳其人迁徙到他们的第三故乡——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 (Rumelia) 地区。这场胜利打破了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霸权, 之后拜占庭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在安纳托利亚 (小亚细亚) 建立的第一个土耳其国家是塞尔柱苏丹国 (Anatolia Seljuk Sultanate, 1077 ~ 1308 年)。第三故乡与前两者有很大的差异。同第一故乡荒芜的大草原相比, 第二故乡河中地区稍有改观, 有成片肥沃的可耕地, 但仍被大片沙漠所包围, 饱受干旱之苦。第三故乡根本就没有荒漠, 这里土地非常肥沃, 到处都可以种小麦。大批土耳其人在此定居, 随着农业的发展, 农民阶层产生了。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后者以低地为主要地貌, 安纳托利亚地区则是间隔在陡峭山脉之间的高原。如果他们愿意, 这里有广阔的土地, 部落和宗族很容易就能恢复他们的游牧生活。此外, 当安纳托利亚地区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暴动和骚乱时, 不堪劫掠的村民便逃到山中, 变成强盗或者恢复游牧生活。简而言之, 牧民和农民之间经常发生周期性的转变, 并轮番在某些地区占主导地位。直到

1865 年，奥斯曼政府才不得不派出军队——改进师（the Firka-yı Islahiye）前往丘库罗瓦（Çukurova），其目的是使阿夫沙尔部落（Avshars）和其他已经不过定居生活的部落重新过上定居生活。据说在这段时间里，阿达纳（Adana）东部的丘库罗瓦平原——土耳其最肥沃的农耕地区，因游牧文化而沦为草地。

历史学家泽基·韦利迪·托甘（Zeki Velidi Togan）研究了居住在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的相关问题。根据托甘的研究，阿拉伯人的劫掠导致安纳托利亚地区大多数信仰基督教的居民逃往海岸地带。这一观点暗示——因为土耳其人到达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居民相对较少，因此他们没有在种族上与安纳托利亚的基督徒融合。换句话说，他们保持了种族的纯洁。但是无法确定有多少基督徒离开或者留下。无论如何，诸如通婚、皈依伊斯兰教、德米舍梅（devshirme，强行从基督徒里征召禁卫军士兵和政府工作人员）、推行奴隶制等，都必然导致种族的融合。事实上，土耳其人与亚洲突厥部落的后裔没有明显的相似点，而且即使是生活在土耳其的土耳其人也没有相同的体征，这似乎是种族间通婚的证据。但是撇开种族方面的考虑，突厥语变成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通用语言。这是把安纳托利亚民众与中亚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

历史的岁月

法国的人类史年表得到了土耳其历史学家的广泛认同。成文的人类史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公元前 3000 年 ~ 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古

代史

公元 476 ~ 1453 年 (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 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灭亡): 中世纪

公元 1453 ~ 1789 年 (法国大革命): 新时期

公元 1789 年后: 现代时期

赞同这一年表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强调 1453 年的重要性、穆罕默德二世 (征服者法提赫) 是复兴君主, 以及君士坦丁堡归于伊斯兰教和土耳其人的意义。尽管征服君士坦丁堡意味着土耳其历史的深刻变化, 即“从行省到帝国”, 但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件事当作土耳其的一个新纪元吗? 从作者的角度看, 或许未必。在把 1453 年当作一个新时期的转折点方面, 欧洲人认为奥斯曼帝国阻碍了历史的进程。根据这一历史观, 奥斯曼帝国占领拜占庭后, 大批拜占庭知识分子逃往意大利, 并成为催生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主要力量。根据这种欧洲历史观, 奥斯曼帝国的全部贡献仅仅是驱使一大批知识分子逃往西方。

易卜拉欣·卡费斯奥卢 (İbrahim Kafesoğlu) 及其他土耳其历史学家很早就指出, 这一历史年表不清晰, 也没有直接阐明土耳其历史的重要方面。在那个年代, 罗马帝国的灭亡对土耳其有什么直接影响吗?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对土耳其有非常大的影响, 但其影响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内有一个时间差, 在西欧和东欧却是同时发生的。

因此, 这些大事件对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地区的土耳其人的重要性值得商榷。土耳其历史更合理的年表应该是:

公元前 220 (匈奴国家的出现) 至公元 1071 年 (曼兹

克特战役；突厥人进入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地区)：古代

公元 1071 ~ 1839 年 (《坦兹马特法令》颁布)：中世纪

公元 1839 ~ 1908 年 (宪法的公布)：新时期

公元 1908 年以后：现代时期

这个年表与生活土耳其的土耳其人相关，因为它强调了
这个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古代史是土耳其人的游牧时代。中
世纪是定居、农业发展、农民阶层出现的转型时期。新时期体
现为西化和法治的努力。现代时期则以土耳其人大规模城市化、
资本主义发展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等重大事件为标志。

第二章 古典奥斯曼时期

奥斯曼系谱的第一位总督 (bey or lord) 是奥斯曼 (Osman), 奥斯曼帝国即因他得名 (“Ottoman” 是 “Osmanli” 的欧洲用法)。1299 年始, 作为古城布尔萨 (Bursa) 附近的小行省, 奥斯曼最终征服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和整个巴尔干半岛, 包括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 以及多瑙河北部的瓦拉吉亚 (Wallachia) 和摩尔达维亚地区。他们接连征服了土耳其的其他行省, 从而成为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唯一统治者。在 16 世纪, 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和埃及, 包括耶路撒冷、麦加、麦地那三座圣城。极盛时期的帝国囊括了从北非延伸到克里米亚、从贝尔格莱德到巴格达的广大版图, 控制了东地中海和东西方之间的商路。奥斯曼帝国演变成一个传统但相对自由的社会, 并且开创了一套以个人功绩为基础、独特且高效的行政体制。在扩张时期, 奥斯曼帝国拥有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常备军; 征服所得的税收, 以及一种不同于欧洲封建体系的土地管理制度所形成的繁荣农业经济, 共同支持了这支军队。奥斯曼帝国统治不同地区的诸多民族长达 6 个世纪, 超过他们的主要敌人沙皇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但在晚期, 他们没有跟上时代; 权力结构崩溃, 且社会内部矛盾频发。他们丧失了国际竞争所需要的实力, 只能依靠列强的政治平衡来延续帝国的生命。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分期

“古典奥斯曼时期” 的社会结构在 1450 ~ 1550 年达到了发

展的顶峰。土耳其的学校按以下分期来讲授奥斯曼历史。

1299 ~ 1453 年：从行省 (Beylik) 到帝国。奥斯曼是王朝的创立者，帝国即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儿子奥尔汗 (Orhan) 继承他的遗志，征服了布尔萨 (Bursa, ancient Brusa)，并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了征服巴尔干半岛的征程。在此一时期，奥斯曼领土迅速扩张，直到“雷霆”巴耶塞特一世 (“Thunderbolt” Sultan Bayezit I) 1402 年在安卡拉大战中为帖木儿汗 (Tamerlane) 所败。战败后，随之而来的是巴耶塞特的儿子们为争夺帝位而发生的争斗。到 1430 年，帝国重新恢复了以前的版图。

1453 ~ 1579 年：极盛期。这段历史从“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 (Mehmet II, Fatih the Conqueror) 攻陷君士坦丁堡 (土耳其人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开始，相继继位的四位苏丹都战无不胜，率军征服了从幼发拉底河到多瑙河、从北非到克里米亚的广袤地区。1517 年，“冷酷者”塞利姆一世 (Selim the Resolute, Yavuz Selim) 征服埃及，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担任了哈里发。这一时期还包括苏莱曼大帝 (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 Kanuni Sultan Süleyman, Sultan Suleyman I) 的统治，并以大维齐尔索克洛维奇 (the Grand Vizier Sokullu Mehmet) 的去世告终。

1579 ~ 1699 年：停滞期。帝国的发展达到顶峰。在这一时期，统治这一庞大帝国的苏丹们在“牢笼”中长大 (托普卡帕皇宫中的一块区域)；他们要么被处死，以确保大统顺利交接，要么便君临天下。他们也不再亲自上战场指挥军队。高门 (the Sublime Porte or High Gate, 即大维齐尔) 掌控着帝国的运转，却陷于权力之争和宫廷阴谋中。

1699 ~ 1922 年：衰落期。帝国为工业革命所弃，诸事落后。对土耳其人来说，问题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现代化；对欧洲诸国来说，则是如何瓜分这个濒临瓦解的帝国。

这一历史分期是仅就领土得失，以及奥斯曼帝国机构的权力和效率而言的。如果说到土耳其人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以及经济的繁荣，它就显得不那么恰当了。如果有据可查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19 世纪普通土耳其人的寿命更长，且民众的识字率要高于苏莱曼大帝时期（帝国的鼎盛时期）。尽管“极盛期”有悉南（Sinan）这样的建筑大师，18 世纪和 19 世纪在文学方面则涌现出许多伟大人物。卡蒂普·切莱比（Katip Çelebi）和埃夫利亚·切莱比（Evlîya Çelebi）就是 17 世纪两位伟大的作家和学者。土耳其古典音乐只有在 17 世纪及之后的时期才真正有所发展。土耳其第一座图书馆建于 18 世纪。如果我们仅仅以国土为标准来评价发展，土耳其共和国就会被认为是倒退了；但实际上，很明显，现代土耳其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远胜于奥斯曼帝国，而且一直在快速、持续地发展。

古典奥斯曼时期的社会结构

大致框架如下：

I. 统治阶级

1. 军队

- a. 领薪水的军官
- b. 拥有土地的骑兵（Timariot sipahis）和大地主（zaims）

2. 乌里玛：法官（kadis）、教授（muderris）和神学博

士 (*mufthis*)

II. 被统治的民众 (*Reaya*), 非军事人员

1. 城市市民

- a. 行会成员 (商人和手工业者)
- b. 商人和银行家

2. 农民

3. 游牧民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 社会分为两个阶级: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国家以苏丹为首, 决定人们的地位和生活环境。国家是服务于征服的战争机器, 所有统治阶级都被认为是军事组织的一部分; 尽管像乌里玛, 并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军事功能。

按原则, 苏丹是帝国最富有的人, 大维齐尔是仅次于苏丹的二号人物。如果有商人积累了过多的财富, 帝国便会通过征用使其降到合适的规模。统治阶级确保过着高水平的生活, 而且免除了纳税的义务。以苏丹为首的统治阶级包括乌里玛和奴隶 (*Kul*) 身份的军队将领, 例如禁卫军成员。军队将领既有行政职能又有军事职能, 换句话说, 他们既是行政管理者又是士兵。从禁卫军到骑兵再到最上层的大维齐尔, 他们都有双重职能, 且都被认为是奴隶, 或称“库尔”。

库尔是国家的奴隶; “他们的脖子比发丝还要细”,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依照苏丹的法令被“政治处决”, 而无须诉诸法律程序。奴隶身份的第二个后果便是征用 (*müsadere*) —— 死后财产充公。尽管这种征用大多用于那些拥有足够财富的高级官员, 但是依然有方法可以绕开它把财产传给后人。继承人被任命为家庭基金 (*vakıfs*) 的负责人, 他必须出钱资助诸如清真寺、宗教学校 (*medreses*)、旅馆 (*hans*) 等公共服务。由于

慈善组织可免于征用，最富有的奴隶的继承人就确保有一定的收入。

统治阶级的第二个分支是乌里玛，他们负责国家的宗教、司法、教育职能，与政府管理基本没有关系。和军队将领一样，他们能获得巨大的财富，且不用纳税。但是和军队将领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奴隶身份，而且一般来说未经审判不受处罚。因此，他们不会被政治处决，死后财产也不会上缴国家。乌里玛是穆斯林的孩子，在清真寺的附属学校毕业后，再到神学院接受教育。乌里玛的高层可以获得巨额财富，且可以把财产留给后代。这些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便可以获得头衔和特权，从而使他们晋升顺利。反过来，这些孩子都想成为乌里玛，从而培养了一批知识贵族。

库尔有很大一部分是德米舍梅（devshirme），即应征入伍的基督徒后代。他们是男孩进贡体系的产物；在这一制度下，孩子们被从征服的省份中召集而来，在正式皈依伊斯兰教后就开始被训练来为苏丹的各类机构服务。他们在长大并被教化成土耳其人时，就会被派到各个省去统治帝国，并进一步扩张领土。根据他们的天赋及接受必要的教育后，他们能够成为禁卫军或行省的总督。这一体系甚至允许他们担任大维齐尔，获得巨额财富和极大的权力。这是一种独创性的精英制度。建筑师悉南、大维齐尔索克洛维奇帕厦以及许多其他的大维齐尔，都是德米舍梅出身。

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比较了德米舍梅所参加的托普卡帕宫中的帝国学校（Enderun）和穆斯林家庭后裔所上的神学院：前者把非土耳其人教育成土耳其人，后者把土耳其人教育成非土耳其人（从他们的文化定位来看）。事实上，在这

样的帝国学校里，土耳其语是学术语言；但是在神学院，学术语言却是阿拉伯语。从现代角度来看，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还不止此。在一个有公开宗教倾向的非世俗国家里，这些穆斯林的后代不参与军队和政府事务，而基督教徒的后代则直接肩负着国家的命运。

军队分为两类：领薪水的军队，例如近卫骑兵（*kapıkulu*）和禁卫军；拥有土地的骑兵，如提马尔西帕希（*Timariot sipahis*）和扎伊姆（*zaims*）。这两类军队相比差异较大，且各有优劣。在缺乏硬通货的经济中，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以实物形式缴纳的阿沙（*ashar*）和什一税（*tithes*），领薪水军队可以获得国家的货币支付。然而，当他们的薪水不能按时发放或被支付了成色不足的铸币时，他们便会随时准备叛乱。

西帕希是那些继承了为信仰而战的圣战士（*gazi*）传统的骑兵。这些骑兵的目的是分得一份称作“提马尔”（*timar*）的军事采邑，并且成为苏丹的西帕希。苏丹拥有全部土地，而且享有一切税收。他把采邑的收入根据功绩赏赐给骑兵；反过来，提马尔西帕希则需在战时召集与其领地规模相称的军队。提马尔西帕希和扎伊姆的地位相当于封建领主。尽管他们不是所占土地的合法领主，但他们还是以实物税收的方式（*ashar*）从农民手中获得很大一部分收入，并在事实上获得了这些领地的主权。

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叫作雷亚（*reaya*，普通民众）。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从事生产，但有时也被招募入伍。他们肩负着纳税的重担。作为一个柏拉图式的国家，奥斯曼帝国基于一种统治者优于被统治者的社会秩序。国家服务于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

居住在城市里的主要群体是隆卡（*lonca*），即行会商人和

工匠。他们要么生产并销售自己的商品，要么仅仅从事贸易；却都是在行会规则下运作的小型经济单位，行会制定有严格的行为规则，规范学徒、合格工匠和师傅之间的关系。国家和行会都注意确保没有任何团体扩张或发展太快。换句话说，在行会制度下不可能孕育出资本主义。其他做买卖的城市商人很大一部分是萨拉夫（sarraf，钱商）和做国际贸易的商人。这些团体可以集聚财富，因为他们的行业性质使得他们不可能在行会的严格限制下运作。

相比牧民，奥斯曼帝国政府更加喜欢农民，原因很明显——农民过着定居生活、纳税，可以应征参军；牧民居无定所，不愿意并且逃避纳税和参军。作为武装的、机动的群体，牧民很难驾驭，奥斯曼帝国政府一直在努力使牧民定居，并把他们转变为农民。

第三章 古典奥斯曼体系的变迁

我们所谓的“古典”奥斯曼的社会政治制度从16世纪中期开始发生变化。影响这一变革的因素如下。

欧洲通货膨胀的影响；毛瑟枪

我们所讨论的那个时代流通货币是用贵重金属铸成的。因此，金银矿的产量决定了欧亚市场上可用货币数量相对有限，从而需要新的金银资源以增加产量。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西班牙征服了阿兹特克、玛雅和印加文明，大肆掠夺他们的黄金和白银，并开采他们的矿藏。西属美洲大量的白银涌入欧洲和亚洲的金融市场，加速了货币化进程，使得世界各国物价上涨。奥斯曼帝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尽管奥斯曼帝国经济局部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会把农民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因为农民仍然不能把他们的产品转变为现金，但对其仍有一定的影响。这是因为他们所要缴纳的实物税是农业收获的一部分，包税商可以把这些粮食转变为硬通货。

一块无主的采邑如果不重新分配给西帕希或扎伊姆等封建领主，将会被拍卖，出价最高的投标人将会变成这块采邑的包税商（一般不会超过3年）。包税商必须给国家缴纳硬通货，但是他们得到的却是从农民那里收来的以实物为主的什一税。其缺陷是，在实施包税制的地区，如果没有可以成为政府耳目的西帕希或扎伊姆封建主，也就没有人负责法律和政令在当地

的影响力。包税商并不承担这样的职责，因为他们并不常住在自己的领地，只有在收获的季节来征收什一税时，他们才会来。结果，那些属于外地包税商的采邑被当地有钱、有势、有兵的显贵阿扬（ayan）接管，并成为当地的统治阶层。国家也开始依靠他们作为收税和招募士兵的中间人。随着权力的增强，阿扬变成地主阶级，类似欧洲的封建贵族。对阿扬的这种授权，意味着中央政府逐渐丧失了对行省的控制，由提马尔体系维持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让位于分权体制。但是，提马尔体系的废除及其被包税制取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历经几个世纪才完成。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期，即 19 世纪初期，提马尔土地所有者依然存在。

包税仍然是帝国主要的稳定收入来源，可以确保政府有能力支付其他的禁卫军和驻扎在大城市里的步兵的薪水。步兵的需求源于轻武器尤其是步枪的发展。西帕希不能使用重型步枪（各行省的提马尔军队都是骑兵），而重型步枪却是步兵的必备武器。这种发展使得有必要废除提马尔西帕希制度，增加步兵的数量，并用从包税中获得的现金支付其薪水。

欧洲（尤其是地中海区域）人口的增长

在资本主义经济之前，人口的增长会导致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当时产品的同步增长要比现在困难得多。人口增长必然会导致饥饿和贫穷。随后便会发生抢劫行为。在 16 世纪的地中海地区，这种情况尤其严重，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地区已经很久没有暴发瘟疫，所以出现人口爆炸。在奥斯曼帝国的安纳托利亚地区接着爆发了“杰拉里叛乱”（the Jelali Revolt）。这场叛乱于 1590~1650 年达到高峰，到 17 世纪末由于人口减少和压力

减弱逐渐消失。在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 (1520 ~ 1566 年)，帝国的人口从 1200 万增长到 2200 万。

国际商贸路线重要性的衰落

在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后，以往穿过中东的古代商路，比如丝绸之路，逐渐衰落。国际商路改道海上，使东地中海地区贸易停滞不前。收入主要依靠陆上贸易的城镇丧失了以前的繁荣。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生产一旦遭受这样的挫折就很难弥补，因此经济萧条成了常态。

达到征服的极限

人力和畜力推动着古老帝国战争机器的车轮。然而，随着发展，他们也会变得笨拙，机体力量不足以保护国土安全。

奥斯曼帝国刚开始时是一台非常成功的战争机器。它有能力随时派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到国内任何地方。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能够克服所有障碍，消除任何威胁。它不仅仅征服了要塞、城镇和城市，而且征服了整个地区。征服战争是有利可图的事业。在欧洲，封建主义造就了一批相互对抗割据且相对独立的贵族，很难组织一支在战斗力和数量上与奥斯曼实力相当的联合部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帝国疆域的扩大，军队赶到边境地区的时间越来越长。步兵的行军速度决定了军队的推进速度。如果要在夏天发动战争，就必须在多雨的春季派出军队以按时到达边境，并且在秋收的季节返回家乡。随着帝国的扩张，军队在路途中需要花费太多时间，以至于用来发动战争的时间所剩无几。而且，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对手权力日益集中起来，从而有能力召集一支强大的军队。赢得战争变得比以

前更加困难。所以，战争的不利因素变得越来越明显，战争所带来的利益和军队的收入都逐渐减少，这导致了军队战斗力的退化。但对于一个随时准备征战的国家机制来说，突然变得要适应和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发现在外国没有出路，挥之不去的好战情绪也许对国内的流血冲突——“杰拉里叛乱”有激发作用。

伊本·赫勒敦法则的影响

生于突尼斯的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生活在14世纪的埃及，被一些人誉为“社会学之父”。他在关于伊斯兰教历史的大作《历史绪论》（*Muqaddimah*）中得出的结论引人深思。根据伊本·赫勒敦的研究，伊斯兰社会是两种不同社会形式斗争的舞台，即麦地那（麦地那在阿拉伯语中是城市的意思）式的文明社会与贝都因式的游牧社会；在后者中，宗族和部落以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贝都因人（Bedouins）拥有一种名为宗派主义（*asabiyet*）的高度凝聚力。他们是一个好战、坦率却又粗鲁、未开化的民族。文明社会是过着定居生活、有城市文明和农业化的社会。文明国家经常受到贝都因人的袭击，那些已经衰落的文明国家被他们征服。一个由贝都因酋长统治的新国家便诞生了。在新建立国家的城市里，贝都因人逐渐被他们征服的文明所同化。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他们逐渐丧失了好战性格和团结精神。经过四代（100~120年）之后，他们已经变得足够“软化”，从而被一批新到的贝都因人所征服。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地重复。

在尼亚齐·贝尔凯斯（Niyazi Berkes）看来，奥斯曼帝国就是一个“伊本·赫勒敦式”的国家。在理论上，他们应该延

续 120 年左右便崩溃，但他们并没有走向宿命，因为那里没有足够强大的游牧势力给其以致命的打击。欧洲的列强不愿意瓜分这个帝国，以防其他国家占领伊斯坦布尔，并控制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因而不愿奥斯曼帝国崩溃却要剥削它。由此，帝国得以延续，就像一个年老体弱的病人在等待死亡。

希克马特·克沃尔哲姆勒 (Hikmet kıvılcımlı) 是另外一位接受伊本·赫勒敦理论的历史学家。他的次理论认为，根据伊本·赫勒敦理论，1402 年奥斯曼苏丹巴耶塞特在安卡拉大战中被帖木儿汗打败时，奥斯曼帝国便走向了终点。穆罕默德一世 (Mehmet Çelebi) 缔造的“中兴”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或者第二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的学者们熟悉伊本·赫勒敦的理论。他们认为，1699 年签订《克劳维兹和约》(the treaty of Carlowitz) 和 1718 年签订《帕萨罗维茨条约》(the treaty of Passarowitz) 已经证明，国家太衰老、虚弱从而无力发动战争，因此他们开始日益重视生活的文化方面；从“郁金香时代” (Tulip Era, 1718 ~ 1730 年) 开始，苏丹们带头倡导文化发展。

第四章 奥斯曼土耳其文化生活中的问题

奥斯曼帝国在许多领域的成就都是非常突出的。这包括诗歌、建筑学、制陶业、袖珍艺术（the art of miniaturisation）以及土耳其古典音乐。奥斯曼帝国能够统治原本属于基督教世界的巴尔干及其他行省和民族长达 400 年之久，是政治才能和组织能力的胜利。从 21 世纪的视角来看，奥斯曼帝国在态度方面可能不太开明，但在其统治巅峰时期，表现出了宗教宽容以及在对待臣属民族和种族方面非常开阔的胸襟。他们转而成为东正教的保护者，并保护东正教徒和受到天主教迫害的新教徒。他们同时也欢迎逃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迫害的犹太人。相对于欧洲的封建主义，提马尔土地所有制压迫较少，对农民的剥削也较轻。一个政府在语言和宗教上都同其臣属迥异，竟然能仅仅依靠武力统治巴尔干数个世纪之久，这似乎很不合情理。奥斯曼帝国却有其重要、积极的方面。

但相比较而言，奥斯曼帝国在文化生活方面有着很多的不足。他们对待印刷术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把书籍看作同手织地毯一样只配富人拥有的手工奢侈品。他们认为不值得印刷出版，也不想让每个人都能接触到。甚至这一发明本身也不需要。教育一般靠死记硬背，不太需要书。伊斯坦布尔的印刷厂分别由犹太人在 1493 年 [1495 年在萨洛尼卡 (Salonika)]，亚美尼亚人在 1567 年，以及希腊人在 1627 年开办。第一家奥斯曼印刷厂是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机 279 年之后由

易卜拉欣·米特费里卡 (İbrahim Müteferrika) 和赛义德·切莱比 (Sait Çelebi) 在 1729 年开办, 此时距离伊斯坦布尔第一架印刷机运行已经有 236 年了。即便如此, 这里的需求量仍然非常小, 1742 年在总共印刷了仅仅 17 本书后这个印刷厂便倒闭了——平均每年一本。当需求量最终增大时, 这些印刷厂才在 1784 年重新开工。对于一个缺乏印刷厂的社会来说, 文化和社会进步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个文化方面的明显缺陷是神学院体系下土耳其穆斯林参加的教区清真寺学校。普遍的情况是, 不讲阿拉伯语的土耳其学生死记硬背《古兰经》的一些章节和祷文, 学校还会用阿拉伯语教授一些宗教格言和少许算术; 这一切都是由或许自己都没有真正弄懂阿拉伯语的霍加 (hodja) 来教授。这些学校不教授土耳其语的阅读和写作。那些设法学习他们母语知识的人, 只能在家里或者在政府服务部门师徒关系中学习。没有中级学校来填补教区学校和高水平的神学院之间的空白。尽管在奥斯曼帝国早期, 一些神学院开设数学、医药、天文以及科学方面的课程, 但是后来便中断了。学校变成仅仅是宗教学习的机构。神学院里的教学语言是阿拉伯语, 但由于认为死记硬背就足够了, 大多数学生和老师可能都无法真正理解这些科目和阿拉伯语。

与神学院相比, 托普卡帕宫的恩德仑学校 (Enderun School) 及其他帝国学校的教育成效更加显著。这些学校在进行宗教教育的同时, 还教授其他科目, 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文学、历史、地理、音乐及艺术, 学习的媒介是土耳其语。事实上, 18 世纪毕业于恩德仑学校的诸如卡蒂普·切莱比和埃夫利亚·切莱比等奥斯曼文化名人的涌现, 便是这些机构富有成效的最好证明。

第二部分

困境中的帝国

第五章 通往坦兹马特之路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通往西方化和现代化道路上的第一个决定性行动是颁布《坦兹马特法令》(Tanzimat Proclamation, the Reorganization), 又称为《玫瑰园敕令》(Rescript of the Rose Chamber) 或《花厅御诏》(the Gülhane Hatt - ı Hümayunu)。这是因为, 它是在毗邻托普卡帕宫的玫瑰园向奥斯曼帝国的政要和欧洲国家大使宣读的。坦兹马特改革意义重大, 它给土耳其人带来人权、法治、自由及民主。这是土耳其脱离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转折点。所以, 我们需要列出土耳其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事件。

改革又称伊斯拉哈提 (Islahat), 开始于艾哈迈德三世 (1703 ~ 1730 年在位) 的郁金香时代, 并贯穿整个 18 世纪。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半心半意, 并且无果而终。例如, 18 世纪建立的机构仅仅是培训学校, 名字也只说明它们是技术院校。真正的改革开始于 1789 年之后; 塞利姆三世 (Selim III) 登基后, 改革为塞利姆苏丹的改革主义倾向所驱动, 并受欧洲变革若隐若现的潜在共鸣所影响, 特别是法国大革命。

在塞利姆苏丹统治时期, 国家面临两个重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阿扬”(地主阶级或者各行省的军阀) 对国家统一造成的严重威胁。他们几乎达到了权力顶峰; 无论大小, 在各个领域都非常成功。他们之中最强大的几乎成为独立“王朝”。奥斯曼帝国政府不得不依靠他们作为中间人来收税和招募士兵。

在 19 世纪初期，两个势力强大的阿扬离宣称独立仅在一息之间，他们是伊庇鲁斯约阿尼纳地区（Janina in Epirus）的泰佩代伦利·阿里帕厦（Tepedelenli Ali Pasha）和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厦（Mehmet Ali Pasha）。他们两个都通过雇用欧洲教官来提高军队的效率和实力。穆罕默德·阿里在法国教官的帮助下创办了一所军事学校。他杀害了绝大多数马穆鲁克首领（the Memluk beys），并且成为整个埃及的统治者。其重大改革主要在教育、工业和农业领域。这两个阿扬都与欧洲国家有着持续的联系，即使是“非官方”的。很明显，这些发展削弱了苏丹的权威，并对帝国的统一产生了致命的威胁。

第二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禁卫军（Janissary corps）造成的，他们已经成为苏丹统治的绊脚石。在帝国放弃一贯的征服政策以后，禁卫军丧失了其最重要的地位，从而被忽视。当他们入不敷出时，政府会对禁卫军的各种贸易行为视而不见。由于忙于商业上的事情，他们不愿在训练场上花费太多时间，但火器技术的发展提升了训练有素的军队之重要性。作战策略依然基于在战场上面对的两军。当敌人开火时，看到战友在周围倒下是非常令人恐惧的；而且，没有受过训的士兵，不论多么勇敢都会很容易被迅速击败。对于禁卫军来说，要放弃市场上的盈利而专注于军营训练，他们必须获得足够的补偿。军事改革是必要的，不仅仅是为了打败外国军队，也是为了抑制阿扬反叛的趋向。

在咨询顾问并研究他们的报告之后，塞利姆三世开始军事改革。1793 年，一支新的纪律严明的核心军队——“新秩序”（The Nizam-i Cedid）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名字与法国大革命“新秩序”类似。塞利姆三世谨慎地逐步推行改革，以

免激起那些倾向于打翻“汤锅”（苏丹的恩赐，拒绝就意味着反叛）的禁卫军的愤怒。因此，他不得不征收额外的税收以获得专门的收入，作为供养新式军队的单独财政；“新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纳税人是不利的。奥斯曼帝国在巴勒斯坦的阿卡（Acre）地区战胜拿破仑之后，土耳其正规军的数量增加到10000人。苏丹在1805年颁布法令，要求在埃迪尔内（Edirne, Adrianople）建立一支同样的军队；1806年一些鲁米利亚的阿扬便发动了叛乱。正当新军被派往镇压这次叛乱的时候，苏丹不得不召回他们，以镇压发生在泰基尔达（Tekirdağ, 色雷斯）的另一场叛乱。第二年，爆发了以卡巴克齐·穆斯塔法（Kabakçı Mustafa）为首的禁卫军叛乱。当塞利姆还在犹豫是否命令新军采取行动时，局势已变得无法控制。塞利姆被废黜（1807年），穆斯塔法四世（1807~1808年）登上帝位，“新秩序”被解散。

《行为协定》（Sened-i İttifak）

侥幸活下来的改革者逃往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厦（Alemdar Mustafa Pasha）的领地——鲁塞（Ruse/Rudçuk）。阿莱姆达尔找了一个借口前往伊斯坦布尔，并抵达托普卡帕宫，计划拥护塞利姆三世复位。意识到阿莱姆达尔帕厦的真正意图之后，苏丹穆斯塔法四世关闭宫门，并立即下令处决奥斯曼皇室仅存的两位男性成员——塞利姆三世和马哈茂德。塞利姆三世被处决；马哈茂德却成功逃脱，并为阿莱姆达尔帕厦攻入托普卡帕宫营救他赢得时间。马哈茂德继位成为苏丹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任命阿莱姆达尔帕厦为大维齐尔。阿莱姆达尔作为国王的拥立者，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成为权力极

大的大维齐尔。他的第一个倡议是组织一支与“新秩序”类似的新式军队——塞克班军团 (the Sekban-i Cedid corps)。他召集那些最有影响力的阿扬到伊斯坦布尔开会，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的潜在目的是，通过授予阿扬官方身份并制定规范阿扬权利和义务的准则，以消除他们对帝国稳定的威胁；这实际上限制了阿扬的权力。

会议在众多阿扬的参与下召开，最终通过了一份《行为协定》，对中央政府和各省阿扬的关系做出了规定。这份文件的条款概括如下：

(1) 阿扬将忠于苏丹，但是有权反抗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

(2) 当需要时，阿扬将会帮助招募士兵，并成立一支新的军队；

(3) 税收不得过于繁重，并定期征收，给国家的份额不可侵吞，而且只有在阿扬和政府商议之后才能征收新税；

(4) 除非明显有罪，否则国家官员和阿扬不受处罚，也不得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

这份文件很重要。如果这个法案付诸实施，那么阿扬将会得到官方的认可。这份合约本身也许可以成为奥斯曼帝国的第一部“宪法”。它规定的关于税收的原则：公平与协商一致，为历史上所有的民主革命所采纳。因此，可以说，关于征税达成的协议标志着议会政治的开始。涉及惩罚政府官员和阿扬的原则是争取法治政府的基本条款，为所有的人权宣言所采纳。

有人认为，这份合约的某些方面与1215年英王约翰被迫与大贵族签订的大宪章类似，规定了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尽管大多数条款只有封建贵族可以受益，但是其中一些关于税收

和司法的条款意味着争取更多自由和民主的开始。

土耳其历史学家对阿扬和该协定的评价一般是负面的，因为他们认为在 19 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建立封建秩序是一种倒退，甚至是同欧洲浪潮背道而驰的发展。但马哈茂德二世发现，自己如果没有欧洲的支持，便无法镇压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发动的叛乱。因此，奥斯曼帝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列强；然而，在《行为协定》的框架内，同穆罕默德·阿里的协议便可以在没有外国介入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独立。这些仅仅只是猜测，没有史实可以证明。

阿莱姆达尔帕厦担任大维齐尔三个半月之后，禁卫军再一次发动叛乱，并围攻阿莱姆达尔的官邸。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后，阿莱姆达尔不堪袭击，英勇牺牲。面对这场战斗，马哈茂德并没有派出塞克班军团前往救援。有人推测，他可能对阿莱姆达尔的权势和《行为协定》感到忧虑。在杀死阿莱姆达尔之后，禁卫军转而进攻托普卡帕宫。马哈茂德二世处死了穆斯塔法四世，以保住自己的皇位，因为这使他成为奥斯曼皇室唯一的男性继承人。迫于他的这种策略，禁卫军被迫承认他为苏丹，但他们成功解散了塞克班军团。那些在塞克班军团建立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被接连处死。如此，这次军事改革的尝试失败，直到 1826 年才被重新提起。

希腊革命和埃及问题

接下来的几年，马哈茂德采取各种方式瓦解阿扬的权力，并在总体上取得了成功。然而，当 1820 年轮到解决约阿尼纳（Janina）的阿扬泰佩代伦利·阿里帕厦时，马哈茂德发现问题很棘手。经过奥斯曼军队长达 17 个月的围攻后，仍要诉诸计谋

才迫使阿里帕夏屈服。苏丹放出消息宣称，答应特赦阿里帕夏，并希望达成协议。阿里停止了敌对，很快被处决。当军队正忙于与泰佩代伦利作战时，摩里亚半岛的希腊人发动起义，这成为他们争取独立的开端（1821 年）。当摩里亚半岛的穆斯林被希腊反叛者残杀时，马哈茂德正在约阿尼纳忙于同泰佩代伦利的战斗。在约阿尼纳最终被攻陷之后，军队才向南开进，此时摩里亚和雅典都已落入叛乱者之手。经过三年全力以赴的作战，禁卫军仍然不能平定摩里亚半岛和雅典的叛乱。马哈茂德请求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出兵帮助（1824 年），后者派出由他儿子易卜拉欣（İbrahim）统率的军队，很快就镇压了这场叛乱。然而，英国、法国、俄国的干预使得这场胜利意义尽失，这几个国家派出一支联合海军舰队在纳瓦里诺海战（the battle of Navarino）中击败并彻底摧毁奥斯曼 - 埃及舰队。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并以 1829 年《阿德里安堡条约》（the treaty of Adrianople）的签订而结束。根据该条约，奥斯曼帝国承认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自治。希腊则在 1830 年完全独立。

这些事件导致禁卫军的解散。禁卫军“打翻汤锅”的次数太多了。苏丹开始创建一支纪律严明的新式军队。当禁卫军如期反叛时，政府组织的联军早已蓄势待发。普通民众也站在政府一边参与战斗，禁卫军在一场血腥遭遇战中被歼灭。这件事被称为“吉祥事件”（Vaka-yi Hayriye）。那些没有逃跑和隐藏的禁卫军都被杀死。一支称为穆罕默德常胜军（Asakir-i Mansure-i Muhammediye）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取代了禁卫军。

“吉祥事件”为改革铺平了道路，并把埃及的改革当作模板。1827 年，第一批土耳其学生被派往欧洲学习，第一所西式

的高等教育机构——伊斯坦布尔医学院（the Tıbbiye）成立。1831年，官方报纸《时事纪要》（*Takvim-i Vekayi*）出版，这是奥斯曼帝国的首份报纸。1833年，翻译馆成立。直到希腊革命时，土耳其人所讲的外语仅仅有阿拉伯语（科学用语）和波斯语（文学用语）。法纳尔人（the Phanariots，伊斯坦布尔法纳尔教区的希腊人）一般被任命为高门（大维齐尔的办公处）的翻译官。希腊叛乱发生之后，高门不再信任法纳尔人，开始任命土耳其人为翻译官（1821年）。给土耳其人系统地教授法语，是在翻译馆开办之后以师徒制的模式进行的。军事学院（Harbiye）创立于1834年；公务员学校（the Mülkiye）是第三所高等教育机构，成立于1859年。这三所学校及之后类似机构的毕业生形成了知识分子的核心，并成为后来现代化运动的领导力量。

这些学校毕业生创办的政治组织——统一进步协会（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发动的革命，开创了第二君主立宪时期（1908~1918年）。一个有趣的点凸显了奥斯曼-伊斯兰传统教育机构的无效：由于缺乏能够跟得上高等教育新式课程的学生，这些西式学堂必须建立自己的小学和中学。直到1848年，军事学院（1834年成立）在建立十四年后才有了第一届毕业生。

在镇压希腊叛乱后，奥斯曼帝国和埃及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最终在1831年派遣一支军队到巴勒斯坦，使得这种矛盾公开化。埃及军队在与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三场对决中都取得胜利。1833年埃及军队到达屈塔希亚（Kütahya），并做好在布尔萨过冬的准备。马哈茂德面临两个不情愿的选择：要么与穆罕默德·阿里达成妥协，要么向外国势

力寻求帮助。他选择了后者。那时，英国和法国都无暇顾及奥斯曼帝国的事情。所以只能求助俄国，马哈茂德引用格言：“一个人掉进海里，却抱住了一条蛇”（然而，他本应该接受穆罕默德·阿里而不是抱住毒蛇）。俄国以极大的热情回应了他的求援，派军队到达伊斯坦布尔，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驻扎下来。这些动向引起其他强国的注意，并在欧洲引起了巨大骚动。在法国和英国的干预下，埃及和奥斯曼帝国在屈塔希亚签署了协议，任命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为吉达（Jedda）、大马士革（Damascus）、阿勒颇（Aleppo）和亚达那（Adana）的总督。

1838 年条约

像马哈茂德这样视权如命的苏丹，这种情形是无法容忍的，必须加以调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通过了许多决定性的改革方案，希望以此来增强帝国的实力，并获得欧洲列强的支持。马哈茂德甚至采取进一步措施来确保英国的帮助和支持，在 1838 年签订了《奥斯曼帝国与英国贸易协定》（the Ottoman - British Trade Agreement），给予英国比之前的“让步协定”（Capitulations）更多的特权。

(1) 英国产品在缴纳 5% 的进口税或 12% 的出口税之后免收一切内地税。这个条款对本地商人不利，因为他们需要缴纳内地税。

(2) 奥斯曼政府将取消对一些产品的垄断。因此，英国商人可以从生产者那里直接购买这些东西，相互之间进行交易，这实际上决定着产品的价格。

(3) 允许英国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参与国内贸易。

根据多安·阿夫哲奥卢 (Doğan Avcıoğlu) 的看法, 这个条约的签订导致传统行会产业的瓦解, 并阻碍了奥斯曼帝国参与工业革命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因此这是一份“死亡判决书”。其他的历史学家则认为, 即使没有这份条约, 奥斯曼帝国的传统行业也无法抵挡工业革命的冲击。以上两种情况都无法得到证实, 但是无论哪种情况, 这个条约都在奥斯曼帝国传统行业的衰落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1839年, 奥斯曼帝国军队和埃及军队在尼吉普战役 (The battle of Nizip) 中第四次遭遇, 奥斯曼军队再次被打败, 这表明了军队的衰败。很明显, 奥斯曼军队丧失了战斗力量。因此,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军队丧失了其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力。从那时以后, 当政的帕厦一般对战争没有实际经验, 反而能说很流利的法语, 并通晓外交政策。现在, 奥斯曼帝国不是依靠军事胜利而是外交手段维持帝国的存在。当军队在尼吉普战役遭到惨败时, 海军叛逃埃及, 马哈茂德二世也处于弥留之际。但是这种士气低落的时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新任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 (Abdülmeçit) 一世任命改革家穆斯塔法·雷希特帕厦 (Mustafa Reşit Pasha) 为其导师。英国予以全力支持, 尼吉普战役之后的情形得以好转。最后, 穆罕默德·阿里失去了他在屈塔希亚战役中得到的所有行省, 只得满足于世袭埃及总督的头衔。

《坦兹马特法令》

在此关键时刻, 穆斯塔法·雷希特帕厦说服苏丹, 只有宣布进行改革才能赢得西方国家的友好和支持。《坦兹马特法令》, 也被称为《花厅御诏》(《玫瑰园敕令》), 宣布在全国实

施改革，并会在 5 ~ 10 年的时间里走上复兴之路。

这份法令所涉及的问题如下：（1）保护生命、尊严和财产安全；（2）废除包税制度；（3）重新修订兵役制度，把服兵役年限缩短至 4 年或 5 年。法令许诺将会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颁布新的法律。受贿是非法的。未经审判不得判处死刑，不论种族和信仰如何，司法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法令附带发布官方邀请，请欧洲国家来为这些原则做见证。

关于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普通市民相对安全，但是政府官员仍然是奴隶身份，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被政治处决并没收财产。尽管财产充公在 1826 年就被废除了，但是佩特维帕厦（Pertev Pasha，雷希特帕厦的导师）还是因为激怒马哈茂德而被政治处决。坦兹马特终结了奴隶身份，保证了政府官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包税制度仅仅废除了两年，包税商的阻挠加之混乱的官僚机构使得政府在包税制外无法收税。包税制和什一税直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的 1925 年才得以废除。兵役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坦兹马特以前的征兵是任意的，一些地区提供大部分兵员，其他地区却不提供任何兵员。此外，一旦被招募入伍，他的下半辈子可能都在服兵役。这种制度即使没有全部也大部分得到了修正。

规定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一律平等的条款，可以称得上是革命性的创新。帝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对非穆斯林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但在 17 世纪之后随着一系列的失利，非穆斯林被鄙视为下等人，并遭受压迫。

坦兹马特以官方的形式传达给欧洲各国代表，这表明他们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他们成了改革的保证人。坦兹马

特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福阿德帕夏（Fuat Pasha）曾经这样解释列强们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国家的权力有两种来源，一是来自上面，一是来自下面。在我们国家，来自上面的权力压制着我们所有人，而且无法控制来自下面的权力。因此，我们需要像鞋匠一样使用拐顶的侧击力（拐顶是一个铁球，用来敲打鞋子以成型并使接缝平整）。”这个侧击力便来自大使们。帕夏使用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源自苏丹，自下而上的权力应该是人民的权力。这是对奥斯曼王朝政治极好的总结，描述了苏丹至高无上的权力、人民的被动地位和政治家的软弱性。结果，帕夏不得不依靠列强的支持来获得对抗苏丹的相对权力。例如，穆斯塔法·雷希特、侯赛因·阿夫尼（Hüseyin Avni）和米特哈特帕夏（Mithat Pasha）得到了英国的支持，阿里和福阿德帕夏得到了法国的支持，马哈茂德·奈迪姆帕夏（Mahmut Nedim Pasha）则得到了俄国的支持。

需要明白的是，在1839年的军事衰败之后，奥斯曼帝国已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而是变成了西方的附属国。奥斯曼帝国情形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个特定国家的殖民地，而是变成欧洲所有列强共同的附属国。很明显，作为几个列强共管的附属国比成为单一系列强的附属国要有更大的优势。奥斯曼帝国在列强之间的相互斗争中获益，借助一方来对抗另一方，从而有一定的自由采取对自身有利的策略。俄国屡次试图获得对奥斯曼帝国的绝对控制权（1833年、1853年、1878年），但每一次的尝试都在列强的联合军队前被迫让步。一方面，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体现了诸列强和奥斯曼帝国的对抗，他们希望在即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获取权力或地缘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为巴尔干各国人民摆脱奥斯曼

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简而言之，这是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历史。

许多土耳其民族主义作家用批评的眼光来看待坦兹马特，因为它恰好出现在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依靠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友好态度来维持统治的时期。尽管坦兹马特恰逢奥斯曼帝国的衰退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一只跳蚤就烧掉整床被子。我们不能忘记，坦兹马特是土耳其民族争取公民权利和立宪政府的开端。

第六章 改革法令和青年奥斯曼党

1853年，巴勒斯坦的圣地问题给了俄国取代其他欧洲列强控制奥斯曼帝国的借口。在英法的支持下，奥斯曼帝国起而反对，从而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的爆发。这场战争以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Sardinia）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俄国战败，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为了增强奥斯曼帝国抵抗俄国进攻的力量，1856年签订的《巴黎条约》规定，尊重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及其领土完整，并把奥斯曼帝国置于欧洲法律的保护之下。帝国由此“欧洲化”（Europeanised）。反过来，奥斯曼帝国政府公布了改革法令（the Reform Decree, 1856年），重申《坦兹马特法令》，并进一步制定了详细条款，使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奥斯曼帝国被当作欧洲国家，其领土主权受到尊重，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这个问题在巴黎会议召开的时候便很明显。奥斯曼帝国代表阿里帕厦提议，既然奥斯曼帝国置于欧洲法律之下，那么以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应该废除，但其他与会代表都不理会他的这一提议。关于领土完整这个问题，其实际含义是，如果列强之间达成协议，奥斯曼帝国就可以被肢解或瓜分。

在奥斯曼帝国内，赋予非穆斯林同等权利被讽刺为：“异教徒不会再被称作异教徒”。吉达、黎巴嫩、大马士革地区爆发了针对基督教徒的暴乱，局势失控以至于英、法不得不进行干预。穆斯林仍然把自己看作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且对非穆

斯林的少数派资产阶级过于欧化的生活方式愤愤不平。通过与西方合作并借用后者的资本，这些资产阶级在各行各业中发展起来，经营贸易甚至工业生产。似乎这还不够，他们现在又获得了与穆斯林平等的权利。这些都是穆斯林做出过激反应的原因。

青年奥斯曼党

为了全面的理解青年奥斯曼运动 (the Young Ottomans movement)，首先必须考虑到新闻业的发展，因为记者是这场运动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奥斯曼帝国第一份报纸是官方报纸《时事纪要》(1831 年)，接下来是英国人创办的《杰里代伊·哈瓦迪斯 (新闻)》(*Ceride-i Havadis*, 1840 年)，这份报纸也具有半官方的特点。独立新闻业真正开始于 1860 年查潘札德·阿加·埃芬迪 (Çapanzade Agah Efendi) 创办的周刊《泰尔居曼伊·阿赫瓦拉 (解说报)》(*Tercüman - I Ahval*)。著名的作家、诗人辛纳西 (Şinasi) 开始为该报工作。到 1860 年之后，土耳其报纸数量有了飞速增长。报纸的发行量不高。但那时的街区咖啡馆 (土耳其语, *kıraathane*) 夜间就成了聚会和阅读的場所；在那里，报纸被高声诵读给在场者，从而比其较低的发行量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很快，不同报纸之间便有了竞争。为吸引读者，报纸需要发表涉及重大问题及针砭时弊的文章。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官方的不满，1864 年，政府颁布《出版业条例》(the Press Regulation)。这就为实施诸如查封、罚款、监禁等惩罚性措施扫平了道路。这个条例可能促成了专业协会 (Meslek) 的成立，这是一个由著名记者组成的秘密社团，其中包括革命作家、诗人纳米克·凯末尔 (Namık Kemal)，

其目的是颠覆阿里帕厦的统治。后来其成员增加到 245 人。这个社团作为“爱国阵线”（the Patriotic Alliance）为众人所知，但其真正的名字是“梅斯莱克”（Meslek）。

在过去，土耳其语中的自由（hürriyet）仅仅意味着不是奴隶，现在则有了新的政治内涵。对于纳米克·凯末尔这样的记者来说，自由首先意味着新闻自由。在批判西方潮流方面，保守者陈腐地认为，西方只是诸如牛仔裤、男士领带等表面事物的发源地。政治自由的概念可能也是表面的模仿，尽管受西方潮流的影响，却似乎回应了社会的需求。

1867 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穆斯塔法·法泽尔帕厦（Mustafa Fazıl Pasha）是统治埃及的卡瓦拉勒（Kavalalı）王朝的成员；他是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帕厦的弟弟，而且是总督的第一继承人。然而，穆斯塔法·法泽尔帕厦在伊斯坦布尔任政府职务时得罪了当时政府最有权势的人物福阿德帕厦，随后被解职流放到欧洲。不久之后，埃及总督的继承制度变为长子继承制，穆斯塔法·法泽尔帕厦被剥夺了继承资格。穆斯塔法·法泽尔帕厦为此很愤怒，他公开发表了一封亲笔信，在其中尽抒长期困扰奥斯曼帝国的问题。这封信公开提到“青年土耳其人”，并认为奥斯曼帝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一种全新的自由概念产生了，它超越了新闻自由，包含有建立宪制政府的要求。“青年”一词体现了对法国大革命原则的忠诚——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政体的反对。后来，土耳其共和国的创立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将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嘱托给“青年人”，很可能这些观念早已在他心中。（其间，欧洲也有“青年意大利”和“青年德意志”运动。）在这种君主立宪制下，选

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被赋予了限制政府和君主的权力。

穆斯塔法·法泽尔帕夏给出版界的公开信有着深远的影响。政府开始意识到自由派运动产生的威胁。纳米克·凯末尔、齐亚帕夏 (Ziya Pasha)、阿里·苏阿维 (Ali Suavi) 被勒令离开伊斯坦布尔，梅斯莱克组织起来的政府接管机构也失败。法泽尔帕夏在法国的安全处境中号召青年土耳其党人继续斗争。在法国，梅斯莱克的 8 个成员，包括纳米克·凯末尔、法泽尔帕夏、齐亚和阿里·苏阿维，创办了青年奥斯曼协会 (the Young Ottoman Society)，并开始出版报纸。在欧洲自由的环境下，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得以发展他们的意识形态，并自由发表他们的思想。

青年奥斯曼协会最杰出的成员是纳米克·凯末尔，他的作品和诗篇不仅仅对他那一代人而且对下一代人有着深远的、革命性的影响，包括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纳米克·凯末尔因其诗歌《祖国和自由》 (*the motherland and liberty*) 而广受赞誉。我们前面已经提及“自由”概念的演化，现在则可以谈谈“祖国”的含义，即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在此之前的奥斯曼历史进程中，一个人的故乡仅仅是指他出生和居住的地方——他生活的地区或城镇。人们称自己是来自伊斯坦布尔或安卡拉的人，而不是奥斯曼帝国公民。所有的土地都被认为是苏丹的财产；人们不是效忠于土地本身，而是忠诚于苏丹；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也应为他或者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不是他们的国家而战。

纳米克·凯末尔用他的诗歌和散文改变了这种思维模式。他拓展了“祖国”这一概念的含义，使之具有了深刻的情感因素。一个人的祖国并不仅仅是一片土地，而且是他挚爱的地方，

为了它甘愿做出巨大的牺牲，包括自己的生命。

纳米克·凯末尔于1870年重返伊斯坦布尔，1873年他的剧本《祖国》（*Vatan Yahut Silistre*）得以上演。观众为该剧描绘的理念，即人民自主决定自己的国家所激动。上演期间，人们自发地进行游行示威活动，几乎每次演出结束后都会涌上街道。该剧被禁演，作者逃往塞浦路斯的马格萨（Magosa）。我们不知道其确切动机，但可以肯定的是，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Abdülaziz）和他的政府被新观念搞得心神不宁。从这个角度来说，热爱祖国意味着忠于苏丹之外的事物，苏丹被降低到第二位。它暗示，人民可以分享苏丹拥为己有的土地。这是个人主义的和民主的思维方式，与绝对君主专制的价值观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更进一步的观念认为，每个国家都拥有一个独立的实体。即使在欧洲最苛刻的专制主义政体中，国家都有一个与其统治王朝不同的名称（俄国、普鲁士、法国），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名字却来自奥斯曼家族。“土耳其”这一名称最先出现在欧洲，在很久以后的独立战争时期才被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采纳。

纳米克·凯末尔采纳了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并改造成容易被穆斯林接受和理解的术语。例如，他引证伊斯兰教的效忠宣誓（*biat*）仪式同卢梭（Jean - Jacques 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相类比。在宣誓效忠仪式上，民众认可苏丹的权威；反过来，人们认为同苏丹达成协定，即他承诺避免对民众进行镇压，公正地处理与人民的关系。因此，当认为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他们就有权利进行反抗。政治权利和议会制被理解为类似《古兰经》中的协商（*meşveret*）命令，即要求信徒遇事要“协商”。纳米克·凯末尔带给土耳其人民的观念还包括：

——所有人生来都是自由的。

——国家实体与人民不可分割，国家利益与人民密不可分。

——教育应该采用土耳其语。摆脱拉丁文的束缚曾经促进了欧洲的发展，摆脱阿拉伯语的束缚同样也会促进奥斯曼帝国的发展。

“我们的未来在握”。穆斯林法理 (Fikih) 称：“审判标准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kad tegayyürül ahkâam betebdilil zaman)。我们必须接受进步的成果。我们必不能退回过去，或者保持一成不变。” (摘自纳米克·凯末尔：《我们的未来在握》)

根据纳米克·凯末尔的看法，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土地上的人，无论何种信仰和语言，都是奥斯曼人。这被称为“民族大团结”，也称作“奥斯曼主义”或“奥斯曼民族主义”。这一观念在共和国时期被谬误性地嗤之以鼻。瑞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瑞士境内有四种语言：日内瓦、沃州 (Vaud)、纳沙泰尔 (Neuchatel)、弗莱堡和瓦莱斯 (Valais) 地区讲法语；三分之二的人讲德语；临近意大利的提契诺州 (Ticino) 讲意大利语；格劳宾登州 (Grisons) 讲罗曼什语。但是全世界都认可瑞士是一个国家，甚至是像希特勒这样疯狂的权力独裁者，也从来没有真正吞并或“解放”德语州的想法。比利时是另外一个例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或国家主义的概念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独立于语言、宗教和国土 (某些情况下) 的范围。如果一个人坚信他自己属于某个国家并忠于这个国家，事实上尽管他不说这个国家的语言或与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信仰不同，这都不会影响他的信念。英国历史学家泰勒 (A. J. P. Taylor) 认为，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不是因为它们混杂的种族结构，而是因为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第七章 第一个君主立宪制政府和大危机

金融危机开启了土耳其君主立宪的第一阶段，史称第一宪政时期（Birinci Mesrutiyet）。这是历史循环的一个有趣例子。由于经济危机，人类追求自由的斗争取得了很多突破。在英国，这样的情形出现于17世纪40年代。国王查理一世坚持增加课税和额外征兵，加之其不负责任的方式，引发了君主和议会之间的武装斗争。在法国，三级会议自1614年后一直未召开，直到1789年国王需要资金时才不得不重新召开。正是这场会议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另一个例子是由不公平征税引发的美国独立战争。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奥斯曼帝国开始向欧洲借款；其财政机构发行债券，并在欧洲金融市场上卖给投资者。然而，这些借贷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给公共项目或诸如修建铁路之类的生产计划；大部分钱都浪费在为宫廷购买奢侈品以及购买武器等非生产领域。在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总吨位在欧洲居第二位。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十二个子女之一的法蒂玛·苏丹娜（Fatma Sultana）嫁给穆斯塔法·雷希特帕厦之子阿里·加利普（Ali Galip），这场持续了十五天的婚礼花费了两百万磅黄金。终于，这种花钱方式导致了债务的恶性循环，用新债还旧债。由于对奥斯曼帝国财政政策信心的下降，借贷的获得只能基于日益不利的毁灭性利率基础之上。据官方统计，十四分之一的国家预算被划拨给

宫廷花费，有传言称宫廷实际上花费了总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一些地区的饥荒（在安卡拉地区很多民众死于饥荒）加速了这一必然结局的到来。1875 年 10 月 6 日，大维齐尔马哈茂德·内迪姆帕夏（Mahmut Nedim Pasha）被迫通过《下调利率决议》（the Reduction of Interest Decision），宣布国家破产。降低债券利率是出于奥斯曼帝国利益的考虑；只有一半在 5 年内可以还清，那些年利率 5% 的债券被无息债券所取代。

因此，在经济（1838 年）和军事（1839 年）破产之后，帝国财政也最终破产了，从而变得比以前更加依赖于欧洲国家的支持。债券持有人损失了 50% 的收入，这导致了英国和法国债权人强烈的抗议，因为他们持有大部分债券。欧洲公众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开始转变为敌视。《下调利率决议》颁布之前，这些人一直同情他们的困境，并相信他们在尽最大努力取得进步。现在这些都颠倒了，奥斯曼帝国被看作在野蛮中沉沦。

1875 年上半年，黑塞哥维那信仰基督教的农民爆发了一场大规模起义。在巴尔干地区，对落后的奥斯曼政府的敌对情绪也在积聚。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增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被认为是难以忍受的不公平负担。俄国尽其所能煽动这种反抗情绪。奥匈帝国则对这种民族主义趋势深表忧虑，因为它试图将其势力范围扩大至靠近萨洛尼卡以南的地区。如果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联合起来，门的内哥罗也有可能加入该联盟，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强大的塞尔维亚国家，它可能拥有巨大的人口；届时它有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的发源地，进而妨碍奥地利向南扩张。由于这些原因，奥地利想要控制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奥地利煽动黑塞哥维那叛乱；当叛乱迅速发展时，列强

则加以干涉，要求其进行改革。

1876年5月，保加利亚也开始反叛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屠杀了大量穆斯林后，叛乱被镇压，双方都有很多人丧生。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这场叛乱中有1000名土耳其人和4500名保加利亚人被杀。西方人一般都忽视土耳其方面的损失，却强调保加利亚一方的损失；他们坚持认为保加利亚死了15000人。英国在野的自由党领导人格莱斯顿（W. E. Gladstone）利用《下调利率决议》引起的反奥斯曼帝国的情绪，发起了一场反对保守党的运动；后者当时执政并支持奥斯曼帝国。

1876年5月30日，新上任的穆特吉姆·吕希蒂帕厦（Muterdjim Rüstü Pasha）政府强迫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退位（四天后自杀）。苏丹被指控应为管理失当和灾难性的财政状况负责。新继位的苏丹是穆拉德五世（Murat V）。在其统治时期，政府中的两派人员分别提出可行方案，以使政府控制宫廷的肆意挥霍。改革派的首领米哈特帕厦（Mithat Pasha）坚持认为，实行君主立宪体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只有选举产生的议会才能控制宫廷的开支。另一个有影响力的大臣侯赛因·阿夫尼帕厦（Hüseyn Avni Pasha）和他的支持者却倾向于另一种解决之道，认为苏丹必须被降到没有政治权力，而只是象征性领袖的地位，所有的权力都应归属于政府。他说，“君主立宪制度不适用于我们”。政府最初想采用第二种方案，但在关键时刻侯赛因·阿夫尼被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副官谋杀；并且很明显，穆拉德五世因患有严重精神疾病而无法胜任其职责。这些事件为君主立宪制开辟了道路，法定继承人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Abdülhamit）会见米德哈特帕厦，承诺如得支持将继承皇位。穆拉德五世仅仅统治了三个月便被废黜。

德沙那会议

新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颁布法令，声称应该在宪法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信守其对政府的承诺，并希望阻止欧洲国家的干涉。所有奥斯曼的民族或米勒特 (millet) 都有权选举议会代表，议会将实施必要的改革。与此同时，诸列强已经准备在伊斯坦布尔组织召开商讨巴尔干问题的大使会议。1876 年 12 月 23 日，正当大使会议就要在德沙那 (Tersane, the Dockyards) 召开之际，新的宪法和君主立宪制在枪炮声中宣布诞生。外交部长萨费特帕夏 (Saffet Pasha) 站在台上宣布：奥斯曼帝国人民通过建立宪制和代议制政府已经能够自己控制国内事务，所以这次会议的召开就没有意义了。但与会代表漠视这个既成事实，并继续召开会议讨论巴尔干问题，而且没有任何承认新宪制政府的迹象。这次会议制订了一个整体的改革计划，准备促使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逐步走向自治。奥斯曼政府被警告，如果拒绝这个方案，所有的外国大使将撤离伊斯坦布尔，而且俄国很可能会对其宣战。

在经过特别委员会商议之后，奥斯曼政府拒绝了列强的方案，随后大使们撤离了伊斯坦布尔。该会议 16 天之后，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解除了大维齐尔米哈特帕夏的职务，并将其流放。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君主立宪体制已经无法折返了。根据宪法，议会由两个立法机构组成：在两级制下选出的众议院 (the Chamber of Deputies) 和由苏丹任命的参议院 (the Chamber of Notables/the Senate)。1877 年 5 月 20 日，举行选举，并召开第一届议会。两个月后，新议会再次召开会议，一直开到 1877 年末，而且，在 1878 年初召开了另一场长达两个月的

会议。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在 1877 年成立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是土耳其走向民主的里程碑（例如，俄国直到 1906 年才召开由选举产生的议会）。

对于一个首次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来说，众议院表现得非常成熟。尽管众议院中几乎一半议员都是非穆斯林，在面对战争时却显示出了典型的奥斯曼式团结。查阅有关议会的官方记录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政府和行政机构深受无知、腐败、无能和压迫的困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议会总体上是进步、自由、理性的，并决定在任何条件下都通过法律支持政府。议会对政府无能的批评是客观的，并把对国家的忠诚当作首要议题。

在德沙那会议的决议被拒绝之后，列强在伦敦开会，并修改他们的要求；但阿卜杜勒·哈米德及其政府在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再次拒绝他们。这是一种勇敢的立场，因为很明显，俄国渴望借此发动战争。

奥斯曼政府肯定是对自己军队的实力过于自信；并且期望，如果最糟糕的事情发生的话，英国政府会像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那样来帮助自己。国家仅仅是被民族主义精神团结起来。1877 年 4 月 24 日，俄国发动了 1877 ~ 1878 年俄奥战争，在土耳其历史中被称作“93 战争”（1877 年在穆斯林的历法中是 1293 年）。尽管最终奥斯曼帝国战败，但保加利亚的普列文 [Plevne，由奥斯曼帕厦（Gazi Osman Pasha）率领] 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埃尔祖鲁姆 [由艾哈迈德·穆合塔尔帕厦（Gazi Ahmet Muhtar Pasha）率领] 的保卫战胜利，证明 1839 年的“军事破产”已经成为过去。

当俄国军队攻打到伊斯坦布尔附近时，奥斯曼帝国被迫签

订《圣斯特法诺条约》(the Treaty of San Stefano)。根据这份条约,当时实行自治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获得完全独立。保加利亚变成一个毗邻爱琴海的独立公国,从而切断奥斯曼帝国通往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的道路。俄国吞并了卡尔斯(Kars)、阿尔达汉(Ardahan)和巴统(Batum)地区;奥地利则控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英国认为这些条款太苛刻了,下令海军驶入马尔马拉海。这时德国政府进行干涉,首相俾斯麦号召在柏林召开会议。《柏林条约》(1878年)决定建立一个较小的保加利亚自治公国和一个有特殊地位的地区——以普罗夫迪夫(Plovdiv)为中心的东鲁米利亚省。马其顿被归还给奥斯曼帝国,以此来确保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完整。其他条款则保持不变。

在向奥斯曼帝国宣战时,俄国或许已有心超越领土扩张和地区霸权的传统目标。此次,俄国发动战争是为了反击奥斯曼宪制政府引起的意识形态挑战。自法国大革命之后,俄国就变成了绝对君主专制的捍卫者,并毫不犹豫地通过军队予以维护。

当俄国军队攻至伊斯坦布尔时,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暂停了议会。然而,这并不是第一宪政时期的结束,因为尽管议会不再召开会议,但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表现得似乎将要恢复立宪政府。所有法律条款都注明,将“在议会召开时重新讨论”;并任命了新的参议员。然而,1880年4月,英国举行大选,以格莱斯顿为首的自由党上台执政。由于该政府是公开反对奥斯曼的,所以在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看来,继续装作要恢复土耳其议会,似乎无利可图。因此,1880年之后,奥斯曼帝国又逐渐倒退到不断增强的专制统治之下。

第八章 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统治时期

阿卜杜勒·哈密德在位时间长达 33 年。其统治以警察国家著称，尽管如此，这一压迫性政权还是逐步持续向前。

阿卜杜勒·哈密德首次滥用权力是罢免米哈特帕厦，后者在担任保加利亚和巴格达总督时期完成了许多发展项目。他同时也是几个历时久远的土耳其机构的创办人，其中有几个一直存在到今天的机构：土耳其农业银行（Ziraat Bankasi）、社会保障基金（The Social Security Fund）以及职业和工业学校体系。极受自由派和保守派尊重的米哈特帕厦在人民心中成为宪制政府的象征。阿卜杜勒·哈密德政府在 1877 年把他流放，又在第二年赦免，并允许他回国。他被任命为叙利亚总督，但却被禁止开发项目或通过任何方式抬升自己。1880 年他被任命为伊兹密尔总督，随后便以谋杀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为由被捕。一场在耶尔德兹宫（Yıldız palace）庭院帐篷中被操控的审判，宣布他有罪并判处死刑，但在西方舆论的压力下又予以减刑。他被囚禁在塔伊夫（Taif，今天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城市），随后被狱卒绞死。尽管阿卜杜勒·哈密德发表声明称，他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但毫无疑问，他至少应该负政治上的责任。因此，阿卜杜勒·哈密德以一种狡诈的方式恢复了“政治处决”。

在阿卜杜勒·哈密德统治时期，当务之急是让 1875 年破产带来的混乱秩序恢复正常。《1881 年穆哈雷姆法令》（the 1881 Muharrem Decree）将某些税收分派给奥斯曼公共债务部（the

Ottoman Public Debt Administration, OPDA); 这一机构是在西方国家的赞助下建立的, 负责偿还欧洲公债持有者的利息。它采取类似财政部的方式收取一些特定的税收, 但直接把这部分收入分发给公债持有者。为了避免将来再次破产, 阿卜杜勒·哈密德严密监管宫廷的花费。他的经济政策不仅使得国家债务有所减少, 而且使他的个人财富剧增, 从而成为国家最富有的人之一。

阿卜杜勒·哈密德统治的另一个积极方面是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例如, 从 1867 年到 1895 年, 进入中学学习的穆斯林学生人数增长了 4 倍, 达到 33469 人。尽管穆斯林入中学学习的人数增长这么迅猛, 非穆斯林学生的人数仍然是其 2 倍多, 有 76359 人。鉴于穆斯林总人口的数量是非穆斯林的 3 倍, 这就意味着, 受教育的非穆斯林与穆斯林的比例是 6:1。总而言之, 教育领域取得了进步, 但还远远不够。

在奥斯曼公共债务部恢复了民众对帝国金融稳定性的信心之后, 许多项目又可以获得外国的投资。交通运输领域的进步主要是铁路运营里程的增加。奥斯曼帝国的铁路领域主要是由外国资本建设, 德国则由于其海达帕厦—巴格达—巴士拉 (Haydarpasha - Baghdad - Basra) 项目取得主导地位。大马士革—汉志 (Damascus - Hejaz) 铁路则是由奥斯曼帝国自己修建, 用来将朝觐者运送到麦加。

阿卜杜勒·哈密德是个极其多疑的人, 几近精神崩溃。他对秘密警察机构的重视是一个表现。他鼓励人们向王宫举报“可疑行为”, 即便后来证实这些举报是毫无根据的, 举报者仍然会受到奖励。国家笼罩在恐惧和猜疑的气氛之中。政府对新闻业采取严格的审查制度, 卡通和漫画被禁止, 报社每天晚上

必须将所有新闻和文章送去审查，禁止的部分被删除，以至于报纸版面上经常有大片空白部分。审查人员由于害怕给自己带来可怕后果，对审查制度执行得非常严厉，甚至比苏丹本人的要求还严格（苏丹的鼻子大，这让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删除鼻子这个词语）。官方的报纸《时事纪要》在1890年被查封（国家直到1908年都没有官方报纸），原因是一个印刷错误导致了苏丹的不佳形象。

统一进步协会的诞生

1889年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之际，伊斯坦布尔军医学院的五个学生建立了一个名为“奥斯曼统一协会”（Ottoman Union Association）的秘密团体。阿卜杜拉·杰夫代特（Abdullah Cevdet）和易卜拉欣·泰莫（İbrahim Temo）是创立成员中最著名的两位。这个新成立的团体最主要的活动包括阅读纳米克·凯末尔及其他自由派作家的作品。这是一个秘密讨论小组。1895年，该协会与身处巴黎的实证主义者艾哈迈德·里扎（Ahmet Rıza）取得联系，后者建议他们称自己为“统一进步协会”（İttihat ve Terakki Cemiyeti）。

亚美尼亚运动

1895年，亚美尼亚问题在伊斯坦布尔的政治舞台上爆发。柏林会议后，亚美尼亚人是奥斯曼帝国境内唯一没有自治也没有独立的非穆斯林属民。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了诸多学校和医院的美国传教士，鼓励亚美尼亚人朝这一目标努力。而且，《圣斯特法诺条约》中有一条规定，安纳托利亚的六个省〔凡城（Van）、比特利斯（Bitlis）、艾拉泽（Elazığ）、迪亚巴克尔、

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 将在诸强的监督下实施改革，这片广阔的地区历史上称作亚美尼亚。《柏林条约》也包含同样的条款。但两方面的复杂情况，使得亚美尼亚的情形与帝国内其他信基督教的民族有所不同。一是亚美尼亚的地理情况，多山的地形阻止了列强的进入。二是，亚美尼亚人不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亚美尼亚区域人口居多数的民族，他们因为经营各种贸易而散居在帝国各地。甚至在亚美尼亚人最密集的聚居地比特利斯，他们也仅仅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亚美尼亚的革命团体——1887 年建立的钟声（Hinchak）和 1890 年建立的达什纳克楚琼（Tashnaksutyun，亚美尼亚革命联合会），参照“保加利亚模式”进行反叛；流血叛乱被镇压，并导致诸多人员伤亡。这吸引了列强的目光，并答应干预。类似的事件于 1890 年相继爆发于穆萨贝伊（Musa Bey）、埃尔祖鲁姆和库姆卡普（Kumkapı），1892 ~ 1893 年爆发于梅尔济丰（Merzifon）、开塞里（Kayseri）和约兹加特（Yozgat），1894 年爆发于沙逊（Sasun）。在拒绝了俄、英共同制订的亚美尼亚改革方案后，伊斯坦布尔街头爆发了穆斯林和亚美尼亚人之间持续三天的血腥冲突。阿卜杜勒·哈密德派出的警察加剧了这些暴乱。面对这些促使帝国濒危的事件，统一进步协会被迫采取行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张贴了两份公告，宣称亚美尼亚人反抗阿卜杜勒·哈密德的统治是对的，但他们应该同其他奥斯曼人民一样团结在统一进步协会的旗帜下，而非单打独斗。当统一进步协会公开反抗政府时，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面临的压力陡增。统一进步协会的成员逃到国外，许多人前往法国。留在国内的人分别在 1896 年和 1897 年试图策划两次反政府政变，但都在早期阶段就被发现。

统一进步协会于1895年制定协会规章。这份章程中有几个有趣的地方。结构上，这个秘密协会被分成独立的“单元”；因此，如果有成员被警察逮捕的话，在审讯时也不会威胁到整个组织。事实上，统一进步协会在宣布其敌人就是祖国的敌人之时已表明，从一开始它就把自身当作一个目标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的组织。他们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尽快地实现土耳其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统一进步协会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积极支持保护妇女权益，使她们与男性处于同等的地位，并赋予她们同样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做法非常吸引人的眼球，因为那时政府对妇女的隔离政策是非常严厉的。妇女不允许同男士相伴出现在街上，即便这个男士可能是她的兄弟、丈夫或父亲。在这样的社会中，像统一进步协会这样的革命团体欢迎女性成员加入并给予她们同等的权利，彰显了其思想解放的程度。

艾哈迈德·里扎和实证主义

1889年统一进步协会成立之时，青年艾哈迈德·里扎前往巴黎参观法国大革命百年纪念展。他在欧洲一直待到1908年，成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 - 1857）发起的实证主义运动的追随者。法国大革命曾一度把理性主义哲学抬到非官方宗教的地位，与大革命同义，但在拿破仑滑铁卢失利之后，法国又恢复到了革命前的状态，反理性主义也借此兴起。孔德认为，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该区别对待，社会学使得发现统治社会的规则成为可能，从而能够科学地重塑社会，可以确保社会的进步不再依靠革命。实证主义有两大原则：秩序和进步——重视社会的“有序发展”。进步

的原则对奥斯曼帝国的自由派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导致奥斯曼统一协会改名为统一进步协会。根据艾哈迈德·里扎的说法，脱胎换骨的民众比宪法更能拯救奥斯曼社会。这些脱胎换骨的民众是“通过辛勤劳动维持生计”，而且不以“损害别人的利益”来寻求进步。一般而言，这些只有依靠科学的指引和高水平的教育才能实现。

自由派运动在 1897 年后的一段时间里失去了动力。一方面是因为其推翻专制主义的努力没有效果；另一方面是由于阿卜杜勒·哈密德在 1897 年奥斯曼军队对希腊的胜利中威望大增，从而使自由派运动陷入被动。由于受到阿卜杜勒·哈密德“大赦”以及其他虚幻承诺的影响，米赞吉·穆拉德 (Mizancı Murat) 取代艾哈迈德·里扎，成为统一进步协会在巴黎组织的领导人；他与阿卜杜勒·哈密德达成“停战协定”，并返回伊斯坦布尔。统一进步协会在萨巴赫丁亲王 (Prince Sabahattin) 的影响下才得以恢复活力。

萨巴赫丁亲王

萨巴赫丁亲王是附马马哈茂德帕厦 (Damat^① Mahmut Pasha) 的儿子，他的母亲是阿卜杜勒·哈密德的妹妹。当由德国承建的巴格达铁路修到孔亚 (Konya) 时，英国想要投标另建一条亚历山大勒塔—巴格达—巴士拉 (Alexandretta - Baghdad - Basra) 铁路；马哈茂德帕厦受命把英国的计划推荐给苏丹。在这一关键时刻 (1898 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正式拜访阿卜杜勒·哈密德，从而足以确保德国获得这一项目。当时，阿卜杜

① Damat 的意思是女婿，同奥斯曼帝国公主结婚的平民可以享有这个头衔。

勒·哈米德因为亚美尼亚问题正遭到欧洲其他所有君主的抵制。

自知无法完成任务的马哈茂德帕厦，带着两个儿子逃往法国。苏丹的妹夫和外甥因为怕失去自由而逃往欧洲的新闻，成为欧洲各大报纸的头条。阿卜杜勒·哈米德发表声明称，他的外甥被绑架，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自由派运动的复活。1902年，萨巴赫丁亲王和他的弟弟在法国召集第一届“青年土耳其党大会”（Young Turk Congress）。来自帝国各地的40名代表探讨了奥斯曼人民所面临的问题。阿尔巴尼亚的著名人士伊斯梅尔·凯末尔（İsmail Kemal）谈到，直到现在出版宣传刊物仍然是青年土耳其党的唯一活动，如此协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发展；他强调使用军事手段的必要性。亚美尼亚代表甚至认为这样也不够，他们的目标只有在欧洲国家的干预下才能实现。萨巴赫丁亲王认真思考了这些观点，认为条件是干预国必须是民主国家，即法国和英国。艾哈迈德·里扎及其支持者 [纳泽姆博士（Dr. Nazım）和尤素福·阿克丘拉（Yusuf Akçura）] 反对这些决议。

因此，青年土耳其运动分裂为两派。萨巴赫丁亲王和他的支持者们根据会议的决定开始准备军事干预。的黎波里总督雷杰普帕厦（Recep Pasha）同意调动军队支持他们，以便强迫阿卜杜勒·哈米德退位。本来是计划由英国舰队把士兵运送到伊斯坦布尔，但雷杰普帕厦改变了主意。由于没有军队支持，这个计划被迫流产。萨巴赫丁亲王随后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科学上，信奉一种理论，即世界上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社会类型。他把英国作为个人主义社会的最早例子：他们鼓励孩子自给自足，并培养其主动性，结果这些孩子长大后成为企业家，并倾向于冒险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社会拥有分权政府，他们的

城市、乡镇和村庄都自给自足。相比而言，集体主义社会不鼓励孩子们独立自主，并在成人后效力公职。政府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社会不能自给自足，而是希望中央政府供养他们。萨巴赫丁亲王认为，延续奥斯曼社会的唯一方法是向个人主义社会转变。为此，他在巴黎成立了私人机构和分权协会（Association for Private Enterprise and Decentralisation）。

日俄战争

这一时期，远东局势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俄国与日本这个新崛起的帝国为争夺满洲和朝鲜而发生冲突。它们之间的争夺最终导致战争的发生（1904 ~ 1905 年）；而且出乎全世界的意料，日本在陆上和海上都打败了俄国。欧洲强国被一个亚洲国家打败，这是人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这场战争的失败影响到俄国国内的事务，为俄国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1905 年）。为镇压革命，沙皇不得不通过宣布成立君主立宪制政府，来寻求自由派即资产阶级的支持。通过选举产生的第一届议会——杜马，1906 年召开首次会议。因为俄国长久以来都是君权神授体制热心而积极的维护者，这一态度的彻底改变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06 年的伊朗和 1908 年的中国先后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奥斯曼政府在 1908 年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也许正是这场国际运动的一部分。

1905 年，穆斯塔法·凯末尔从土耳其军事学院以上尉参谋身份毕业，并被派往驻扎在大马士革的奥斯曼第五军司令部。在那里，他与穆斯塔法·詹泰金博士（Dr. Mustafa Cantekin）领导的秘密社团“瓦坦”（Vatan，祖国）取得联系。穆斯塔法·凯末尔开始只是一名普通成员，后来成为这个团体的领导

人，并将其名称改为“祖国和自由协会”（Vatan ve Hürriyet）。因为大马士革不适合这一事业进一步的发展，他设法秘密潜回他的家乡萨洛尼卡（Salonika），并在那里成立了协会的一个分部，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它。鲁米利亚更有影响力的革命组织是奥斯曼自由协会（Osmanlı Hürriyet Cemiyeti），由伊斯梅尔·詹博拉特（İsmail Canbolat）、塔拉特（Talat）、拉赫米（Rahmi）和其他7位成员于1906年9月在萨洛尼卡创立。创立者和成员都是平民或军官，成员被分成许多小组。入选前，成员需要在《古兰经》前宣誓，并在午夜由三个蒙面人员拿枪指着警告，如背叛组织将会被处死。1907年，这个组织与巴黎的统一进步协会合并，并采纳后者的名称。

1907年，青年土耳其党第二届会议在法国召开，与会者包括艾哈迈德·里扎及其支持者、萨巴赫丁亲王和他的支持者，以及亚美尼亚的代表。艾哈迈德·里扎是这次会议的主导人物。会议准备了一份宣言，列举了阿卜杜勒·哈密德政府的诸多不足。这次会议批准用武力来实现革命目的。

马其顿问题

1908年，马其顿爆发革命。为了解此次起义的背景，我们必须简短地回顾一下马其顿问题。这一被欧洲国家称作马其顿的地区由奥斯曼帝国治下的科索沃、萨洛尼卡、莫纳斯提尔（Monastir）三个省组成。其人口包括：150万穆斯林、90万保加利亚人、30万希腊人、10万塞尔维亚人和10万瓦拉几人（Vlachs）。在穆斯林中，奥斯曼帝国的统计数据没有区分种族。他们占了人口的大多数，但是巴尔干民族主义者和欧洲公众一般把穆斯林当作“入侵者”，而忽视这里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是

他们故乡的事实。从这点来看，如果不把穆斯林考虑在内，保加利亚人则是这里的主要居民。尽管《圣斯特法诺条约》把这一地区划分给保加利亚，但随后的《柏林条约》改变了这一决定。使这一状况更加复杂的是，这些民族的居住地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是多民族的社区。保加利亚人建立了名为“非正规兵团”（comitadji）的帮派，通过恐吓手段镇压和驱逐居住在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作为回应，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也建立了自己的非正规兵团以自卫。奥斯曼帝国军队在冲突地区之间疲于奔命，试图维持和平（必须指出的是，那些现在被指定并称呼自己为保加利亚人的民族，并不是保加利亚人而是马其顿人）。

1902年，保加利亚人发动了一场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大规模起义，使侯赛因·希勒米（Hüseyin Hilmi）帕厦被任命为马其顿地区三个省的总督。第二次起义在1903年爆发，并持续了3个月之久；随后，俄国和奥地利联合起草了一份改革计划。根据这份计划，每个国家都要往马其顿指定地区派驻宪兵军官，作为奥斯曼帝国宪兵的顾问；德国为了保持与奥斯曼帝国的良好关系，没有参与这个计划。阿卜杜勒·哈密德更希望把军事学校的毕业生派到这一地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装备精良，能更好地维护和平；另一方面是出于自己安全方面的考虑，让他们远离伊斯坦布尔。因此，一大群受过教育的军官被派往巴尔干。这些军官的薪水两个月才支付一次，他们目睹其他军官的奢侈生活，以及“非正规兵团”以民族主义为名屠杀他们的宗教同胞，这让他们大开眼界。

《自由宣言》

1908年3月，英国政府向其他列强发出照会通知，要求为

马其顿地区三个省任命一位总督，并减少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统一进步协会将此视为马其顿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首要危险，并给除了俄国以外马其顿地区所有国家的领事发出照会通知，表明统一进步协会将会终结这里的暴政，因而应该得到支持。由此，统一进步协会最终公开阐明其立场。阿卜杜勒·哈密德尝试了许多镇压统一进步协会行动的措施，但都没有奏效。在莫纳斯（Monastir），副官尼亚齐贝伊少校（Adjutant Major Niyazi Bey）、市长和警察局长将 200 名士兵和 200 名平民带往山区。苏丹派谢姆西帕厦（Şemsi Pasha）前往镇压这场运动，但是在来的路上被杀害了。法尔索维克（Firzovik）的阿尔巴尼亚人被诱使给阿卜杜勒·哈密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事态逐渐升级，巴尔干所有的大城市都在 1908 年 7 月 23 日这一天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奥斯曼帝国政府总共收到 67 封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电报。阿卜杜勒·哈密德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别无选择。几天前，他任命赛义德帕厦（Sait Pasha）为大维齐尔。报纸在 7 月 24 日便公布了进行选举的命令。自此，奥斯曼帝国进入第二君主立宪时期（the İkinci Meşrutiyet）。

第九章 统一进步协会的组织 特征和“3·31”事变

前文提到，第二君主立宪时期是土耳其的“法国大革命”，使土耳其快速步入现代社会，并对土耳其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历史学家塔勒克·扎菲尔·图纳雅（Tarık Zafer Tunaya）把第二君主立宪时期称作“政治实验室”，因为许多共和国时期的成熟政策在这时就已经开始讨论了。更重要的是，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在这一时期开始积极参与政治，并在统一进步协会的运动中崭露头角。

我们应该明确统一进步协会的几个鲜明特点。

（1）土耳其主义——土耳其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统一进步协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是穆斯林。在《自由宣言》公布之前加入统一进步协会的少数非穆斯林成员，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瓦拉几人，他们没有独立的志向和民族主义观念。大多数穆斯林是土耳其族人；即便不是，他们也把自己当成土耳其人，并对土耳其主义事业深表同情。

（2）青年。通常，青年是革命组织的主导力量，尤其是当该组织的活动被认为非法的时候。一般来说，青年和未婚人士更愿承担革命的危险和责任。

（3）统治阶层。统一进步协会的大多数成员是公务员或军官。

（4）教育。统一进步协会的大多数成员是西式高等学校的

学生或毕业生。

(5) 资产阶级的态度和理想。统一进步协会的目标首先是推动土耳其人现代化，然后再使整个土耳其社会现代化，使土耳其能赶上欧洲发达国家。因为欧洲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统一进步协会的目的地把他们自己的国家改造成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社会。

奥斯曼社会是传统型的，这样一个社会是不能接受由年轻人来管理国家的。所以，在宣布实行君主立宪之后，统一进步协会没能建立一个自己成员占多数的政府。尽管统一进步协会的一些成员，如塔拉特和贾维特被任命为部长，但直到1913年也没有成员担任大维齐尔一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统一进步协会没有掌握政权。通过命令政府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它可以来把自己的意志施加给政府。这种情形更像是“监督政府”（supervisory government），而不是“实权政府”（full government power）。

另一美中不足是，尽管统一进步协会负责巴尔干地区的《自由宣言》，但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负责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国家。既然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成为宪制政府的一部分，统一进步协会就不得不允许其保留苏丹称号。多年来，统一进步协会运动的关键是反对专制政府，因此接受阿卜杜勒·哈密德把统一进步协会置于同其基本政治原则相悖的立场上。为了摆脱这一困境，统一进步协会发展出了“王朝循环论”。根据这一理论，阿卜杜勒·哈密德是一个善意的统治者，但他的周围有许多邪恶的顾问，并居心叵测地诱使苏丹采取错误行动。统一进步协会因此掩饰了自己的缺陷，并对那些曾经担任阿卜杜勒·哈密德顾问却还没来得及逃往国外的人施以重罚；罚款

以“捐赠”的方式来掩饰。

立宪政府的成立极大地活跃了社会气氛。1908年7月24日，媒体界拒绝把副本送去审查。一大批报纸、杂志和书籍开始出版。妇女运动创办了自己的协会和刊物，工人运动也兴起并开始组织罢工。这时，萨巴赫丁亲王从欧洲的自我放逐中返回。在自由宣言公布后不久，统一进步协会便与萨巴赫丁亲王创办的私人机构和分权协会合并；但后来萨巴赫丁亲王对统一进步协会大失所望，他和他的支持者分裂出去，并成立了自由统一党（the Liberal Union Party）。大选在筹备，但因为两级制选举体系非常复杂，这些准备工作需要花很长的时间。1908年12月17日，议会在盛大典礼中开幕，艾哈迈德·里扎当选众议院议长。

统一进步协会赢得不少席位，但大多数的席位被独立代表获得。非穆斯林候选人也进入了统一进步协会的名单。选举开始前，统一进步协会就同少数派就他们的议席问题达成一致，少数派的候选人随后出现在统一进步协会的名单上。在选举之前，统一进步协会要求竞选者不要分开竞选，强调说，如果统一进步协会的穆斯林候选人不能赢得足够的选票，少数派将获得不成比例的大量席位。在此情形下，自由统一党没有在竞选中赢得胜利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主教和犹太法学博士代表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统一进步协会代表穆斯林（尤其是土耳其人）。事实上，统一进步协会赢得选举是一种误解；因为尽管统一进步协会在巴尔干地区有坚定的支持者和完善的组织，但在《自由宣言》发表后，帝国其他地区的支持者被随意地组织起来。在巴尔干之外，统一进步协会不得不欢迎所有自称“统一派”，并从那些不具备“统一主义特征”的人中选

举代表：其中，许多人既不是统一派也不是进步分子，而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因此，统一进步协会的代表大多只有统一主义之名。

《自由宣言》公布后不久，统一进步协会认为赛义德帕厦不再适合担任大维齐尔一职，任命来自塞浦路斯的卡米尔帕厦（Kâmil Pasha）取代他。在担任阿卜杜勒·哈密德政府部长时，这两位年长的帕厦以亲英态度而为人们熟知。卡米尔帕厦很不满足于听候统一进步协会的命令，坚持行使自己的主动权。这一情形因在议会中侯赛因·贾希特（Hüseyin Cahit）责难他的议案而升级。侯赛因·贾希特是一个颇具影响的众议员，是《坦尼报》（*Tanin*）的首席专栏作家。后来，统一派决定维持卡米尔帕厦的地位，因此他的信任投票获得全票通过。这种结果进一步鼓励了卡米尔帕厦挑战统一进步协会的权威。在没有与统一进步协会商议的情况下，他撤换了陆海军大臣，而且，当他试图将某些军队（统一进步协会派来首都，以增强他们的权力）调回其原驻地鲁米利亚时，再一次对统一派形成挑战。统一进步协会开始对他的独立态度感到忧虑，因而在议会举行第二次信任投票，并获得多数票。由于此次信任投票的失败，卡米尔帕厦被迫辞职，并于1909年2月13日离开。在这次争论期间，一些官员前往议会，对解除前海军大臣的职务表示抗议。这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卡米尔帕厦是迫于军事压力而被免职。

“3·31”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所有官员实际上都是统一派。《自由宣言》发布后，这一情势通过解除那些非军事学校毕业官员的职务而得以保证，仅仅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军中就有1400名军官被解职。军事学院从1848年开始培养出毕业生，

但是文职官员、军校毕业生和非军校毕业生都等级相同。“阿拉以勒”(Alaylı) 这个词语首先在军队中使用，意思是“从底层爬上来的”，随后在官僚机构中广泛使用。它意味着缺乏教育，即人们没有接受他们身份需要的教育。有能力的人可以升至中士等级，他们的解职也是“有退路的”。这意味着，他们仍然可以服役，并可能在上司的赏识和垂怜下成为军官。结果，那些几乎没有读写能力的人能够成为军官，而且渴望成为最高级别的帕厦（将军）。尽管苏丹和他的顾问们意识到，受过教育的官员更能胜任，但他们更喜欢那些被提拔的、没有文化的官员的忠诚。之所以认为他们更加忠诚，因为他们靠自己努力无法升迁，一切都得依靠欣赏他们的人。同样的晋升哲学在政府中也存在。

统一派实现了一个重大变革，清除军队中从底层爬上的人，并使受过教育的人占据高位。在此之后，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统一派。反对者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鼓励那些没有获得军衔的军官发动叛乱，其公开口号则是迫使议会召回卡米尔帕厦。“3·31”事变由此发生。

“3·31”事变

这场事变的表面原因是，1909年4月6日晚《塞贝斯蒂报》(Serbesti)的高级专栏作家哈桑·费赫米(Hasan Fehmi)在加拉塔大桥被杀，该报纸以其强硬的反对派立场著称。有谣言称，袭击者穿一件政府官员的斗篷。尽管桥的两端都有警察局，但并没有抓住任何嫌疑犯。狂怒的反对派毫不犹豫地认为，统一进步协会应该对这起谋杀事件负责。统一进步协会并没有尽力反驳，从而被认为默认了这一谋杀指控(多年之后证实是

统一派策划了这场谋杀事件)。哈桑·费赫米的葬礼演变成了一场巨大的抗议活动。在葬礼举行5天之后,即4月13日(罗马伊斯兰历1325年3月31日),叛乱爆发。

那天一早,第四猎人营(the Fourth Hunter Battalion)的中士哈姆迪(Hamdi)和塔克西姆广场附近塔什基什拉军营(the Tashkishla barracks)的中士和士兵逮捕了他们的长官,并煽动其他部队起义。当天晚些时候,他们在苏丹艾哈迈德广场(Sultanahmet Square)的议会前举行会议。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要伊斯兰教法。”其他的直接要求包括:赦免参加此次叛乱的所有人;内阁、艾哈迈德·里扎(众议院议长)和其他的统一派成员辞职;解除某些高级军官的职务。另外还要求,重新任命卡米尔帕厦为大维齐尔、纳泽姆帕厦为陆军大臣、伊斯梅尔·凯末尔为众议院议长。

侯赛因·希勒米帕厦(Hüseyn Hilmi Pasha)政府首先采用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策略——用父亲般的劝告来安抚叛乱者,但没有成功,反而使得叛乱蔓延。内阁大臣艾哈迈德·里扎和第一军司令马哈茂德·穆赫塔尔帕厦(Mahmut Muhtar Pasha)别无他选,只能辞职。重要的统一派分子都躲藏起来,从伊斯坦布尔逃往巴尔干。事实上,叛乱的士兵聚集在苏丹艾哈迈德广场,表明他们承认众议院的权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是重要的统一派分子,而且包括其他议员,都因为感觉受到威胁而缺席议会。因此,伊斯梅尔·凯末尔和其他反对派代表无法通过获得足够的多数票来控制议会和当前局势。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站出来,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他发表声明,宣布赦免所有参加叛乱的士兵,并任命陶菲克帕厦(Tevfik Pasha)为大维齐尔,1897年奥斯曼帝国与希腊战争中的英雄、广受尊

敬的加齐·埃特海姆帕厦 (Gazi Ethem Pasha) 为陆军大臣。这次大赦具有重要的意义。士兵们欣喜地接受这一结果，成群结队地前往耶尔德兹宫表达对苏丹的支持。苏丹随后犯了一个政治错误，即在阳台上接见了他们，这给人造成了他与叛乱士兵串通的印象。叛乱者一整夜都在城市中游行，并不时地朝天鸣枪。

关于谁策划了这场叛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统一进步协会是这场叛乱的幕后黑手。这是因为叛乱的结果加强了他们对政府的控制。执政党制造这样一个事件作为借口来清除异己分子，并不是闻所未闻的。但是，这种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没有严谨的证据可以佐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而且很难让人相信统一进步协会会策划出如此成功的一个阴谋来对付自己。第二种说法是，这场叛乱是阿卜杜勒·哈密德策划的。这个说法看起来也不正确。不过不可否认的是，阿卜杜勒·哈密德在这个短暂的权力真空期间获益；如果没有军队后来的干预，他可能既保住自己的皇位，又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是否试图利用这次事变来恢复他的专制政体仅仅是一种推测，但这不足以证明他应该对这场叛乱负责。

第三种说法是，这场叛乱似乎应该由以萨巴赫丁亲王为首的反对派负责。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就必须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利用叛乱所产生的机会。答案是，他们本来期望没有军衔的叛乱士兵举行一场更有纪律的武力展示，但没有想到事件发展为一场血腥叛乱。在两天的时间里叛乱者杀死了 20 多人，他们大多是军事学院的学生。在死难者中，包括代表侯赛因·贾希特的议员和司法部长纳泽姆帕厦。萨巴赫丁亲王确实试图控制叛乱。第二天，他认识到这场政变的第二个目标是试图废黜阿

卜杜勒·哈密德，但其令人不悦的结果却增强了苏丹对王权的控制。于是，他使用另一种策略，要求海军军官以炮轰宫殿来威胁苏丹退位。尽管军官们都貌似接受这一方案，但是只有阿萨勒·托菲克（Asr - ı Tevfik）军舰的指挥官阿里·卡布里（Ali Kabuli）在第三天采取了行动。正当阿里·卡布里为这一攻击做准备时，同叛乱者有联系的水兵将其逮捕，并送到耶尔德兹宫。阿卜杜勒·哈密德再次出现在阳台上，暗示把阿里·卡布里送到警察局，但叛乱者当场处死了阿里·卡布里。这一事件毫无疑问成为后来反对苏丹的政治材料。

究竟谁是这次叛乱的真正煽动者，并没有定论，但谁以及怎样煽动士兵却是明确的。由德尔维希·瓦赫代蒂（Dervish Vahdet）发行的《火山报》（*Volkan*）是推动叛乱爆发的一个因素。德尔维希·瓦赫代蒂是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人（Turkish Cypriot），而且是纳克什班迪派（Nakshibendi）的活跃分子，曾受雇于英国。他被称作为反对派工作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他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士兵们的控告信。同赛义德·库尔迪（Said-i Kurdi）一道——后来以赛义德·努尔西（Said-i Nursi）著称，是努尔派（Nurcu）的创始人——他创立了穆斯林联盟（Mohammedan Union），为纪念，1909年4月3日在索菲亚清真寺^①做了一场圣纪夜祈祷（mevlit prayer）。

第二股煽动士兵叛乱的势力是神学院的学生。在《自由宣言》发表之前，只有神学院的学生和伊斯坦布尔的居民可以免除兵役，其他各省居民免除兵役的方式即成为神学院的学生，因此，神学院中充满了仅仅是为逃避兵役的人。统一进步协会

^①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后，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译者注

试图通过在神学院建立考试制度来堵上这一漏洞，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人会被招募入伍。这不可避免地使神学院的学生反对统一进步协会。

第三股煽动叛乱的势力是从底层爬上来的被解职的军官。第四股煽动叛乱的势力是那些反对统一进步协会土耳其主义政策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

叛乱之后，许多煽动者被送上军事法庭，德尔维希·瓦赫代蒂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萨巴赫丁亲王被捕，但在英国大使的干预下释放。官方从来没有明确指出谁是这场叛乱的煽动者。这件事没有定论的原因之一是统一进步协会见好就收。如果宣布阿卜杜勒·哈密德为此负责，他们针对反对派的调查将被视为镇压。如果调查发现反对派应该对此负责，那么废黜苏丹看起来就不公平。正是这种含混态度，使得统一进步协会可以一箭双雕。

镇压叛乱

这场叛乱是如何被镇压的呢？统一进步协会把对自己的攻击等同于对宪制政府的攻击，并在巴尔干的坚强后盾下采取了果断行动。他们迅即决定，在萨洛尼卡建立一支“机动部队”（Hareket Army），由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厦（Mahmut Şevket Pasha，第三军司令）担任指挥官，来自埃迪尔内的第二军和萨洛尼卡的部队由侯赛因·许斯尼（Hüseyin Hüsnü Pasha）帕厦和谢夫凯特·托古特帕厦（Şevket Turgut Pasha）指挥。叛乱爆发的第二天，萨洛尼卡召开各个民族共同参加的会议。政府、宫廷、众议院都被抗议电报淹没。但是，伊斯坦布尔的气氛完全不同。宫廷、政府、反对派的新闻记者感到，暴风雨已过，

诸事恢复正常，并乐于没有统一进步协会在伊斯坦布尔干涉国政。众议院直到第三天才召开会议，首先是为应对新的政治形势进行调整。但与此同时，来自埃迪尔内和萨洛尼卡的“机动部队”逐步在圣斯特法诺集结。众议院派一个代表团到“机动部队”位于圣斯特法诺的总部劝告军队返回驻地，以避免他们坚定不移的革命立场导致内战爆发。他们被提醒，他们自己也属于统一派，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代表团的成员停留在圣斯特法诺，以支持这一理由，并号召其他人加入。

1909年4月20日，众议院无法召集法定人数，从而以新的名义在圣斯特法诺召开会议。按照宪法规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大会，事实上只是每年年初苏丹公开讲话时的礼仪团体。在圣斯特法诺，众议院议员和部分参议员联合组成了大国民议会（the National General Assembly），该名称在宪法中并不存在，只是用来指在圣斯特法诺召开的会议。添加的“国民”一词在此次短暂使用后很快被弃，直到1920年4月23日现在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成立，才被官方采纳。很可能是，法国大革命启发了两院的联合。这可能会使人想起，法国大革命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三级会议联合成为“国民议会”。统一派没有公开宣布灵感的来源，也许是因为当时公众并没有发现这其中的外国影响。

1909年4月24日，“机动部队”占领伊斯坦布尔。尽管阿卜杜勒·哈米德要求叛乱士兵不要抵抗，但一些地方还是发生了流血冲突。4月27日，大国民议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最后一次会议。结果，大穆夫提（Grand Mufti）发布声明（fetva），阿卜杜勒·哈米德被废黜，穆罕默德·雷沙特（Mehmet Reshat）继位。后者象征性地腰束奥斯曼佩剑，成为苏丹穆罕默德五世

(1909 ~ 1918 年在位)。仁慈善良的人担任苏丹符合宪制政府的要求，因为他并不想参与到政治活动中。阿卜杜勒·哈密德长达 33 年的统治由此结束，之后他不得不待在萨洛尼卡。“机动部队”的许多年轻军官，比如时任各师参谋长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卡泽姆·卡拉贝基尔 (Kâzim Karabekir)、恩维尔贝伊 (Enver Bey)，都将在独立战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青年土耳其党的新时期，侯赛因·希勒米帕厦被重新任命为大维齐尔。现在，众议院异常高效：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依法管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立法。这些法律的一些重要部分在共和国时期仍然有效，如那些关于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罢工自由及结社自由的法律。与此同时，阿卜杜勒·哈密德的巨额财富被没收充公，宫廷的花费被置于严格的预算之下，高官的薪水被降低，许多不必要的公务员被裁撤。先前对黑奴贸易的禁令扩大到包括白人奴隶在内。最重要的是宪法得到了全面的修订。1876 年宪法规定，政府要对苏丹而不是众议院负责，而且没有立法倡议权。相关规定以及其他问题也都重新修订。这部宪法是如此的民主，因而应该被称为“1909 年新宪法”。

新时期另一个发展是一个“强人”的出现，即“机动部队”的指挥官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厦。一开始，他担任特设职位——第一、第二、第三军的监察长。更重要的是他被任命为伊斯坦布尔的军事指挥官，在那里戒严令已经实施了 3 年之久。他因此得到了首都所有的权力。统一进步协会认为，这是维持秩序最好的方法。因此，统一进步协会的大多数年轻人觉得发现了一个父亲般的领导人（土耳其说法是兄长）。[这一情况同样出现于 1960 年 5 月 27 日军事政变，退休的将军杰马

尔·居尔塞尔（Cemal Gürsel）成为全国统一委员会的主席，其中的大多数成员也都是年轻军官。居尔塞尔也扮演父亲的角色。] 总之，马哈茂德·谢夫凯特的年龄和军阶，使他得到所有部队的尊敬。他对统一进步协会的“准领导”（qusai-leadership）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是对统一进步协会的军务和民事。通过担任统一进步协会的“首脑”，他在军事中的地位提高。其次，他曾经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时期参与同德国的武器谈判和外交事务，这便加强了亲德国势力在统一进步协会中的力量。英国政府试图积极看待“3·31”事变，但反对“机动部队”；德国的做法则恰恰相反。再次，与统一进步协会的大多数成员相比，马哈茂德·谢夫凯特比较保守，从而能够抑制进步分子的狂热势头。例如，在宗教节日拜访苏丹时，侯赛因·贾希特以把右手指放到嘴唇和前额的替代方式来向苏丹致敬，而不是亲吻御座边缘，这一行为招致新闻业的责难，马哈茂德·谢夫凯特禁止对这一问题发表任何评论。最后，尽管帕厦是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并与统一进步协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他从来没有成为统一进步协会的成员。

现在，“3·31”的周年纪念被视为反动势力的典型行为——类同于梅内门事件（the Menemen Incident），以及1993年的锡瓦斯事件（the Sivas Incident），那时37人死于原教旨主义者的火灾。毫无疑问，“3·31”事变是反对派势力策划的，叛乱分子要求恢复伊斯兰教法这一中世纪制度，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还必须指出的是，伊斯兰教法关于个人权利、婚姻、遗产和义务的许多规定那时仍然有效力，直到1926年《民法典》的颁布才被废止。可能，他们的反动要求还暗含另一个方面。当他们呼喊“我们要沙里亚”的时候，这些士兵真正想要的是

逃避新军条例的规定，恢复到旧军队的松散状态，这样便可以通过宗教职责这个借口逃避训练。他们的另一个反动因素，也许是想回到过去“从底层升迁”的旧体制，以取代成为军官必需的教育资格。从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看这个问题，可以说，反对统一进步协会这一当时最富成效的革命团体的权力，其自身便是反动的。抛开其缺陷不论；对统一进步协会的破坏意味着返回到旧政权的体制之下，后者可能会填充权力的真空。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统一进步协会采用的这一模式被称为“监督政府”。很明显，一个政府尤其是革命政府会被这样的情况所束缚。由于这一原因，统一进步协会开始准备建立一个掌握全部权力的政府。这些筹备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设立议会副秘书长一职。目前土耳其政府中的副秘书长是官僚机构中的一个行政职位，而在英国，既有政府的副秘书长，也有由议会任命的议会副秘书长。统一进步协会把自己的议员任命为副秘书长，目的在于他们可以获取行政经验，同时通过参加内阁会议获得政府管理的经验。马哈茂德·谢夫凯特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这一提议的人，他的立场鼓舞了政府和议员同他站在一起。看起来，反对统一进步协会的所有势力也同样损害了其自身的利益。只要马哈茂德·谢夫凯特仍是众议院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就可以依靠“名义上”统一派的支持，使得统一进步协会成员无法担任部长职位，从而阻止统一进步协会掌握全部权力（直到1912年）。有时候，统一进步协会的一些成员也会被任命为内阁成员，但这对掌握政府全部权力的目标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统一进步协会的特点

统一进步协会有一些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特点。前面已经

提到过，由于其许多成员都是军官，从而分为军人和文官两派。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双重结构。既有统一进步协会又有统一进步党，协会的团体和成员遍布整个国家，并召开地方和中央会议。从表面上看，它像是一个社会和文化团体，而且这是统一进步协会的本色。统一进步党则包括其在议会中的代表，换句话说，它只是统一进步协会的核心组织。因为这些代表中许多人并不是统一进步协会的真正支持者，仅仅是名义上的统一派（直到1912年），统一进步协会倾向于与他们保持距离。例如，只有三个统一进步党成员被允许参加每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集体领导的观念。一些成员可能相对来说更有权力，他们的意见比其他人更有分量，如文官中的塔拉特和军人中的恩维尔。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凌驾于所有人之上。无论塔拉特和恩维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多么杰出，中央委员会总是保留它的决策权。为了防止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中，统一进步协会在1913年之前一直没有设立主席一职。不管是秘书长还是1913年以后设立的主席，都没有像今天土耳其的政党领袖那样有权。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特点是协会代表大会的秘密性。1908年、1909年、1910年和1911年大会在萨洛尼卡召开，并不对公众和新闻媒体开放。甚至1908年大会选举的结果都是保密的，这次大会决定哪些成员进入中央委员会。也许是因为觉得公众会认为这一保密特点很奇怪，协会的两个成员恩维尔和尼亚齐（Niyazi）扮演着“自由英雄”的角色，他们的海报在全国随处可见。因此，统一进步协会逐渐认同这些领袖人物。统一进步协会的另一个特点是依靠恐怖主义，这在其还是一个非法组织时是可以理解的，但1908年以后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1908 年暗杀阿卜杜勒·哈密德特务机关领导人伊斯梅尔帕厦，1909 年暗杀反对派的新闻记者哈桑·费希姆 (Hasan Fehmi)，1910 年暗杀艾哈迈德·萨曼 (Ahmet Samin)，1911 年暗杀泽基贝伊 (Zeki Bey)，都是例子。谋杀艾哈迈德·萨曼成为亚库普·卡德里·卡拉奥斯曼奥卢 (Yakup Kadri Karaosmanoğlu) 的小说《审判之夜》 (*The Night of Judgement*) 的主题 (1927 年)。

为什么统一进步协会觉得它需要依靠秘密手段和恐怖主义呢，尤其是在 1908 年之后？1918 年议会准备解散协会的时候，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确。甚至在 1908 年后它仍然视自身为一个革命组织，离他们要创建一个现代社会的目标还很遥远。这一目标之所以遥不可及是因为，尽管有军队的支持，但它仍得不到占绝大多数的未受教育者和保守民众的支持。“3·31”事变已经显示出其艰难的处境。秘密和恐怖主义不是强大而是脆弱的体现。1908 年的规划曾包含有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贫穷或占有较少土地的农民），但统一进步协会随后被迫将其删去，因为它需要阿扬阶层的 support，而阿扬正是各省的大地主。同样，尽管统一进步协会本质上是一个土耳其主义的协会，但它不得不修改其规划和声明，以迎合奥斯曼主义。本书作者认为，统一进步协会有强烈的世俗主义特点，但在那时，即使是在协会内部表达这样的观点也是危险的，因为统一进步协会中也有持伊斯兰主义观点的成员。

最后，一个与统一进步协会相关的问题经常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它与共济会 (Freemasonry) 关系密切。那时，共济会通常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实证主义者、进步分子和精英主义的组织，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这使得共济会

在意识形态上适合统一进步协会的成员。在《自由宣言》发表之前，共济会属于外国机构，在奥斯曼帝国内享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①（如奥斯曼帝国警察未经邀请不得进入其活动场所）。这对于像统一进步协会这样的秘密组织来说有很大的优势。有证据表明，共济会对统一进步协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大多数统一进步协会成员并不是共济会会员；例如，尽管凯末尔和杰拉尔·巴亚尔（Celal Bayar）曾经是统一派，但他们从来都不是共济会会员。贝克塔希派（Bektashi sect）与统一进步协会有相似的联系，他们的自由世界观使得其对统一进步协会会员更加开放。因此，1908年之前，许多统一进步协会的领导人同时也是贝克塔希派的成员。

① 一种通常在半殖民地国家使用的体制，外国人和外国机构享有某些治外法权。

第十章 统一进步协会监督政府

——从“3·31”事变到1913年

到1909年底，一个外交问题开始动摇侯赛因·希勒米（Hüseyin Hilmi）政府的统治根基。国有的哈米迪耶公司（Hamidiye Company）和英国林奇公司（Lynch）都从事幼发拉底河的航运业。此时，林奇公司的特许权即将到期，政府提议成立一个拥有75年特许权的新公司，前面的两大公司各占50%的股份。巴格达的代表和马哈茂德·谢夫凯特本人都强烈反对这个提议，要求终止林奇公司的特许权。不太清楚这种反对立场是否受民族主义或亲德分子的推动。最后，政府要求众议院对此进行信任投票，得到了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尽管如此，侯赛因·希勒米仍然坚持辞职。哈克帕厦（Hakkı Pasha）受命组织新政府，但他决定不延长林奇公司的特许权。这一决定的公正性受到质疑。“3·31”事变已经表明，英国对统一进步协会持怀疑态度，林奇公司事件使得英国和统一进步协会的关系更加疏远。对侯赛因·希勒米政府提议的否决，可能是英国政府制定对奥斯曼帝国消极政策的一个因素，这在几个月后爆发的叛乱和战争中表现无遗。

哈克帕厦的政府在两个方面区别于其前任。首先，更多的统一派成为政府成员 [塔拉特，内务部长；贾维特，财政部长；伊斯梅尔·哈克（İsmail Hakkı），教育部长；哈伊里（Hayri），宗教基金会部长（Minister of Pious Foundations）]。其

次，马哈茂德·谢夫凯特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可能认为，让他加入内阁会更容易牵制他，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当财政政策出现争议时，财政部长贾维特试图采用预算统一原则，但被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厦拒绝，而且他拒不交出阿卜杜勒·哈密德的宫廷（耶尔德兹宫）拨付给陆军部的 55 万里拉。新的预算已经划拨给陆军部 950 万里拉，但在交予参议院审议之前，谢夫凯特要求再增加 500 万里拉，参议院不顾贾维特的抗议，批准了这一请求。由于其财政预算被彻底打乱，贾维特不得不前往法国寻求贷款。他向奥斯曼银行（the Ottoman Bank，法英合办）提出申请。然而，由于贾维特拒绝奥斯曼公债委员会的贷款担保，以及奥斯曼银行要求监督其使用，谈判陷入僵局。在他看来，这无异于外国监督奥斯曼内政。反过来，奥斯曼银行拒绝了这一贷款申请。贾维特随即与其他银行达成协议，而法国政府又极力阻止。很明显，法国试图阻止统一进步协会完全独立的愿望，英国则支持法国的立场。最终，贷款从德国获得，后者愿意在贾维特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提供贷款。此外，马哈茂德·谢夫凯特拒绝财政部监督陆军部的财政，他的坚持导致贾维特辞职。政府以剥夺审计部门对陆军部的监督权为代价请求他收回辞呈。

“3·31”事变爆发后，反对派发现自身处境艰难。统一进步协会认为，“非我即敌”。戒严令对所有人都很苛刻，但仍然有些组织在坚持其活动。

第一个党派——代表社会民主原则的奥斯曼民主党（the Ottoman Democratic Party）。其创立者易卜拉欣·特莫博士（Dr. İbrahim Temo）和阿卜杜拉·杰夫代特（Abdullah Cevdet）也是统一进步协会的创立成员之一。前者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文明、

忠诚的反对派，但由于其党报在戒严令下不断被查封，难以为继。根据特莫的说法，马哈茂德·谢夫凯特曾经对奥斯曼民主党的主席福阿德·许克吕（Fuat Şükrü）挥舞着手杖大喊：“我要打死你”。

第二个党派——“温和自由党”（The Moderate Liberal Party）。它是阿拉伯和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在 1909 年建立的。其章程具有封建主义的特点，认为落后地区需要通过改革来“逐步文明化”，为实现此目标，省议会应该有权通过地方立法。伊斯梅尔·凯末尔和伊斯梅尔·哈克先后担任主席。由于受到戒严令的限制，它只能在议会中寻求支持，不可能吸引更大范围的民众。

第三个党派——“人民党”（the People's Party）。它有伊斯兰主义的特点，成立于 1910 年 2 月，由二三十名土耳其乌里玛议员组成。其中最杰出的成员包括来自孔亚的泽伊内拉比丁（Zeynelabidin）、来自巴勒克西尔的瓦斯菲（Vasfi），以及来自托卡特（Tokat）的穆斯塔法·萨布里（Mustafa Sabri）。除了设立农业和商业部等当代机构、在神学院中教授符合当前需求的科学知识、提升工人的权利，其章程也包括一些保守的要求，如降低对未受过教育的底层官员从事某类工作的条件，以及加强在神学院中的阿拉伯语教育。它的另一个保守要求是，议会的候选人应该在他们所代表的区居住最少 5 年，而且不包括其担任公务期间。

1910 年 6 月 9 日深夜，反对派报纸《国家之声》（*Voice of the Nation*）的资深专栏作家艾哈迈德·萨米（Ahmet Samim）被杀。有“3·31”事变的经历，马哈茂德·谢夫凯特立即采取措施。里扎·努尔（Rıza Nur）和大约 50 名反对者被捕，理

由是试图谋杀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和塔拉特。尽管他们随后被无罪开释，但关于他们在审讯期间被拷打的报道震惊了全国。与此同时，关于征兵和征税的中央政策在叙利亚、阿尔巴尼亚和也门引发了诸多暴动。在1911年的前几个月，统一进步协会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保守派——新党（Yeni Hızır），由萨迪克贝伊上校（Colonel Sadık Bey）和阿卜杜拉齐兹·梅吉迪·埃芬迪（Abdulaziz Mecdi Efendi）成立。公布的十项声明中，包括从议员中任命部长必须得到统一进步党三分之二的赞成票。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对这一运动和萨迪克贝伊采取支持态度。

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统一进步协会的内阁部长逐一被取代。

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利比亚）

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的爆发使情况变得更糟。意大利在1860年才完成国家统一，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空手而归。法国控制摩洛哥，以及统一进步协会颠覆意大利在的黎波里统治的举措，导致意大利采取行动。在其他大国的默许下，意大利于1911年9月23日给奥斯曼政府下了最后通牒。有意思的是，通牒的指控大多指向统一进步协会，因而意大利介入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政。9月29日，意大利宣战。

对奥斯曼帝国来说，防卫的黎波里困难重重。增援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主要困难来自英国在埃及的势力，这阻挡了的黎波里塔尼亚和帝国其他地区的陆路交通。克服这一难题的唯一方法是从海上运送军队，但意大利海军对奥斯曼帝国有绝对优势，并且在爱琴海和地中海也抢得先机。它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占领包括罗德岛在内的多德卡尼斯（Dodecanese）群岛，并且炮

轰了贝鲁特和奥斯曼帝国的其他港口。战争爆发前不久，马哈茂德·谢夫凯特从黎波里运出四个营的军队和大量武器弹药前往也门，这使当时的形势更加恶化。但是，这一形势被黎波里塔尼亚人民的英勇精神所挽救。尽管意大利在强大的海军支持下控制了海岸地区，但贝都因游击队的抵抗使其不能在陆地上快速推进。统一进步协会的志愿军官伪装成平民通过埃及，快速奔向前线帮助组织抵抗。恩维尔、费特希和穆斯塔法·凯末尔均在其中。所有这些年轻官员（同整个统一进步协会一样）把宪制政府看作“欧洲病夫”恢复活力的象征，但黎波里塔尼亚战争却证明恰恰相反——变化无几，帝国濒危。

哈克帕厦在战争爆发后辞职，其职位由赛义德帕厦接替。他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时期的大维齐尔，并以其亲英立场闻名，但不像卡米尔帕厦那样极端。赛义德帕厦拥有足够的权力对付黎波里局势处理不当而威信扫地的马哈茂德·谢夫凯特。

1911年11月21日，战争爆发50天后，自由和谐党（Hürriyet ve İtilaf Fırkası）成立。这是一个超级党，内部包括持不同见解的党派——自由派、温和派、保守派、民主派及人民党的成员——都聚集在反对统一进步协会的旗帜下。附马费里特帕厦（Damat Ferit Pasha）任主席，萨迪克贝伊为副主席，后者来自新党，是分裂自统一进步协会的保守派。费里特的姐夫瓦希代丁亲王是其支持者，甚至有谣言称他担任名誉主席。德尔维希·瓦赫代蒂从机动部队中逃跑后，曾寻求亲王的保护，但却被拒。尽管自由和谐党的队伍中有许多民主主义者，但很明显，它是一个比统一进步党“更右”的派别，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宫廷党。其章程宣称，坚持两级选举制度并由苏丹任命参议员很符合“现在的情形”。它的目标在于，让参议院在立法、

政府和预算监督方面获得更多的权力。当坚称苏丹有权否决立法及决定政府政策时，其保守性显而易见。

大棒选举

1911年12月11日，众议院为一个议席在伊斯坦布尔进行补选。自由和谐党以一票的优势赢得这个席位，并称这一结果为伟大的胜利。统一进步协会内部却弥漫着失败主义气氛。他们为一个内阁职位提名的候选人因马哈茂德·谢夫凯特的阻碍而落选。统一进步协会最终忍无可忍，决定提前进行选举。但1909年宪法修正案使得解散议会异常艰难，于是又通过一个新的修正案，以简化程序。在经过长期、激烈的讨论之后，众议院最终在1912年1月18日解散。此后，包括塔拉特和贾维特在内的4名统一进步协会成员被任命为部长。统一进步协会非常用心地为这次大选推举候选人，并动用自己所有的权力向选民施加压力，以致这次选举被称作“大棒选举”。在选出的270名代表中，仅有6名来自反对党，而且只有1名来自阿尔巴尼亚地区。这个例外的议员叫阿里·盖利普（Ali Galip），他是一名军官，来自开塞利的一个很有声望的家庭，但后来却因为试图袭击锡瓦斯议会而名誉扫地。哈利勒（Halil Mentеше）^①当选新一届议会的主席。由于艾哈迈德·里扎与统一进步协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被任命为在政治上“不活跃”的参议员。在反对派取得补选胜利之后，他对这些结果深感失望，从而开始酝酿一场政变。

5月初，阿尔巴尼亚再次爆发叛乱。6月，12名军官占领

^① 一般来讲，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没有姓。这里提到的姓氏，是1934年《姓氏法》实施之后才采用的。

莫纳斯提尔山，要求重新选举，组建新政府，并审判那些应该为的黎波里塔尼亚灾难负责的人。与此同时，一个名为“救星”（Saviour Officers）的秘密军事社团发表了反对统一进步协会的声明。尽管那时只有 5 名成员，它却被认为代表大多数军队的利益。不管选举期间多么混乱，在国家与意大利交战时发生叛乱，军官们到莫纳斯提尔山进行政治密谋，这是不可接受的。种种迹象表明，尽管所有的政治环境都会有差异，但统一社会的基本共识却不存在，或者说是严重缺乏。7 月 2 日，一项禁止军队相关人员参与政治活动的法律开始生效。其实，这样的法律早已存在，但统一进步协会甚至在《自由宣言》发布后还允许自己的军官参加政治活动，从而打破了这一法律的限制。在 1909 年召开的统一进步协会大会上，穆斯塔法·凯末尔就指出允许军官参与政治活动的缺点，尽管其观点在原则上被接受，但并没有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统一进步协会利用其在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优势，采取措施摆脱马哈茂德·谢夫凯特的监督，并要求他辞去陆军大臣之职。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就接受了统一进步协会的要求，但随后，统一进步协会却无法就四个帕厦谁来出任陆军大臣一职的问题达成一致。看起来，这四位帕厦都拒绝在一场团结马哈茂德·谢夫凯特的秀中合作。7 月 15 日，赛义德帕厦要求进行信任投票。他以 194 票获得了多数支持，仅有 4 票反对，但仍然坚持在两天后辞职了。苏丹试图让陶非克帕厦（Tevfik Pasha）出任大维齐尔一职，但不管用，他提出以解散众议院为条件。统一进步协会同意超级党政府这一想法，但威胁说，如果“救星”官员提名的候选人卡米尔帕厦当选大维齐尔，就会爆发内战。最终，在 1877 ~ 1878 年

对俄战争中担任埃尔祖鲁姆保卫战指挥官的加齐·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厦 (Gazi Ahmet Muhtar Pasha) 被任命为大维齐尔。内阁成员包括：卡米尔、阿夫洛尼亚里·费里特 (Avlonyalı Ferit)、侯赛因·希勒米 (Hüseyin Hilmi)、纳泽姆和加齐·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厦的儿子——马哈茂德·穆赫塔尔 (Mahmut Muhtar)。由于内阁中有这么多重量级的人物，因而被称为“超级内阁”或“父子内阁”。

赛义德帕厦辞去大维齐尔一职和加齐·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厦被任命为大维齐尔，标志着统一进步协会监督政府的终结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直到高门政变 (Babıâli Baskını)。统一进步协会在众议院中实力强大，为什么却接受这样的情形呢？还是它厌倦了来自各方面的抗议和指控？这可能是一种考虑，其真正的动机或许在于，逃避签订将的黎波里塔尼亚割让给意大利的和约责任。的黎波里人民仍然在进行斗争，但基本没有获胜的希望，意大利占领多德卡尼斯群岛，已经证实其攻占土耳其其他地方的实力。可以说，统一进步协会变成自己宣传的受害者，割让的黎波里的行为与其自封为国家“救星”的角色相互矛盾。但是，由于统一进步协会在众议院中占有大多数席位，它确信随时可以重掌大权。

然而，事情的变化证明其实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届政府在卡米尔帕厦和纳泽姆帕厦的影响下开始采取反统一进步协会的政策。7月24日，“救星”官员给众议院议长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48小时内解散议会。与此同时，政府向议会递交了自己的方案，并获得了167票对45票的信任票。有了这一结果，政府开始着手反对统一进步协会，并镇压其喉舌——《坦尼报》。侯赛因·希勒米抗议，并从政府辞职。8月初，众议院

解散，统一进步协会提出简化议会解散程序的宪法修正案，最终可谓自食恶果。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1911 年底 1912 年初，一个巴尔干联盟逐渐形成，包括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第内哥罗。俄国和英国扮演了调停者的重要角色。8 月，保加利亚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恐怖行动，到 9 月，这些事件升级到战争即将爆发的地步。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让步没有取得任何效果。9 月 30 日，巴尔干国家宣布进行战争动员，奥斯曼帝国也在 10 月 1 日做出类似的举动。

10 月 13 日，巴尔干联盟宣布其条件：

(1) 巴尔干地区各省自治，且由比利时人或者瑞士人担任总督。

(2) 基督徒在他们本省服军役，并由基督徒军官指挥；在训练出足够的军官之前，他们免除兵役。

(3) 建立省立法委员会。

(4) 改革将在巴尔干国家和列强的监督下进行。

(5) 改革将在 6 个月之内进行，奥斯曼帝国停止单方面的军事动员。

这些要求在奥斯曼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政府不可能给出肯定的答复，而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巴尔干联盟想要的。

1912 年 10 月 17 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对奥斯曼帝国宣战。两天前，它们与意大利匆忙缔结了和平协议。10 月 22 日到 31 日，奥斯曼帝国军队接连惨败：在科索沃和科曼诺瓦 (Komanova) 被塞尔维亚军队打败，在克尔克拉雷利

(Kırklareli) 和吕莱布尔加兹 (Lüleburgaz) 被保加利亚军队打败。保加利亚军队一直打到查塔加 (Çatalca) 的伊斯坦布尔防线和加里波利半岛的博拉亚尔 (Bolayır) 防线。11月18日的一场战役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结果。加强防守的约阿尼纳 (Janina)、斯库塔里 (Scutari) 和埃迪尔内 (Edirne, or Adrianople) 被包围。奥斯曼巴尔干人的命运在两周内决定。

为什么会有如此惨重的失败呢？与其对手相比，奥斯曼帝国或许有同样充足的武器和装备供应，马哈茂德·谢夫凯特过去把预算的很大一部分都用在了购买武器上。但事态的发展清楚地表明，巴尔干联盟在谋略、通信和补给线方面更胜一筹，而且他们的军队更具机动性。

奥斯曼帝国的惨败应该归咎于军队的代理总司令、陆军大臣纳泽姆帕厦。当然，加齐·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和卡米尔帕厦都应该为任命并让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负政治上的责任。他们尤应被指责，因为在巴尔干战争面临转折点之时，他们仍然执着于对统一进步协会的不满，这同国家统一的精神相违背。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在黎波里塔尼亚战争中国家共识的崩溃。统一进步协会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毫无头脑地采取了不成熟的政策，这同样可以解释共识的缺乏和在巴尔干的失败。

1912年10月29日，加齐·艾哈迈德·穆赫塔尔被迫辞职，卡米尔成为新的大维齐尔。11月1日，陆军大臣纳泽姆帕厦对查塔加防线是否能够抵挡敌军进攻持悲观态度，从而开始寻求外交上的解决途径。法国认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奥斯曼帝国将无法保卫帝国领土的完整。11月3日，奥斯曼帝国请求列强在确保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情况下进行干预，达成停战协议。11月9日，统一进步协会创办的《坦尼报》被关闭，原

因是其专栏作家侯赛因·贾希特 (Hüseyin Cahit) 写了一篇要求马哈茂德·谢夫凯特指挥军队的文章。11月11日, 统一进步协会的所有活动都被迫停止。这天前, 自由和谐党在当局的建议下停止活动。被捕的统一进步协会成员增加到55人。由于列强拒绝干预, 奥斯曼帝国政府被迫于11月12日与巴尔干的统治者直接谈判。保加利亚又一次攻击了查塔加防线, 但没能成功。因此, 他们也愿意接受停战协定 (12月3日), 接着和会在伦敦召开。

伦敦会议于12月16日召开。23日, 巴尔干地区的国家要求获得爱琴海诸岛和整个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 泰基尔达 (Tekirdağ) 和米迪耶 (Midye) 以东的岛屿和加里波利半岛除外。最初, 奥斯曼帝国代表仅仅同意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自治, 但随后接受阿尔巴尼亚和克里特的未来地位由列强来决定, 并同意跟列强讨论爱琴海诸岛的地位, 条件是从埃迪尔内省到梅斯塔-卡拉苏边界 (the Mesta - Karasu border) 仍保留在奥斯曼帝国版图内 (1913年1月1日)。巴尔干同盟宣称, 如果奥斯曼帝国拒绝放弃埃迪尔内、克里特及其附属岛屿, 和谈立即终止, 这一情形在1月6日发生了。在经过共同商议之后, 列强驻奥斯曼的大使于1月17日给帝国政府发出外交照会, 要求其放弃对埃迪尔内和爱琴海诸岛的要求。但是, 这一情况似乎无法解决。传统上, 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交由众议院审议, 但众议院已被解散。帝国最杰出的政治家聚集起来, 组成帝国政务委员会 (Şurâ-yı Saltanat), 并于1月22日召开会议。卡米尔告诉代表们, 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已被包围, 他们必须决定是战是和。大多数人同意求和, 这就意味着不得不割让埃迪尔内。

高门政变

面对这一严重的困境，统一进步协会策划了一场政变。1913年1月23日，一群统一派分子来到宫廷前，大声喊保卫埃迪尔内的口号。守卫并没有阻止他们，因为其长官也站在抗议者一边。两名军官和一名警官因为试图阻止他们进入而被枪杀。此时，纳泽姆帕厦站出来大声说道：“你们背叛了我”，随即被雅库普·杰米尔（Yakup Cemil）杀死（有谣言称，统一进步协会许诺给予纳泽姆大维齐尔一职来换取他的支持。随后他开始照顾统一进步协会官员的利益，并确保一些反对统一进步协会的措施没有执行）。恩维尔大步走到卡米尔帕厦面前，宣布他被免职，并把签好的文件直接呈送给苏丹。他任命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厦为大维齐尔和陆军大臣，赛义德·哈莱姆帕厦（Sait Halim Pasha）为外交部长，哈吉·阿迪勒（Hacı Adil）为内务部长，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厦（Ahmet İzzet Pasha）为代总司令，杰马尔贝伊（Cemal Bey）为伊斯坦布尔的司令官。

新政府着手打造一种民族统一的精神。之前被捕的反对派被释放，并于2月11日宣布实施大赦，只有那些在巴尔干战争中给敌军提供物质或道德帮助的人除外。国防委员会（Müdafaa-i Milliye Cemiyeti）成立，声称它将接受任何为保卫祖国提供的援助。对萨巴赫丁亲王和所有著名反对派记者的拜访，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欧洲国家对高门政变持消极态度，主要是因为公众反对统一进步协会，将其行为看作灾难。1月28日，巴尔干联盟宣布伦敦会议结束。1月30日，保加利亚军队统帅部宣布，预定三天之后到期的停战协定终止。同一天，奥斯曼帝国回复列强的照会，声明埃迪尔内是奥斯曼帝国的第二首都

和穆斯林城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但将会放弃马里查河右岸的大片领土。在确保安纳托利亚地区安全的前提下，爱琴海岛屿未来的情况可以由列强决定。同时，他们也要求列强承认海关独立、贸易平等，并向居住在帝国的外国人征税。作为第一步，关税应立刻提高 4%，关闭外国邮局，并取消不平等条约。统一进步协会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欧洲各国特别痛恨它的原因。欧洲列强希望奥斯曼帝国势力撤出巴尔干和埃迪尔内，统一进步协会则用要求经济独立的方式来回避这一问题。

保加利亚如期重开战端。青年土耳其党官员想通过发起一次进攻来解除对埃迪尔内的包围，声称发动宫廷政变的目的就是保卫埃迪尔内。但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厦和军队代理统帅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厦都认为这一行动不会成功，奥斯曼银行也拒绝为这样的行动提供资金。然而，在统一进步协会官员的坚持下，最终决定可以尝试在博拉伊尔采取行动。当驻扎在加里波利半岛的特种部队开始进攻时，第十军通过海运在沙尔柯伊 (Şarköy) 的敌军阵地后面登陆，使得保加利亚军队遭到两面夹击。特种部队按计划于 2 月 8 日开始发动进攻，但第十军的登陆被延迟了。他们只能在晚上开始进攻，这给了保加利亚军队阻止第一波和第二波攻击的机会。费特希是特种部队的参谋长，他的朋友穆斯塔法·凯末尔是他的众参谋之一。恩维尔是第十军的参谋长。这次行动的失败导致两支军队之间的互相指责，并发展成为恩维尔和凯末尔、费特希之间的个人恩怨。

取胜已经没有任何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人们试图接受抛弃埃迪尔内的做法。3 月 26 日，埃迪尔内在经过英勇的抵抗（相传人们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只得吃树皮充饥）后被迫投降。列强坚持把边界划在米迪耶和以挪士 (Enos) 之间，

从而把埃迪尔内与奥斯曼帝国其余部分分割开来。奥斯曼政府被迫在4月1日接受这一边界，并在5月30日签订的《伦敦条约》中批准了这一协议。由于丢失了埃迪尔内，恩维尔这个宫廷政变的主要活动家丧失了他在统一进步协会中的领导地位，结果费希特贝伊获胜，并成为统一进步协会的秘书长。

由于割让埃迪尔内的事又一次被提上议程，反对派再次谋划接管政府。统一进步协会没能拯救埃迪尔内，而且在欧洲国家越来越不得人心。第一个阴谋（3月初）是萨巴赫丁亲王的私人秘书萨特维特·卢特菲（Satvet Lutfi）鼓动的，意图组建一个分权制政府。尽管多人被捕，但统一进步协会小心地避免因反应过激而破坏国家统一的气氛。例如，尽管派人搜查萨巴赫丁亲王的住宅，但认为他并没有与阴谋者勾结在一起。第二个阴谋发生在《伦敦条约》签订12天之后的6月11日。但同其他试图推翻政府的行动一样，这次行动没有周密的计划。当要从陆军大臣调往高门任职时，马哈茂德·谢夫凯特遭到了强力阻止，并被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卡泽姆上校（Captain Kâzım）及其同伙杀死。但除了马哈茂德·谢夫凯特的死以外，这次阴谋没有其他活动。卡泽姆和他的同谋躲藏在培拉区（Pera）一位英国妇女家中。尽管英国领事拒绝出具搜查令，但他们仍被包围，并在经过2个小时的喊话之后投降。卡泽姆和其他11名同谋被处决，其中包括法国公民萨利赫帕厦（Salih Pasha）。统一进步协会对王宫和不平等条约失去了耐心。关于英国和法国对统一进步协会新显现出的好战性作何反应，此处不再赘述。

在马哈茂德·谢夫凯特被杀之后，统一进步协会非常希望消除“统一和团结”的气氛。在处死的11个人中，不包括萨

巴赫丁、前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库尔德人谢里夫帕厦（Sherif Pasha the Kurd）。超过 200 名反对者被捕，并被流放到锡诺普（Sinop）。5 月 28 日从埃及返回后，卡米尔帕厦随即被软禁在家中，然后被迫离开伊斯坦布尔。英国大使对此提出抗议，但奥斯曼政府对此置之不理。一个重大发展是，统一进步协会的成员赛义德·哈利姆帕厦首次被要求出面组建政府。赛义德·哈利姆帕厦在统一进步协会中并不突出，随着他当选大维齐尔，统一进步协会的监督政府时期便宣告结束。从此时起，统一进步协会完全掌握了政权。

统一进步协会监督政府简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回顾这一时期的一系列事件，并评估其积极和消极方面。从严格的政治角度来看，起初这段时间充斥着激烈争论，而且奥斯曼帝国止步不前，并被迫放弃巴尔干的大部分领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并不能代表全局。革命在一些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土耳其社会开始走向民主资产阶级革命——换句话说，土耳其开始进入现代时期。

第一个发展领域是立法。政权更替带来立法的变化。这就是前面已经详细介绍过的宪制改革。第二个发展领域是国家的精神生活。无论在政治上多么压抑，统一进步协会作为政治上的监护人是如何多疑，但它坚持自由主义的哲学。在阿卜杜勒·哈密德的长期统治中，思想的自由表达被限制和压制。而此时，文学界获得巨大的进步，出版了大量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思潮都有所发展，并能够兴旺繁荣。教育事业也从这种新形成的自由氛围中受益。历史课程变得多样、丰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限于奥斯曼历史和伊斯兰教史。社会科学和

哲学课程也被列入。像随后共和国时期的人民之家（Halkevi），统一进步协会的俱乐部实际上就是统一进步协会的分支，它们承担着重要的职责，成了文化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这一时期出现并在后来继续发展的主要思潮，将在下一章介绍。

第三个发展领域是经济。公司被授予获取房地产的权利，并允许出售那些已经无用的捐赠物资。内地税被废，进口机器和设备的工业投资免进口税。1911年爱琴海成立了保护无花果生产商的公司，1912年为增加国内产品需求成立了全国消费者协会。在1886~1908年的23年间，国内资本支持成立了24家公司，总资产达4020万库鲁斯（平均每年约175万库鲁斯）。然而，在1909~1913年，民族工业发展了27家，总资产达7920万库鲁斯（平均每年约1590万库鲁斯）。公司的数量增长了5倍，总资产达到以前水平的9倍。在同一时期，外国公司的数量和资本仅仅在以前的水平上增长了两倍。到1908年，穆斯林仅仅创办官商合办的企业。事实上，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一个企业家就不可能创办属于自己的公司。农产品贸易在统一进步协会的监督政府时期也有显著的增长。

第四个发展领域是教育。从1904年到1908年，教育部从预算中获得20万里拉拨款，1909年增长到60万里拉，1910年增长到94万里拉，1914年增长到123万里拉。在对比这些数字的时候，需要知道，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范围变小了。在发表《自由宣言》的时候仅有79所中学，到1914年增加到95所，而且教师和学生的数量也有了极大的增长。

第十一章 立宪时期的主要思潮

前面已提到，塔勒克·扎菲尔·图纳雅认为，第二立宪时期是共和国的“政治实验室”。因此，我们需要回顾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

伊斯兰主义

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是伊斯兰教统一和哈里发的强力维护者，或许比以往的苏丹更甚。在其统治时期，伊斯兰主义已经有《公义》（*Sirat-i Müstakim*）杂志作为喉舌，但他还是非常小心，不准任何思潮在其控制之外。因此，伊斯兰主义只有到了第二立宪时期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伊斯兰主义可以被界定为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反向思潮，以及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国家殖民化的反应。这也是从伊斯兰教寻求解决世界状况的方式。

一些人认为，通过高举现代性的旗帜，伊斯兰教可以盛行天下。纳米克·凯末尔便是这一思想流派的先驱：他不仅是现代伊斯兰主义之父，而且是奥斯曼民族主义（即奥斯曼主义）之父。现代伊斯兰主义的第二位先驱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uddin al-Afghani, 1839 - 1897），他不仅影响了奥斯曼帝国的民众，也影响了其他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其他著名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还有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卜笃（Mohammad Abduh）、喀山的穆萨·卡鲁利亚（Musa Carullah of Kazan），以

及印度的赛义德·艾哈迈德·汗 (Sayyid Ahmad Khan) 和穆罕默德·伊克巴勒 (Muhammad Iqbal)。《塞比尔 - 于尔 - 雷萨德》(Sebilürreşad) 是第二立宪时期的重要伊斯兰杂志。现代奥斯曼伊斯兰主义者包括赛义德·哈莱姆帕厦、谢姆塞丁·居纳尔塔伊、伊斯梅尔·哈克·伊兹米尔利、谢赫本德尔扎德·艾哈迈德·希勒米 (Şehbenderzade Ahmet Hilmi)、穆罕默德·阿里·艾尼等。艾哈迈德·纳伊姆和穆斯塔法·萨布里则是这一时期的保守伊斯兰主义者。

西方主义

立宪时期的第二大思潮是西方主义。追随者希望在西方化中找到“如何拯救奥斯曼帝国”的答案。希勒米·齐亚·于尔肯 (Hilmi Ziya Ülken) 把西方主义者分为四类：

——坦兹马特文明主义者 (the Tanzimat Civilisationists)。这些人相信奥斯曼主义这一坦兹马特时期 (1839 年) 的基本思想，并希望通过西方化实现“民族统一” (Unity of Nationalities) 的要求，即奥斯曼民族主义。他们认为，奥斯曼各民族或来自不同宗教信仰的米勒特 (millets) 可以在西方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于尔肯将萨特贝伊和埃姆鲁拉·埃芬迪划归这一群体，他们曾建议将教育作为提倡奥斯曼主义的方法。他们宣称，防止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教育促进年轻人的亲奥斯曼情感。

——那些发现奥斯曼社会结构的缺陷，并希望创造一种盎格鲁 - 撒克逊式社会的人。他们最杰出的代表是萨巴赫丁亲王及其追随者。

——实证主义者，他们以《知识富论》 (Servet-i Fünun)

和《乌尔姆社会经济》(Ulum-u İktisadiye ve İctimaiye) 杂志为核心, 或与这些杂志有联系。实证主义是统一进步协会运动的基本世界观, 在后来的共和国时期, 对这一信条的坚持成为阿塔图克领导的共和人民党的显著特点。艾哈迈德·里扎是坚定、坦率的支持者, 致力于推动实证主义的发展。其他的统一进步协会成员和随后的共和人民党成员也把实证主义当作他们的世界观, 尽管他们可能并不完全理解其含义。

—— 激进的西方主义者: 不加批判地崇拜西方的一切。

这个学派最著名的极端主义者是阿卜杜拉·杰夫代特 (Abdullah Cevdet)。他是创办统一进步协会的五名军医学院学生之一, 并且也是《学说》(İçtihat) 杂志的负责人。杰夫代特是拉丁字母的倡导者。人们经常可以看到, 他和他的妻子戴着典型的欧式帽子, 在西尔凯吉 (Sirkeci) 附近宣讲与欧洲人通婚是尽快摆脱落后的良方。这一事业的其他拥护者包括杰拉勒·努里 (Celal Nuri)、卡勒奇扎德·哈克 (Kılıçzade Hakkı), 以及在较低程度上的里扎·陶菲克, 尽管他们不像杰夫代特那么激进。

土耳其主义

土耳其主义可以被看作第三大思潮。同许多其他的民族主义哲学家一样, 他们通过研究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的著作来分析其起源。这些成果大部分都与欧洲突厥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关, 包括艾贝尔·雷穆萨 (Abel Remusat)、西尔维斯特·德·萨西 (Silvestre de Sacy)、德经 (Deguignes) 和亚瑟·拉姆李·戴维斯 (Arthur Lumley Davids) 等学者。皈依伊斯兰教的波兰学者穆斯塔法·杰拉勒丁帕厦 (Mustafa Celalettin Pasha)、利

昂·康恩 (Leon Cahun) 以及匈牙利历史学家、突厥学专家阿米尼乌斯·范贝里 (Arminius Vambery), 他们的成果都很有影响力。一些作品在大众社会中引起了突厥意识的觉醒, 如福阿德帕厦和杰夫代特帕厦的《奥斯曼语法》 (*the Kavaid-i Osmaniye*, 1851)、艾哈迈德·陶菲克帕厦的《奥斯曼语》 (*Lehçe-i Osmani*) 和《历史哲学》 (*Hikmet-i Tarih*)、苏莱曼帕厦的《世界史》 (*Tarih-i Alem*) 和《土耳其语法》 (*Türkçe Sarf*)、谢赫·苏莱曼·埃芬迪的《察哈台语字典》 (*Lugat-i Çağatay*) 以及谢姆塞丁·萨米 (Şemsettin Sami) 的《土耳其语大字典》 (*Kamus-ı Turki*)。在文学界, 我们从锡纳西 (Şinasi) 的新式诗歌可以看到去除奥斯曼形式主义的简化土耳其语, 以及在穆罕默德·埃明和里扎·陶菲克诗中的进一步发展, 这同样见于艾哈迈德·希克梅特 (Ahmet Hikmet) 的散文, 以及齐亚帕厦和阿里·苏阿维对土耳其语的辩护。

突厥主义被统一进步协会改造成土耳其民族主义。从一开始, 统一进步协会并不主张彻底推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甚至其真实意图不得不对自己的追随者保密, 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极度谨慎。随着时间的流逝, 统一进步协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质变, 发展成为土耳其主义的政治组织。尤素福·阿克丘拉写的政治散文《三大政治形态》 (*Üç Tarz-ı Siyaset*) 是这一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阿克丘拉是从俄国喀山移民到土耳其的实业家之子, 当在军事学校读书时, 他因为加入统一进步协会而被流放到黎波里, 随后逃亡到巴黎, 并在那里学习政治学。毕业之后, 他返回俄国。1904年, 他在阿里·凯末尔在开罗创办的《土耳其人》 (*Türk*) 报纸上发表文章。在这篇文章中, 他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奥斯曼主义者、土耳其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

政策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客观分析。因此，这“三者”第一次得到了受过教育的奥斯曼帝国民众的关注。像艾哈迈德·阿加奥卢 (Ahmet Ağaoglu)、侯赛因扎德·阿里 (Hüseyinzade Ali) 和尤素福·阿克丘拉这样的鞑靼人，在土耳其主义政治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可能与俄国更为发达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他们是受压迫群体的实际情况有关。土耳其化、伊斯兰化、欧洲化的原则最先得到阿里·苏阿维 (Ali Suavi) 的支持，并在 1905 年被侯赛因扎德·阿里 (统一进步协会的创立者之一) 在一篇给《生活》(Hayat) 杂志的文章中采纳，该文发表于第比利斯。继阿里·苏阿维之后，齐亚·格卡尔普 (Ziya Gökalp) 成为这一未来蓝图的主要倡导者，他创造了许多土耳其化、伊斯兰化和欧洲化的名词。

创建突厥主义组织的第一次尝试出现在《自由宣言》发表之后，即 1909 年 1 月 7 日成立的突厥协会 (Türk Derneği)。它是一个包括亚美尼亚人和一些欧洲东方学者的文化团体。1911 年 8 月 31 日，突厥之乡协会 (Türk Yurdu Cemiyeti) 成立，其最初的目的是为土耳其学生提供住宿。这个协会出版了名为《突厥之乡》(Türk Yurdu) 的杂志，极大地影响了土耳其主义的发展。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中，奥斯曼帝国接踵而至的灾难推动了土耳其主义事业的发展。1911 年 7 月 3 日，突厥之家 (Türk Ocağı) 开始在军医学院开展活动，这里曾经是统一进步协会的诞生地。事实上，统一进步协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侯赛因扎德·阿里是一个医学教授，而尤素福·阿克丘拉在军事学院教授政治史，这就为这些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突厥之家正式成立于 1912 年 3 月 25 日，当时的的黎波里塔

尼亚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6个月，而且意大利就在3天前攻击了达达尼尔海峡。其创始人包括杰出的土耳其主义者穆罕默德·埃明·尤尔达库尔（Mehmet Emin Yurdakul）、艾哈迈德·费里德·泰克（Ahmet Ferit Tek）、艾哈迈德·阿加奥卢和福阿德·萨利赫博士（Dr. Fuat Salih）。突厥之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伊斯坦布尔进行大量的活动，包括“星期五会议”和由男女演员表演的戏剧。其成员写文章讨论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如国民经济。这些文章都发表在《突厥之乡》上，使其成为突厥之家的宣传工具。

随着巴尔干战争的爆发以及帝国几乎丧失在巴尔干的全部领土，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变得越来越明显。事态的急转直下改变了土耳其的政治形态，产生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奥斯曼主义不再被视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它是土耳其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导致后者成为一种隐藏的或无法公开的理想。这是因为，土耳其主义担心会被视作对多民族帝国的否定。面对失去埃迪尔内这一土耳其核心领土的威胁，对奥斯曼主义的顾虑成了次要的因素。事实证明，“土耳其人”这一观念现在必须被当作保卫国家的工具大力宣传。奥斯曼主义尽管不再重要，却仍然存在；统一进步协会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土耳其民族主义组织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尚未完全消失，因而像突厥之家这样的组织的存在仍旧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有这样的进展，1918年签署停战协定之前，突厥之家的活动仍主要集中在伊斯坦布尔。其中央机构成员增加到2743人，但在全国范围内的分支机构不过28个。

巴尔干形势的急转直下迅即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作曲家穆尼尔·马兹哈尔·卡姆索伊（Münir Mazhar Kamsoy）讲述

了他在米尔基耶公务员学校 (Mülkiye School for Civil Servants) 求学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在高校中, 米尔基耶是第一个建立突厥之家组织的学校。卡姆索伊和他的一些来自斯屈达尔 (Üsküdar) 的同学组织了一个突厥之家的分支机构, 并努力寻求一个成熟、有经验、“兄长般”的领导人。他们认为哈姆杜拉·苏普西 (Hamdullah Suphi) 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们是在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时认识的。他们邀请他加入协会, 却遭到拒绝。后来, 哈姆杜拉·苏普西不仅成为突厥之家的成员, 而且还担任了主席。人们记得他当时说: “如果土耳其人变成土耳其主义者, 这将会开启其他种族各寻异路之门, 我们的帝国将会瓦解。不管怎样, 我是个切尔克斯人 (Circassian), 不会同情你们的事业。”

实际环境和事件的压力经常使纯粹的意识形态在现实中无法立足, 人们因而持几种混杂思想。例如, 本来是伊斯兰主义的人可以接受一些西方主义和土耳其主义的观点。纳米克·凯末尔在其作品中首先是一个现代伊斯兰主义者, 但是他也出版为奥斯曼主义、西方主义甚或土耳其主义辩护的小册子。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算作西方主义者, 而且, 在接触到西方民族主义之后, 一些西方主义者很容易对土耳其主义产生同情。许多西方主义者对失去身份和传统价值感到忧虑, 采取了“有限度的”或部分西方化的立场。因此, “西方”需要穿越思想的壁垒, 其有益的方面 (科技) 被留下, 消极的方面 (极端个人主义、松散的家庭关系) 则被抛弃。如果说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被视为西方思想最高端的产品, 反过来, 它们也许会被等同于无限制的思想自由, 没有丧失个人、传统或宗教价值的危险。但是, 这种程度的西方化要想广泛传播, 就

必须有一个高效的教育体系，以确保有一个坚实的文化背景。在土耳其，许多民族主义者都坚持“有限度的”西方化。阿塔图克的路线，毫无疑问是亲西方的，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阿塔图克主义的基本思想也许可以概括为高度的西方主义和高度的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

奥斯曼社会主义党成立于1910年9月，就在其刊物《参与》（*İştirak*）出版几个月之后。侯赛因·希勒米（绰号社会主义者希勒米）是这一运动的领导。然而，它并没有获得强有力的支持，也许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欠发展，特别是土耳其社会发展水平不高。没有发达的工业部门，因而也没有组织化的工人阶级。当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落后是另一个因素。例如，尽管萨洛尼卡的工人数量比伊斯坦布尔少，但社会主义运动却更加活跃，因为该城市的社会和文化更为发达。

第十二章 统一进步协会的 统治和卷入一战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1913年6月30日，在马哈茂德·谢夫凯特被刺后的第19天，对于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人来说，一个“奇迹”诞生了。在战争之后，巴尔干国家为瓜分从帝国掠夺来的战利品而产生矛盾。保加利亚向曾经的盟友发起攻击，但被打败。在冲突期间，他们撤出东色雷斯。根据《伦敦条约》的规定，奥斯曼帝国军队首先抵达米迪耶—以挪士一线。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应该进一步收复埃迪尔内。统一进步协会想要这样做，但老一辈对此持悲观态度，谴责这一冒险计划除了惹一身麻烦外什么也得不到。他们引用奥斯曼的外交名言：“十字军一旦进入，新月军永难复回。”其寓意为：即使军队成功收复埃迪尔内，欧洲国家也会通过外交诡计阻止土耳其拥有它。统一进步协会立场坚定，并于当天执行了这一计划。奥斯曼帝国派军队快速前往埃迪尔内，穆斯塔法·凯末尔和恩维尔的军队争当第一。恩维尔的军队夺得头筹，1913年7月22日，奥斯曼帝国军队进入埃迪尔内和克尔克拉雷利（Kırklareli）。统一进步协会并不理会列强的抗议和威胁，特别组织（the Special Organization，统一进步协会的秘密军队）的成员建立了西色雷斯独立政府，该政府以苏莱曼·阿斯凯里（Süleyman Askeri）为首，并获得了

大多数土耳其人的支持。这一系列事件以《伊斯坦布尔条约》（1913年9月29日）为高潮：保加利亚被迫割让西色雷斯，并把马里查河作为其边界，这样埃迪尔内和克尔克拉雷利便划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同时，保加利亚被迫割让给希腊和塞尔维亚一些它们自认为合法的土地。现在奥斯曼被看作这两个国家的未来盟友，并为这一目的开启了对话。根据地缘政治格局，保加利亚想要不顾列强尤其是俄国的反对，夺取伊斯坦布尔、东色雷斯，或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这是不现实的。

奥斯曼举国欢庆，庆祝夺回埃迪尔内。恩维尔这个昔日高门政变的英雄借此为自己正了名，他在统一进步协会内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那年秋天，费特希被任命为驻保加利亚大使，穆斯塔法·凯末尔为使馆武官。索菲亚的职责远离了国内政治的格局，这确保了恩维尔大权在握。恩维尔及其支持者将目光投向陆军大臣一职。由于在黎波里塔尼亚和巴尔干战争中的功绩，每战为他赢得了三年的“资历”（seniority），从而获得了帕厦的军阶（准将）。随着凯末尔和费特希被边缘化，杰马尔成为恩维尔新的权力竞争对手。他也得到了晋升，并以工务部长（Minister of Public Works）的身份进入内阁。

恩维尔的晋升也许与他的皇室联姻有关。在《自由宣言》公布后，统一进步委员会决定通过选择两名忠诚拥护者与皇室成员结婚，以加强对宫廷事务的监督。恩维尔便是被选择完成这一任务的两人之一，并在1909年与苏丹穆罕默德五世的侄女纳吉耶（Naciye）订婚。那时他已经30岁了，而纳吉耶才刚刚12岁。他们在1911年正式结婚，但直到1914年（土耳其重新夺回埃迪尔内之后）纳吉耶成年后才开始过夫妻生活。

担任陆军大臣之后，恩维尔从 1914 年 1 月开始着手清理军队。在《自由宣言》公布后，所有依靠上级提拔而晋升的军官都被勒令退休，而现在轮到那些军事学院的老毕业生，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对巴尔干战争的失败负有责任。根据利曼·冯·桑德斯将军（General Liman von Sanders）的统计，他们大约有 1100 名。1914 年 2 月，军队开始大规模重组，这使得奥斯曼帝国军队焕然一新。恩维尔（与马哈茂德·谢夫凯特相比）没有利用其在统一进步协会中的影响力作为筹码来增加军队的预算。1911 年，全国总预算的 24.8% 划拨给陆军部，而在 1914 年这一数字下降到 17.6%。这也许是因为他逐渐认识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比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更加重要，而且军队的实力会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而增强。

瓜分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军队在巴尔干战争中突如其来的惨败使得帝国士气衰竭。米赞杰·穆拉德（Mizancı Murat）在 1912 年 11 月撰文称，奥斯曼帝国只有在成为其中一个列强的保护国之后才能得以幸存，而且这种情形将会持续至少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可谓此时状况的一个反映。在这一关键时刻，卡米尔帕夏站出来支持成为英国的保护国，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在估计军事形势之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谢夫凯特强调，在欧洲顾问的帮助下改组军队已经证明效果并不理想，恢复军队战斗力的唯一方法是将其置于德国人的统率之下。他决定实施这一计划，并于 1913 年 4 月 24 日向德国大使提出正式申请。同年 11 月，奥斯曼同冯·桑德斯将军签订了为期 5 年的协定，后者随后成为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并成为军事委员会的成

员，负责所有军事学校及其训练设施，以及总参谋部官员的理论教育和军官的晋升考核。伊斯坦布尔的军队被交到德国人手中。这引起了俄国的抗议，它要求“机会均等”，提议英国占领伊兹密尔，法国占领贝鲁特，俄国则占领特拉布宗（Trabzon）。为不示让步，德国晋升冯·桑德斯为陆军元帅，这对于一个集团军指挥官来说军阶太高了。他还被授予陆军总监察官的头衔。

预感到与德国的过分亲密关系会引起抗议，马哈茂德·谢夫凯特想要通过请英国帮助实施“各省新法”（Law of the Provinces）来安抚后者。他们将会给内政部任命一名英国顾问，并给东部辖区（包括的省份有凡城、比特利斯、埃拉泽和迪亚巴克尔）和安纳托利亚北部辖区（包括的省份有埃尔祖鲁姆、锡瓦斯和特拉布宗）的公共工程、林业、农业和司法部门任命一名总监及各部门监察官，同时给这7个省的宪兵队分别任命一名指挥官。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东部和北部是“试点区”，随后将作为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未来的行政模式。加强与英国的关系意味着纠正拒绝林奇特许权（Lynch concession）的错误。然而，这一情势有两方面将会成为奥斯曼的悲剧。就在不久之前，统一进步协会曾拒绝一笔法国贷款，原因是这种特许权将侵犯国家独立。现在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把军队的控制权交给德国，国内事务交由英国处理。第二个残酷现实是，尽管给英国的所有特许权都是为了确保德国会对军队进行改革，但是奥斯曼帝国仍然需要处理同其他四个强国之间的问题。这将会导致更多的让步。

无论如何，统一进步协会并没有放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尽管列强在原则上同意应

该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各国都用“其他国家”应该先同意这一条件作为借口来阻止这一问题的解决，从而使得这一进程被无限期地延长。

因此，一种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并不希望看到的状况出现了。尽管列强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没有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但是它们努力实现一种状况：它们相互之间达成一致，划分势力范围，分割奥斯曼的大块领土（以修建铁路或运营权为掩护），并诱使奥斯曼帝国同意。当然，像伊斯坦布尔以及两个海峡这些有巨大争议的地区不包括在这个协议中。奥斯曼政府认为4月24日的提案是一个明智的举动，让俄国和英国在东安纳托利亚地区相互抗衡。然而，通过与英国结盟，俄国扭转了格局，迫使奥斯曼帝国政府接受它们进入东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事实。1914年2月8日签订的《俄国-奥斯曼条约》，取消了由柏林会议决定把东安纳托利亚地区（欧洲称这一地区为亚美尼亚）视为欧洲内部事务的规定，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争论的焦点，这也是《圣斯特法诺条约》的结果。换句话说，在亚美尼亚问题上，俄国现在终于成功地成为即便不是唯一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裁决者。例如，如果俄国没有在东安纳托利亚地区修建铁路，奥斯曼帝国就无法与其他国家签订该地区的铁路修建合同。地区军事体系得以建立；安纳托利亚东部及东北部的监察官本属于英国人，现在则由一名荷兰人和挪威人担任。1914年8月战争的爆发阻止了这些人就职。如此，统一进步协会尝到了同帝国主义共处的苦果，以及统治一个多民族帝国的紧迫性。

1913年9月20日，统一进步协会召开第五次大会，会议决定：小学和中学教育用本地语言，土耳其语作为一门单独课程

教授。然而，在1908年和1909年的教育方案中，地区语言只适用于小学。这一决定在阿拉伯世界引发了抗议活动。1913年1月，贝鲁特省议会决定建立地区军事体系和地方政府，并将阿拉伯语作为阿拉伯诸省的官方语言。当时，刚刚通过高门政变获得政权的统一进步协会，拒绝接受贝鲁特议会的决议。但到1913年3月和4月，阿拉伯诸省逐步建立地方政府，阿拉伯语被定为司法和教育系统的官方语言。6月，统一进步协会的代表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阿拉伯议会，提出了更多的要求。8月，要求政府机构使用阿拉伯语，并雇用说阿拉伯语的公务员。当阿拉伯议会的主席和其他4名阿拉伯人成为参议员时，似乎已经达成了一个友好协定。

有传言称，任命赛义德·哈莱姆帕厦为大维齐尔可能是为了安抚阿拉伯人。在巴尔干战争之后，一些知识分子明显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国家，而且认为应该模仿奥匈帝国的模式，建立一个土耳其-阿拉伯帝国（Turco-Arab empire）。在这一思路下，要求统一进步协会支持伊斯兰主义的潮流和呼声愈加高涨。在为《突厥之乡》杂志写的一系列文章中，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阐发了这一观点。第一篇以《土耳其化、伊斯兰化和现代化》为题，发表于1913年3月20日。毋庸置疑，统一进步协会对伊斯兰主义的理解是现代主义的。

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奥斯曼帝国如何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呢？众所周知，到19世纪末，欧洲列强之间的不和使得它们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一方是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另一方是协约

国：法国、俄国、英国，意大利后来加入这一阵营。多年来列强都在为战争做准备。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访问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这一突发事件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奥匈帝国的大多数人口有斯拉夫血统，由于担心塞尔维亚对这一多数民族的影响力，他们决定借此教训塞尔维亚。在塞尔维亚拒绝答应其提出的苛刻要求后，奥地利在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由于塞尔维亚是一个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国家，所以其在一定程度上是俄国的保护国。对塞尔维亚宣战把俄国也拖入战争，导致其不仅在与奥地利的边境，而且在与德国的边境进行战争动员（7月29日）。德国皇帝担心这种紧张局势会导致严重后果，于是向他的朋友俄国沙皇道歉。俄国统帅部告诉沙皇，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是盟国，所以动员方案应该包括这两国的边境，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仅针对奥地利进行战争动员。德国的战略也是准备同两国作战，首先将以最快的速度攻击法国，在打败法国之后转而集中全部兵力进攻俄国。因此，德国在8月1日对俄国宣战，8月3日对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同塞尔维亚开战前，奥地利有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兴趣。但巴尔干战争的惨败使奥地利，尤其是德国政府，对与奥斯曼帝国结盟深感担忧，普遍认为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弊大于利。尽管如此，德国还是于7月23日决定支持与奥斯曼帝国结盟，而且就此与亲德的赛义德·哈莱姆、塔达特、恩维尔以及众议院议长哈利勒（Halil）展开谈判（奥斯曼帝国内阁并不知情）。8月2日，奥斯曼帝国同德国签订条约。德国的军事代表团将会影响并积极参与奥斯曼帝国军队的组织和部署工作；反过来，

在必要时，德国将会保卫奥斯曼帝国的前线。需要注意的是，奥斯曼帝国是在战争爆发之后才签署这一条约的，因此缔约者完全明白他们的国家并不只是参加了一个同盟，同时也被卷入了战争。其他政府官员在听说签订了这一条约之后，都强烈抗议。他们坚持，至少盟约应该是秘密的，而且参战应该被尽可能地推迟。奥斯曼帝国内阁甚至想要和协约国结盟，但他们的提议遭到无情拒绝，答复称奥斯曼帝国只要保持中立就足够了。当然，它们拒绝奥斯曼帝国结盟提议的潜在动机在于，它们不希望同一个早就商量好要被瓜分的国家结盟。

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如此急切地希望结盟，并卷入不可避免的战争呢？其中的关键因素似乎是希望挽回在巴尔干战争中的损失。埃迪尔内失而复得的例子，给予其收复失地的希望。“为巴尔干战争复仇”的标语贴满了国内所有的军营和学校。奥斯曼帝国还担心，如果不能与其中一方达成同盟关系，列强将会瓜分帝国。另一个因素是缺乏资金。在回答雅库普·卡德里（Yakup Kadri）战后提出的“我们为什么参战？”这一问题时，杰马尔帕厦回答道：“为了支付人民的薪水”（引自 F. R. Atay, *Zeytindağı*）。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德国一直给予奥斯曼帝国财政支持。

战争爆发时，由海军上将索罗钦（Souchon）指挥的两艘最先进的德国重型巡洋舰“戈本号”（Goeben）和“布雷斯劳号”（Breslau）正在地中海航行。由于遭到英国海军跟踪，这两艘战舰受命进入达达尼尔海峡，恩维尔在没有与内阁商议的情况下就做出这样的决定（8月10日）。政府已经计划参战，但不是春天之前。为了尽量避免参战，政府要求德国军舰要么解除武装，要么离开土耳其领海。当德国拒绝这些要求时，奥斯

曼帝国宣布买下这两艘巡洋舰。“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分别被重命名为““亚沃士号”” (Yavuz) 和“米蒂里号” (Midilli), 奥斯曼帝国国旗在两艘军舰上兴起, 德国水兵也戴上了土耳其费兹帽。9月9日, 被任命为奥斯曼帝国海军司令的索罗钦要求在黑海举行军事演习。恩维尔在没有与海军部长杰马尔帕厦商议的情况下同意了这一要求。当杰马尔帕厦对这一决定提出抗议时, 德国大使声明这两艘巡洋舰仍然属于德国。10月, 德国发现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在东西战线取得预期的胜利, 便开始坚持让奥斯曼帝国参战。奥斯曼帝国海军准备对俄军港口发动突然袭击, 并随后在高加索和苏伊士运河开辟战线。恩维尔接受了这一计划, 统一进步协会的另外两位领导人杰马尔和塔拉特也赞同他的决定。10月27日, 舰队驶入黑海, 10月29日和30日分别炮轰了塞瓦斯托波尔 (Sebastopol) 和奥德赛 (Odessa)。这些决定没有告诉其他内阁成员。在得知发生了什么之后, 贾维特和其他三位部长辞职以示抗议。俄国在1914年11月2日, 法国和英国在11月5日先后对奥斯曼帝国宣战。恩维尔满足德国所有的要求, 就是希望德国赢得战争, 奥斯曼帝国可以分得更多的战利品。因此, 奥斯曼帝国政府成为德国野心的俘虏。

1914年11月11日, 奥斯曼帝国政府向协约国宣战。11月23日, 他们根据相应的宗教仪式, 向伊斯兰世界宣布要发动圣战, 但是这基本无效。许多穆斯林士兵参加英、法军队来对抗奥斯曼帝国, 汉志和许多其他阿拉伯诸省的奥斯曼臣民也毫无顾忌地拿起武器反抗奥斯曼军队。

第十三章 独立战争

战争爆发一月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利用列强相互争斗的时机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并于9月9日（这对于土耳其是一个吉利的日子，1922年的这一天伊兹密尔摆脱外国的占领获得独立）公布于众。所有的金融、经济、司法和行政特许权全部废除。

受制于人的种子早在帝国早期就播下了，这体现为一系列只给外国人的特权和“让步”。当帝国处于顶峰时，这种制度有利于促进和鼓励贸易的发展，但帝国衰落时，它就变成了欧洲国家争夺霸权和剥削奥斯曼帝国的工具。奥斯曼帝国甚至无法自主决定税赋以及向外国人收取的关税，经济发展因此受阻，国内商品无法与涌入帝国的外国商品竞争。在拥有领事裁判权、邮政系统、监狱和其他大量特权之后，列强变得自行其是。统一进步协会把这些不平等条约当作土耳其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并下决心要予以废除。借此良机，终于在9月9日做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这实际上是宣布完全独立。

当然，仅仅宣布不平等条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确保当事各国的官方接受。但出乎奥斯曼帝国意料的是，列强能够把它们相互之间正在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战争抛在一边，立即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并通过它们的代表呈送给大维齐尔，声明它们一致反对这一单方面的决定。这一奇怪的情形贯穿整个战争。当奥斯曼帝国军队在前线与协约国作战时，奥斯曼帝国外交的

首要任务是说服其盟国（同盟国和保加利亚）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在经过艰难的外交努力之后，德国在 1917 年 1 月最终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有附带条件：如果战争结束后协约国不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那么德国的特权也必须得到恢复。很明显，这一带有附加条件的协定没有太大的价值，但在经过进一步的谈判之后，奥斯曼帝国最终于 1917 年 11 月同德国签订条约，德国保证不再签订任何包含不平等条款的协议。

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 - 经济结构的现代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实现完全独立的必要条件。在监督政府时期就开始实施的经济结构重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扩大到更多的社会领域。战争的特殊环境增加了发展的动力。公司建立的过程便是恰当的例子。1913 年，统一进步协会的两名成员卡泽姆·努里（Kâzım Nuri）和托普丘奥卢·纳兹米（Topçuoğlu Nazmi）成立了艾登无花果生产公司（Aydın Fig Producers' Company）。1909 ~ 1917 年，合资企业的建立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

1909	3	1914	10
1910	13	1915	15
1911	22	1916	15
1912	8	1917	29
1913	5		

在 1912 ~ 1913 年，新建企业数量的下降是因为巴尔干战争的爆发，但令人惊讶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业继续繁荣发展。这不仅仅是指合资企业。卡拉·凯末尔（Kara Kemal）

负责战时的食品供应，他积极鼓励商人建立中小型企业。国内资本从 1908 年的 3% 增加到 1918 年的 38%。新成立的银行有：1913 年成立的阿达帕扎勒伊斯兰贸易银行（Adapazarı Islamic Trade Bank），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商业银行；卡泽姆·努里和托普丘奥卢·纳兹米于 1914 年创办的艾登国家银行（Milli Aydın Bankası）；1917 年成立的马尼萨葡萄业银行（Manisa Bağcılar Bankası）。1917 年 1 月，由国土耳其独资创办的国家信贷银行（National Credit Bank）成立。最初它只是一个贸易银行，随后则作为土耳其的中央银行。如此，它便承担了被英国和法国资本控制的奥斯曼帝国银行的职能。在占领伊斯坦布尔期间，协约国意识到奥斯曼经济独立的重要意义，从而竭力破坏该银行的运行。

奥斯曼还实行了一系列确保资本积累的措施。其中一项，即 1913 年底颁发的《鼓励工业发展法》（Law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Industry）。政府提供了诸多激励措施，如将政府土地拨给工厂、税收豁免和政府优先购买。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后，政府重新规定了进出口关税。1916 年 3 月规定，奥斯曼帝国的所有企业必须在通信和财务方面使用土耳其语。强迫非土耳其人学习土耳其语有三重利好。有利于监督外国公司的活动，为那些不懂外语的土耳其人找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比如，在爱琴海铁路公司中，土耳其人只能受雇于低级的职位。为确保土耳其人能够胜任这些工作，统一进步协会驻伊兹密尔的代表杰拉勒贝伊 [Celal Bey, 后改名为杰拉尔·巴亚尔 (Celal Bayar)，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三位总统]，于 1915 年 6 月创办了铁路工人学校（School for Railway Employees）。战时物资缺乏的状况给土耳其企业创造了机会。由于在战时铁路主要用来运

输军用物资，土耳其人（特别是与统一进步协会有联系的土耳其人）得到了非常可观的收入。

事实上，许多来自东色雷斯的希腊和亚美尼亚移民（或被强制迁来的移民），是另一个有助于土耳其资本主义发展的战争因素。在巴尔干战争之前，爱琴海地区的所有食品商店都是由希腊人经营的，而且许多地区的商业和手工业都掌握在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手中。他们移民至此，为土耳其人进入这些领域开辟了道路。

土耳其一位杰出的商人和实业家韦赫比·寇赤（Vehbi Koç），在其回忆录中讲述了在安卡拉建立企业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战争爆发时，奥斯曼帝国舰队控制着黑海，但在俄国投入新的军舰之后，这一控制权转到了俄国手中。结果，黑海的贸易不得不通过陆路完成。货物首先经由轮船运到安卡拉，然后通过大篷车运输到萨姆松，再从那里沿着海岸向东运输。这促进了安卡拉的经济觉醒。寇赤由此成为当时许多安卡拉公司（许多处于统一进步协会的保护下）的合伙人。

第一本在土耳其被广泛阅读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是《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1880），是艾哈迈德·米特哈特·埃芬迪（Ahmet Mithat Efendi）为贸易保护主义所做的辩护（1880年）。一个相反的潮流则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如米尔基耶公务员学校的教授奥汉内斯（Ohannes of Chios）和米凯尔·波尔塔凯尔（Mikail Portakal）。来自喀山的穆萨·阿克伊特（Musa Akyiğit）是另一名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者，他毕业于俄国公立学校，也是奥汉内斯的学生，曾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米尔基耶，后成为军事学院和陆军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的观点基于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理论。后者认为，国内工业在发展过程

中必须被保护，直到完全确立。《自由宣言》公布之后，自由贸易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理论。贾维特贝伊是一个重要支持者，他是一名经济学教授，并担任统一进步协会政府的财政部长。

1910年，亚历山大·海尔芬德（Alexander Helphand）来到土耳其并在那里居住了五年之久，他是德国籍犹太人，以帕武斯（Parvus）的名字为人熟知。帕武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后来成为统一进步协会的顾问，并写了许多文章，把“帝国主义”和“剥削”的概念介绍给土耳其民众，并准确地解释了诸如奥斯曼公共债务协会和烟草专卖局这样的机构是如何剥削奥斯曼帝国的。他同时还强调农村发展的重要性。

在战争期间，统一进步协会内部发起了鼓励商人联合、合作甚至建立国营企业的运动。卡拉·凯末尔对此很是积极。影响最大的是国家主义思潮（*étatisme*，混合经济），它在战时发展尤为迅猛。由于受德国类似发展的影响，这一思潮及其他观点在经济协作（*solidarism*）中找到了基础。齐亚·格卡尔普反对曼彻斯特经济学，并指责泰金·阿尔普（Tekin Alp）的理论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第十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大事记

从土耳其的角度概括出战争的主要方面和进程就足够了，无须赘述细节。奥斯曼帝国于11月11日宣战，又在1914年11月23日发出圣战号令，号召伊斯兰世界支持同盟国对协约国作战。德国和奥匈帝国要求奥斯曼帝国尽快在东线发动进攻，以便缓解西线的压力。恩维尔急切地制订计划，希望在安纳托利亚东部萨瑞卡米斯地区（Sarikamış）对俄国发动进攻，并由他亲自担任指挥官，同时，希望在苏伊士运河发起针对英国的行动。1914年12月18日，恩维尔下令在萨瑞卡米斯大胆行动，预计战果辉煌，但在1915年1月10日以惨败告终。即使在失败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恩维尔仍然固执地命令军队继续进攻，几乎所有参战的奥斯曼帝国军队都被摧毁。据估计，死亡人数不少于6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人不是在战斗中阵亡，而是死于运输不畅导致的寒冷、饥饿及伤病恶化。结果，同德国的意图相反，奥斯曼帝国军队一败涂地。俄国发现奥斯曼帝国根本不堪一击，从而把许多军队调往欧洲前线。

为了对民众隐瞒战争的实际情况，恩维尔决定返回伊斯坦布尔，并要求政府派先前护送他到特拉布宗的“亚沃士号”巡洋舰接他回去。内政部长塔拉特发电报回复说，不能把“亚沃士号”巡洋舰派到如此危险的海域。尽管恩维尔背后有德国支

持，但这样的回复却使他对对自己的处境深感忧虑。在这个节骨眼上，恩维尔想到了在索菲亚向他索要野战军指挥官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如果政治形势真的不利，那么此时再疏远穆斯塔法·凯末尔显然不明智。因此，恩维尔任命凯末尔为新成立的第19师师长。非常凑巧的是，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的英国军队与凯末尔的军队在阿纳法尔塔拉尔（Anafartalar）迎面相遇。在恰纳卡莱（Chanakkale）战役开始时，凯末尔还只是一名分区指挥官，他在战争中迅即提升，从军团指挥官到野战军指挥官，再到集团军指挥官。

在第二战线，海军部长杰马尔帕厦被任命为驻扎在大马士革的第四军军长，并随即着手苏伊士行动，希望征服整个埃及。他乐观地估计，当埃及人意识到土耳其军队占领运河时，将会起而反抗英国的统治。进攻在2月3日开始，目标是占领运河，但没能成功。当3.5万名土耳其士兵需要借助唯一的交通工具——骆驼穿越西奈沙漠时，这一结果便可想而知了。面对这种没有希望的形势，杰马尔帕厦至少应该下令撤退。

在俄国（想把奥斯曼帝国军队包围在第二战线之内）的鼓励和法国的支持下，1915年2月19日起，英国开始从海上进攻恰纳卡莱。与此同时，俄国强烈要求英国和法国承认它对伊斯坦布尔的所有权。因此，协约国承认，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米底耶—以挪士与萨卡里亚河之间的整个马尔马拉地区都是俄国的领土。因为不能容忍其他国家插足这一地区，俄国否决了希腊提出的派3个师到上述地区的建议，甚至想尽可能地阻止意大利加入协约国。希腊和意大利断定奥斯曼帝国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因此想要分得一部分战利品。随着1915年4月26日《伦敦条约》的签订，意大利加入协约国。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非常关注恰纳卡莱地区事态的发展，并静候事情的结果。这时土耳其已经很少能从德国获得军事物资，因为两个中立国阻断了道路。尽管武器、弹药、食品供应不足，只能依靠很少的小麦维持生活，但土耳其军队仍然成功地击退了敌人。

土耳其的胜利使得战期延长，并导致沙皇统治的崩溃。此外，土耳其在战场上也证明其独立的决心，决不成为任何列强的殖民地。最终，欧洲殖民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和欧洲殖民帝国的根基也被这出乎意料的胜利动摇了。

1915年3月18日，协约国舰队试图突破恰纳卡莱，但被土耳其军队击退。随后，协约国军队于4月25日开始在加里波利登陆；尽管协约国舰队对土耳其阵地狂轰滥炸，多次战斗造成双方伤亡惨重，但协约国军队还是被迫于1915年12月和1916年1月撤出加里波利。特别是由于他在1915年8月阿纳法尔塔拉尔战役中表现出的坚定立场，穆斯塔法·凯末尔上校被誉为“伊斯坦布尔的救星”（saviour of Istanbul）。鉴于土耳其在恰纳卡莱的强硬表现，保加利亚于1915年9月6日加入了同盟国一方，结果，塞尔维亚被打败，战时第一辆从中欧开往伊斯坦布尔锡尔凯吉车站（Sirkeci station）的火车于1916年1月17日到站。

奥斯曼帝国军队一度把汤森德将军（General Townshend）率领的英国军队包围在伊拉克的库特-阿玛尔地区（Kut-ül Amare）。当汤森德将军率领的军队在1916年4月29日被迫投降时，土耳其军队在东线又取得另一场胜利。这极大地增强了土耳其军队的士气，即使只是暂时的。

似乎保护奥斯曼帝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不具有足够的挑战性，

恩维尔在伊朗又发动了一次行动。英国也在伊拉克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并于1917年3月11日占领巴格达。

1916年1月11日，俄国军队开始在东安纳托利亚发动进攻，土耳其军队的形势迅速恶化。在6个月的时间里，埃尔祖鲁姆（2月16）、里泽（3月8日）、特拉布宗（4月18日）和埃尔津詹（Erzincan，7月25日）先后落入俄军手中。在阿拉伯半岛，麦加的埃米尔、谢里夫·侯赛因（Sharif Hüseyin）与英国达成秘密协定，反叛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在1916年6月2日或3日占领了麦加2/3的领土。如此，奥斯曼帝国属下的大部分阿拉伯民族面临分道扬镳。统一进步协会本质上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组织，在面临这些事情时就更加明显。

奥斯曼帝国铁路的情形反映了土耳其在进行这场战争中遇到的困难。战争爆发时，巴格达铁路仅仅修建到阿克恰卡莱（Akçakale，今Tel Abiyat）；更糟糕的是，修建隧道需要通过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山脉 [有37公里经过托罗斯山脉（Taurus），有97公里经过阿曼尼斯山脉（Amanos）]。在这些地区，物资和人员不得不通过山路运输，多数情况是靠驮兽。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从伊斯坦布尔到巴格达也需要22天；而从伊斯坦布尔到阿勒颇的连贯铁路直到1918年10月9日才开通，这时距离停战只有3周的时间。

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根本没有铁路。东边的海路是不安全的，因为俄国的新式军舰控制了黑海。只有通过乌卢克什拉（Ulukışla，尼代的南边）的古道才能到达前线。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南方战线到处可见赤脚、饥饿的奥斯曼步兵和同样饥饿的骡马在恶劣的天气下挣扎。

尽管条件艰苦并屡遭挫折，奥斯曼帝国军队还是于1916年

早些时候在德国人冯·克瑞斯 (von Kress) 的指挥下对苏伊士运河发起第二轮攻击 (其根本目的也是减轻德国军队在西线的压力)。但这次进攻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 而且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撤退。从 1916 年下半年到 1917 年初, 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土耳其军队被派往罗马尼亚 (3 个师)、加利西亚 (2 个师) 和马其顿 (2 个师) 的前线。与此相反, 保加利亚人热衷于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拒绝派军队到其前线以外的任何地方, 而且不允许恩维尔视察奥斯曼帝国驻扎在这些地区的军队。

在形势黯淡的战局下, 转机忽然出现。在 1917 年 3 月的上半个月, 圣彼得堡的暴动超越了战争的倦怠, 革命的风暴愈演愈烈。3 月 15 日, 沙皇被迫退位, 而且迈克尔大公 (Grand Duke Michael) 拒绝即位。这是俄国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标志。然而, 新的政府, 尤其是外交部长米留可夫 (Miliukov), 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攻占伊斯坦布尔和两个海峡上, 并决定继续进行战争。但国内人民早已受够了。在德国的支持下, 列宁于 1917 年 4 月 16 日返回圣彼得堡, 并成为想要和平、面包和土地的俄国民众的代言人。11 月 7 日, 布尔什维克通过一场成功的政变掌权。他们不承认所有秘密条约, 并且宣布想要在不割地、不赔款的条件下达成和平。觉得光靠这份声明还不够, 他们将这些秘密条约公之于众, 而且立即开始单独的和平谈判。12 月 15 日, 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在布列斯特 - 立托夫斯克 (Brest - Litovsk) 签订停战协定。当议和进程还在继续时, 俄国士兵已经开始返回家乡, 一些人卖掉他们的武器。毫无疑问, 这使同盟国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但这仅仅是暂时的缓解。随着协约国的一个强国退出战争, 另一个强国——美国正准备参战

(1917年3月6日)。在这个转折时期，美国还没有做好参战准备，而且大西洋将它与欧洲隔开，所以不能立即感受到其强大的影响力，但战争的结束只是时间问题了。1917年4月，德国国内开始罢工，7月爆发了海军起义，这说明厌战情绪开始影响民众的士气。

尽管时间很短，同盟国的东部战线还是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1918年2月12日，奥斯曼帝国军队又开始向前推进，2月收回了埃尔津詹和特拉布宗，3月收回了埃尔祖鲁姆和阿尔达汉（Ardahan），4月收回了萨瑞卡米斯、凡城、巴统和卡尔斯。笔者使用“收回”这个词，因为在俄军撤出的地区现在换成了亚美尼亚军队在顽强抵抗。1918年3月3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签订之后，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地区（在1877~1878年的俄奥战争中割给沙俄）被归还给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行动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地区。1918年5月28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新政府感觉到亚美尼亚、英国和俄国的威胁，从而向奥斯曼帝国寻求帮助。于是，不满足于只夺回上述三个地区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开始向阿塞拜疆进发，并于9月15日在英军撤离之后占领巴库。奥斯曼帝国军队继续向北进攻，随后开始插手达吉斯坦（Daghestan）的事务，并于10月6日进入达尔班（Derbent）。

然而，战争即将结束。9月14日，奥地利向协约国乞和，保加利亚前线在18日被攻破。德军的西线战事和国内情况已经恶化。9月29日，德国决定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申请，在他提出的“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开始和平谈判。1918年10月30日，奥斯曼帝国签订了《穆德罗斯停战协定》（Armistice of Mudros）。与奥斯曼帝国军队在高加索的胜利相

比，其南部前线的形势却越来越糟。在伊拉克战线，英国在 1917 年 3 月 11 日夺回巴格达，并不可阻挡地向摩苏尔 (Mosul) 缓慢开进。同时，在西奈半岛，一边前进，一边修建铁路和输水管道。1916 年 12 月 21 日，英军占领埃尔阿里什。1917 年 3 月到 4 月间，奥斯曼帝国军队阻止了英军对加沙的进攻，但在 11 月 6 日，奥斯曼帝国军队的防线被攻克。12 月 9 日，耶路撒冷落入英军手中。尽管遭到这些挫折和损失，奥斯曼帝国军队还是在巴勒斯坦坚守到 1918 年 9 月 18 日英军的大举进攻。在阿拉伯人的支持下，处于优势地位的英军彻底摧毁了奥斯曼军队的抵抗。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指挥下，奥斯曼帝国军队在阿勒颇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但这距《穆德罗斯停战协定》的签订只有短短几天时间。此时，安纳托利亚地区保卫战已经开始了。应该指出的是，恩维尔在 1918 年就不顾德国的反对把大部分军用物资运到高加索前线。这个决定表明了土耳其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政府首要考虑的事情，阿拉伯人的利益被降低至次要地位，即便这只是暂时的。

亚美尼亚人的强制迁移

显然，土耳其卷入世界大战在亚美尼亚人中产生了一种乐观的气氛。他们认为，在巴尔干战争中轻易落败的土耳其军队很快将被有着巨大优势的俄国、英国和法国军队击败，从而出现对他们有利的形势。1915 年 1 月 10 日，土耳其军队在萨瑞卡米斯的溃败证实了这些期望。一个月之后恰纳卡莱战役爆发，尽管土耳其军队在 3 月 18 日先取得胜利，英国还是于 4 月 25 日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但是，亚美尼亚又一次估计错了。土耳其军队拒绝在恰纳卡莱投降，而且，尽管俄国在东安纳托利

亚取得胜利，但占领这一地区的进程却很慢。对亚美尼亚希望的打击还不止此，这场战争持续了4年时间，并在第三年由于革命的爆发导致俄国防线的崩溃。1915年4月15日，当亚美尼亚在俄国支持下在凡城地区反叛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时，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比特里斯在4月18日，凡城在4月20日，爆发了流血冲突。凡城的亚美尼亚人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5月中旬俄国和亚美尼亚联军才攻占这座城市，所有的穆斯林都被杀害。在俄国的帮助下，一个新的亚美尼亚国家宣布成立，大约25万亚美尼亚人涌入凡城地区。尽管8月初奥斯曼再次收复凡城，俄国随后又重新占领了它。

在土耳其为生死而战的时候，亚美尼亚人的这一举动提醒统一进步协会，如果土耳其想要在战争中生存下来，亚美尼亚人就必须保持中立。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作为预防措施，奥斯曼帝国把亚美尼亚人从会对土耳其前线产生消极影响的地方，即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和梅尔辛-伊斯肯德伦（Mersin - Iskenderun）地区，迁移到帝国的其他地区，即叙利亚和伊拉克。亚美尼亚起义发生在4月，迁移的准备工作在5月开始。1915年5月27日，奥斯曼政府通过了一项临时法律，给予军队监督迁移活动的任务。5月30日的内阁会议把迁移的条款永久性地规定下来。移民将被安置在亚美尼亚人撤离的地方，并补偿他们的财产和物品，从而在新安置的地区保持他们之前的生活水平，穷人将提供住房。1915年9月26日通过的一项新的临时法律规定，迁移人口的不动产和物品将会由法庭进行清点，而且依照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分派收益。不动产将会由国库和一些宗教基金会补偿，动产将会被出售，所有的收益都将给予那些应得的亚美尼亚人。这些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贯彻，需

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亚美尼亚人迁移最糟糕的状况发生在他们前往新居住地的过程中。缺乏交通工具、食物和遮蔽物，恶劣的天气及疾病导致许多人丧失生命。复仇和土匪抢劫也导致不少人死亡。对于到底有多少亚美尼亚人死亡或被杀，有不同的估计。亚美尼亚人及其支持者夸大数字，宣称有 100 万人或更多的人死亡。历史学家斯坦福·肖 (Stanford J. Shaw) 推测，死亡人数是 20 万左右。

战争期间的社会变革

统一进步协会在战时的独裁统治使其方针（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中的一些激进内容得以自由实施。这种自由发展的实现，不仅是因为统一进步协会不再需要防范反对派了，而且是因为宗教狂热分子已被抑制住了。《塞比尔 - 于尔 - 雷萨德》周刊在战时被停刊了两年之久，便是统一进步协会独裁统治的一个例子。在沙里夫·侯赛因公开举起叛乱旗帜之后，总体上，阿拉伯人对这场战争的消极态度表现得很明显。从那时起，统一进步协会毫不克制冒犯阿拉伯宗教情感和削弱其战争能力的行为。伊斯兰主义者赛义德·哈莱姆的退休，以及心胸开阔的大法官 (Sheyhülislam, 大穆夫提, 伊斯兰教中的领袖) 穆萨·卡齐姆的上任，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容易。因此，为了同 1916 年统一进步协会的大会决议相符，所有的宗教法庭被剥夺审判权，且置于司法部长的权力之下（《1917 年 5 月 25 日法》）。这源自统一进步协会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观，是土耳其走向世俗主义的重要一步。然而，也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即解除不平等条约。宗教法庭的存在给了欧洲国家反对土

耳其司法体系权威一个借口。另一项大胆的革新是《家庭法》(the Family Law Decree, 1917年11月17日)的颁布,这成为适用于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内的所有奥斯曼帝国公民的家庭法体系。但这一法律也可以说是在沙里亚的范围之内,因为它是根据一项伊斯兰教令和基于源自四个逊尼派穆斯林教派的原则而实施的,并被认为最适合于当代生活。除此之外,一些促进妇女权利的全新规定和关于非穆斯林的特殊规定也包括在内。另一项重要的革新是1917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在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结束了基督教和罗马/伊斯兰历法上13天的日期差。因此,1917年3月1日之后,罗马/伊斯兰历法和基督教历法的日期和月份统一了,但年份仍然不同(例如,基督教历法中1917年3月1日是罗马/伊斯兰历法中的1333年3月1日)。

改革主义立法中有一项是《神学院法》(*Medaris-i Ilmiye*)。这项立法及其相关规定试图把神学院改造成现代宗教学习机构。它们的课程包括用西方语言教授的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最后,该立法还试图修订基于阿拉伯字母的土耳其字母表,从而使其与土耳其语更加协调。1911年前后,字母改革协会(the Alphabet Reform Society)在突厥之家的帮助下成立。另外,侯赛因·贾希特是拉丁字母的支持者。在战争爆发之前,恩维尔在军中尝试使用拉丁字母形式的阿拉伯文字,而不是两者混用,这一尝试由于战争的持续被迫放弃。

妇女生活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前,男人和女人不允许一起上街,因为仅靠匆匆一瞥无法判断他们是否姘居。战争的紧急状况被迫允许妇女出去工作。在工厂、办公室、田地,甚至在城市的街道上都出现了对女工的需求(例如他们在伊斯

坦布尔清扫垃圾)。统一进步协会自然也鼓励这种进步。女工协会 (the Women Workers' Society) 在军队的支持下成立, 其成员为军队制作制服、内衣和沙袋。在协会的车间里有 6000 ~ 7000 名妇女在工作, 她们每天领取 10 库鲁斯的薪水, 并免费提供午餐。需要的时候, 同样数量的妇女也可以在家中完成任务。该协会是一个营利的团体。此外, 第一军中成立了一个女兵营, 单身女性过着同男性战士一样的生活, 已婚妇女允许每周回家住四个晚上。1917 年末, 该协会要求所有的工人都要结婚, 而且还为能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丈夫专门设置了一个系统。在此时期, 女性开始到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种学校读书。尽管在像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大城市中, 妇女仍然佩戴黑色纱巾, 但许多妇女不再遮盖其面部。终于, 达鲁百代 (Darülbedayi) 剧院的舞台上出现了第一位穆斯林女演员。

第三部分

阿塔图克时期

第十五章 战争的结束和停战协定 (到 1919 年 5 月 19 日)

前线战败

1918 年秋，协约国加强了战争的最后攻势。在艾伦比将军 (General Allenby) 的指挥下，英军于 9 月 19 日开始了对巴勒斯坦的主攻。恩维尔把大部分战略物资源集中在高加索地区，他在那里的胜利是以牺牲奥斯曼帝国南部防线为代价的，因此，南部防线在艾伦比将军的猛攻下被撕开一个口子。奥斯曼帝国南部防线的指挥官利曼·冯·桑德斯 (Liman von Sanders) 将军起先为了在叙利亚南部建立新的防线命令军队撤往大马士革南部，但在意识到这一想法不可行时，改变了策略，决定在霍姆斯 (Homs) 地区重新部署。在冯·桑德斯做出决定之前，第七军军长穆斯塔法·凯末尔便抢先命令军队撤到靠近叙利亚北部与安纳托利亚边界的阿勒颇。凯末尔解释了他为什么公开违令，他说，叙利亚虽然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但现在对保卫土耳其人的安纳托利亚至关重要。冯·桑德斯撇清自己与这一策略的关系，并放弃了自己的指挥权。于是，凯末尔成为代理指挥，并在随后被正式任命为南部前线的指挥官。到达阿勒颇之后，他注意到奥斯曼帝国士兵常被隐藏在城市中的狙击手击杀，于是决定把阵地转移到阿勒颇北部。这一新的防线环绕整个亚历山大勒塔，并得以抵挡英军的进攻。用凯末尔的话说，这是

“用土耳其刺刀铸成的边境”。

1918年9月15日，英军开始在巴勒斯坦发动进攻，协约国也在保加利亚战线发动猛烈攻击，并撕开一个大口子。9月26日，在意识到局势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时，保加利亚投降乞和。29日，停战协定签署，保加利亚战争结束。从那时起，奥斯曼帝国的前景变得更加糟糕，因为保加利亚战线是他们整个西部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了保加利亚防线，协约国便可以不用费吹灰之力从色雷斯打到伊斯坦布尔。这是真实的情形，同教授给土耳其小学生的毫无意义的课程截然相反：“我们在恰纳卡莱战役取得了胜利，但却输掉了战争，这是因为我们的盟国德国被打败了。”此时，德国已经打得精疲力竭，在军队仍同比利时和法国交战时，总参谋部便有了求和的意图，只是希望以此来确保在和谈进程中的影响力。10月4日，奥斯曼帝国、德国和奥匈帝国请求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做和谈的调解人。同一天，自1917年赛义德·哈莱姆帕厦退休之后就一直担任大维齐尔的塔拉特帕厦向苏丹递交了辞呈。

1918年7月3日，苏丹雷沙特去世，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Vahdettin）继位。与前任不同，他对政治很感兴趣，而且公开反对统一进步协会。他也生性多疑，尽管没有达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那样的程度——例如有传言称，即使在皇宫，他都在口袋里装一把手枪。

美国在理想主义精神和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指引下参战。“十四点原则”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支持民族自决，并提议成立一个保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组织——国际联盟。同盟国为了求和，请求威尔逊总统做调解人。美国总统对此予以积极回应，并表示，这些国家建立民主制度而不是军事和独

裁政府将会更加有利。这种回应动摇了这些国家的统治根基，其国内人民早已对长期遭受的巨大而毫无意义的战争灾难深怀怨恨。这些国家政府开始迅速倒台，像暴风雨过后的树叶一样。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King Ferdinand）退位，以支持他的儿子鲍里斯（Boris，1918 年 10 月 4 日）。在德国，威廉二世的退位已经不足以平息公众的愤怒，随后建立了共和国（11 月 9 日）。奥匈帝国皇帝卡尔（Karl）退位，这导致奥地利共和国（11 月 13 日）和匈牙利共和国（11 月 16 日）的分立。帝国崩溃，共和国随之建立。很显然，这些选择对于瓦希代丁来说都没有吸引力。他自我安慰说，自己在战争结束之前几个月才继位，所以不该为奥斯曼帝国卷入战争及其后果负责。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误判，瓦希代丁最终丢失了王位，共和国在土耳其建立。

伊泽特帕厦政府

1918 年 10 月 14 日，伊泽特帕厦组建了新政府，内阁成员中有两名统一进步协会的成员贾维特和哈伊里贝伊（Hayri Bey），以及两名前统一进步协会的成员劳夫·奥尔巴伊（Rauf Orbay）和费特希·奥克亚尔（Fethi Okyar）。这届政府又回归统一进步协会监督政府的模式。凯末尔从前线发回电报，建议伊泽特帕厦组织一个同样成员的政府，并自荐陆军大臣之职，但伊泽特帕厦已经同时身兼陆军大臣和大维齐尔。作为安抚，伊泽特帕厦给凯末尔写信说，他现在的职务很重要，并希望实现和平之后可以合作。有人推测瓦希代丁曾反对关于凯末尔的任命，但对凯末尔来说，他的对手恩维尔已经出局，而且考虑到他以前与瓦希代丁的关系，所以提前认定陆军大臣之职非已

莫属。

上述事件的发生背景始于 1917 年末，当时瓦希代丁仍是王位的法定继承人。德国邀请他访问前线，凯末尔被任命为他的副官。在返回的途中，凯末尔趁机建议瓦希代丁担任守卫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军军长，并引用德国皇太子担任同样职务的例子来说服他。当瓦希代丁说自己没有资历担任这一职务（德国的皇太子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毕业于军事学校）时，凯末尔回答说，如果由自己来担任第一军参谋长，这一缺陷就没有了。这次会谈没有任何结果。虽然有传言称，因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瓦希代丁曾提出要把女儿萨比赫（Sultana Sabiha）嫁给凯末尔，但这一提议被凯末尔谢绝。

与此同时，英国正一心谋划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计划。据说大英帝国之所以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是因为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其殖民地。仅印度的人口就有英国的 10 倍。所有的殖民国家，包括英国在内，都采取一些手段来维持帝国的统治。其中之一便是“分而治之”。例如，在印度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分，在巴勒斯坦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分，在塞浦路斯有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之分。这样，殖民者便可以通过挑起他们之间的民族仇恨来维持统治。另一种手段是宣传，英国宣传说，自己是文明的传播者和进步的保障，没有它的参与，发展将会受阻，并导致暴政。第三种手段是通过严厉处罚少数人来威胁民众屈服。作为被殖民的非欧洲国家，奥斯曼帝国的两场胜利（恰纳卡莱战役和库特 - 阿玛尔战役）使得英国威信扫地，从而决心对其予以严惩。

当时，土耳其并不知道英国的计划，基于对国际形势迥然不同的理解，一种乐观情绪在蔓延。有人认为，恰纳卡莱战役

的胜利是沙俄灭亡的关键因素，并期待欧洲会因其对民主的这种贡献而予以感激。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苏联被资本主义的西方认为是比其前任更糟糕的选择。土耳其的乐观有其现实基础，他们同德国的结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跟俄国敌对，传统上奥斯曼更倾向于同英法结盟。现在，欧洲对社会主义的俄国不予理睬，土耳其与德国的联系也因为战败而中断，恢复传统上同英法的亲密关系时机已到，甚至结盟反对俄国，就像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一样。

宫廷谋划

宫廷对于政治局势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看法。当瓦希代丁还是皇子时，他就对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迹象表明，他与穆斯林联盟（Mohammedan Union Association）和德尔维希·瓦赫代蒂有联系。他的妹妹米蒂赫（Mediha）嫁给了达马德·费里特帕厦（曾经是反对派自由和谐党的领导人），而且郎舅关系很好，因此，不难猜测他与自由和谐党也有联系，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他对统一进步协会怀有敌意。事实上，无论是苏丹穆罕默德五世还是奥斯曼王室的其他成员，都不曾支持统一进步协会。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只是看起来和善，那是因为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且生性不善交际。似乎，也从来没有王室成员是民主制的支持者（至少在 1922 年之前没有）。瓦希代丁同统一进步协会反对派的联系并不是基于民主原则。他的立场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为了更好地反对统一进步协会，其真正目的则是绝对君主专制，就像他在王朝后期所做的那样。

即使瓦希代丁过去不曾反对统一进步协会，迫于当前的政治形势，他也必须假装出敌意。欧洲尤其是协约国的民众，因

为统一进步协会所持完全独立的立场可能在其殖民帝国其他地方引发同样的诉求而反对它。反对情绪因其处理亚美尼亚人的方式而增强。统一进步协会被看作一点不亚于共产主义的魔咒。因此，为了保住他的王位并在和平谈判中取得更好的结果，瓦希代丁不得不扮演反对统一进步协会的角色，即使他内心对此不是很赞成。

前面已经提到，瓦希代丁生性多疑，于是他喜欢与和他有姻亲关系的官员打交道。例如，当想要实行温和的政策时，他就把任务交给陶菲克帕厦，后者的儿子娶了他的女儿乌尔维耶 (Sultana Ulviye)。当他想要实行严厉的政策时，则会依靠其妹夫达马德·费里特。如果传言中瓦希代丁提议萨比赫和凯末尔结婚属实的话，瓦希代丁也许会把这种关系当作一种条件以及同他进行政治合作的保障。

瓦希代丁心态的一次明确展示是 1918 年 10 月 19 日达马德·费里特帕厦在众议院进行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一开头便说有两种政治体制，“民权政府和精英政府”。根据帕厦的说法，前者是一种糟糕的体制，后者则极好。此外，他坚持认为，1909 年的宪法修正案造成了帝国的分裂。但是，他在演说中小心地避免直接攻击宪制政府的原则或 1876 年宪法。这并不表示他对民主原则有任何忠诚可言，而是当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这样的原则时，竭尽全力攻击宪政体制在政治上没什么好处。

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在世界大战末期，土耳其或土耳其社会面临两种不同的运动，而它们的目标都是回到过去。一方面，政府决定利用统一派在战后大权旁落以及在国内外都不讨好的情势，至少要削弱立宪政府，可能的话则彻底摆脱它，以恢复

绝对君主制。这就是说宫廷想要进行反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协约国作为自豪的战胜国现在准备涌向奥斯曼帝国，重新修订条约，希望增加额外的大量条款，从而增强对霸权的控制，把奥斯曼变成半殖民地状态。宫廷想要回到1908年甚至是1907年，即第二立宪时期开始之前，协约国想回到1913年，可能的话则是还没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1907年。但要想使时光倒流，撤销已经发生的事情，绝非易事。从1908年到1918年，土耳其社会经历了革命性的变革，即使这种变革才刚刚开始。但到1918年，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了。土耳其解放战争的主题在流血和冲突中被废弃，上述两种企图将使土耳其回到过去。

《穆德罗斯停战协定》

土耳其在10月4日提出和平谈判请求，10月30日就在利姆诺斯岛（island of Lemnos）的穆德罗斯港签订协定。海军大臣劳夫（Rauf Orbay）是土耳其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协约国的代表是英国海军上将卡索普（Calthorpe，在许多土耳其文件中拼作 Galtrop）。在众多的条款中，对奥斯曼帝国前途影响最大的是：开放两个海峡，并给予协约国占领任何它们认为对保卫自身安全有必要的地区（第七条）。开放海峡使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完全处于协约国陆军和海军的控制之下。劳夫曾要求，不要把希腊海军包括在派往伊斯坦布尔的海军行列之中，但在条约中却没有这样的条款。协约国觉得没有必要给出任何理由，就先占领了伊斯坦布尔，然后占领东色雷斯、两个海峡、摩苏尔、西里西亚地区（Çukurova），以及附属的梅尔辛、塔尔苏斯、亚达那、亚历山大勒塔（哈塔伊）和安塔利亚。除此之外，“占领官员”和/或小规模的军队被派往其他战

略要地，如埃斯基谢希尔、萨姆松、孔亚、特拉布宗和埃尔祖鲁姆。土耳其军队的复员和裁撤行动在全速进行。交出的枪支和弹药被储存在由协约国军队把守的仓库里。在那里，炮栓和步枪零件都被拆卸，从而不复其用。

尤其是在占领期间的第一个月，英国和法国都企图把土耳其人当作附属国的国民，时而以傲慢的方式相互竞争。他们只允许在 24 小时内撤出政府机关，甚或私人住宅。需要强调的是，他们支持少数民族，鼓励他们过度放纵，利用他们来反对土耳其人。例如，驻扎在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军团由法国人指挥，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军团为英国警察局效力。这种政策对所有民族都没有好处，也不是对少数民族的恩惠，因为协约国最终会离开，土耳其的各民族仍要生活在一起。意大利占领安塔利亚西南地区和布尔杜尔的行动是非常文明的，因为意大利尽力想表现出对土耳其人民的同情。在与英国分道扬镳之后，法国也表现出适度的节制。也有人认为，英国的行为过度温和，尤其是在土耳其取得萨卡利亚（Sakarya）战役胜利之后。然而，下文将看到，希腊的占领达到了极致。

穆斯塔法·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

11 月 1 日晚，《穆德罗斯停战协定》签订之后，作为统一进步协会的领导人，三位帕厦——塔拉特、恩维尔和杰马尔，以及统一进步协会的重要成员纳泽姆和巴哈丁·沙克尔（Bahaettin Şakir），乘坐德国军舰逃往俄国。反对派一片哗然，要求政府为他们的出逃负责。瓦希代丁认为，伊泽特政府不适合跟协约国打交道，并任命刚刚与统一进步协会脱离一切关系的艾哈迈德·里扎（凑巧以前是他的邻居）作为中间人，迫使

政府辞职。由于无法抵挡这样的压力，伊泽特帕厦辞职了。11 月 11 日，伊泽特政府被陶菲克帕厦政府所取代。这届政府由大量年长的政治家组成——陶菲克帕厦已经是 73 岁高龄。11 月 13 日，包括希腊军舰“阿维罗夫号”（Averof）在内的 100 多艘军舰抵达伊斯坦布尔，向奥斯曼帝国示威。巧合的是，即将领导土耳其人民解放运动的凯末尔此时恰好从伊斯坦布尔海伊达帕厦车站（Haydarpasha Station）走下火车。刚从前线回来，凯末尔就被告知，通往波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区的航运服务因为协约国舰队的到达而被中断了。他找到了一艘划艇，克服各种困难到达了波斯普鲁斯海峡的彼岸，上岸便径直拜访了伊泽特帕厦。他认为，伊泽特帕厦辞职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应该把政府交到保守派手中。伊泽特帕厦必须复职，重新担任大维齐尔，而他自己则应当担任陆军大臣一职。伊泽特帕厦同意了他的意见。

11 月 18 日，议会对陶菲克帕厦政府的施政纲领进行信任投票。一身文官打扮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提前来到议会，向聚集起来的代表解释否决政府施政纲领的必要性。与他交谈过的代表似乎都赞成他的观点，但在投票之后政府却幸存了下来。这届议会的代表是在 1914 年选举产生的，因此大部分都隶属于统一进步协会，不像凯末尔想象的那样缺乏领导。11 月 5 日，统一进步协会在其最后一次大会上宣布解散。4 天之后，革新党（Teceddüt Fırkası）起而代之。贾维特是领导人，从此时起，凯末尔开始跟贾维特合作。他们通力合作在议会中对陶菲克帕厦政府提出了公开谴责，并将于 12 月 21 日的会议上进行讨论。那一天，陶菲克帕厦发表演说，阐释政府对其施政纲领的执行，但演讲结束，尚不及讨论，就宣读了苏丹解散议会的法令。这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惊讶。很显然，没有人想到这件事情会这么快发生，因为 1914 年选举出的议员代表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诸省（也门、汉志、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在新的议会选举中，不大可能有阿拉伯诸省和安纳托利亚被占领地区的选举代表（而且事实上它们也没有）。换句话说，1914 年的议会只有在苏丹和政府违反宪法时才会被解散，不幸的是，它们的确违反了宪法。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灾难性的转变，因为瓦希代丁很巧妙地掩饰了他的真实意图。

不久，瓦希代丁便开始厌倦陶菲克帕厦政府，因为它不够亲英，而且没有大力起诉统一进步协会的领导人在使国家卷入战争、贪污和迫使亚美尼亚人迁徙中所犯的罪行。这些主张大多来自自由和谐党，他们渴望复仇和权力。在自由和谐党的支持下，瓦希代丁不但迫使政府辞职，而且组建了由达马德·费里特帕厦领导的新政府，这个新政府得到自由和谐党的支持，并由其成员组成。为了讨好英国和复仇，新政府逮捕了許多人，而且加速调查对统一进步协会的指控。结果，约兹加特（Yozgat）总督凯末尔贝伊（Kemal Bey）由于指挥亚美尼亚人的迁徙行动而被施以绞刑。

同样需要解决的是黑海地区的法律和秩序问题，以及是否为了这个目的把凯末尔派到那里。政府认为，这将使伊斯坦布尔摆脱一个麻烦制造者，同时，凯末尔将会解决那一地区的安全问题。凯末尔及其同伴认识到，他们在首都什么都做不了。他的战友卡泽姆·卡拉贝基尔（Kâzım Karabekir）和阿里·福阿德·杰贝索伊（Ali Fuat Cebesoy）已经在安纳托利亚有些时日了。卡拉贝基尔是驻守在埃尔祖鲁姆地区第 15 军的指挥官，这是奥斯曼帝国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阿里·

福阿德指挥第 20 军，其司令部设在安卡拉。大批希腊和土耳其强盗出没于黑海地区，逮捕土耳其籍的强盗没什么大问题，但抓捕希腊海盗却很微妙，因为这牵扯到英国。1919 年 3 月 9 日，一支 200 人左右的英国军队在萨姆松登陆，凯末尔被派往那里担任第 9 军的监察官（重组之后命名为第 3 军）。5 月 15 日，凯末尔在离开伊斯坦布尔之前向大维齐尔辞行，并目睹了政府的混乱无序。此时，希腊人已经在伊兹密尔登陆了。

占领伊兹密尔

这一决定是在巴黎和会上做出的。那时，意大利正因为和会没有满足自己的全部要求而抵制会议。如果意大利参会的话，他们可能会反对希腊占领伊兹密尔，因为他们也已经盯上了伊兹密尔。这遭到了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的反驳，他想让奥斯曼帝国做个榜样，但将伊兹密尔从土耳其夺走实在太过分了。这可能激怒印度穆斯林和他们的印度教同情者，导致印度的不稳定。此外，希腊人占领伊兹密尔将会影响英国铁路公司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后者希望爱琴海地区的市场不被分割。然而，劳合·乔治似乎受到个人仇恨的刺激，他在年轻的时候有宗教倾向，而且一度想要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另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他属于格拉斯顿创立且有着强烈的反土耳其倾向的自由党，而且与一些希腊人关系紧密。其中一个就是巴希尔·扎哈罗夫（Sir Basil Zaharoff）。扎哈罗夫出生于安纳托利亚爱琴海地区的穆拉镇（Muğla），他积累了一些财富，并最终创立了威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是世界上主要的军需供应商之一。在战争初期担任军需部长任内，劳合·乔治就已经和扎哈罗夫签订了大批军需协定。更多的是私人因素

而非公共因素，促使劳合·乔治支持这一决定。他引用一位在雅典时期的英国旧知的信件说，在爱琴海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希腊人是受迫害的，从而向巴黎和会施压，要求授权希腊占领这一地区。

海军司令卡普索前往伊兹密尔，以确保土耳其人在希腊占领军到来时措手不及。那时，达马德·费里特组建的政府刚刚掌权，“胡子”努雷丁帕厦（Nurettin Pasha, Bearded Nurettin）既是第 17 军的军长，又是伊兹密尔的代理总督。但是，达马德·费里特在掌权之后就立即解除他的这两个职务，并且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年长的阿里·纳迪尔帕厦（Ali Nadir Pasha，统一进步协会认为他不能胜任，并勒令他退休），总督一职则授予伊泽特贝伊。后者曾担任内阁部长，曾被传言是一个间谍，向英国通报内阁会议的内容。5 月 14 日，卡索普作为英国舰队的指挥官驻扎在伊兹密尔海湾，向伊泽特递交了一份照会，声明伊兹密尔要塞将会被协约国军队占领。对此，伊泽特不仅没有提出异议，甚至可以说，他对这一要求给予了积极回应。在政府机关已经下班的当晚，卡索普又给了他第二份照会，申明希腊将会在第二天早晨占领伊兹密尔。对于第一份照会，伊泽特非常镇定，但第二份照会却使他有有所警觉。伊斯坦布尔的政府办公室已经下班，不能通过电报联系，而这在当时是唯一的通信工具。这只能由他自己决定了。伊泽特自己既没有强硬的性格，也没有反对希腊占领的决心。可怜的老阿里·纳迪尔帕厦也没有这样的决心。很可能，努雷丁帕厦被免职，而被这样一个二人组所代替，目的是使占领伊兹密尔变得更加容易。这使得在伊兹密尔的抵抗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但是情况怎样——由协约国军队还

是希腊军队占领呢？事实上，当得知真实情况时，伊泽特及后来的费里特都变得非常警惕，认为第一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第二种情况则不可想象。

希腊占领伊兹密尔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土耳其人已经有所体验：英国、法国、意大利军队占领南部，法国占领东色雷斯，协约国军队联合占领伊斯坦布尔。无论遭受多大的屈辱和压迫，欧洲国家的占领甚至是殖民都不会消灭他们寻求自由或本民族生存权利的希望。但是，希腊的占领却完全不同。19世纪和20世纪的巴尔干民族主义历史表明，穆斯林在巴尔干小国家的控制下很难生存。这一地区当代种族清洗的例子可被视为这种心态的延续。土耳其人已经经历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无论他们多么厌战，这样的威胁只能迫使他们重新拿起武器，来保卫生存的权利。在伊兹密尔被占领之前，我们不清楚穆斯塔法·凯末尔有什么计划，但毫无疑问，这一事件加速了土耳其民族解放的进程。如果没有这一转折性事件的发生，土耳其人可能会更有耐心地选择进行长期斗争。

内吉普·法泽尔·克萨屈雷克（Necip Fazıl Kısakürek）在《不是卖国贼而是爱国者》（*Not a Traitor but a Patriot*）一书中指出，瓦希代丁下令让凯末尔负责领导民族斗争，甚至给这次冒险行动提供总计2万土耳其里拉的财政支持。第一，没有人见过这一命令。如果这个文件存在，凯末尔难道就不会利用它吗，尤其是在民族斗争的第一阶段？第二，没有证据表明他和他的战友有足够的资金，而且事实上，他们甚至连从埃尔祖鲁姆到锡瓦斯的旅费都支付不起。第三，即使这笔资金存在，鉴于他随后的行为，这又会对最终评价瓦希代丁有什么影响呢？正如齐亚帕厦（Ziya Pasha）所说：“无论他说什么，行动说明

一切。”凯末尔在回忆录中写道，5月15日当他向瓦希代丁辞行时，后者对他说：“帕厦，你将会拯救这个国家。”这难道不可以理解为：穆斯塔法·凯末尔通过重建黑海地区的秩序，从而避免希腊军队在那里的登陆吗？

5月15日早上，希腊人在伊兹密尔登陆，一支希腊军队开始在卡登（kordon）大道上行进。当希腊军队到达科纳克广场（Konak Square）时，哈桑·塔赫辛（Hasan Tahsin，真实名字是 Osman Nevres）开枪射击一名希腊旗手，反过来被希腊军队枪杀。哈桑·塔赫辛是统一进步协会突击队（the Teşkilat-i Mahsusa）的枪手。他曾经在罗马尼亚击伤正在为筹建巴尔干联盟积极努力的英国巴克斯顿兄弟（Buxton brothers）。哈桑·塔赫辛似乎想通过牺牲他的性命来表明，除了武装斗争外别无选择。但是，希腊军队并不满足于只杀害他一个人。他们不顾军纪，开始冲进伊兹密尔的穆斯林居民区，使这一地区在两天内都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之中。有人称，第一天就有2000土耳其人被杀害。阿里·纳迪尔帕厦把所有的土耳其士兵集结在兵营，等待希腊军队的到来。希腊军队准时到达，完全不顾土耳其军队挂白旗投降，立即对准兵营开火。随后，他们强迫阿里·纳迪尔帕厦带领着土耳其人举起双手穿过大街，接着被关押到一个船舱里。军官们被迫喊“韦尼泽洛斯万岁”的口号。苏莱曼·费特希（Süleyman Fethi）将军拒绝这一要求，被希腊士兵拿刺刀猛刺，并用枪托活活打死。是哈桑·塔赫辛的行为引发了这些事件，还是希腊士兵如此行事是早有预谋的呢？

后一种猜测看起来更有可能。伊兹密尔事件之后，当希腊军队扩大爱琴海地区占领范围时，土耳其人没有再发动大规模的反抗。甚至传言，阿克希萨（Akhisar）的民众为了保护他们

的生命和财产，挥舞着希腊国旗来欢迎希腊军队的到来。但是，当希腊军队到达帕加马（Bergama）时，民众拿起武器奋勇抵抗，不允许希腊军队进入他们的村镇。伊兹密尔所发生的事情在这里又一次上演。出于气愤，同一支希腊军队在进入梅内门（Menemen）时搜出并杀害了 10 位重要的居民。他们也对一般民众实施暴行。梅内门的民众与帕加马的事件，以及伊兹密尔民众和哈桑·塔赫辛，又有什么关系呢？也许在希腊士兵眼中，仅仅因为他们是土耳其人而且是穆斯林，便理应得到最粗暴的对待。

伊兹密尔是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协约国军舰就停泊在其海湾。尽管这些事情发生在全世界面前，可英国最重要的报纸《泰晤士报》却在随后几天里只字不提。当最终希腊开始进行军纪调查时，《泰晤士报》才刊登了这一新闻。

爱琴海地区的土耳其人意识到，他们没有选择，必须重新拿起武器反抗希腊军队的占领。在阿拉谢希尔和巴勒克西尔，“反吞并协会”（Redd-i İlhak Cemiyeti）成立，并在其他地方建立了分部。人民抵抗力量“国民军”（Kuva-yı Milliye）成立，并得到各地知名人士的经济支持。由阿里·切廷卡亚（Ali Çetinkaya）指挥驻扎在艾瓦勒克（Ayvalık）的第 172 团和谢菲克·阿凯尔（Çefik Aker）指挥的驻扎在纳泽利（Nazilli）的第 57 师，开始主动或者在国民军的支持下发起进攻，这在民族战争初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安纳托利亚区，像尤如克·阿里·埃芬（Yörük Ali Efe）这样的土匪也加入了战斗。在希腊军队占领地区的周围，一道由国民军组成的防线开始形成。

在伊兹密尔被占领后，保卫权利组织（Müdafaa-yi Hukuk Cemiyetleri）在全国迅速建立。许多地区都举行了抗议希腊占领

的集会。协约国发现，最好不要对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抗议集会采取行动。1919年5月23日，在苏丹艾哈迈德广场举行的会议上，著名的女性小说家哈莉黛·埃迪普·阿迪瓦尔（Halide Edip Adivar）和其他的演讲者向聚集的人群发表演说。达马德·费里特辞职，新成立的政府不允许任何自由和谐党成员参加。

第十六章 从萨姆松到达马德· 费里特政府的倒台

当凯末尔从伊斯坦布尔乘“班德尔玛号”（Bandırma）前往萨姆松的时候，伊兹密尔被占领的消息震惊了全国。由于众议院已经解散，5月26日，大维齐尔费里特觉得有必要召开一次帝国委员会（Şura-yı Saltanat）。如前面的章节中所说，这是一个由各行业的知名人士参加的会议。在会上，所有人都表达了他们的悲伤，并对来自伊兹密尔的消息感到忧虑。很明显，许多人为事态的转变感到沮丧，就像在巴尔干战败之后一样。自由和谐党的代表萨迪克贝伊（Sadık Bey）提出，摆脱这种绝望的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成为某个列强的保护国。宫廷与自由和谐党都主张成为英国的保护国，立宪政府的拥护者则主张由美国托管，声称这样将会促进民主制的发展。

在萨姆松登陆以后，凯末尔立即给达马德·费里特发了一封只有四句话的电报来描述对伊兹密尔被占领的反应。其中三句都提到“人民和军队”，另外一句用了“国家和军队”。费里特一定被这些不祥的词语搞得心神不宁。凯末尔随后前往哈夫扎（Havza），在与卡泽姆·卡拉贝基尔、阿里·福阿德·杰贝索伊和雷费特·贝莱（Refet Bele）交谈之后，他于6月3日给五位军队指挥官和六位总督发了一份声明，称费里特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方式已经证明他不能在巴黎和会上代表国家的真正利益。尽管这份声明只发给11个可靠的人，凯末尔也一定知

道这样做并不能保守秘密，并且伊斯坦布尔的政府很快就会知道这些信的内容。因此，这份声明象征着他公开举起反叛的旗帜。英国政府早已后悔允许凯末尔和他的同事离开伊斯坦布尔，所以要求宫廷将他立即召回。迫于英国的压力，6月8日，政府下令凯末尔返回首都，这标志着伊斯坦布尔政府与安纳托利亚抵抗组织之间冲突的开始。两天后的6月10日，凯末尔发出第二份声明，称许多保卫权利和反对吞并的团体都要求他担任民族运动的领导人；无论代价有多大，他已经答应了这一要求。因此，他接受了领导的挑战。就在同一天，他离开哈夫扎前往阿玛西亚参加会议，他还邀请了一些同僚一起参加。当开始承担这一神圣使命时，他38岁。

《阿玛西亚决议》

阿玛西亚 (Amasya) 会议在6月19日召开。除了凯末尔，还有三个人参加：驻扎在安卡拉的第20军军长阿里·福阿德·杰贝索伊，驻扎在锡瓦斯的第3军的军长雷费特·贝莱，前海军部长以及奥斯曼帝国派往穆德罗斯会议的代表劳夫。会议期间，他还通过电报咨询了驻扎在埃尔祖鲁姆的第15军军长卡泽姆·卡拉贝基尔和来自梅尔辛的小杰马尔帕厦，后者是驻扎在孔亚的第2军的监察长。6月21日，《阿玛西亚决议》最终形成。其要点如下：

我们的祖国统一和民族独立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但伊斯坦布尔政府当局却不履行其职责。只有国民自己采取果断而坚定的行动，才能维持国家的独立。为了这一目标，将会在最短时间内于锡瓦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每个省

派出3名代表。在这之前，将会在埃尔祖鲁姆举行地区性会议，来部署东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防务。

《阿玛西亚决议》的一些内容在全国范围内流传。这就是1919年6月22日的《阿玛西亚宣言》。但第五条和第六条没有包括在内，它们被定为国家机密。

产生了极大影响的第六秘密条款宣称：

(1) 从这一天开始，军队和全国性组织将不再被遣散或取缔；相反，将会受到保护。

(2) 军队的指挥官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向其他国家投降。

(3) 同样地，武器和弹药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允许交出。

(4) 敌人占领任何地区或省份，都不仅仅是该区军队的问题，而是全军的问题。

因此，根据第六条款，政府关于遣散军队或关闭国家机构的命令将不遵守，也不承认政府做出的军事任命。不再把武器和弹药上交给协约国，即使这样做意味着违反《穆德罗斯停战协定》。军队将作为一个整体行动。

因此，第六条款反对奥斯曼帝国政府，反对《穆德罗斯停战协定》，从而也反对协约国的占领军。一个军事组织在阿玛西亚成立，由一名海军军官和五名陆军军官组成，将代表民族运动的最高指挥部（我们称其为阿玛西亚军事组织）。除了杰马尔帕厦之外，军阶最高、资历最老的成员就要数穆斯塔法·凯末尔了。杰马尔帕厦很快便离开安纳托利亚，辞去他在孔亚担任的职务，返回伊斯坦布尔，因而也放弃他在这一组织中的职

务（也许是因为他觉得不可接受凯末尔的领导）。不管怎样，凯末尔都是民族斗争的天生领袖，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军阶和资历，而且因为他有超常的智慧、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强的意志。

在随后的民族斗争岁月中，这个组织的五位创始人因为见解不同而产生分歧，并最终导致了他们关系的破裂。凯末尔在他著名的长达六天的《大演说》（*Speech*, 1927 年）中解释说，如果一开始就宣布通过革命建立共和政体，势必危害民族斗争，从而注定会失败。这被当作“国家机密”，实现这个目标的每个步骤都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才公开的。每当走出一大步，他的那些眼界不够宽广、看不到未来的同事就会被离间，走上其他的道路。很明显，这主要是指他在阿玛西亚军事组织的同事。他同时也阐明了他们对民族解放事业所做贡献的局限性。卡泽姆·卡拉贝基尔在其所著《我们的独立战争》（*Our War for Independence*）一书中反驳了这一观点，书名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可能指阿玛西亚军事组织。这本书竭力强调他自己的贡献，其次是除了凯末尔之外的其他人的贡献。卡拉贝基尔甚至宣称，当他和费夫齐·查克马克帕厦（Fevzi Çakmak）都在布尔萨的时候，后者曾经表明，他和伊斯梅特帕厦（İsmet Pasha）想要推举凯末尔当独裁者。这暗示，阿塔图克的根本目的是以后来的革命为工具，超越他的同事并成为一个独裁者。

除了这个争论，还有一个问题。阿玛西亚军事组织是不是军政府？这是一个由军官组成的秘密组织，其目标是掌握国家权力。这样的话，它就符合这个词的定义，但却不完全符合这样一个名称。因为尽管它是军事性质的，但是这一组织也曾在埃尔祖鲁姆会议和锡瓦斯会议上寻求民众支持，坚持要求进行议会选举，并且确保选举的顺利进行。军政府不是建立于民众

支持之上的，尽管掌权后会在一些问题上寻求民众的支持。因此，尽管阿玛西亚军事组织有军政府的一些特点，但它在没掌权之前就一直在寻求民主的权力基础，从而使其避免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军政府。此外，即使可以把阿玛西亚军事组织当作军政府，实际上它一直致力于反对苏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统治、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这自然使其更像一场民主运动。

巴黎和会上的达马德·费里特

与此同时，协约国开始第一次显示出同情奥斯曼帝国的迹象。法国认为，允许希腊占领伊兹密尔的决定太过激进了。此外，英国则对印度民众表现出的对奥斯曼帝国的强烈同情深感不安。因此，奥斯曼帝国被给予一个其他同盟国都没有的选择：邀请他们来巴黎和会陈述自己的情况。6月，达马德·费里特作为奥斯曼帝国代表团的团长前往巴黎，他在演讲中阐述的观点遭到欧洲人民和土耳其人民的反对。他说托罗斯山脉是土耳其的天然边界，然而许多在这一边界以外并长期由土耳其人居住的地方被这些土耳其人看作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同时也宣称对阿拉伯土地拥有主权。他把统一派（统一进步协会）描述得比布尔什维克还要邪恶，而且还进一步谴责他们，他估计的被迫迁徙中伤亡的亚美尼亚人数甚至比亚美尼亚人自己估计的还要多。

劳合·乔治并不赞成让奥斯曼帝国出席会议。此时，法国正在寻求英国保证，反对将来德国的复仇战争，并几近成功；为此，它们甚至愿意接受英国提出的某些与自己利益相冲突的要求。例如，它们对英国占领摩苏尔的行动保持了克制，这一地区在《塞克斯-皮科协定》（Sykes - Picot Agreement）分割阿

拉伯土地的时候划给了它们。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充当了劳合·乔治的发言人，他用带有侮辱性的话语回应费里特，说土耳其不管怎样文明都退步了，并告诫费里特不要试图通过把亚美尼亚问题的责任推卸到统一进步协会身上以逃避指责。在这次演讲之后，奥斯曼帝国代表被要求退出会议并返回国内。

在经过进一步的考虑之后，协约国一致认为又一次对土耳其做得太过火了，于是在7月18日做出两项决定。第一项是规定希腊占领的边界。事实上，当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登陆的时候，某些边界就决定了，但希腊人无视这一规定。第二项是关于奥斯曼帝国代表所说的希腊人的不法行为，派出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该委员会由一名意大利军官、一名英国军官和一名法国军官组成，美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高级专员布里斯托尔上将（Admiral Bristol）领衔。这个委员会前往爱琴海，并听取了双方的说法。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在5月15日之前并没有发生土耳其镇压希腊人的事件，而且希腊军队不是充当维护安全的力量，而是扮演了侵略军队的角色。尽管《布里斯托尔报告》用事实揭穿了劳合·乔治先前的断言和他为把希腊军队派往爱琴海安纳托利亚地区所说的辩词，但这对于和会的决议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埃尔祖鲁姆会议

在此之后，身处埃尔祖鲁姆的凯末尔再次接到政府要求他返回伊斯坦布尔的命令。当他明显无意遵守这些命令时，苏丹亲自介入了这件事，要求（7月2日通过电报）他离职休养两个月。这似乎是个可行的选择，但7月8日发的第二封电报却解除了他所有的职务。作为军队监察官的官方头衔和职位足以

保证他对全军的影响力，然而，当一位帕厦失去官方背景之后还会有多大的影响力呢？此外，那时因为战败的屈辱带来的痛苦，使得军官并不受大多数人的尊重。在权衡形势之下，凯末尔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从军队中辞职。这肯定是一个在感情上很难做出的抉择。为什么伊斯坦布尔政府会取消先前让他休假的决定呢？其中一个因素也许是，在第二支英军到达萨姆松之后，雷费特反抗协约国的权威。雷费特提前撤出所有的土耳其士兵；并宣称，如果英军在未得到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从萨姆松深入内地，他的士兵将会进行抵抗。另外，即将在锡瓦斯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被认为是国民议会。凯末尔和他的同事们公开反抗协约国当局的行为，对伊斯坦布尔政府来说是一种冒险；对他们的温和立场不足以安抚协约国。

埃尔祖鲁姆会议在7月10日召开。这不是一个随意选择的日子，而是对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巴尔干宣布自由的纪念日，并被作为一个国家节日来庆祝。作为其反革命行为的一部分，瓦希代丁曾下令废除这个节日。然而，当这天来临时，许多代表却没有在埃尔祖鲁姆露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会议推迟几天是很正常的；但埃尔祖鲁姆会议却足足推迟了13天；直到7月23日才重新召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样做会使那些按时到达的代表非常尴尬，感觉他们在让埃尔祖鲁姆的主人强行招待。为什么会推迟这么长的时间呢？也许是因为新选定的日子23日和10日一样富有象征意义，相当于格里高利历法的10日（1908年7月23日）。坚持在这个象征性的日子开会表明瓦希代丁的反革命阴谋已经被识破，因而要做出一个明确赞同民主的姿态。这证明，埃尔祖鲁姆会议承诺民主-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模仿

了统一进步协会。尽管凯末尔此时支持这些目标，但他是比统一进步协会更激进的左翼；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世俗共和国。

总之，埃尔祖鲁姆会议的决议概括如下。

(1) 东安纳托利亚保卫权利协会 (Doğu Anadolu Müdafaa-i Hukuk Cemiyeti) 由两个地区协会联合成立。它们是东部省份保卫国家权利协会和特拉布宗保卫国家权利协会。

(2) 东安纳托利亚地区各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允许一个省份脱离其他省份或奥斯曼帝国。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兄弟。在停战协定签订的那天，这些穆斯林同胞绝大多数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内，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停战协定签订时，任何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领土边界的干涉或占领，都被认为是旨在建立希腊和亚美尼亚独立国家，这是不能容忍的。

(3) 不承认任何扰乱政治主权和社会平衡的特权，但重申基督徒的权利会像以前奥斯曼帝国法律所确定的那样受到尊重。

(4) 任何国家的科技、工业和经济援助，只要不具有侵略本国的意图且符合 1918 年 10 月 30 日停战协定所界定的国家原则，都将受到欢迎。

(5) 如果政府在外国压力下被迫忽视或抛弃东安纳托利亚地区，我们将会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如果奥斯曼帝国政府瓦解，东部省份将会与其他省份联合起来组织抵抗；如果不能实现，我们则将独自保卫它们的独立。任何针对这次会议决议的消极评价或者宣传，都被视作对民族和祖国的背叛。

(6) 这一运动与统一进步协会没有任何关系。必须举行大选，且众议院的会议不得延迟。

这些决议阐明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和指导原则，以及建

立一个新政府的思想，表明了为保卫祖国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心。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占领”没有好坏之分；所有旨在建立一个亚美尼亚或希腊国家的行为，都有损于国家利益。而且，要求举行选举和召开议会也都是为了民主。最后，没有做出涉及阿拉伯领土主权的决定；相反，还特别提到了停战协定决定的边界。这是一个放弃帝国的决定——意义重大。不幸的是，没有关于这次埃尔祖鲁姆会议的专门档案可以查阅。今天一个党的会议一般持续一天或两天，但埃尔祖鲁姆会议在拖延之后，不可思议地持续了两个星期（1919年7月23日至8月7日）。这次会议一定是充满了漫长和激烈的讨论。这些生活在600年帝国传统中的最后一代人一定是意识到，面对惨败以及随之而来的被分裂和被殖民的命运，必须做出极大的牺牲来获取完全独立。此时对阿拉伯国家的土地提出主权要求是不现实的，且同其完全独立的重要诉求有冲突。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也要求阿拉伯国家从帝国分离出去。他们也知道，达马德·费里特就是因为提出这样的要求而遭到侮辱。但是，无论多么合理，这都是一个在感情上很难做出的决定，所以引发了痛苦而漫长的讨论。凯末尔作为会议主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才能、非凡能力和对会议明智的指导，在决议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大会还选举了一个代表委员会，来组织和管理东安纳托利亚保卫权利协会的具体事宜，凯末尔任主席。

为了阐释瓦希代丁所代表的宫廷和凯末尔及其同事们的民主-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巨大分歧，我们将会略述1919年3月30日费里特代表瓦希代丁向卡索普上将提交的和平方案。这不仅仅体现了政治观点的不同，更体现了意识形态甚至历史时代的差别。

(1) 非阿拉伯国家将继续直接处于苏丹哈里发的统治之下。允许阿拉伯国家独立，但在宗教问题上服从哈里发的权威。苏丹的货币就是整个领土的货币。在星期五的祷告中必须诵读苏丹的名字，所有国家都必须使用奥斯曼的旗帜。汉志仍将保留在先前的管理者手中，但是派驻一位由 100 名士兵保卫的奥斯曼帝国代表，以确保其外交政策与奥斯曼帝国保持一致。一名奥斯曼将军将带领一支军队驻扎在麦地那。也门也保持战争以前的行政模式。根据诸强的决定，亚美尼亚将成为自治或独立的共和国。

(2) 英国可以占领任何对维持其内部安全有必要的地区（包括自治区），而且负责保护奥斯曼帝国为期 15 年的独立。

(3) 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边境从布尔加斯（Burgaz）附近的埃米内巴尔干（Emine Balkans）起，到萨马科夫（Samakof），再到以挪士西部的爱琴海。

(4) 拆除黑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所有防御工事；英国将占领两个海峡。

(5) 关于行政问题，英国同意将向任何苏丹认为合适的政府各部派遣顾问。各省都会任命为期 15 年的英国领事，给总督担任顾问。英国领事将会监督地方和议会的选举。

(6) 英国将会审计各省和首都的财政。

(7) 简化宪法，以便与东方各民族的能力相符（根据 1910 年 2 月 15 日费里特呈交给参议院的一份报告）。众议院负责对预算进行表决，并将地方的需要告知中央政府。

(8) 苏丹在处理涉外事务时拥有“绝对自由”。

这份仅仅保存在英国档案中的计划，显示了宫廷的心态。首先，最重要的是，宫廷很明显不接受帝国边界的任何变更。

它仍然怀有不切实际的希望，想要控制所有的阿拉伯土地，包括英国的“宝贝”——汉志。即使在亚美尼亚独立这个不可能实现的事例中，某种程度上的自治仍被认为是可行的。而且，政府希望牺牲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保加利亚，以扩大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反过来，英国获得了一系列特权。两个海峡和伊斯坦布尔的财政和行政事务，通过各省的领事和各部的顾问，都听命于英国；而且在十五年内，它想占领哪里就占领哪里。在所有这些特权背后，有一个奇怪的悖论，即苏丹仍然坚持要在处理涉外事务中有“绝对”自由。看来，对立宪政权的绝对限制是目的。费里特的原始报告找不到了；但是因为预算需要表决而不是讨论或者准备，立法和监督职能没有被提及，相反却提到了各省的需要，这也许足以反映其心态。瓦希代丁对国土的坚持以及对民族利益的不顾显示了奥斯曼帝国典型的封建思维。无限期地为了国土利益而允许特许权（1740年），以及为控制埃及（1838年）而给英国扩大贸易权，体现了苏丹的一贯政策。在这个例子中，瓦希代丁宁愿放弃独立以便控制领土。

埃尔祖鲁姆会议和民主 - 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取向都更具有当代特征，并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一致。经验表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能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获得发展。民族主义者同样也清楚，要想获得完全的独立，必须放弃对阿拉伯土地的主权。再次重申，这不仅仅体现了观点的不同，更体现了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分歧：一个是中世纪的，另一个是现代的。

锡瓦斯会议

锡瓦斯会议于1919年9月4日召开，9月11日闭幕，凯末尔当选为主席。开始的时候，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首先，在

埃尔祖鲁姆会议之后，根据《阿玛西亚决议》，锡瓦斯会议必须尽快召开；但是，凯末尔和代表委员会于会议结束后在埃尔祖鲁姆耽搁了 3 周时间。其次，当锡瓦斯会议最终召开时，代表的出席率却非常低（东部省份参加的地方性埃尔祖鲁姆会议有 56 名代表出席，全国性的锡瓦斯会议却只有 38 人出席）。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西部省份（马尔马拉和爱琴海地区）和东安纳托利亚的各省防卫组织的防御政策有所不同。西部省份坚持认为，没有必要把地方性防御组织联合起来组成全国性的防御组织，因为每个省的组织都需要处理自己省内的具体问题。亚美尼亚造成的威胁是东部省份面临的首要问题，希腊则是西部省份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它们态度的另一个不同体现在，东部的防卫组织反对任何列强的占领，西部各省却接受由协约国（除了希腊）占领的想法。最后，东部各省有诸如举行大选、召开众议院会议等民主的要求，西部各省却没有。这些观点上的分歧也许是源于：东部各省的领导权掌握在更加激进的军官手中；而在西部各省是相对温和的上层人物承担这一角色。奥斯曼帝国政府意识到西部各省的观点相对温和，便开始更加热诚地看待西部的民族运动。

锡瓦斯会议本应有 183 名代表参加（61 个行政区各派出 3 名代表）。如果说东安纳托利亚保卫权利协会的代表委员会代表了东部的 21 个省，那么其他 120 名代表应该来自其他省份。当仅仅有 38 名代表到会时，凯末尔和他的同事们觉得他们不可能聚集国内的大多数代表，所以决定组织召开大安纳托利亚会议。为了这一目的，他们立即向代表们发出邀请函。尽管开局不顺，事态的不断发展却使锡瓦斯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没有必要再举行其他会议。

一些锡瓦斯会议的代表希望劝说会议同意由美国托管。在停战协定签订初期，伊斯坦布尔出现了一个名为“威尔逊原则协会”（Wilsonian Principles Society）的组织，但其活动影响很小，从而逐渐销声匿迹。由于希腊占领的冲击，由美国托管的思想开始在宪政主义者中占据优势，但遭到亲英的宫廷与自由和谐党的反对。[一个名为“英国朋友协会”（Friends of England Society）的组织，由赛义德·莫拉（Sait Molla）担任主席。]美国的高级专员布里斯托尔上将曾鼓励亲美的团体，并邀请他们到美国大使馆来促进这一趋势。对那些仍然没有放弃对帝国幻想的知识分子 [最突出的是小说家哈莉黛·埃迪普·阿迪瓦尔（Halide Edip Adivar）和记者艾哈迈德·艾美·亚尔曼（Ahmet Emin Yalman）] 来说，交由美国托管的吸引力在于希望可以控制诸如叙利亚、伊拉克这样的阿拉伯国家。然而，一旦处于美国的管控之下，就需听任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建立亚美尼亚国家。布里斯托尔上将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坦率地阐明美国的政策，因为华盛顿还没有就是否承担托管土耳其一事达成一致。布里斯托尔或多或少是在宣传他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主张。

支持交由美国托管的人接二连三地前往议会的讲台上吹捧这样做的好处和美国托管的必然性。哈莉黛·埃迪普·阿迪瓦尔曾写信支持这一做法；她在信中描述了菲律宾在美国托管下取得的高度繁荣，但这并不完全是事实。有趣的是，凯末尔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耽于反驳这些主张 [只有来自埃尔祖鲁姆的拉伊夫·霍贾（Raif Hodja）激进的东方情结受到冒犯，迫不及待地想表达自己的抗议]。凯末尔和劳夫使用了非常聪明的应对策略。他们避免公开反对，而是提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并迅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设想我们希望交由美国托管，可

是美国是否也有这样的打算呢？”很明显，没有人想过回答这样的问题。因此，一项提案通过，即给美国参议院写信确认其对托管一事的官方政策。这个策略非常聪明，因为这样避免了失去美国对于民族主义事业极为重要的支持。当时，宫廷与自由和谐党正在积极争取英国的支持，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直接拒绝美国托管的提议可能会触动美国的猜疑。《芝加哥论坛》(*the Chicago Tribune*) 的记者，美国人布朗恩 (Browne)，出席了会议。

根据会议做出的另一项决议，任何占领和入侵的军队都将遭到国民军（不是正规部队）的抵抗。这样做可以避免被控违反停战协定。9月9日通过的一项决议任命阿里·福阿德为国民军总司令。

从锡瓦斯会议召开的那一刻开始，政府就开始策划破坏。尽管锡瓦斯会议是一个合法机构，政府还是密谋通过非法手段遣散和逮捕其代表。埃拉泽 (Harput) 的总督阿里·加利普 (Ali Galip) 也是一名坚定的反对派，他被选出，作为执行此任务的政府代表。他到达马拉蒂亚 (Malatya)，并同英军少校诺莱 (British Major Nole，库尔德专家，精通库尔德语) 会晤；一起的还有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员杰拉戴特·阿里·贝迪尔汗 (Celadet Ali Bedirhan)、卡穆兰·阿里·贝迪尔汗 (Kâmurân Ali Bedirhan) 和埃克雷姆贝伊 (Ekrem Bey)。阿里·加利普准备率领 150 名骑兵突袭锡瓦斯，并担任锡瓦斯总督。为了确保这次突袭的成功，安卡拉总督穆赫丁帕厦 (Muhittin Pasha) 开始在西边发动进攻。然而，在这一切付诸实施之前，酬劳需要谈定。为了这次特殊且非法的行动，阿里·加利普要求获得帕厦军阶和资金报酬。他与伊斯坦布尔政府通过电报讨价还价；但电报线路恰好通过锡瓦斯，这引起了

值班人员的注意。政府的通信密码很快被锡瓦斯方面破译。因此，凯末尔在9月7日就获悉了这个阴谋，并立即派出军队逮捕那些参与此事的人。穆赫丁帕夏被捕，其他人则逃脱。两天后，凯末尔把这些事情通报给锡瓦斯会议。

会议对这种无端使用暴力破坏合法会议的行为予以强烈反对。一封写给苏丹的信中记述了达马德·费里特的这一阴谋，并要求免去他的大维齐尔一职。这份文件通过电报发给了苏丹。但却被告知，不能把这样一份文件通过电报呈送给苏丹，这会给他未被告知因而无法采取行动的借口。费里特政府仍然没有辞职。于是，锡瓦斯会议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从那天起到费里特政府辞职之日止，锡瓦斯代行首都的职权，而且中断所有同伊斯坦布尔的电报及其他联系。他们向整个国家公布了这一决定，这使得军官和公务员都陷入了两难的处境。如果他们服从这一决定就意味着背叛政府，如果不服从则意味着赞成费里特的策略。锡瓦斯-伊斯坦布尔的斗争持续了三周之久。所有的军官都支持锡瓦斯的决议。孔亚和特拉布宗的总督，以及埃斯基谢希尔的行政长官，均因反对锡瓦斯决议遭到武力惩罚。埃斯基谢希尔的行政长官在随后的冲突中被杀。与此同时，两封信被交给美国记者布朗恩：一封是写给美国参议院关于托管问题的信，另一封是写给苏丹的抗议信。当布朗恩亲自将第二封信带到伊斯坦布尔并交给执政当局后，苏丹所谓不知情形的借口就无所依据，从而不能再维持现状。在9月20日的宣言中，苏丹建议当事双方达成协议，并为此派出许多调解人。费里特称，英国政府愿意派出2000名士兵；后者为避免动乱没有同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费里特于9月30日晚上辞职。

因此，锡瓦斯会议尽管开局不太顺利，最终却取得了辉煌

的成果：没有必要举行大安纳托利亚会议。锡瓦斯会议批准了埃尔祖鲁姆会议的所有决定，而且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保卫权利协会（LDRAR）。同在埃尔祖鲁姆一样，一个代表委员会将同凯末尔主席一起承担行政职能。协会将组织选举。由它支配这一切，从而确保了众议院会议的召开。

第十七章 第三立宪政府时期

这为什么被称作第三立宪政府时期呢？原因在于瓦希代丁违反宪法中必须在议会解散4个月内举行大选的规定，使政府偏离了宪政轨道。“3·31”事变表明，当统一进步协会失去在政府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时，立宪政府便不可避免地落入宫廷的控制之中。为了避免冒犯英国的感情，瓦希代丁没有直接彻底废除立宪政府，但却尽可能地削弱和控制它。因此，当瓦希代丁在政治形势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我们认为第二立宪时期已经结束。由于锡瓦斯会议的政治优势，立宪政府在经历了一年的绝对君主专政后得以重生。马哈茂德·戈尔奥卢（Mahmut Goloğlu）是第一位将1920年4月2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the Turkish Grand National Assembly）的成立作为第三立宪政府时期开端的历史学家。因为一开始大国民议会承认苏丹的权威，并承诺维护苏丹制，这一界定被广泛接受。但鉴于大国民议会和苏丹之间的内战，以及大国民议会及其领导人凯末尔的革命性，将奥斯曼帝国最后一届众议院会议的召开作为第三立宪政府时期的开端似乎更加合适。

阿里·里扎帕夏（Ali Riza Pasha）组建了新的政府，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保卫权利协会认为他是“无害的”。另一个积极的发展是，前阿玛西亚军事组织的成员梅尔西雷·杰马尔帕夏（Mersinli Cemal Pasha）成为新的陆军大臣；军校毕业的萨利赫帕夏（Salih Pasha）倾向于民主-民族主义的目标，因

而被任命为海军部长。

凯末尔想要确保新政府接受埃尔祖鲁姆会议和锡瓦斯会议的决议，而且在众议院选举之前不要做出任何关乎国家前途的决定。只有那些确信能够表达土耳其人民意愿的代表，才能被派去参加巴黎和会。在 1919 年 10 月 20 日到 22 日召开的阿玛西亚会议上，萨利赫帕厦和凯末尔决定了关于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保卫权利协会同政府之间合作协议的细节。在他们的审议下，最终形成五项协议。首要问题是新议会的选址。凯末尔认为，敌人的占领使伊斯坦布尔太过危险，萨利赫帕厦也同意这一观点。然而，当萨利赫帕厦返回首都后，苏丹和政府明显反对选择除伊斯坦布尔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他们声称，其他选址不仅会阻碍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同时也会给人们造成奥斯曼帝国准备抛弃伊斯坦布尔的印象。

面对这一困境，凯末尔在 1919 年 11 月 16 ~ 28 日主持召开了一次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保卫权利协会代表扩大会议，阿玛西亚军事组织的所有成员参加了会议，包括卡泽姆·卡拉贝基尔。凯末尔在演讲中把这次会议称为“指挥官会议”（the Commanders' Meeting）。代表委员会最终决定伊斯坦布尔是议会最合适的选址。

伊斯坦布尔政府也同样面临困境。一方面它不希望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保卫权利协会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使协约国处于尴尬的境地，它不希望统一进步协会成员成为候选人，这就意味着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保卫权利协会的介入是一个权宜之计。由于是两级制选举体系，此次选举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组织，而且遭到非穆斯林与自由和谐党的联合抵制。因此，当选举最终开始时，几乎为安纳托利亚和鲁米

利亚保卫权利协会所掌控，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大部分成员当选。凯末尔和劳夫都被选为议员；但如果他们出现在伊斯坦布尔，协约国可能会不尊重他们的议会豁免权。因此，他俩决定继续留在安纳托利亚，并指挥和协调议员们在去伊斯坦布尔之前召开一次会议。

12月27日，为了方便同伊斯坦布尔和众议院联系，凯末尔和代表委员会从锡瓦斯迁到安卡拉。除此之外，安卡拉还有吸引凯末尔并使他留在那里的另一方面原因。安卡拉人民早在他到达之前就接受了民主-民族主义事业，而且自发地反抗苏丹的统治。（尽管安卡拉已经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几个世纪，也许它持有这种独立立场是因为从来都没有丢掉“阿赫共和主义精神”。^①）尽管无法组织所有代表都参加的单独会议，但是凯末尔在新选出的代表到达安卡拉之后组织了一系列的会议，通过与小组交谈来保证每个代表都熟悉民主-民族主义的政策。

凯末尔要求代表们就像在伊斯坦布尔一样承担起职责。

(1) 他们批准并公布了《国民公约》(Misak-ı Milli)；这设定了民主-民族主义运动的和平目标。

(2) 凯末尔本人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举为众议院议长；他认为，假使敌人通过某些方式解散或破坏众议院，议长的头衔将有助于他在别处召集会议。

(3) 那些从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保卫权利协会中选出的代表，也是大多数会议的代表，将成立一个名为“保卫权利组织”的议会小组。

^① 13世纪末统治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塞尔柱苏丹国灭亡之后，安纳托利亚许多地区被当地有权势的人统治；只有安卡拉是个例外，成立了由行会进行管理的阿赫共和国(Ahi Republic)。

(4) 因为阿里·里扎政府妨碍民主 - 民族主义运动，所以应该动员所有力量推翻现任政府，并建立一个更加同情这一事业的新政府。

最后一次奥斯曼帝国议会在 1920 年 1 月 12 日召开，瓦希代丁像往常一样以身体不适为由缺席会议。

《国民公约》

《国民公约》在 1920 年 1 月 28 日批准生效。宣布：

(1) 奥斯曼帝国所有的领土，无论在停战协定规定的边界内外，都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阿拉伯领土和卡尔斯、阿尔达汉、巴统和西色雷斯地区的命运，可以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

(2) 在保证伊斯坦布尔和马尔马拉海安全的情况下，为国际贸易开放两个海峡的决定将受到尊重。

(3) 如果邻国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可以享受到同等权利的话，土耳其政府将认可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签订的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条约。

(4) 土耳其的国家和经济必须完全独立，出于这一原因，必须反对不平等条约。奥斯曼帝国的债务将会依照这些原则予以解决。

凯末尔为代表们准备的草案宣称，在停战协定边界之内的地区，将根据锡瓦斯会议和埃尔祖鲁姆会议的决议被认定是不可分割的。但在到达伊斯坦布尔之后，代表们无法抵抗政府的诱惑，转而支持对敌人占领之下的阿拉伯领土提出主权要求（当时正在签订停战协定），这些领土不在停战协定规定的范围之内。在随后的许多年，土耳其历史学家都极力掩盖这一事实。

《国民公约》是民主-民族主义运动向全世界公布的宣言。其失误在于，宣称阿拉伯领土将由公民投票来决定。除此之外，这是一个在充分认识到当时政治形势重点的情况下做出的现实主义方案。

通过批准这一方案，议会实现了凯末尔的一个目标；但奇怪的是，却否定了他在安卡拉提出的其他三个阶段性目标。绝大多数的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保卫权利协会代表确实组成了一个议会小组，但却命名为光复祖国会（Felah-ı Vatan）；通过拒绝使用“保卫权利”的名称，他们也抛弃了自己的母体。雷沙特·希克马特（Reşat Hikmet，他甚至不是光复祖国会的成员）而非凯末尔被推选为议会主席；而且在他死后，同样不是光复祖国会成员的杰拉勒丁·阿里夫（Celalettin Arif）继任了主席一职。最后政府进行了信任投票。尽管所有这一切都成既定事实，随后劳夫决定冒险前往伊斯坦布尔，以给代表们强调他们的使命感。也许是他自己受当时伊斯坦布尔政治气氛的影响，也许是因为他的话说服力不强，代表们没有理会他的说法。在《大演讲》中，凯末尔全面批评了代表们的行为；他指出，他们肯定是在宫廷、协约国及自由和谐党的影响下前来参加会议的。他们最终成了伊斯坦布尔体制的一分子，将对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保卫权利协会的忠诚看作极端主义、冒险主义和危险。结果，他们撇开甚至反对他们的领袖凯末尔。

凯末尔也许是极其激进的，但其极端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因为他的敌人。1919年12月22~23日，英国和法国在伦敦会谈，讨论奥斯曼和约的具体条款，并且决定占领伊斯坦布尔。唯一留待将来讨论的问题是，新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应该建在哪里？

法国认为孔亚很适合；英国则更倾向于布尔萨，因为布尔萨处于其海军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一决定被泄露给媒体，并在 1920 年 1 月 4 日成为伊斯坦布尔各大报纸的头条。这随即导致一片恐慌。瓦希代丁也反对这一决定，并开始倾向于美国和法国。与此同时，协约国（受英国煽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陆军大臣杰马尔和总参谋长贾维特辞职，理由是 they 与国民军勾结。在没有咨询安卡拉的情况下，两个人都辞职了（1 月 21 日）。凯末尔彻底被激怒了，认为他们应该坚决抵制，而不是辞职。占领伊斯坦布尔的决定和这个最后通牒，促使凯末尔和他的同事们采取了激烈的反对措施，于 1 月 25 日下令全力以赴在西里西亚东南部地区开展游击战。战争在马拉什、艾因塔布和乌尔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 月 11 日，法国抵挡不住攻击，被迫撤出马拉什。1 月 27 日晚，由比加的柯普律吕·哈姆迪（Köprülülü Hamdi）率领的国民军突袭了法军在加里波利的阿克巴什（Akbaş）武器库，将夺取的大批武器和弹药运往安纳托利亚。

协约国意识到他们又一次做得太过分了。他们又一次在伦敦召开会议，并于 2 月 14 日宣布，伊斯坦布尔仍然归土耳其所有。瓦希代丁于是又恢复了跟英国的友好关系。两天之后，2 月 16 日，第二次安札武尔起义爆发。艾哈迈德·安札武尔（Ahmet Anzavur）是切尔克斯人，属于从底层晋升的军官，声称代表沙里亚和穆斯林党（the Mohammedan Party，在意识形态上接近 1909 年的穆斯林联盟）。安札武尔及其支持者俘获了柯普律吕·哈姆迪和他的部下，并将他们全部杀掉；而且，还侮辱他们的尸体，把尸体吊在比加给民众和英国人看。他们随后袭击了耶尼切（Yenice），那里藏着来自阿克巴什的武器和弹

药。面对强大的敌人，哈姆迪的战友们在摧毁军需品后逃走。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这些物资是准备用来对付希腊人入侵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瓦希代丁通过支持安札武尔和其他反民族主义势力，已经背叛了西安纳托利亚的国民军。

阿里·里扎帕厦不知道该怎么办，再加上宫廷、协约国和安卡拉三方不断施压，便辞去大维齐尔一职。那些曾经背叛安卡拉的代表们变得非常忧虑，害怕瓦希代丁再次任命费里特担任大维齐尔。权力资源在安纳托利亚以及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保卫权利协会。用凯末尔的话说，代表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电报风暴。通过发电报施压这一手法在宣布自由和“3·31”事变时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也许是因为迫于这种压力，瓦希代丁没有选择，只能勉强接受民主-民族主义运动。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萨利赫帕厦被任命为大维齐尔（3月8日），费夫齐帕厦被任命为陆军大臣。

伊斯坦布尔占领的升级

与此同时，协约国重新通过它们先前的决议。伊斯坦布尔可以留给奥斯曼帝国，但议和条件非常苛刻。为了确保土耳其服从协约国强加的条件，首先需要通过一系列重磅出击，镇压民族主义者的抵抗，并切断民众对民主-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对民族主义的严厉打击也间接地支持了苏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英国在1920年3月16日对伊斯坦布尔发动突袭。因为这座城市早已被占领，所以这次行动可以看作占领行动的升级，而不仅仅是“占领”或“正式占领”。英军采取了突然袭击或发动政变的方式。那天清早，英国军舰在金角湾向加拉塔大桥靠近时对这座城市进行袭击。英军在屋顶安排机枪手，并且进入陆军部

和其他办公大楼——那时尚未被占领的地方。许多政客和记者被当作民族主义者强行逮捕，一大清早就被从家中带走，许多人当时还穿着睡衣。英军发出公告，威胁将处死抵抗者。

当袭击位于泽扎德巴什 (Şehzadebaşı) 的一所军事建筑时，双方发生了激烈交火，造成一些人员伤亡。同一天，协约国派代表前往宫廷，向瓦希代丁保证他不是政变的目标。

在威胁民众的同时，英军并没有直接攻击议会和萨利赫帕厦政府，但要求后者必须发一份谴责民族主义者的公告。政府出于其爱国责任坚决不让步，也不辞职；他们认为，如果辞职的话，达马德·费里特将会重新上台执政。萨利赫帕厦政府谨慎地起草了一份宣言，称人们拿起武器反对希腊军队的压迫，行使其合法自卫的权利，但其中一些人使用了非法和极端的措施。协约国认为这份宣言没有效力，并拒绝接受。于是政府用强硬的措辞重新写了一份声明，但同样遭到拒绝。这份公告就像羽毛球一样在政府和协约国之间弹来弹去，直到萨利赫帕厦政府辞职。

尽管英军在早晨用他们的枪托强行闯进私人住宅和办公室，但在下午他们却有秩序地前往议会，并在进入议会前礼貌地表示，他们只是来逮捕劳夫和其他一些成员的。尽管凯末尔已经提前得到关于政变的情报，并要求劳夫到安纳托利亚来加入他的组织，但后者当天还是去了议会。也许他想要引发一场激烈的冲突，使得档案中留下英国不尊重民主和议会的历史记载。他出席议会，给了英军武力抓捕他的机会。但英军礼貌的行为破坏了这一计划，他决定从负责的英国军官手中拿到供词后再投降，以证明他是故意被捕。即便在英军到达时他也有机会逃脱；阿塔图克可能将此事牢记于心，从而在他的《大演讲》中

毫不避讳地说：有些人宁愿被关到文明国家的监狱，也不愿意参加到危险且前途未卜的民族斗争中。

在劳夫和侯赛因·卡泽姆（Hüseyin Kazım）的带领下，两个代表团前往宫廷，请求苏丹不要任命达马德·费里特为大维齐尔。瓦希代丁立即拒绝了二人的请求。他对侯赛因·卡泽姆说：“我可以任命任何我喜欢的人担任大维齐尔，无论他是希腊主教、亚美尼亚主教或者是犹太教大拉比。”对劳夫则说：“一个国家就像一群羊，需要一位牧羊人，而我就是。”这种把人民说成羊群而把他自己描述成牧羊人的说法，体现了瓦希代丁典型的中世纪思维。

为了反对协约国的侵略，众议院暂停会议，但这一立场没有得到占参议员绝大多数的极右反对派势力和宫廷的支持。他们认为根本不需要任何抗议，里扎·陶菲克甚至还反对营救被英国逮捕的参议员。他的理由是，强国的行为不可能是非正义的。这种对最基本的团结精神的否定，表明了土耳其社会的分化已经到了无法调解的地步，从而失去了达成一致的机会。很明显，这些问题推动了内战的爆发，而内战事实上已经开始。

凯末尔已经预料到一场政变即将发生，并为此做了准备。他立即采取行动，向全国发出电报抗议协约国的行动，提议在安卡拉重新召开议会，并号召切断安卡拉与安纳托利亚之间的所有官方联系（就像在锡瓦斯会议期间那样）。与此同时，爱国的萨利赫帕厦政府继续执政 17 天有余。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召开全国大会，但众议院曾召开“部分”会议。陆军大臣费夫齐帕厦要求军队不要切断与陆军部的联系。只有两支部队的长官（驻扎在孔亚的第 12 军军长法赫尔丁·阿尔泰和驻扎在班德马的第 14 军军长尤素福·伊兹特）遵守这一命令；因此，1919

年9月锡瓦斯会议期间成立的“军队指挥官阵线”在1920年无法重新建立。当众议院派出代表团劝阻“机动部队”进入伊斯坦布尔时，不禁让人回想起“3·31”事变的后果。政府派出一个由四人组成的代表团，劝说安卡拉恢复与政府之间被切断的联系。另外，安卡拉使用武力迫使两个叛乱的军官团结合作。因为不能承受协约国不断施加的压力，萨利赫帕厦于4月2日辞职。协约国并没有因为政府对国民军进行谴责而心存感激。4月4日，费里特再次担任大维齐尔。人民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绵羊将从山羊之中分离出去。与此同时，前陆军大臣费夫齐逃往安纳托利亚。4月11日，众议院被解散，之后许多议员也选择加入安纳托利亚的抵抗运动。短暂的第三立宪政府时期由此结束。

第十八章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成立、 内战及《色佛尔条约》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

从英国在伊斯坦布尔发动政变的那一刻起，凯末尔就致力于在安卡拉组建一个新议会。其成员包括那些能够逃离伊斯坦布尔的议员；同时举行选举，代替那些没有选择逃离或者无法逃离的代表。另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是新议会的名称。新的议会不能继续像奥斯曼帝国议会一样由参众两院组成了。首先是因为参议员不再存在；其次则是因为没有同伊斯坦布尔政府和苏丹合作的问题了。凯末尔提议，新的议会应该称为立宪会议（Müessisan Meclisi）。卡泽姆·卡拉贝基尔反对，认为应该用“Şura”（委员会）一词来代替，因为它更有伊斯兰内涵。随后，凯末尔和他的同事们想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Türkiye Büyük Millet Meclisi）这个名称，这最终被确定为最佳选择。这个新名称的每一个词都充满革命的象征意义。“土耳其”（Türkiye）意指土耳其人的国土；奥斯曼时期，这个国家被称作奥斯曼领土（memalik-i Osmaniye），即奥斯曼帝国的领地或奥斯曼统属的领土。在欧洲国家中，即使是被一个王国或者帝国统治，国家的名称也不同于统治王朝的名称。例如，在英伦诸岛，国家包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统治王朝却是都铎、斯图亚特或汉诺威王朝。“奥斯曼领土”意味着这

个国家和其统治王朝是同一个名称，国土是王朝的财产。相比之下，外国人所称的“土耳其”确实是一个更加民主的概念。“大”或者“伟大”这个词语强调这不是一般的议会，而是拥有满足国家需求的超凡权力的议会。“国民”这个词语表明这个议会代表土耳其民族的利益。第一次使用大国民议会这一新名称是在圣斯特法诺，但“机动部队”在进入伊斯坦布尔之后便不再使用了。现在这个词语（Millet）作为一个永久性的概念重现。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 19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穆斯塔法·凯末尔被选为主席，而且要负责即将成立的安卡拉政府。从此以后，土耳其争取民主的民族斗争有了新的动力。

内战

远在伊斯坦布尔的达马德·费里特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从大穆夫提迪里扎德·阿卜杜拉·埃芬迪（Dürrizade Abdullah Efendi）那里讨得一份法令（fatwa），宣布民族主义运动背叛了哈里发，其成员应该被处死，而那些拿起武器反对他们的人则会成为加齐（圣战士或殉道者）。数以千计的法令被传布到全国各地，据说其中一些是从英国的飞机上散发下来的。凯末尔和他的同事们被军事法庭缺席审判，许多人被判处死刑（1920 年 5 月 11 日）。

这些措施导致内战爆发。在 1919 年 9 月锡瓦斯会议和政府斗争期间，攻击民族运动的行动已经开始，这些行动即使不是宫廷和费里特政府组织的，也一定是它们唆使的，并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这些行动是第一次博兹克尔起义（Bozkır，9 月 27 日至 11 月 4 日）、第一次安札武尔起义（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日)、第二次博兹克尔起义(10月20日至11月4日)、谢赫·埃什雷夫起义(1919年10月26日至12月24日)。在经过一个半月的停火之后,协约国改变了主意,决定夺取伊斯坦布尔。伴随着第二次安札武尔起义,它们于1920年2月16日发动了更猛烈、影响也更深远的第二次行动。土耳其历史学家在提及这些亲君主专制民众的暴动时,有时使用“国内叛乱”这个词语——这是无意义的,因为外国人无法反叛他国政府。尽管亲君主专制运动攻击大国民议会政府,但从瓦希代丁的角度来看,他们则是支持建立宗教和法律权威的合法力量。苏丹瓦希代丁把他们称作“勤王军”。如果我们既不从安卡拉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看,也不从伊斯坦布尔政府的角度来看,这完全就是一场内战、一场国内的流血冲突:一方为民主-民族主义革命而战,另一方则是维护中世纪绝对君主专制和反革命。

民主-民族主义运动立即采取了反对措施。1920年5月5日,安卡拉的穆夫提里法特·埃芬迪[Rifat (Börekçi) Efendi]针对苏丹颁布的法令起草了一项反法令,宣称反对民族主义事业就是对祖国的背叛。4月29日,颁布了关于背叛祖国的法律。任何反对大国民议会的行为都被认为是背叛祖国,而且会被判处死刑。随后在9月18日,大国民议会建立了独立革命法庭(İstiklal Mahkemeleri),法官和检察官都是从大国民议会成员中选出;而且,他们的判决是最终判决,不允许上诉。1920年5月6日,大国民议会做出决定,终止所有与伊斯坦布尔政府的联系,并宣布伊斯坦布尔政府在3月16日之后所做的任何决定和行为都无效。他们称,大国民议会的目的是营救处于协约国监禁之下的苏丹。为此,大国民议会继续小心地避免直接攻击苏丹,而同时做好内战的准备。

让我们回顾一下内战的主要战场。反对民族主义者的安扎武尔叛乱发生在比加、格嫩 (Gönen) 和卡拉贾贝伊 (Karacabey, 布尔萨)。阿达帕扎勒 (Adapazarı) 和迪兹杰-博卢 (Düzce-Bolu) 的叛乱一直蔓延到安卡拉的贝伊帕扎勒 (Beypazarı), 形成了安卡拉联盟。哈莉黛·埃迪普·阿迪瓦尔的《土耳其的苦难历程》(The Turkish Ordeal) 一书写道, 此时, 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民族主义司令部“不断听到枪声, 但却不知道来自何处。安全防御措施包括随时撤退和转移”。

孔亚是德利巴什·穆斯塔法 (Delibaşı Mustafa) 叛乱的大本营, 第四大起义恰潘奥卢叛乱 (the Çapanoğlu rebellion) 则发生在约兹加特。选择在这些地区发动叛乱, 是为了从三面包围安卡拉。作为最后一搏, 苏丹组建了一支正规军, 安全部队也称作哈里发军, 由苏莱曼·谢菲克帕夏 (Süleyman Şefik Pasha) 指挥。其目标是扑灭民族主义运动。1920年6月25日, 国民军在阿里·福阿德的指挥下在盖伊韦 (Geyve) 成功击败这支军队。从1920年夏天持续到秋天的战争在安纳托利亚造成了极大混乱。从1919年起, 内战持续了一年之久, 只在解决伊斯坦布尔问题时暂停了一下。苏丹瓦希代丁而不是费里特需要为此负责, 因为当时后者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任。安扎武尔、迪兹杰-博卢-阿达帕扎勒起义和恰潘奥卢叛乱都被一支“机动部队”镇压, 这是一支由切尔克斯人指挥、隶属于国民军的独立部队。大国民议会之所以取得内战的胜利, 主要归功于国民军而不是正规军的英勇奋战。

《色佛尔条约》

当安纳托利亚人民忙于这些战争时, 外交事务发生了很大

变化。随着一系列会议在意大利小镇圣雷莫（San Remo）的召开（1920年4月24日），协约国最终完成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和约。随后，它们要求奥斯曼帝国派代表来参加和会。在巴黎和会上，条约的内容被作为既成事实交给奥斯曼帝国的代表。代表团团长陶菲克帕夏被这些惩罚性的条款所震惊，并致电伊斯坦布尔政府，这个条约不仅否认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其地位甚至不能与国家的概念相符。包括苏丹在内的整个国家都陷入恐慌。

《色佛尔条约》的主要条款如下：

（1）东色雷斯割让给希腊，并在五年内准备把伊兹密尔 - 马尼萨 - 艾瓦勒克（İzmir - Manisa - Ayvalık）地区割让给希腊。

（2）承认亚美尼亚国家，其同奥斯曼帝国的边界由威尔逊总统确定。（威尔逊随后接受这一任务，划定边界，取走了安纳托利亚的一大部分，包括蒂雷博卢、居米什哈、埃尔津詹、马什、比特里斯，以及此线以东的领土。）

（3）在亚美尼亚之外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建立自治的库尔德斯坦（Kurdistan）。按照这个条约的规定，库尔德斯坦在不久的将来也会独立。

（4）达达尼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由海峡委员会负责管理，这是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并且拥有自己的旗帜和警察部队。两个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岸地区广阔的腹地将解除军事管制。只要奥斯曼帝国按照这些准则行事，就允许伊斯坦布尔继续作为其首都。

（5）马尔丁、乌尔法、安特普和杰伊汉并入叙利亚。

（6）奥斯曼帝国的士兵和宪兵武装，包括宫廷卫队在内，不能超过 50700 人。

(7) 恢复以前条约的内容。

(8) 法国、英国、意大利代表组成一个财务委员会，奥斯曼帝国的财政预算将根据其决定来制定。该委员会将监督财政，并限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没有得到授权，奥斯曼帝国就不能举借外债和授予其他国家特权。

(9) 停战协定的第七条依然有效，这就是说协约国可以占领任何它们认为必要的地区（第 206 条）。

根据协约国之间的三方协议，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包括安塔利亚、西利夫克、尼代、阿克、阿克谢、阿菲永、巴勒克西尔、艾布、穆拉；法国的势力范围包括梅尔辛、亚达那、马拉什、迪亚巴克尔、斯尔万、埃拉泽、阿拉普基、锡瓦斯、托卡特。奥斯曼帝国的抗议完全被忽视。协约国做出的唯一让步是，如果土耳其加入国际联盟，奥斯曼帝国代表将有一名投票代表成为海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协约国意识到，即便苏丹也不愿意签署这一条约，便推动希腊采取行动。1920 年 6 月 22 日，希腊军队开始发动进攻，侵占了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并于 7 月 8 日占领了布尔萨，8 月 29 日占领乌沙克。亚罗瓦、布尔萨、乌沙克和布尔丹属于新占领的地区。尽管遇到一些抵抗，希腊军队还是在 7 月 20 日占领了东色雷斯。西安纳托利亚的国民军不仅不能阻挡希腊军队的进攻，甚至没有组织任何名副其实的抵抗。国民军在南安纳托利亚创造了奇迹，但在爱琴海地区却收效甚微。这个不难解释。在希腊发动进攻的时候，土耳其西部内战正酣，因此希腊取胜也就不足为奇了。既然内战是由瓦希代丁煽动爆发的，并在一定程度受他指挥，毫不夸张地说希腊的胜利归功于他的所作所为。然而，国民军的惨败并不能使他高兴起来，因为这使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色佛尔

条约》，而这将会是奥斯曼帝国的死亡判决。在一次见证奥斯曼帝国衰弱而没有任何功用的帝国会议之后（只有一票反对），1920年8月10日，奥斯曼帝国的代表里扎·陶菲克、雷沙特·哈利斯（Reşat Halis）和哈迪帕厦（Hadi Pasha）在巴黎和会上签署了条约。这也许是土耳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这并不意味着，瓦希代丁没有办法，唯有退位。如果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他可以拒绝批准和约，甚至为此发动圣战。这样一个立场可能会导致他被逐出皇宫，遭遇同拿破仑·波拿巴一样被流放的命运，但瓦希代丁显然没有这种坚定行动的意志。凯末尔及其大国民议会的同事，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他们冒险公开宣布反对签署这一条约，并做出决定：无论谁接受了这一条约，都将成为国家的叛徒。在希腊占领布尔萨的当天，大国民议会的讲台被蒙上了一块黑布，只有到这座城市被解放的那一天才能被扯去。

《色佛尔条约》是土耳其人民心灵的巨大创伤。同巴尔干民族主义一道，欧洲国家用语言和行动表明了它们的目的，即将土耳其人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甚至是种族从巴尔干地区驱逐出去；实际上到1913年，奥斯曼帝国在那里只剩下很少的领土主权。土耳其人也许正在准备接受一个进一步限制他们在东色雷斯统治的条约。但是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条约会同时开启把他们驱逐出安纳托利亚的进程。这个条约在完全没有调查特定地区哪个民族人数居多的情况下，仅仅依照历史主张便做出决定，允许建立一个由亚美尼亚少数民族组成的亚美尼亚国家和一个希腊少数民族组成的安纳托利亚希腊国家。“驱逐进程”这一词语用在这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巴尔干的历

史表明，这一进程不会因为签订了这一条约而停止。很难保证，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或诸多希腊国将会在黑海地区（萨姆松、巴夫拉、阿玛西亚和托卡特的希腊人确实在 12 月发动了起义）、安纳托利亚中部或地中海地区兴起。这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在不久的将来极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几乎可以确定会长期如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充满了暴政、非正义、剥削和压迫的例子，但很少有殖民主义者或者帝国主义者会对当地人宣称：“这块土地是我的，这里不欢迎你们，到别处去吧。”可是，这种特殊的遭遇却发生在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身上，一如后来发生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身上，这令土耳其人非常震惊。

土耳其人民用暴力反抗《色佛尔条约》，并赢得了《洛桑条约》的胜利。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的革命是这一进程的延续。它带领土耳其人民走向文明，保证了《洛桑条约》的有效性和《色佛尔条约》的永久失效。阿塔图克的革命是《洛桑条约》的安全保证。作为一个免遭《色佛尔条约》劫掠的国家，土耳其人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现实；因此，尽管凯末尔已经去世几十年了，革命所坚持的原则仍然受到各种制度的支持和保护。

内战的最后一场战役是德利巴什·穆罕默德（Delibaşı Mehmet）的叛乱；它于 1920 年 10 月 2 日爆发，并迅速蔓延。叛乱者占领了孔亚，但正规军用短短几天时间就把他们赶了出去。10 月 16 日，大国民议会军队进入博兹克尔。第二天，也就是 10 月 17 日，达马德·费里特在伊斯坦布尔辞去大维齐尔一职，他的政治生命也随之终结。为什么瓦希代丁和费里特会坚持这么久呢？是不是他们仍然期待德利巴什叛乱将会蔓延到

全国？看起来，直到最后一场叛乱以失败告终，瓦希代丁都没有放弃内战将会对绝对君主专制产生积极影响的期望。面对这样的现实，瓦希代丁撤掉了“鹰派”的达马德·费里特，任用他的另一个亲戚“鸽派”的陶菲克帕厦，直到苏丹统治的终结。

第十九章 正规军走向胜利之路

土耳其正规军在东线取得了第一次胜利。自1920年6月起，亚美尼亚就试图利用其在内战中的先机和希腊对土耳其西部地区的入侵，时常袭扰土耳其东部边境。1920年9月24日，亚美尼亚对土耳其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当时驻扎在安纳托利亚的卡泽姆·卡拉贝基尔（Kâzım Karabekir）将军所属的第十五集团军，无视停战协定中的裁军条款，仍保留作战能力，不仅阻止了亚美尼亚的入侵，而且继续前进夺回了土耳其的领土。亚美尼亚人被迫议和。随着1920年12月3日《亚历山大罗波尔条约》（the Treaty of Alexandropol, Gümri）的签订，奥尔图、萨瑞卡米斯及卡尔斯归还土耳其，并且亚美尼亚必须对外宣称不承认《色佛尔条约》。

如果没有内战，就无法评论国民军在抵抗希腊入侵时有多成功。然而，毫无疑问，国内剧变严重削弱了国民军的战斗潜力。人们可能记得，国民军是在解放战争初期为避免因拒绝《穆德罗斯停战协定》的条件受制裁而建立的军队，尽管某些地方的士兵是雇用的，但主要由志愿兵组成。那时，由于人们普遍厌战，很难为正规军招募士兵。一些非正规军，例如，埃特海姆（Ethem）的切尔克斯机动部队，通过掠夺获取了大量财富。当希腊入侵者迅速席卷东色雷斯和西安纳托利亚时，在西部没有取得任何胜利的国民军促使了民众对能够打败敌人的正规军的支持。这使得雇用并优先组织正规军成为可能。1920

年6月，西部战线在阿里·福阿德（Ali Fuat）的领导下建立。由于国民军遗留的非正规性及所沾染的习气，使得阿里·福阿德成为一名肩扛步枪、身穿不带军衔徽章制服的将军。新时期需要一位新的领导人物。11月8日，阿里·福阿德被解除军职，任命为驻苏俄大使，其职位由伊斯梅特贝伊上校接任。国民军被编入正规军中，从而使得正规军得以重组和扩充。

新秩序同非正规军指挥官德米尔吉·穆罕默德·埃菲（Demirci Mehmet Efe）和切尔克斯人埃特海姆（Çerkez Ethem）的利益相悖。12月11日，德米尔吉叛乱被雷费特帕厦领导的军队打败，德米尔吉被迫投降。随后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试图说服切尔克斯人埃特海姆将民兵并入正规军，但却毫无成效。1921年1月1日，他又公开反叛。1月5日，当正规军攻入机动部队位于盖迪兹（Gediz）的总部时，埃特海姆逃走，并向希腊人寻求庇护。关于埃特海姆在土耳其历史上的地位，历史学家们意见不一。有些人认为他是叛徒，有些人则认为他的行为值得同情；但没有人怀疑他在内战时对国家所做的巨大贡献。他可能会因为拒绝加入正规军而遭到批评，但不会因为保住自己生命和自由避难于希腊而被指责为卖国贼。问题是，他在投奔希腊后是否背叛了国家，这仍是一个谜。

伊斯坦布尔的新陶菲克帕厦政府力图重建与安卡拉的联系，以寻求两个政府之间的协作。会议于1920年12月5日在比莱吉克（Bilecik）举行。伊泽特帕厦和萨利赫帕厦（二人以前都是大维齐尔）作为伊斯坦布尔政府的代表，穆斯塔法·凯末尔和伊斯梅特上校代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但并没有产生积极的结果。

希腊局势

与此同时，希腊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影响着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1914 年一战在欧洲爆发时，国王康斯坦丁（King Constantine）正统治希腊。他曾在德国的军事学院受过教育，并且与德国公主——德里·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妹妹结婚，这一背景使他同情德国。因此，希腊选择保持中立。来自克里特岛的希腊政治领袖韦尼泽洛斯（Venizelos）认为保持中立是一种错误；他认为协约国集团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如果希腊把自己的命运与协约国集团联系在一起，未来将会实现“梅加利理念”（Megali Idea）——建立伟大的希腊王国的宏伟理想。1917 年法国入侵色萨利（Thessaly），迫使康斯坦丁退位，其第二子亚历山大（Alexander）即位。韦尼泽洛斯被任命为总理，希腊加入协约国集团，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20 年 10 月，亚历山大因被他的宠物猴咬伤而身亡。韦尼泽洛斯召集举行大选，鉴于自己对希腊所做的巨大贡献，他对大选结果很是自信。反对派支持康斯坦丁复位。然而，选民在投票时更在乎“梅加利理念”之外的因素，韦尼泽洛斯在民意投票中惨遭失败，康斯坦丁复位。康斯坦丁意识到法国会反对他，因而支持重新开始进攻土耳其，以迫使其接受《色佛尔条约》，从而赢得法国的支持。这些事件的后果引发了伊诺努战役和萨卡利亚战役。

第一次伊诺努战役及其影响

1921 年 1 月 6 ~ 10 日，在靠近埃斯基谢希尔的伊诺努，伊斯梅特上校率领的军队与希腊军队遭遇。此战紧接着抵抗埃特

海姆的行动。尽管在人数和装备方面有很大劣势，土耳其军队还是在一次激战中打败了希腊军队，迫使后者撤退。这场战争有时降级为由少数希腊军队参加的侦察行动。然而，纵观历史，一场战役的重要性是由其结果而不是参加这场战役的士兵数量来决定的。在伊斯兰诞生过程中，同毗邻大国的小战役影响深远，从而非常重要。

伊诺努战役的胜利使协约国集团意识到它们做得太过分了。它们决定在伦敦召开一次有土耳其代表参加的会议。协约国给大维齐尔陶菲克帕厦发了一份邀请函，并要求奥斯曼帝国代表团中必须包括大国民议会的代表。当陶菲克帕厦通知安卡拉方面协约国的这一要求时，凯末尔予以严词拒绝；他认为，协约国政策的变化是因土耳其人民的坚持抵抗以及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拒不接受《色佛尔条约》的决心所致。签订该条约的政府不可能取得对民族有利的成果。参加会议的所有代表均应由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挑选，并且伊斯坦布尔政府应保持克制而不予干涉。在伊斯坦布尔政府拒绝这些要求之后，安卡拉议会要求单独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协约国被迫同意这一要求。

伦敦会议于1921年2月23日召开。当轮到陶菲克帕厦发言时，他听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贝克尔·萨米（Bekir Sami）的建议，宣称人民的代表有权代表国家发言。伊斯坦布尔政府的认可极大地提高了贝克尔·萨米的地位。然而，随着会议的继续，协约国集团的建议显然只是对《色佛尔条约》稍作修改，这同《国民公约》的原则相悖。因此，这次会议无果而终（3月11日）。然而，贝克尔·萨米却同意大利和法国签订了协议，并且与英国签订了释放战犯的协议；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以与《国民公约》相悖为由否决了这三

项协议。尽管伦敦会议未取得任何具体成果，但却产生了一个积极影响，即国际社会对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承认。

在第一次伊诺努战役之后，土耳其与苏俄的关系有了重大进展。1920年春，列宁与凯末尔之间的通信成为两国确立友好关系的开始。民主-民族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源于它们都是西欧国家敌视的对象，这很自然它促进了它们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1920年5月11日，一个由贝克尔·萨米率领的土耳其代表团被派往莫斯科，会谈的成果是苏俄承认《国民公约》（6月3日）。尽管阿里·福阿德从11月开始就在莫斯科，这个外交上的重大成果却是在第一次伊诺努战役后取得的。《土苏友好条约》（the Turkish-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于1921年3月16日在莫斯科签订，最终解决了土耳其与苏维埃俄国的边界问题。巴统留给了苏联，苏联则承诺给土耳其提供战争物资和经济援助。这个既定边界，在随后土耳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于1921年10月13日签订的《卡尔斯条约》（the Treaty of Kars）中再一次得到确认。

同苏维埃政权的友好关系唤起了土耳其一些人士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趣。例如，切尔克斯人埃特海姆即为绿军组织（the Green Army Organization）的成员。1920年7月14日，土耳其共产党（Turkish Communist Party）秘密成立，并在同年12月以土耳其人民社会党（the People's Socialist Party of Turkey）的身份实现合法化。凯末尔对这些运动将走向何方深感不安；为将其置于掌控之下，他鼓励一些同僚，包括杰拉尔·巴亚尔，组建“官方”的土耳其共产党（10月）。所有这些组织在切尔克斯人埃特海姆叛乱后都被取缔。1920年9月，穆斯塔法·苏普

希（Mustafa Suphi）在巴库建立了土耳其共产党，并于1921年1月率领其成员访问土耳其。在离特拉布宗不远的水域，他们因为某些无法完全解释的原因被亚赫亚·卡赫亚（Yahya Kahya）暗杀。

第一次伊诺努战役的胜利也为外交事务的另一个成就铺平了道路，即1921年3月1日签订的《土耳其—阿富汗友好条约》（the Turco-Afghan Friendship Pact）。也许我们从上文可以总结出，尽管第一次伊诺努战役的意义被一些人低估了，但它促成了土耳其外交事务的三个主要成果。

这次战役的失败并没有抑制希腊的战争欲望；他们相信能占领埃斯基谢希尔，并继续向安卡拉前进，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认同。希腊军队于3月31日发动进攻，第二次伊诺努战役开始于1921年3月31日，4月1日以土耳其的决定性胜利而结束。伊斯梅特帕厦（后来，他以这次战役的所在地作为他的姓）在第一次伊诺努战役后被晋升为上将。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凯末尔发去贺词：“你不仅打败了敌人，而且扫除了国家的霉运。”

5月，意大利人开始从马尔马拉地区撤离；7月从安塔利亚撤离。6月，法国人从宗古尔达克（Zonguldak）撤退。早些时候（4月），奥斯曼帝国的奥马尔·法鲁克（Ömer Faruk）亲王试图访问安卡拉；当他在黑海港口伊内博卢（İnebolu）登陆时，凯末尔友好而坚决地将他送回了伊斯坦布尔。在比莱吉克会议、伦敦会议及此次在伊内博卢所做的努力都失败后，瓦希代丁（穆罕默德六世）与民族主义者达成妥协的希望破灭了。

萨卡利亚战役

尽管在伊诺努两次战败，希腊人仍然很顽强。他们召集所

有兵力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希腊人于7月10日发起进攻，开始时进展顺利。土耳其军队从埃斯基谢希尔和屈塔西亚败退，希腊人接着占领了埃斯基谢希尔、屈塔西亚和阿菲永。凯末尔命令军队撤退到环绕安卡拉平原的萨卡利亚河东岸，他认为这一有利的防御形势能够抵消希腊军队的优势。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弥漫着愤慨和恐慌的气氛。当政府考虑是否把政府机关撤至开塞利时，大量的国民从安卡拉涌向开塞利。

7月25日，土耳其军队在萨卡利亚河东岸建立阵地。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希望凯末尔亲自指挥军队，他以获取全权作为接受任命的条件。1921年8月5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凯末尔总司令一职，并且授权他在3个月内以大国民议会的名义行使全权（直到进攻前，这些权力被变更过几次）。8月7日和8日，凯末尔在《国家税收的命令》(Orders for National Taxation)演讲中立即使用了这项权力；他宣布在全国进行大动员，要求每一个公民都加入战斗。

用凯末尔的话来说，即将到来的战争“不是两支军队之间的战斗，而是两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需要他们将全部的资源、财产、物资和道德力量投入战斗……在将来的战争中，胜利的决定因素也将体现于这一理念”。罗德·金罗斯 (Lord Kinross) 在他关于阿塔图克的传记中提到，多年后丘吉尔非常欣赏这一预言性声明的真谛。

每个家庭须向军队捐献一批麻布、一双袜子和一双鞋子。所有的武器和弹药、40%的食物、20%的坐骑和役畜、牛马拉的货车，都是从反抗最终赔偿政策的人那里征用的。在用牛车远距离运送弹药和炮弹的过程中，妇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每个省，国家税务委员会承担繁重的备战工作。剩余的时间确

实不多了。1921年8月23日，两军在大约100公里宽的阵线上遭遇。除了骑兵和军官数量外，希腊军队在每个方面都有优势。下面的附表展示了当时的形势。这些数据表明，希腊的机枪数量是土耳其的3倍，加农炮比土耳其多69%。希腊有840辆卡车，而土耳其没有；飞机数量是土耳其的9倍（土耳其只有两架）。这表明两军存在质的差别。最显著的是军队的数量。虽然希腊人口不到土耳其的一半，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召集250万人的军队（其中一半来自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地区）；但是现在，当敌人离首都安卡拉越来越近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土耳其在战场上的人数比希腊还少。

	军官	士兵	步枪	机枪	加农炮
土耳其	5401	96326	54572	825	169
希腊	3780	120000	75900	2768	286
	牲畜	货运马车	卡车	飞机	
土耳其	32137	1284	—	2	
希腊	3800	—	840	18	

当在加里波利陷入无路可退的境地时，凯末尔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命令军队战斗到底，按当时的情况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取得胜利。他当时的命令是：“没有防御线，只有防御面。防御面就是我们的整个祖国。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被其国民的鲜血浸染之前，我们都不能放弃。正因为此，无论大小，每支军队都要继续战斗，在每一个新的据点重建抗敌战线。所有军队独立作战，而无须旁顾身边被迫撤退的部队。所有人都需拼死守护自己的阵地。”在经过22个昼夜的激烈战斗后，希腊军队战败撤离（1921年9月13日）。

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土耳其的人口更多，在战场上的人数却比希腊少呢？这看起来也是内战的产物，虽然其影响几近消失。或许可以这样说，尽管现实中的战争已经结束，但国民对相互斗争造成的心理创伤仍记忆犹新。此外，对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和凯末尔来说，没有时间为抵抗希腊人的整体战确立一致的舆论，因此安纳托利亚的人力只能动员到这种程度。同样，这些观点也在凯末尔的《大演讲》中提到过。我们也要注意，服役的军官增多了。这再次强调了“受教育者”，即知识阶层，在土耳其民族延续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希腊军队已经推进到距离安卡拉 50 公里的地方，而且能够有序地撤退。如果土耳其军队不那么疲惫，有更多的物资，就有可能发动更大规模的后续行动，使希腊人的撤退一发而不可收。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而且，由于他们发动 7 月攻势，希腊人已经到达了埃斯基谢希尔 - 阿菲永一线，从而取得了更多的土耳其领土。从前线归来的康斯坦丁因这些胜利而信心膨胀，从而在伊兹密尔举行庆祝活动。比雷埃斯 (Piraeus) 和雅典通过欢宴、演唱感恩圣歌的方式来庆祝他的到来。但是，希腊人认为他们所谓的胜利是一种幻觉。康斯坦丁的号令是：“向安卡拉进军！”虽然占领了新的领土，但军队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希腊人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因此，萨卡利亚战役被认为是土耳其的胜利。为纪念这次胜利，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穆斯塔法·凯末尔“加齐”的称号（即战胜者）和元帅军衔。

这次胜利的成果使土耳其获得了稳固的国际地位。法国秘使富兰克林 - 布永 (Franklin-Bouillon) 在 6 月初已到达安卡拉，打算签订一份法国 - 土耳其协议。然而，当进行到要

确认《国民公约》的原则时，他不再那么有热情了。但在萨卡利亚战役胜利后，他们立即签约确认了这些原则，即1921年10月20日的《安卡拉协定》（the Ankara Agreement）。为与该协定保持一致，法国承认土耳其与叙利亚南部的现存边界，为确保土耳其人的利益而建立特殊政权的哈塔伊（Hatay，包括亚历山大塔勒和安提阿可）除外。因此，土耳其南部与法国实现和解；据此，法国从它所占领的所有地区撤出，并承诺给土耳其提供武器。土耳其与意大利之间也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于是，英国由于其支持希腊入侵土耳其的政策而变得孤立。《安卡拉协定》有效地分裂了法英同盟。英国甚至与土耳其议会政府签订了双方交换战犯的协议（1923年10月23日）。于是，劳夫和许多其他土耳其政界人士及官员返回土耳其。另外需要注意，土耳其在这一时期与其他三个存在时间较短的高加索独立国家间签订了《卡尔斯条约》（Treaty of Kars，1921年10月13日）。

第二十章 大胜利和苏丹制的废除

和平倡议

在取得萨卡利亚战役胜利之后，无论是以前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不得不承认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和民主 - 民族主义运动是土耳其不可小觑的力量。凯末尔作为这场运动的领袖，地位也因此次胜利而提高；尽管有一些人（包括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成员），仍希望看到由恩维尔领导这场运动。有迹象表明，在安卡拉陷入敌手时，恩维尔准备带领由苏联支持的部队进入安纳托利亚。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希腊人从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撤退，并根据《国民公约》的原则达成和平，或至少是遵守其基本观念。

萨卡利亚战役后的一年里，土耳其都在寻求和平。在这段时间内，土耳其 - 希腊战线几乎没有行动；但过后，开始产生紧张的氛围。希腊或许感觉到他们不可能坚持很长时间，或许意识到他们在安纳托利亚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土耳其军队已证明将是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部队，并且会日益壮大；意大利和法国政府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达成协议便是有力证据。对希腊来说，即使付出很大的牺牲和代价，在安纳托利亚广大地区维持军事占领也是必要的，而且准备随时行动。

持续的敌对也引起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某些成员的焦虑。他们的耐心被耗尽了，要求要么开战，要么议和。只有凯末尔

和他的同事们能保持一种深思熟虑的平静。耐心和不懈的努力为决定性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但他们并没有放弃用战争以外的方式来寻求光荣的和平。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决定派外交部长尤素福·凯末尔（Yusuf Kemal，即 Tengirşenk）去欧洲进行和谈。因为感到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支持能增强在与协约国谈判时的地位，所以尤素福·凯末尔在动身去欧洲之前被派往伊斯坦布尔。换句话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寻求伦敦会议上陶菲克帕厦所给予的类似支持。尤素福·凯末尔于1922年2月15日到达伊斯坦布尔。大维齐尔陶菲克和外交部长伊泽特帕厦听取了尤素福·凯末尔善意的建议；但告诉他，如果得不到瓦希代丁的允许，什么也做不成。他受到了苏丹的接见，并介绍了他的提议。自始至终，瓦希代丁闭目而听；当尤素福·凯末尔介绍完时，也只有长久的沉默，瓦希代丁仍闭着眼睛，一句话也没说，好像他已经睡着了。最后，不知所措的尤素福借故离开，在没有得到奥斯曼帝国支持的情况下便前往罗马。刚到罗马，他就发现奥斯曼帝国的外交部长伊泽特帕厦在他之前已抵达，并且无论他去哪儿或采取任何行动，伊泽特帕厦也必如此。在巴黎和伦敦，相同的情况再次上演。如果瓦希代丁不那么顽固地在全世界面前使自己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决裂，结果是否更有利犹未可知。但很明显，苏丹的策略阻碍了和平进程，挫败了任何富有成效的对话。

3月底，协约国集团提出了它们的和平倡议。1922年3月22日的停战计划确定了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三个月停火期，并在每期结束时自动延长。在此期间，任何一方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增强它们武装部队的战斗力，而且双方要接受协约国的监督

以确保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希腊接受了上述的停战协定，但土耳其人拒绝对军队的限制和协约国监督的条件。土耳其针锋相对地提出，只有希腊在 4 个月内撤离安纳托利亚，土耳其才会接受停战协定的条件。3 月 26 日，土耳其人被告知协约国集团的和平计划。《色佛尔条约》又一次被作为某些变化的基础；爱琴海地区和泰基尔达留给土耳其，东色雷斯的其他地区分给希腊。建立亚美尼亚国家的问题留给国际联盟。土耳其被允许保留一支 85000 人的军队。不平等条约有所修订，赔款义务也有所减少。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再次拒绝了这个计划，坚持任何可行的和平条约都必须符合《国民公约》的基本原则，并且要求在伊兹密尔召开和会。

夏季到来时，仍看不到解决这一僵局的希望。紧张的氛围在希腊日益浓厚，希腊最终找到了一个自认为能结束困境的方法；他们将参与对伊斯坦布尔的占领，以迫使土耳其顺服，从而更容易接受和平条件。他们准备好军队，并于 7 月 29 日正式向协约国提出申请。如果由英国决定，也许会欢迎希腊参与占领；但意大利和法国反对，因此希腊的建议被拒绝（7 月 31 日）。7 月 30 日，希腊高级专员斯戴尔吉德斯（Sterghiades）宣布在伊兹密尔建立一个名为爱奥尼亚（Ionia）的希腊国家。协约国、安卡拉及伊斯坦布尔政府都公开抗议这一行动。劳合·乔治对友国希腊的失望一定感同身受；8 月 4 日，他在下议院的演讲中列举了土耳其的罪行，例如，在大战中对协约国关闭海峡，以及希腊代表协约国所做的牺牲和土耳其人对希腊造成的麻烦。

7 月底，土耳其大举反攻前的一个月，费特希·奥克亚尔被派往欧洲讨论安卡拉政府的方案，并在巴黎见到了法国各部

长；但没能与英国各部长取得联系，甚至包括外交部长寇松侯爵，从而只得两手空空而归。英国档案记录了在这期间瓦希代丁与英国秘密联系的事实。1922年4月6日，在一次同高级专员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Sir Horace Rumbold）及其首席翻译赖安（Ryan）会谈时，瓦希代丁说道：“你是打算同一个合法政府还是革命组织议和呢？我们准备在不承认安卡拉政府的前提下议和。”因此，瓦希代丁准备“低价出卖”《国民公约》。他把马尔查河作为可接受的新边界，并愿意单独同英国签订协议。在大反攻三周前同朗博尔德的会谈中，瓦希代丁称，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是希腊占领的产物，如果希腊占领结束了，它将失去存在的理由并且变得多余。最重要的是，希腊军队撤走后的领土应该交给伊斯坦布尔政府，而不是安卡拉政府。此外，英国必须向伊斯坦布尔政府提供资金、武器和海军支援。在下文探讨叛国这一问题时，将会进一步讨论瓦希代丁在这些秘密会谈中的所作所为。

上文已经提过，萨卡利亚战役后各种事务持续的模糊性，不仅在希腊，而且在土耳其也引起了紧张氛围。很明显，这些状况迫使凯末尔在绝密的情况下计划和准备新的进攻。同时，一些不知道这些计划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代表，担心他利用作为总司令的特权建立独裁统治。也许是受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们的影响，在5月5日的一次会议上，凯末尔因病缺席，大国民议会投票反对延长他的权力。次日，凯末尔来到大国民议会，宣称这一投票结果罢免了军队的总司令，将会对国家构成严重的威胁。他说：“我没有离开我的职位，我不能而且也不会这么做。”面对其坚定的立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重新授予他全权。

总攻及其胜利

为总攻所做的秘密准备可概括为：从东部和南部征集人员和物资；招募新兵；组织从苏联、法国及其他地方运来武器弹药，包括从伊斯坦布尔的军火库走私物资。在一个严重缺少公路和铁路的国家，这些设备的远距离运输绝大部分靠牛车拉、动物驮，甚至人背。此外，由于希腊人占领了阿菲永和埃斯基谢希尔的主要交通枢纽，使用现存的铁路几乎是不可能的。1922年6月中旬，凯末尔下令进攻。土耳其军队晚上悄悄地向阿菲永南部的目的地进发。在那里，一场歼灭战即将打响，这意味着希腊军队将完全丧失战斗力。如果土耳其的这一目标没有实现，那么希腊军队即使战败也能全部撤退并重组。这样的话，拯救东色雷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尽管希腊军队会轻易撤到东色雷斯，但协约国将会阻止土耳其军队通过其所控制的海峡。在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对土耳其索取色雷斯的回答是：“虽然你们在安纳托利亚打败了希腊人，但他们仍以大量的武装力量控制着色雷斯。”

8月17日，凯末尔离开安卡拉去西部前线总部，接着是阿克谢希尔（Akşehir），两周后又到了舒胡特（Şuhut）。总攻于8月26日早晨发动。在各个方向遭遇反击和包围的希腊军队在达姆卢佩纳尔（Dumlupınar）战役中遭到致命的打击。为阻止希腊军队重组，总司令凯末尔下令从三个方面向伊兹密尔进发。他那天的命令是：“全体将士，你们的首要目标是地中海^①。前进！”

① 爱琴海那时在土耳其语中没有单独的名称。

无论对于实现这次战役（歼灭战）的主要目标，还是阻止希腊人在行军进程中烧杀劫掠城镇和村庄，速度都是很重要的；在占领安纳托利亚期间，他们的烧杀掳掠已经达到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坏程度。在萨卡利亚战役之后，名为“审计自我暴行团”（Fetkik-i Mezalim）的调查委员会发起关于这一暴行的调查，其成员包括哈利黛·埃迪普·阿迪瓦尔、亚库普·卡德里·卡拉奥斯曼奥卢和尤素福·阿克丘拉。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通过对卡拉米塞尔（Karamürsel）情况的直接观察确认了他的发现。最糟糕的是，当地的希腊人要么被招募进希腊军队，要么就是犯下那些罪行的人。因此，当希腊军队战败时，他们除了逃离自己的祖国别无选择；他们烧杀劫掠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返回的希望，也不敢面对他们的邻居。他们为种族仇恨所感染。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胜利是如此势不可当，以致希腊总司令特里库皮斯（Tricoupis）和他的全部参谋人员都被俘获。他和另一位希腊将军被带到凯末尔面前，并受到凯末尔的礼遇。人们时常谈论战争。尽管土耳其人民遭受了各种暴行，但其对待战败将领的方式是人道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在进入伊兹密尔以后，他拒绝从铺在路上的希腊国旗上走过。土耳其军队9月9日解放了伊兹密尔，9月10日解放了布尔萨。不幸的是，同其他地方一样，伊兹密尔也被付之一炬。土耳其的敌人称他们对这场大火负责；然而，消防队的欧洲负责人在其报告中指出，这次火灾是某些亚美尼亚人所为。混乱无序的希腊残军和希腊人乘船从伊兹密尔、切什梅（Çeşme）和班德尔马逃离。

阿塔图克带给全国人民的胜利消息如下：

致伟大而崇高的土耳其民族：

我们英勇的军队于1922年9月9日早上解放了伊兹密尔，9月9日晚上解放了布尔萨。地中海上空回荡着我们战士的胜利歌声。

一支企图建立亚洲帝国的傲慢军队竟敢来到战场，其指挥官和总参谋部全体成员几天前就已经成为大国民议会政府的俘虏。

敌人的总司令特里库皮斯将军，在经过许多日夜绝望的战斗以及多次尝试突围失败后，最后被迫率领随从人员、总参谋部和所指挥的军队残部投降。如果希腊国王没有在今天这场战争的俘虏中，那是因为皇室成员总是乐于参与到人民的欢乐中，而到战争灾难到来时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宫殿。

希腊大军现在只剩下西方钢铁厂生产的装甲车和被他们的将领遗弃在安纳托利亚山区的悲惨士兵；现在多数士兵对他们所犯下的屠杀罪深感恐惧，被留下的疲惫无助的伤员在沿途的树下寻找栖身之所。

大约2/3的敌军装备被遗弃在我们的土地上。除去那些俘虏，很难确定敌人的伤亡人数比100000这个数字高多少。我很高兴地告诉全国人民，官方估计我军伤亡人数低于10000，而且其中3/4是轻伤。

伟大的土耳其人民，我们的军队已经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能力，足以令敌人胆战心惊，并且能够激发我们朋友的信心。我们国家的军队用14天时间就打败了敌人的大军，并且不懈追敌400公里。他们夺回了安纳托利亚所有被侵占的领土。这个伟大的胜利正是你们的功劳，那些甚

至乐意将伊兹密尔拱手让给敌人并为贪婪和政治野心驱使的人与这个国家无关。至于侵入布尔萨的希腊军队，他们的成功仅仅因为他们同其他帝国的军事组织目标和行动的统一。我们国家的解放运动始于这个民族的民选政府代表并无条件地掌握自己的未来，源自有民族意识的军队取得积极的、绝对的胜利。

伟大而崇高的土耳其民族，我对安纳托利亚的解放表示祝贺，我将来自伊兹密尔、布尔萨和地中海地区士兵的问候带给你们。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主席

总司令 穆斯塔法·凯末尔

在演讲中，凯末尔利用希腊国王的例子攻击所有的专制体制，包括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制。这篇宣言为民主政治辩护：胜利只属于这个民族。那些“甚至乐意将伊兹密尔拱手让给敌人”的人与这个国家无关。希腊人能成功入侵布尔萨是因为他们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结盟。解放运动只能开始于确立人民无条件地掌握自己命运的主权和建立具有民族意识的军队。凯末尔的这篇宣言开创了共和国建国之路。

当土耳其的军队攻到恰纳卡莱时，驻扎在那里的英国军队准备迎战。意大利和法国人意识到英国的意图，撤退到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边的加里波利（9月19日）。英国宣称，一旦土耳其军队进入他们防线外的中立区，就会开火。劳合·乔治因希腊的战败恼羞成怒，决心确保海峡的自由通行，于是让英国和自治领的军队（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与打击土耳其的战斗。他下令，当土耳其人进入中立区时，立即开

始战斗行动。土耳其军队确实进入了中立区，但他们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而不是宣战的方式靠近英国战线（9月24日）。在这一情况下，英国指挥官马登将军（General Marden）并没有下令开火。

当英国叫嚣着保护海峡的自由通行时，劳合·乔治想与土耳其打一场代理战争；而此时，希腊占领着东色雷斯，土耳其想不失时机地继续解放东色雷斯的行动。在关键时刻法国介入了这场危机，承担了调停者的角色。伊斯坦布尔的高级专员佩尔（Pellé）与富兰克林·布永来到伊兹密尔，同凯末尔进行协商。9月24日，苏联在一次外交照会中警告协约国，如果列强卷入希腊-土耳其战争，将会在欧洲导致严重的后果。9月23日，其他协约国成员提出了第一个停战协定，并建议稍后举行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合·乔治日益孤立。

《穆达尼亚停战协定》

穆达尼亚会议于10月3日召开，伊斯梅特帕夏代表土耳其参加了会议。谈判的另一方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但希腊代表也应该在场的，因为没有任何行为可以否定《穆德罗斯停战协定》，而且战争是在土耳其与希腊之间展开的。这种奇怪的外交现象表明希腊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协约国的附庸，特别是英国。这些事实值得强调，因为一些土耳其作家，如凯末尔·塔希尔（Kemal Tahir）和经济学家伊德里斯·屈奇克梅尔（İdris Küçükömer），认为解放战争从来没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而仅仅是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战争。

希腊代表西莫普勒斯将军（General Simopoulous）在停泊于穆达尼亚的一艘船上等待着协商结果；结果并不是他们所希望

的，因此在其他所有代表都签字三天后，他仍拒绝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九天的会议是一场焦虑战。土耳其的目标是迅速控制东色雷斯，以便能参加未来有关东色雷斯协商问题的会议。这也使土耳其在其他问题上立场更强硬。尽管希腊军队已经大部分被歼，但在穆达尼亚的协约国仍试图拒绝承认土耳其的这一优势。伊斯梅特帕厦绞尽脑汁，耐心而坚定地为其政策辩护。劳合·乔治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想要为发动战争寻找最后的机会。他同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协约国占领军指挥官查尔斯·哈林顿中将（Sir Charles Harington）商定，如果到了约定时间还没有达成协议，就向土耳其发动军事进攻。然而，军队并不像劳合·乔治那样热衷于发动战争，并且英国人民整体上厌倦了战争。尽管截止日期已过了，同马登将军在恰纳卡莱一样，代表们没有理会这些命令。希腊已完全变成英国的傀儡，以至于他能对伊斯梅特帕厦的问题（如果希腊拒绝签字，停战协定是否仍有效）给出肯定的答案。

根据《穆达尼亚停战协定》的规定，停火协议于10月14日或15日晚上生效，希腊军队应该撤出东色雷斯；而且为了防止他们从中作梗，命令希腊把撤出的地区交给协约国而非土耳其管理。然后，协约国会将这些领土交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军队，他们将在30天内自行撤离东色雷斯。土耳其军队当前总数不超过8000人。负责东色雷斯移交工作的雷费特于10月19日在一片欢庆氛围中抵达伊斯坦布尔。同一天，英国联合政府被迫辞职，由此也终结了劳合·乔治的政治生涯。当然，他是土耳其人的敌人，但不能确定多大程度上可以称他为希腊的真正朋友。向土耳其移交东色雷斯的工作在10月31日至11月26日期间完成。与此同时，权力日减的王室政府也在消失。但是，

协约国还是将洛桑会议的邀请函同时给了伊斯坦布尔政府和安卡拉政府。以陶菲克帕厦为代表的伊斯坦布尔政府受邀请函的鼓动提议确定联合政策参加会议，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非常愤怒。

苏丹制的废除

凯末尔的完全胜利确保了土耳其的独立，《洛桑条约》(the Treaty of Lausanne) 确保了其领土的完整。同样的胜利也可以确保凯末尔革命与封建主义没有关系。《色佛尔条约》的冲击清楚地表现出土耳其对革命的迫切需要，并且这一胜利给革命的缔造者以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来赢得成功。凯末尔很善于把握政治时机。他利用双重邀请产生的义愤一举结束了苏丹制。他并没有公开提到任何建立共和国的计划，并以保护哈里发的名义发表演讲。然而，当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联合委员会准备继续无休止地讨论哈里发在没有苏丹后能否存在的问题时，凯末尔站起来声称，只有依靠军队和权力，主权才能存在。奥斯曼帝国以前是主权国家，但现在这个民族将主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他补充说道：“在我看来，议员和其他人都应该把这件事当作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失败了，尽管可能会出现牺牲，但真理终将胜利。”联合委员会主席霍贾·埃芬迪 (Hodja Efendi, 神学博士) 在会议结束时说，他们已经“开化了”。1922年11月1日，决议通过 [只有齐亚·胡尔希德 (Ziya Hurit) 一票“反对”]，奥斯曼帝国苏丹 600 多年的统治结束。奥斯曼家族将作为哈里发继续其权威，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可以决定王朝的哪个成员担任哈里发。陶菲克帕厦政府辞职。

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对瓦希代丁的地位做进一步的阐释。11月10日，他参加了传统的周五祈祷仪式。最后，苏丹

制废除 15 天后，他在一封信中告知哈林顿将军（General Harington）自己正向英国寻求庇护。11 月 17 日，瓦希代丁和他的家人及亲信登上了英国“马来亚号”（Malaya）战舰离开土耳其。翌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正式宣布废黜穆罕默德六世，并选举他的法定继承人阿卜杜迈吉德·埃芬迪（Abdülmeiçit Efendi）为哈里发。

瓦希代丁是否犯了叛国罪？第一，在 1919 年 3 月 30 日提交给英国的和平倡议中，他完全放弃了土耳其的独立。他试图以领土换特许权，这可能符合用经济权利换取土地的奥斯曼传统政策。这仅仅与他非常传统的心态有关。

第二，他煽动和尽力延长内战。对一个在位的专制君主来说，拿起武器反对民主制并战斗到最后，有自己的理由。然而，在敌人入侵期间，煽动内战使他的行为更加严重。

第三，当他的拥护者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他也放弃了战斗，并罢免了达马德·费里特的大维齐尔一职，但仍努力与英国达成协议；他这样做是阴谋破坏《国民公约》。在内战中，他的所有策略都失败了，他本应向不可逆之势屈服；但相反，甚至从他自身的价值观和苏丹的语言来说，他背叛了他对安拉的神圣信仰（Vediat-ullah），并从背后捅了穆斯林（ümmet-i Muhammet）一刀，使他们受控于非穆斯林的统治。这是他自己所理解的叛国。

第四，最让他的支持者不安的是他向英国寻求庇护；他的支持者求为欣慰，辩称他是在枪口的威胁下被英国绑架了。当然，瓦希代丁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出逃，但是他的自由甚至生命可能处于危险中。他要为自己逃到英国而受责；因为那时英国与希腊结盟，是土耳其主要的敌人。他本可以到意大利或

法国避难（事实上，他一直住在意大利小镇圣雷默，直到 1926 年去世）。他的一些支持者称赞说，他只带了个人财产而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全部财富出逃。这是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撇开他是否有时间打包那些财宝不谈，不应该因为他有机会但没有这样做而夸赞他，因为通常只有正面的行为才应该获得赞扬，能够克制住不光彩的行为通常并不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

第二十一章 《洛桑条约》： 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

洛桑会议

1922年11月20日洛桑会议召开，伊斯梅特帕厦（İsmet İnönü）作为土耳其代表参加。总理劳夫（Rauf Orbay）自荐作为本国代表，但鉴于伊斯梅特帕厦在穆达尼亚会议上的成功，凯末尔认为他是完成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为加强伊斯梅特帕厦的地位，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任命他为外交部长。

在这次外交对抗中，双方的分歧不仅在相互矛盾的利益，而且在完全不同的观点。协约国把土耳其看作战败的同盟国的一员，因此想把类似《色佛尔条约》的条约强加给它。英国外交部长寇松侯爵仍决心以牺牲土耳其为代价增强英国在中东的霸权。然而，土耳其人认为他们自己是独立战争的胜利者，同会议所有的其他成员一样是平等的，因此他们的国家应被视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他们要求批准《国民公约》并以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地位进入国际社会。协约国并没有完全理解，它们面对的不再是为保住领土而妥协的古老的奥斯曼帝国，而是一个崭新的国家。

会议开始时，伊斯梅特帕厦没有采用传统的开幕致辞，而是直接陈述了土耳其的主要观点；他宣称，为根据《国民公约》原则建立自由独立的国家，土耳其人民受尽了苦难，并不懈

地斗争。接下来的数月，他用极大的耐心坚持自己对《国民公约》基本概念的承诺，并坚持不懈地劝说其他代表。会议很明显无法达成一致。寇松侯爵将自认为合适的和平条款草案呈给伊斯梅特帕厦，并宣称如果截止到2月4日后者还没有接受他所提出的方案，他将离开洛桑会议。因此，当截止日期到来时，寇松乘火车离开了。经过两个半月的协商后，会议无果而终。

双方僵持了大约三个月。在这期间，土耳其采取了军事防备措施，应对任何挑衅行动。此外，土耳其也试图营造一种有利于接受他们提议的氛围。

土耳其选择的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渠道是土耳其进出口公司 (National Import and Export Corporation of Turkey)；它是在伊兹密尔解放 10 天后建立的，建立者是 54 名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代表。1923 年 6 月 15 日，这一公司与英国的土耳其开发公司 (Corpo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urkey) 达成综合性协议。尽管美国退出欧洲事务并不再参与洛桑会议的协商，但是全世界都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力。因此，土耳其人决定努力安抚或者软化包括美国在内的敌对国家。过去在第二立宪时期，一个由海军上将切斯特 (Admiral Chester) 率领的美国财团提出关于安纳托利亚铁路 99 年特权的协议。其条款规定，美国财团将负责建设和经营 2000 公里的铁路；作为报偿，将获得铁路两边 20 公里范围内的采矿权 (8000 平方千米的总面积)。4 月 9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这一议案。然而，这一条约并没有缔结；或许是因为，美国对该条约的热情主要在于从土耳其获得对摩苏尔的控制权和石油开采权。

伊兹密尔经济会议

这次会议于洛桑会议结束后两周 (1923 年 2 月 17 日至 3

月4日)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企业家、商人、工匠、工人和农民,卡泽姆·卡拉贝基尔任主席。凯末尔在开幕致辞中指出:经济胜利将给军事胜利以更长久的生命力;数百年来土耳其人民追随苏丹作战,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在新的土耳其国家,经济将被视为最重要的因素。他同时也申明,拒绝冒险主义的外交政策。1921年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演讲时,凯末尔已经提出他的基本外交理念,即外交政策要与国力相称。奥斯曼帝国已接受了伊斯兰主义,但没有能力予以贯彻,因此奥斯曼帝国陷入了泥潭而无法自拔。泛突厥主义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伊兹密尔会议决定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废除什一税。会议也试图制定新兴的土耳其经济发展所依据的原则。这次经济会议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加强与西方的关系;尽管实行同苏联友好协作的政策,但土耳其并没有打算偏离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

《洛桑条约》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外交谈判后,洛桑会议于1923年4月23日再次召开,并在三个月内达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最终于1923年7月24日签订了条约。这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问题。

边界和土地权利 《洛桑条约》批准了土耳其同叙利亚以及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高加索国家的边界。之前同法国签订的《富兰克林-布永协议》解决了前一个问题,同苏联签订的《卡尔斯条约》解决了后一个问题。《穆达尼亚停战协定》规定:土耳其应拥有东色雷斯。土耳其对西色雷斯的要求被拒绝;在爱琴海岛屿,伊姆罗斯岛(Imbros)、特内多斯

岛 (Tenedos) 和兔岛 (Tavshan) 留给了土耳其。剩余的爱琴海岛屿被割让给意大利和法国, 允许莱斯波斯岛 (Lesbos)、伊卡利亚岛 (Ikaria)、希俄斯岛 (Chios) 及萨摩斯岛 (Samos) 实现非军事化。土耳其在《国民公约》中对摩苏尔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以后由国际联盟来决定。

特许权 伊斯梅特帕厦接到政府的严格命令,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这一问题上让步。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斗争, 各缔约国接受“完全废除在土耳其的各项特许权”。

经济和金融问题 奥斯曼帝国的债务将按比例分给那些继承奥斯曼土地的国家, 并将分期支付。债券持有人对这些还款没有控制权和监督权。土耳其的债务到 1954 年偿清。土耳其承认 1914 年前给予的特权 (经营权)。关税方面做出让步, 将 1916 年的固定税率冻结 5 年。直到 1929 年, 土耳其才完全控制了自己的关税政策。

海峡 海峡管理将确保最大限度的自由通行。即使土耳其参战, 中立国家的船只和飞机也可以通过。此外, 海峡的毗邻地区将实行非军事化。海峡相关规定的实行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这些条款都是对土耳其主权的严格限制。

几年后, 当战争再次迫近欧洲时, 土耳其申请重新评估海峡问题, 最后通过 1936 年的《蒙特勒公约》 (the Montreux Convention); 土耳其的主权和独立获得承认, 国际海峡委员会 (the International Straits Commission) 被取消。因此, 土耳其重获对海峡的完全控制权,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与希腊相关的问题 这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

(1) 人口交换。决定交换土耳其境内的希腊少数民族和希腊境内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尽管强制迁移会带来明显的悲剧性

后果，但会议认为，鉴于他们之间的敌对程度，这两个民族不可能与作为人口多数的邻居和平相处。

土耳其有很好的理由支持这次人口交换。第一，人口交换将迁走西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的希腊人；他们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加入希腊军队，反对其所属的奥斯曼 - 土耳其。第二，黑海地区的希腊人从 1920 年 12 月到 1923 年初一直处于叛乱状态，而且很可能再次叛乱，或成为希腊再次入侵的借口。在希腊，土耳其少数民族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尽管这次人口交换是痛苦和不人道的，但确实缓和了当时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为两国未来的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当然，在独立战争期间，有很多不愿与敌人混在一起的希腊人，尤其是那些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希腊人；他们甚至脱离伊斯坦布尔费奈尔（Phanar/Fener）的希腊主教，而建立了土耳其的东正教。然而，在人口交换之后，埃夫蒂姆主教（Pope Eftim）连一个信徒都没有了。

总共有 130 万希腊人被迫从土耳其迁出，50 万土耳其人从希腊迁出。只有在西色雷斯的土耳其人和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幸免。根据他们的地位，新迁来的人得到了迁走者的地产和房产。农民得到了农田，店主得到了店铺，等等。

关于这一事件的一个有趣话题是，土耳其语是安纳托利亚中部希腊人的母语。他们很多人根本不说希腊语，但用希腊字母书写——这一结果就是众所周知的卡拉曼利（Karamanlika）。这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学。当伊万杰琳奥斯·米萨伊里德斯（Evangelinos Misailides）1871 年写就出版的《看看这个世界》（*Seyreyle Dünyayı/Behold the world*）一书用土耳其文再次出版时，一场论战爆发了。第一本土耳其语小说一般认为是谢姆

塞丁·萨米 (Şemsettin Sami) 的《塔拉特和费特纳特的相爱》(*Taaşşuk-u Talat ve Finat/Talat and Fünat falling in love*), 它于 1872 年出版。当米萨伊里德斯的小说再次印刷时, 土耳其文学界关于这是否为第一本土土耳其语小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那些母语是土耳其语的希腊人在适应希腊生活时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同样, 很多来自约阿尼纳和克里特岛的土耳其人以希腊语作为母语, 他们在适应土耳其的新生活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事实上, 似乎是宗教信仰而不是语言决定着他们的去留, 即种族中的宗教因素问题。

(2) 战争赔偿的要求。尽管土耳其的代表做了很多努力, 但对于希腊军队在安纳托利亚造成的破坏却没有得到赔偿; 主要理由是, 入侵期间积存的债务使希腊缺少资金。在会议即将结束时, 协约国和希腊提议转让埃迪尔内的卡拉阿奇 (Karaağaç) 地区, 以代替赔偿。伊斯梅特帕厦有心接受; 但赔偿问题成了伊斯梅特与总理劳夫激烈争论的焦点, 内阁也否决了这一提议。条约的签署因此被推迟。最后在凯末尔的干预下, 内阁才接受了协约国的提案, 条约也得以缔结。

(3) 费奈尔希腊主教区。土耳其想将主教区迁到其他国家, 但这一要求遭到拒绝。

1923 年 7 月 24 日, 《洛桑条约》正式签署。因此, 国际上普遍承认, 依赖外国的奥斯曼帝国终结了, 一个新的、独立的土耳其国家得以建立。同时, 用凯末尔的话来说, 《色佛尔条约》对土耳其的死刑判决失效了。自《克洛维茨条约》(1699) 始将土耳其人驱逐出欧洲的进程在东色雷斯停止了, 同时也消除了这一进程波及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的危险。在会议期间, 寇松侯爵曾告诉伊斯梅特帕厦, 即使土耳其人拒绝, 直到这些

提议再被一一提出，他都不会放弃。但是，阿塔图克的革命不仅长期阻止了这些提议再次出现在国际议程上，而且阻止了《色佛尔条约》的重现。

有人认为，从某些方面来看《洛桑条约》对土耳其来说是一场灾难。他们丧失了摩苏尔和西色雷斯，只保留了少数几个爱琴海岛屿，海峡被非军事化；这些过去曾是且现在仍被作为这一观点的证据。然而，这些理由没有严格的依据。洛桑会议是国力非常明确的国家之间巨大的历史性对抗，会议持续了五个半月；如果将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僵持期考虑进去，应该是八个月。当会谈无法进行下去时，其中一方必须做出让步，要不然就得回到战争状态。一个和平会议的参加者可能之后会说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一般来说要证明这一事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场谈判都是错综复杂的。客观地比较《色佛尔条约》与《洛桑条约》，任何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轻松而迅速地判定，《洛桑条约》对土耳其来说是胜利还是灾难。

共和国的建立

达成和平后，阿塔图克终于可以自由地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自相矛盾的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现在成了革命进程的最大障碍之一。尽管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过去成功地支持了民族斗争并且它的大部分成员仍支持凯末尔，但是被称为“第二集团”的反对派不可否认是保守和反动的；他们已经看出凯末尔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意图，暗中等待把他赶下台的机会。当作为世俗共和国进行改革时，如重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否大多数人仍将支持他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其独立战争中最亲密的盟友劳夫也认为，反对哈里发制是忘恩负义的。有关选举的

问题使这些反对者趋于公开化。

1922 年 12 月 2 日，三名议会代表提出了一个貌似无关紧要的法案：议会的候选人或者出生于现代土耳其境内，或者连续五年居住于他们的选区。如果这项法案获得通过，将使凯末尔失去作为国会候选人的资格，有效地终结他的政治生涯。因此，在一篇措辞尖锐的演讲中，凯末尔宣布了自己的基本动机；而且从那时起，不再那么谨慎，而是公开地宣布他的一些改革目标。在西安纳托利亚进行的一次持续一月之久的旅行中，凯末尔在伊兹密尔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折中的方法不可能完成革命。革命的法律必须优先于现行的法律。只要我们仍然活着，就不会放弃进行彻底变革的行动，我们已经开创的进步性变革就永远不会丧失动力。”

1923 年 4 月 1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自行解散，并举行新的选举。一些土耳其作家在比较第一届和第二届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时发现，前一届在保守的环境中有更多的“民主”，从而为辩论创造了一种更活跃的氛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正确的；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后一届议会由于其更进步的性质而更具民主性。那些保守派和反对派维护现状和沙里亚，从宗教教义角度反对平等（以争取女性的平等权为例）和知识自由，称他们为民主是值得怀疑的。

4 月 8 日，阿塔图克宣布了他的九项原则，总体上构成了他的竞选纲领。他强调主权在民，承诺世俗教育的统一体系，取消什一税，并缩短服役期。选举将于 8 月举行。在这一过渡期内，开始筹备建立人民党（the People's Party）；它于 1923 年 9 月 9 日正式成立。9 月 27 日在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记者的采访中，凯末尔透露了他建立共和国的计

划。10月2日，协约国军队撤离伊斯坦布尔。10月13日，议会通过了将安卡拉作为土耳其首都的法案。10月27日，费特希·奥克亚尔政府辞职。

成立新一届政府并不容易；每位新内阁部长都由议会单独选举，这会引发内阁的分裂和冲突。如果要建立共和国，总理就可以选择那些他认为合适的人担任部长，以避免将来无法协调工作。因此，共和国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解决这些技术性问题的实际途径，如废除苏丹制表面上已经解决了洛桑会议双重邀请产生的危机。然而，这些转折点（取消苏丹制和宣布成立共和国）的不朽成果和革命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阿塔图克公开宣称他将实行的政策具有革命性的特点，但他从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和场合以让所有人更容易接受这些政策。

1923年10月29日，1921年宪法做了必要的修正，土耳其成为共和国。已经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主席的凯末尔，以全票当选土耳其共和国第一届总统。他在就职演讲中说道：“未来的土耳其共和国将是幸运的、成功的、胜利的。”因此，继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之后，土耳其也成了共和国；但有一点不同：前几个国家是在溃败和战败的情况下做出它们的抉择，而土耳其则是在胜利和自由的环境下选择了共和国。

在欧洲，20世纪20年代是建立共和制和民主制的进步年代。然而，20世纪30年代则是反动主义、种族主义和专制独裁发展的年代。

第二十二章 废除哈里发，走向世俗主义

废除哈里发

废除哈里发有很多动机。例如，11世纪的伊斯兰教学者艾尔·马维尔蒂（El Maverdi）声称，只有古莱什（Oureish）部落的成员可以担任哈里发，但这是一个与奥斯曼王朝没有继承关系的部落。哈里发也被认为是低效的。例如，在一战期间，尽管奥斯曼苏丹-哈里发已向协约国宣布圣战，但并没能阻止汉志的埃米尔谢里夫·侯赛因（Sharif Hüseyin）与奥斯曼帝国的非穆斯林敌人联合反对奥斯曼的军队。

然而，废除哈里发最有力的理由是，最近的奥斯曼王朝成员既担任苏丹，又把持着哈里发一职。因此，哈里发是反共和与保守主义的潜在号召力和权力基础。取消哈里发制的议会法案宣布，剩余的奥斯曼王室成员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即废除哈里发制度首先要做的便是流放他们。

同样重要的是，这也是实现世俗化所必需的，因为没有一个是哈里发会同意建立世俗主义制度的措施；作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招致伊斯兰国家和国内反动派的愤怒和谴责。

此外，哈里发作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会给土耳其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带来许多问题。那时，除了伊朗和阿富汗外，所有伊斯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因此，哈里发对

领袖地位的宣称意味着其卷入帝国主义列强（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甚至苏联）事务的可能；反过来，这也会给这些国家干涉土耳其的事务提供借口。这一情形同阿塔图克慎重、民族主义及以和平为宗旨的外交政策直接相矛盾。这一外交政策以谨慎的不干涉政策为基础，禁止土耳其干涉他国内政，反之亦然。

很快，许多事件就表明哈里发很可能成为一个危险动荡的焦点。反动派刊物通过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哈里发制度和哈里发阿卜杜勒·迈吉德身上来煽动反革命情绪；后者正在小心翼翼地组织盛大的星期五祈祷仪式，并要求政府给予更多的拨款。报纸上刊登了一封来自阿加汗（Aga Khan）和阿米尔·阿里（Amir Ali）的信件，信中要求土耳其政府将哈里发置于主导穆斯林信心与尊严的地位，从而赋予土耳其力量和尊严。这被视为外来干预，在议会中引起了极大愤怒。

在议会投票前，阿塔图克认为权宜之计是确保军队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1924年2月15~22日，在伊兹密尔军事演习期间，兵团的指挥官们承诺支持废除哈里发的政策。1924年3月3日，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度，剩余的奥斯曼王朝成员被流放。如此，废除苏丹、建立共和国以及废除哈里发，阿塔图克这三项互补的革命性变革构成了土耳其新政治体制的基础。

同一天，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颁布了另外两部重要的法律。第一部是《教育统一法案》（*Tevhid - i Tedrisat*）；根据这项法案，所有学校被置于教育部的管辖之下。法律颁布后，所有的神学院和社区宗教学校都被关闭。如此，土耳其的教育都变成世俗的，尽管伊斯坦布尔仍保留了一些伊玛目 - 哈提甫学校

(îmam - Hatip schools) 和神学院，以培养旨在从事宗教工作的人员。国家支持教授特定行业技能的职业学校，就像培养工匠和公务员的学校。然而，现在伊玛目 - 哈提甫学校里学生的数量远远超出了国家的需要，这是对《教育统一法案》和世俗主义原则的公然漠视。

那天颁布的第二部法律废除了宗教事务部和总参谋部，以宗教事务委员会 (Directorate of Religious Affairs) 代替宗教事务部，总参谋部则置于国防部之下。这部法律的意义体现在：委员会和委员不参与决策，而是仅仅根据政府制定的政策运作；部长们参加内阁会议，因而不仅对自己的部门而且对所有部门都有决策权，即决定政府的所有政策。因此，一个宗教事务部部长会影响土耳其的宗教和教育政策，但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主任不能影响任何政策，甚至是与宗教直接相关的政策。很明显，这部法律背后的动机是阻止宗教团体和军事集团在政府中拥有任何话语权。这就使政府向世俗化和非军事化前进了一步。

世俗化进程

同其新政治结构一样，土耳其的世俗体系是通过一系列连续的改革实现的。随着哈里发的废除以及上述两部法律的颁布，1924 年 4 月 8 日宗教法庭也被废除了。宗教法庭只有唯一一名工作人员，即在伊斯兰法律中被称为卡迪 (Kadı) 的法官，他可能不具有与这一职位相称的教育资格。1925 年 11 月 30 日，苏菲教派 (Dervish Orders) 的所有活动以及对苏丹和酋长墓的参拜被法律禁止。然而，一些教派仍秘密活动；尽管这项法律到现在仍有效，但神秘的宗派仍然非常活跃和繁盛。

1926 年 2 月 17 日颁布的新的《民法典》，可以说是瑞士的

《民法典》和《债权法》的译本，内容稍有修改。于是，土耳其社会一举废除了伊斯兰教法，接受了现代法制。

沙里亚（Sharia/Şeriat）是随着伊斯兰教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法律体系。尽管它的基本原理是统一的，但对沙里亚的解释和应用随教派的不同而不同。例如，逊尼派穆斯林的教义有四个思想流派：哈纳菲、沙菲耶、马利基、罕百里，并且每个流派对沙里亚原则都有自己的解释。逊尼派土耳其人主要是哈纳菲派，它被认为是最自由的教派。

在其发展时期，沙里亚作为一个法律体系包含了适应当时需要的规则；与同时代的法律体系相比，其大部分内容都是进步的。然而，它在本质上是中世纪的法律体系。例如，允许奴隶制度存在；犯了通奸罪的女性要被活埋至腰部，并用石头砸死；窃贼的手会被砍掉；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女人，只需说“你们被休掉了”就可以解除婚姻，而妇女没有这项权利；男性继承全部的财产，而女性只能继承一半的财产；一位男性目击者的证词效力等同于两个女性的证词；体罚是可以接受的道德教育手段，而且男子可以因为妻子不听话而殴打她。根据这一原则，在某些情况下，体罚成为一种教育手段。因此，老师用来打学生的棍子和杖子（用于打脚底板的杖子）被认为是同黑板和粉笔一样的教学工具。

然而，伊斯兰教法的一个准则是：“审判标准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于是，在古典奥斯曼帝国时期（1450年以后），如果一个窃贼没有其他暴力犯罪是不能被砍手的，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也只有两个被石头砸死的例子。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使用欧洲的商法和刑法。但是，即使是第二立宪政府也没有权力修改伊斯兰教民法典，这成为沙里亚的堡垒。1917年，

统一进步协会政府通过了向世俗主义靠拢的《家庭法律条例》(*the Family Law Ordinance*)。但这在统一派倒台后迅速被废除。然而，统一派成功地废除了奴隶制。

《共和国民法典》(*the Civil Code of the Republic*) 的最大成就是在各个领域里确立了男女的平等权利。与此相反，如所有的中世纪法律体系一样，沙里亚认为女性是低等人类。在中世纪的欧洲，女性是否拥有完整灵魂是一个神学辩论话题；并且，如果女性比同辈人更雄辩和聪明，她可能被指控使用巫术，判定后就会被活活烧死。

1928 年 4 月 10 日，宪法中关于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共和国国教的条款被废除；9 年后的 1937 年 1 月 5 日，即凯末尔去世两年前，作为共和人民党六项原则之一的世俗主义被载入土耳其宪法。在 1927 年的大会中，世俗主义第一次被共和人民党接受；1931 年决定将世俗主义作为六项原则之一。尽管 1928 年成立了一个旨在改革穆斯林传统习俗的协会，但阿塔图克从未承认和关注其成果；他满足于将世俗主义作为一个同伊斯兰教相契合的概念。

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本质

随着共和国的建立，世俗主义成为阿塔图克革命的两大基石之一。宗教同社会事务相分离，因此，没有宗教、教派、教义和神秘派别能以任何方式影响社会事务或为自己谋取特权。此外，法律的实施同任何宗教和教派无关。

同样，共和国对任何宗教和宗派持公正态度，而且不介入宗教事务；尽管在某些情况下需要进行干涉，如当一个教派命令他的信徒献人祭或自杀时。在美国，基督教科学家认为《圣

经》或祷告是地球上所有疾病的解药，因此认为就医没有必要，甚至是有罪的。于是，尽管已有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很多得了病的信徒却因此丧命。如果孩子得了阑尾炎而他的家人拒绝就医，国家甚至世俗主义者都有权干涉。

尽管这是国家干涉的一部分，但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建立为逊尼派穆斯林在土耳其创造了两大优势。第一，它能监督逊尼派穆斯林的习俗和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因此或多或少地阻止了一些妨害世俗主义的行为。第二，它能确保村庄和社区不会因为争夺社区清真寺的控制权而引起不同团体和教派间的冲突。这种斗争会无限制地逐步升级；不论哪个团体或教派，只要得不到清真寺，就会发起行动寻找资源，以建立自己的清真寺。德国就有类似的例子。然而，在土耳其，因为这种情况处于宗教事务委员会的控制之下，清真寺是所有逊尼派宗派和团体做礼拜的公共场所。当然，宗教事务委员会需要注意其处理不同教派和宗教事务的方法。

一些亲沙里亚集团把世俗主义视为凯末尔对伊斯兰教犯下的罪行。然而，沙里亚是把伊斯兰教同中世纪和不发达国家联系起来的限制性条件。在土耳其，这一链条的断裂给伊斯兰教发展为当今世界和发达国家的宗教创造了机会。沙里亚的存在可能是土耳其（或其他伊斯兰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障碍。如果那些想把妇女关在家里的沙里亚拥护者禁止妇女工作，就将意味着一半的土耳其人不能参与到发展进程中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国家很少或几乎没有机会在发达和文明社会中取得一席之地。另一个负面因素是排斥女性参与社会生活，这一文化上的缺陷有害于整个社会。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工具是语言，最基本的教育步骤是母亲教孩子说话。在一个男性主导的

社会中，孩子们从母亲而不是父亲那里学习如何用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无论男孩女孩，一个只有 500 词汇量的母亲的孩子，明显不如一个词汇量更大的母亲的孩子。从基本的辩证逻辑发展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禁止妇女参与社会生活将对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产生消极的影响，包括那一半的男性。

世俗主义的更大好处在于，¹它能确保所有宗教团体间的平等，从而推动国内和平与发展。于是，它可以作为减轻阿拉维派 (Alevi) 和逊尼派穆斯林传统对抗的手段。1978 年在卡赫拉曼马拉什 (Kahramanmaraş)，一些穆斯林居民袭击了另一部分穆斯林居民，并将他们残忍杀害。尽管一些人认为这是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冲突，但参与这一事件的右派几乎都是逊尼派，左派都是阿拉维派。这表明，这一事件是两个教派间的冲突。这一事件从各方面说明共和国并不是充分公正和世俗化的。不幸的是，这样的事件时有发生；1995 年在伊斯坦布尔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

一些人认为，“有世俗的国家，但是没有世俗的穆斯林”。这当然是谬论。任何接受世俗主义的人都是世俗主义者，他们可能是穆斯林，可能是基督徒，也可能是其他信徒。多亏了土耳其革命，现在才会有很多世俗的穆斯林；如在接受世俗主义的穆斯林中，有很多人继续勤勉地遵守宗教义务。当启蒙革命发展时，世俗主义者的数量会增加；土耳其之所以能处于文明的中心地位，有赖于这一发展。如其他世界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传播甚远。它也有很多宗派和神秘派别，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睦友好地承认和尊重其他派别的信仰、习俗和权利，是伊斯兰教团结的必然要求。因此，世俗主义的伊斯兰教和其他教派或派别必须被同等看待，并被接受为新形式的伊斯兰教。

第二十三章 革命和反革命

1924 年宪法

1921 年宪法是内战和独立战争时期为处理当时的实际问题和紧急情况而制定的，但土耳其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完全确定。在废除苏丹和哈里发、建立共和国之后，需要制定一部更加完善的宪法，1924 年宪法由此诞生。它在一定程度上是 1921 年宪法统一立法和行政权力理念的延续。

大国民议会不仅被授予了否决政府和随时罢免现任部长的权力，而且在满四年届期之前可以自行解散。人民被赋予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并受相关法律的保护，但没有给予诸如罢工等社会权利。宪法中缺乏关于最高法院确定某些具体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条款。有意思的是，宪法草案中关于总统任期七年、总统有权解散议会以及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条款，被大国民议会否决了。因此，每次大选后（每四年一次），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都会选举新的总统，并保留总司令的权力。如果阿塔图克坚持，最初的宪法草案所提出的总统任期就可能通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坚持这一点。宪法于 1924 年 4 月 20 日生效。

进步共和党

新宪法的颁布为多党制的蓬勃发展开辟了道路，那些不赞

同当前事态发展的人也抓住了这次机会。除阿塔图克外，那些曾掌管阿玛西亚军事组织的人——凯泽姆·卡拉贝基尔、劳夫、雷费特和阿里·福阿德，现在都成了反对派的领袖。劳夫和雷费特是保守派；卡拉贝基尔和阿里·福阿德，尽管不那么保守，但也对凯末尔的激进政策感到担忧。或许，他们四个人都很怀念在阿玛西亚军事组织和独立战争时期，那时他们有着重要的作用。劳夫因没有被选为洛桑会议的土耳其代表而受挫，也因自己的意见没有对协商希腊赔偿问题产生影响而失望，所以，《洛桑条约》签订后不久，他便从内阁辞职了。在土耳其军队取得最后的胜利后，卡拉贝基尔和阿里·福阿德分别被任命为第一、第二集团军的监察长，他们同其他军团的指挥官一道被选进了议会。

卡拉贝基尔和阿里·福阿德分别于10月26日、10月30日从军队辞职，在大国民议会就职。凯末尔意识到一场反对运动正在酝酿，于是决定将军队从政治事务中分离出来。为了这一目的，他以个人名义要求七个集团军的指挥官辞去在大国民议会中的职务。其中，五个人同意他的要求；两个人辞去了军事职务而保留了议员职务，后来一人改变主意又回到了军队。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拒绝他们兼任议员的理由是他们没有完全交出指挥权。卡拉贝基尔和阿里·福阿德被迫返回原职，履行他们的军事职责。

1924年11月17日，进步共和党（the Progressive Republican Party）成立（11月10日，人民党在名字中加上“共和”一词，变成了共和人民党，进步党也这样做了）。卡拉贝基尔被选为党主席，阿德南·阿迪瓦尔（Adnan Adıvar）和劳夫被选为副主席，阿里·福阿德为秘书长。进步共和党得到了30位议员的

支持。他们将“尊重宗教观念和信仰”纳入党纲，这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但由于没有任何其他保守党存在，加上它比共和人民党偏右，从而可以吸引各种保守派和反动派。随着其第一分部在乌尔法（这是保守派的堡垒）建立，这一可能性日益增加。

谢赫·赛义德叛乱

1925年2月13日，谢赫·赛义德（the Sheikh Sait）叛乱在东安纳托利亚的宾格尔省（Bingöl）的皮兰村（Piran）爆发，并迅速席卷烈日（Lice/Lidje）地区。当叛乱扩张到穆什-瓦尔托（Muş - Varto）地区时，叛乱分子占领了埃拉泽市；3月7日，叛乱分子袭击了迪亚巴克尔。叛乱的领导者谢赫·赛义德是一个地主、部落首领及纳克什班迪派的成员，影响扩及其他部落。对于这次以沙里亚和哈里发名义发动的叛乱，费特希·奥克亚尔政府开始认为它是安保上的小漏洞，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然而，当叛兵打败了派来镇压他们的政府军时，情况的严重性变得明显了。面对日益严峻的威胁，费特希政府于1925年3月3日辞职，由伊斯梅特帕厦政府取代；后者要求并被大国民议会授予特别权力，大国民议会颁布了《维护秩序法》（Takrir-i Sükûn Kanunu）。独立法庭（the Courts of Independence）成立，反动派报纸被查封；在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后，叛乱最终于1925年5月31日被镇压。叛乱的领导者被审判处死；6月3日，进步共和党被取缔。

谢赫·赛义德叛乱源于宗教问题，似乎是一场反革命的封建运动。因为此次叛乱发生在库尔德人中间；而且，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于后穆德罗斯时期，当时首次成立了库尔德斯

坦进步协会 (the Kurdish Advancement Society), 因此叛乱包含民族主义的因素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实际上, 独立法庭认为库尔德斯坦进步协会的领袖赛义德·阿卜杜勒卡迪尔 (Seyyit Abdülkadir) 是这次叛乱的同谋, 并判处其死刑。然而, 一些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参与或领导叛乱, 这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此次叛乱是一场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¹ 民族主义的先决条件是关于现代民主公民权的共同意识; 在一个部落主义主导的社会结构中, 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或问题尚未出现。类似的情况也见于汉志的谢里夫·侯赛因起义。那是部落叛乱而不是民族主义运动, 这从两次叛军首领采用的口号即可判定: 它们都源于宗教或封建主题, 而不是民族主义主题。

根据《维持治安法》(Mete Tunçay), 阿塔图克时代进入了一党制模式。尽管这是重要的转折点, 但在 1925 年一党制模式并非不可避免。至少, 1930 年成立自由共和党的尝试表明, 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 阿塔图克仍抱有共和革命应发展多党制的希望。

这也暗示英国插手了叛乱, 尽管这在审判时没有被证明, 也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 那时土耳其为了摩苏尔的控制权正与英国斗争, 叛乱将土耳其置于了尴尬的境地。摩苏尔及其石油储备对英国来说非常重要, 这也必须考虑在内。

1925 年 2 月 17 日, 叛乱四天后,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取消了什一税; 这在伊兹密尔经济会议上已被提出并在原则上被接受, 它还被列入共和人民党的党纲。有人认为这是一项错误的政策, 因为当时什一税是收入匮乏的政府的主要财源。这样做在技术和财政上可能是正确的, 这项政策还废除了同样残酷的包税制。

当然，如果政府已用自己的征税制代替包税制，雇用政府官员代替包税人，财政弊端或许已被克服；但那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们仍旧怀疑政府组织是否到达了设立新税制的水平。因此，无论废除什一税和包税制对财政的影响如何，这都被赞为使农民摆脱千百年压迫的一场解放运动。

帽子改革——取消费兹帽

1925年8月23日，阿塔图克在全国巡回演讲到达卡斯塔莫努（Kastamonu）时，戴了一顶礼帽。尽管那些跟随的人遵照他的意愿也戴了礼帽，但他们感觉这种新服饰一点儿也不舒服；为了不称这种非穆斯林戴的帽子为礼帽，他们称它为遮阳帽。然而，阿塔图克在伊内博卢（黑海地区的城市）明确说：“这种帽子是礼帽。”11月25日，《帽子法》（Hat Law）颁布，规定废除费兹帽，而且所有的公务员都必须戴礼帽。从那时起，费兹帽便消失了；城里人戴礼帽，乡下人戴便帽。

对于那些没有意识到其历史意义的人来说，帽子改革不那么容易理解。帽子的象征性源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根据一个人所戴的帽子来确定他的身份：宗教信仰、职业和社会地位。例如，苏丹的所有宠臣、少数民族、宗教人士、苏丹亲兵或其他部队，在大街上都可以通过他们的帽子来区分。当人们去世时，他们的帽子被置于棺材的顶端，富有的家庭会把帽子的石雕作为墓碑立在亲人安息的地方。

礼帽被认为是只有非穆斯林才戴的东西；当马哈茂德二世下令公务人员和军队必须戴与希腊人类似的费兹帽时，人们称他为“异教徒苏丹”。现在，阿塔图克采取了一项类似但更大的措施。一些人将这场革新运动贬为“衣柜改革”（wardrobe

reform), 认为衣着爱好是肤浅而做作的, 对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当代形象和现代制度的建立。然而, 阿塔图克 8 月 24 日在卡斯塔莫努的演讲中说: “强大的文明之火会将漠视它的人烧成灰烬。” 他想使土耳其西化, 不仅在制度和精神上, 也在其社会形象上。这不是简单的模仿和虚伪的做法, 而是阻止《色佛尔条约》带来的灾难再次出现的另一个预防措施; 这是一个更容易被欧洲公众识别的标志, 即“我们是一个跟你们一样的民族。因此, 我们的国家不能也将不会成为殖民地”。这是传递这一信息非常实际和有效的方式; 尽管大多数的外国民众可能不那么在意另一个国家的发展, 但民族形象这一方面就不那么容易被忽视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帝国主义仍然很猖獗, 而无视国际联盟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只有几个欠发达的非欧洲国家能勉强维持独立: 埃塞俄比亚、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国和泰国。在这些国家中, 阿富汗(作为俄、英帝国主义的缓冲地带)和泰国(在英、法的扩张主义中发挥着类似的作用)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其他四个国家中, 三个国家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帝国主义践踏: 1931 年日本入侵中国; 1935 ~ 1936 年, 埃塞俄比亚成为意大利的殖民地; 1941 年, 苏联和英国达成了分别从北部和南部入侵伊朗的协议。

只有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独立, 这是因为它成功地传递出了“我们是欧洲人, 不会成为殖民地”的信息。帽子改革在传递这一信息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4 年, 墨索里尼发表的帝国主义宣言在土耳其引起了不安; 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和墨索里尼本人都向土耳其大使表示, 宣言涉及的问题并不针对土耳其, 因为土耳其是一个欧洲国家。

当然，帽子改革也向土耳其公众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土耳其将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这次改革也将土耳其从中世纪带到了当代。也有人反对改革，例如，在锡瓦斯、埃尔祖鲁姆、里泽和马拉什。这甚至成了伊斯基里普里·阿蒂夫·霍贾（İskilipli Atif Hoca）所建立的反现代主义秘密组织的标志，他因为反革命活动被独立法庭判处死刑。

刺杀阿塔图克

除上述《民法典》的影响外，1926年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有人企图刺杀阿塔图克。早在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就曾策划谋杀凯末尔，并雇佣了一个名为穆斯塔法·萨吉尔（Mustafa Sagir）的印度刺客；1921年，他们的阴谋被识破，萨吉尔也被处死。后来，居住在希腊的亚美尼亚恐怖分子雇用马诺科·马努基扬（Manok Manukyan）去谋杀阿塔图克；1925年他也被逮捕处死。1926年，拉兹斯坦的齐亚·胡尔希德（Ziya Hurşit of Lazistan）、伊兹密特的许克吕（Şükrü of İzmit）和埃斯谢希尔的阿里夫（Arif of Eskişehir）三名大国民议会的代表组织了一次暗杀行动，他们计划于6月15日在阿塔图克途经伊兹密特的凯梅拉尔特（Kemeraltı）地区时，用炸弹和手枪袭击他的汽车。刺客将乘坐克里特岛谢夫基（Şevki of Crete）的汽船逃往希腊斯岛（Chios）；当阿塔图克的访问被推迟到第二天时，他向当局揭发了这一阴谋。

很多人受到牵连，包括很多统一进步协会的前成员。很显然，尽管统一派的贾维德贝伊（Cavit Bey）没有参与策划这场谋杀，但他至少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很可能，老一辈的统一派虽说是民主-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但认为这场革命走得太远、

太快了。又或者，他们不满于自己被弃之一旁。由阿里·切廷卡亚 (Ali Çetinkaya) 负责的独立法庭下令进行全面调查。除了统一派，进步党的领导人也被逮捕；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试图阻止对后者的逮捕，结果他自己也差一点被拘禁。18 个人被处死，其中包括贾维德贝伊和多克托尔·纳泽姆 (Dococtor Nazim)。

发现的总共有五次暗杀行动。第四次来自哈哲·萨米 (Hacı Sami) 及其来自萨摩斯岛的同谋，他们于 1927 年被抓。第五次被认为是切尔克斯人埃特海姆所为，导致 5 人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地方被杀 (1935 年 10 月 21 日)。这些事件表明了土耳其敌人的实力，其目的是暗杀阿塔图克。出于安全问题的考虑，1919 年 5 月 19 日后，阿塔图克不再访问任何国家，只在 1927 年去过一次伊斯坦布尔。

1927 年阿塔图克写了一部详细的历史著作，记述了他对从 1919 年 5 月 19 日在萨姆松港下船到当时的一系列事件的看法。他可能感到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需要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评价。这一记录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并在短时间内写就，即著名的《大演讲》(Speech)；在那年 10 月，总共 6 天，每天 6 小时，他在共和人民党的第二次大会的开幕式上向众人宣读。它是记录 1919~1921 年这段时间的主要历史资料。在闭幕式上，阿塔图克向土耳其青年发表演说，并把共和国托付给他们。“青年”一词，无论从字面还是象征意义上看，都意味着革命主义。如众人所知，在整个 19 世纪，所有法国大革命推动的革命运动之前都加上一个形容词“青年”。其中最著名的有马志尼领导的“青年意大利党”的革命。当然，也有两代“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即纳米克·凯末尔时代的革命和统一进步协会时代的革命。

第二十四章 文化革命走向前台

字母改革

如上所述，阿塔图克的《大演讲》是共和国的一个转折点。到1927年，政治体制已经确立，世俗主义的基础也已很稳固。在关注国内政治和外交事务的同时，凯末尔将注意力转向文化事务，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经济的关注。

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措施是使用土耳其-罗马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项大胆而令人震惊的举措。

公元730年后不久，当土耳其人正创造一种书写文字并开始文学作品中使用时，他们接受了伊斯兰教。在改变信仰的过程中，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字母，开始使用阿拉伯字母。在1000多年后放弃阿拉伯字母看似奇怪，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是理性而符合逻辑的进步。

这项改革可行的原因有很多。一个原因是奥斯曼帝国在提高土耳其人的读写能力方面没有什么建树。1918年，尽管第二立宪时期进行了教育改革，但土耳其人的识字率刚刚超过5%。到1927年，识字率也只提高到10.7%。如果土耳其人的识字率达到了20%或25%，那么阿塔图克或许不会认为这是一项可行的改革。

改革的进一步实现或许在于奥斯曼图书馆里收藏的丰富的阿拉伯文手稿，这些手稿保留了大量中世纪的知识，而且毋庸

置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与 20 世纪的社会没有多大联系。19 世纪，奥斯曼人曾努力翻译西方作品，但由于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造成的奥斯曼语的复杂性，这些翻译作品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都是晦涩难懂的。变革字母是除去土耳其语中阿拉伯和波斯表达方式的一种很好的方法；由于采用土耳其 - 罗马字母写作，这些表达方式变得很不方便，而且没有了存在的希望。由于最近土耳其语的变化以及土耳其词汇和表达方式的丰富，即便大学毕业生也很难理解《大演讲》，就像很多讲英语的人很难理解莎士比亚的语言一样。阿塔图克及同僚效仿塔里克·本·齐亚德 (Tarik Bin Ziyad) 在前去进攻西班牙前烧船的做法，他们或许想切断土耳其同保存于奥斯曼图书馆的知识所体现出的中世纪精神之间的联系。

同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阿拉伯字母一点也不适合土耳其语；因为阿拉伯语辅音很多，元音很少，而土耳其语正好相反。例如，在阿拉伯语中，字母 T 有两种变化（发音和字母），H 有 3 种，Z 有 4 种，S 有 3 种，K 有 2 种；然而在土耳其语中，这些字母都只有一种形式。另外，阿拉伯语只有 3 个元音——A、U 和 I——而土耳其语有 8 种。因此，阿拉伯书面语很少使用元音（除了“A”的长音和《古兰经》里的元音）；尽管不是很难理解，但解释用阿拉伯字母写的土耳其文时就有问题了。例如，如果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gl”指的是土耳其单词，读者必须确定是 gal, gel, gil, gil, gol, göl, gul, gül 中的哪一个；而在阿拉伯语中，单词和音节就很容易确定，只有三个选项：gil, gul, gal。

民族主义因素在土耳其应有自己独特字母的决策中也具有一定影响力。（这也许解释了，尽管学习汉字书写很难，但中

国人仍拒绝考虑修改其书写语言。)当然,可以不用完全抛弃,而创造一种土耳其版本的阿拉伯字母;但在决意融入欧洲的背景下,1929年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被从高校课程中剔除出去。

字母改革的准备工作早在1928年就开始了。1月8日,司法部长马哈茂德·埃萨德(Mahmut Esat, Bozkurt)在安卡拉突厥之家发表关于罗马字母的演讲;5月2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使用国际通用数字的法律。这仅仅是第一步。阿塔图克选择在伊斯坦布尔开始他的字母改革运动;6月4日到达后,他便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一运动。然后,他从伊斯坦布尔出发开始巡游全国,先后抵达泰基尔达、布尔萨、查纳卡尔、加里波利、西诺普、萨姆松、阿玛西亚、托卡特、锡瓦斯、沙尔克什拉、开塞利等,最后于9月21日回到安卡拉。8月9日晚上,在伊斯坦布尔靠近托普卡帕宫的萨雷布尔诺公园(Sarayburnu Park),他解说字母改革对公众社会的意义,并参加了在多玛巴赫切宫举行的讨论新字母的研讨会。最后,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新字母的法律。自12月1日起,先是报纸和期刊,然后自1929年1月起,所有图书,必须用土耳其-罗马字母印刷。1929年1月1日,公立学校向成年人开放,以学习新的书面语;到1936年,250万人取得毕业证。字母改革迅速完成。

多党制的试验

1929年,阿塔图克同他的养女历史学家阿菲特·伊南(Afet İnan)合写了一本名为《公民知识》(*Civil Knowledge*)的书,该书后来成为中学公民课程的教材。尽管该书最初以伊南

的名义出版，但在 1969 年再版时加入了阿塔图克手稿的复印件，证明大部分内容出自阿塔图克之手。

在该书中，阿塔图克把民主政体描述为一种正在崛起的潮流，是现存最好的政治体制，必将普及全世界。他进一步指出，共和民主制是最成熟的形式，且优于君主立宪制。这一观点的记录直到今天也有重要的意义。阿塔图克因没有将民主制作为共和人民党的六项原则之一而受到批评。然而，这些原则中有一项——共和主义——是与上述观点相关的，从而证明这些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尽管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还不成熟，然而在 1930 年，阿塔图克认为应发展多党制，但应采取预防性措施确保新成立的政党不会为反革命提供机会。他让费特希·奥克亚尔（他是阿塔图克的朋友，当时任土耳其驻法国大使）负责筹建一个反对党。

同年 8 月，阿塔图克与费特希·奥克亚尔间的通信给费特希提供了书面支持；它实际上是一个合同，内容是阿塔图克完全支持这项事业。为求保险，阿塔图克令他的妹妹马克布莱（Makbule）和一些共和人民党代表加入了 1930 年 8 月 12 日成立的新的自由共和党（Free Republican Party, FRP，也称自由党）。他也承诺公正地对待两党。作为一名古典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和虔诚的个人主义者，艾哈迈德·阿加奥卢是自由共和党的二把手。

阿塔图克的目标是创立一种有利于探讨经济问题的环境，但无论如何不能危及革命。这一目标在 1930 年 8 月 30 日安卡拉—锡瓦斯铁路的开通仪式上得以强调；参考自由共和党对政府铁路建设项目的批评，伊斯梅特·伊诺努谈到共和人民党的温和国家主义。

1929年10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崩盘导致美国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随后传到欧洲，导致世界性的危机、失业和贫困。总体上讲，这对土耳其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农业部门；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出口额也急剧下降。由于贫困而绝望的人们更容易受到反动宣传的影响，有人说阿塔图克把支持多党制作为一种挽救经济衰退的方法。这可能是一个因素，但他的真正动机是实现民主化。事实上，在1930年8月前，很有可能是在1929年，阿塔图克已经做了有关这一行动的决定。

自由共和党的尝试很快遭到失败。反对派和那些严重受经济困境影响的人聚集在一起，却没有人听费特希·奥克亚尔维护革命原则的演讲；他对伊兹密尔的访问以暴力游行和血腥冲突而告终。共和人民党的官员对这些变化感到恐惧。1930年11月17日，费特希及其自由共和党的支持者意识到了事情的走向，从而结束了该党的活动。自由共和党只存在了三个月。一个月后，费特希·奥克亚尔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一如进步党解散时出现了谢赫·赛义德叛乱，自由共和党解散后也出现了反动事件。尽管自由共和党已被解散，但它似乎仍卷入了梅内门的叛乱事件。

1930年12月23日，苏菲修士穆罕默德（Dervish Mehmet）领导的纳克什班迪派的一些成员，从马尼萨游行到梅内门；每到一地，就用清真寺的绿旗召集一大批人。预备军官费赫米·库比拉伊（Fehmi Kubilay）到现场试图干涉，却被反动派枪杀，他的头颅被砍下挂在竿头示众。他的两名警卫员也被杀。随后叛乱被镇压，戒严令颁布，军事法庭成立，28人被判处死刑。

这些随进步共和党与自由共和党的成立而发生的事件表明，直到革命根基确立，多党制是不可能有效运行的。无论如何，

20 世纪 30 年代是民主制受到威胁的年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欧洲在盟国的帮助下摆脱法西斯专政。纵观这一时期，土耳其也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

人民家园

1931 年，阿塔图克热衷于建立名为人民之家和人民之屋 (People's Rooms and Houses) 的文化中心。梅内门事件 (the Menemen Incident) 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政策的实行，将他的部分注意力转移到文化事务上。库比拉伊被砍头示众这一中世纪行为的残酷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阿塔图克开始把文化发展作为一种应对方法。在 1931 年 4 月 10 日的一次大会上，突厥之家决定自行解散。尽管最初是作为文化中心而成立的，但当突厥之家变成反动派的温床时，毫无疑问政府和阿塔图克都支持这一决定。突厥之家的权力被移交给共和人民党；1932 年 2 月 19 日，以人民之家和人民之屋为名重新开放。到 1950 年，成立了 478 所人民之家和 4322 所人民之屋。人民之家有 9 个教育、社会和文化活动部门：(1) 语言、文学和历史部；(2) 美术部；(3) 戏剧部；(4) 体育部；(5) 社会福利部；(6) 人民教育课程部；(7) 出版物和图书馆部；(8) 农村福利部；(9) 博物馆和展览馆部。考虑到土耳其学校中缺少图书馆、音乐和戏剧器材，以及成人对文化设施的巨大需求，这些机构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研究

历史学是阿塔图克关注的另一个文化领域。尽管他已接受并支持某些历史观点，甚至写了一些作品，他在历史分析方面

的实验需要考虑到他的政治目的。

历史是帝国主义最有效的意识形态武器；经历过色佛尔的冲击和洛桑的威胁之后，重视历史对土耳其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共和国早期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恩维尔·齐亚·卡拉尔（Enver Ziya Karal）称这一时期的历史学为“国防历史学”（defence historiography）。西方帝国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希腊人的东色雷斯地区，一个希腊人的伊兹密尔 - 马尼萨 - 艾瓦勒克地区，以及亚美尼亚人的东安纳托利亚；他们的决定基于历史权利，却不顾占人口大多数的土耳其人。一种回应观点是强调安纳托利亚的历史而不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历史；认为赫梯人有土耳其的血统，他们的历史是土耳其历史的一部分，从而确立对这一地区的道德权利。

土耳其开始研究人类体格学来应对基于人体特征的种族主义理论，例如当时一些欧洲国家流行的关于人类头盖骨形状的理论。为回击土耳其人不是文明人的论点，土耳其学者研究中亚历史，并从中得出：中亚是土耳其人的发源地，也是文明的摇篮，世界大部分人口从这里兴起。在这一过程中，捏造了许多完全或部分想象的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当时在某些欧洲国家很流行，土耳其仅仅是其中的一支。阿塔图克也高度重视心理学，认为几百年来土耳其的失败产生了一种民族自卑感，这可能阻碍新的土耳其国家的重生和发展。因此，同致力于发展事业一样，他强调用过去取得的成就培养“自豪感”，并在未来建立一种新的“自信”和“信任感”。他可能认为，一定程度的幻想是国家伤痛必不可少的慰藉；他想参照“亚瑟王传奇”（the Arthurian Legends）创造一种神话，即便它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

如果说当代土耳其历史研究达到了比先前更高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塔图克的推动。正如在其他知识领域，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大受限制，主要是奥斯曼历史和伊斯兰教历史；后者集中于伊斯兰教的诞生和穆罕默德之后的四任阿拉伯哈里发。其他主题，如世界史、欧洲史和奥斯曼帝国之前的土耳其历史，完全被忽略；奥斯曼历史的主题集中在战争和王朝更替。在第二立宪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缺憾；由于阿塔图克，这一小小的开始转变为集中的努力，并产生了大量作品。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1931年4月15日，土耳其历史研究协会（the Turkish Society for Historical Studies）成立，即后来的土耳其历史协会（the Turkish Historical Society）。1932年7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土耳其历史大会，1937年召开第二次。

语言改革

有文化的上层阶级使用的奥斯曼语中含有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词句。一些奥斯曼宫廷诗歌与散文中满是阿拉伯和波斯表达方式，以致人们很难发现土耳其字母。由于从本质上说他们的语言是书面语，奥斯曼帝国并不担心大多数人识字；因为，对大多数土耳其人来说，连学习阅读和写作的机构都没有，更别说理解复杂的奥斯曼语言和文学了。结果，人们只说土耳其语。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当然熟悉奥斯曼语，但通常不包括妇女，甚至上层社会的妇女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对奥斯曼语一无所知，她们之间或同男性亲人之间只能使用土耳其语交流，别无选择。于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文盲，包括女性，使土耳其语存活下来，尽管它不是文化或文学语言。

随着 19 世纪中叶新闻业的发展，一种更易理解的、土耳其化的奥斯曼语开始形成。在 1897 年的奥斯曼 - 希腊战争期间，穆罕默德·埃明（Mehmet Emin, Yurdakul）用土耳其语写了一首至今仍很容易理解的爱国诗歌。尽管在第二立宪时期也取得了一些进步 [格卡尔普为萨洛尼卡的《青年作家》（*the Young Writers*）期刊写的文章就是这一时期不那么使用华丽辞藻的例子]，但像 1927 年写成的《大演讲》现在就不那么容易理解。将土耳其人从奥斯曼表达方式（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解放出来，是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并仍在持续的一项伟大事业。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the Turkish Society for Language Studies）于 1932 年 7 月 12 日建立，后改名为土耳其语言协会（the Turkish Language Society）。它的第一次大会于 1932 年 9 月 26 日召开；成立后不久，它就号召民众使用土耳其语做礼拜。阿塔图克也加入了语言改革的工作当中。他甚至一度用完全土耳其化的语言写公报和演讲稿，以致到现在许多人都不能完全理解他所使用的词语。

关于语言改革及它采用的“极端措施”，有很多说法和评论。土耳其语很容易被大多数公众理解，用它来替代晦涩难懂的奥斯曼表达方式也少受非议；但是，用一些土耳其语的新派生词代替人们熟知的奥斯曼同义词（例如，*okul* 替代 *mektep*，意指学校；*betik* 替代 *kitap*，意指书；*dinlence* 是 *tatil* 的同义词，意指假期）确实引起了保守派的批评。他们的理由是，这会使祖父母和父母无法同他们的子孙交流，并声称这是共产主义阴谋，将导致代际分歧并削弱土耳其社会。

受上述理由或其他理由的影响，政府时而会改变语言政策。例如，1945 年，根据当时的标准土耳其语修改了 1924 年宪法

的语言，此后宪法被称为“*Anayasa*”。1952年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又恢复到1924年的表述，“*Anayasa*”改回奥斯曼名称“*Teşkilat-i Esasiye Kanunu*”。在某些政府时期，国家控制的土耳其广播和电视（TRT, Turkish Radio and Television）曾试图阻止一些土耳其语的使用。尽管大部分政府漠视甚至反对改革土耳其语，这一进程主要靠文学界的努力得以继续。1980年9月12日政变前，土耳其语言协会是这一改革的最大推动者。

进行语言改革的动机有很多。第一个动机源于弥合政府与人民、精英与平民之间文化鸿沟的民主概念。当然，创造新土耳其词语来代替人们所熟知的阿拉伯和波斯同义词本质上是不民主的。第二个动机是希望创立一种精确和更易理解的语言。因此，改革不仅要寻找阿拉伯和波斯词语的土耳其语同义词，而且要寻找源于西方的词语和概念的同义词：*bilgisayar* 对应 *komputer*（计算机），*ilginç* 对应 *enteresan*（兴趣）。因此，人们希望土耳其语变成更加丰富和富有美学性的语言，以创作文学、哲学和科学作品。第三个动机是民族主义。很多土耳其人反对在他们的语言中出现外国词语，如阿拉伯语、波斯语、法语和英语，这是左派民族主义或阿塔图克主义的一个观点。右派民族主义者漠视甚至敌视语言改革。第四个动机是希望解除土耳其语同东方的中世纪文化的联系，从而将其从奥斯曼语中解放出来。很可能，保守派的敌意源于这种动机。

阿塔图克对历史学和语言学研究给予高度重视。显而易见，他建立的历史协会和语言协会是独立组织而不是政府机构，政府不能干预它们的工作。他把自己的个人遗产捐赠给这两个组织；这两个组织也证明它们对得起阿塔图克的信任，它们承担了许多项目，出版了很多为其赢得国际声誉的作品。非常不幸

的是，由于1980年9月12日的军事政变，这些组织变成了国家机构，并将阿塔图克的遗产重新分配给政府各部；这违反了宪法权利，辜负了阿塔图克的信任。很明显，当时政府国有化这些组织的目标是阻止语言改革进程，并用它们自己的机构提出和支持的官方意识形态（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替代凯末尔主义。然而，这并不那么成功。

在阿塔图克时期，土耳其不能在任何文化领域落后，从而兴起了许多发展戏剧和西方音乐的项目。1924年11月1日，音乐师范学校（Musiki Muallim Mektebi）在安卡拉成立。有才华的年轻音乐家被派往欧洲接受进一步教育。1936年，在著名的德国作曲家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和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Bela Bartok）的赞助下，安卡拉国家音乐学院（Ankara State Conservatory）成立。来自德国的卡尔·艾伯特（Carl Ebert）建立了戏剧和歌剧系；1940~1941年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开始走上舞台表演戏剧和歌剧。在1941年的毕业典礼上，教育部长哈桑·阿里·于杰尔（Hasan Ali Yucel）祝贺安卡拉国家音乐学院创造了新时期的土耳其人文主义。1941年，芭蕾舞学校（School of Ballet）成立。

大学

1827年，奥斯曼时代的第一所西式高等教育机构伊斯坦布尔医学院（İstanbul School of Medicine）成立。高等教育机构首先被当作职业学校。那时产生了将高等教育学科组织成大学的需要，这将是基础科研的中心；但这一方面的各种倡议很快便消失了，直到1900年科学院（the Darülfünun）成立才被重新提起。它是土耳其唯一的大学，直到1944年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

(İstanbul Technical University) 成立。(之前安卡拉有很多独立的院系,但直到 1946 年它们才并入大学。)由于科学院在很多方面被认为是不足的,所以邀请了瑞士教育专家阿尔伯特·马尔奇 (Albert Malche) 来研究并矫正这一情形。马尔奇的报告反映了对这一情形的批评。1933 年 1 月 30 日,纳粹掌权后,开始清除大学中的那些不符合其极权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学者 (犹太人、左派、民主人士等),而不管其价值和地位。土耳其利用了这一形势带来的机会。

1933 年 5 月 31 日,一项法律得以通过,将科学院关闭并建了新的伊斯坦布尔大学 (University of İstanbul)。151 名土耳其学者仅保留了 59 位;尽管他们中很多人丢了工作,但随后又在政府机构中得到了职位。同时,他们邀请被从德国大学清除出来的学者加盟这些院系;总共接收了 142 名学者。他们是一些领域的专家,如动物学、苏美尔文明、法律、哲学、经济学、物理学、医学等领域的教授。很多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一时间,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一所日耳曼大学在土耳其成立了。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一直待到 1945 年,有几位甚至待了更长的时间。他们中多数人学习了土耳其语,并很快不需翻译也可以进行授课。毫无疑问,他们的努力为当代土耳其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十五章 经济和政治发展

意识形态和期刊

阿塔图克对自由共和党试验失败的反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集中加强一党制，相关措施包括：关闭突厥之家，建立共和人民党辖下的人民之家，结束共济会（the Masonic Lodges）的活动，等等。在共和人民党第三次大会上，阿塔图克被宣布为终身主席。另一方面，在意识到不能只关注政治舞台后，阿塔图克开始积极鼓励文字世界的多样化发展。

《卡德罗》（*Kadro*）是这一时期（从1932年1月到1935年1月）的期刊之一。其创办者包括谢夫凯特·叙雷亚·艾德米尔（Şevket Süreyya Aydemir）、伊斯梅尔·徐斯雷夫·托金（İsmail Hüsrev Tökin）、亚库普·卡德里·卡拉奥斯曼奥卢、布尔汗·贝尔盖（Burhan Belge）和维达特·尼迪姆·托尔（Vedat Nedim Tör）。他们中有三人（托金、艾德米尔和托尔）早期是共产主义者。艾德米尔与瓦拉·努雷丁（Vala Nurettin）和后来著名的左派诗人纳泽姆·希克梅特（Nazım Hikmet）一样，独立战争时曾在莫斯科的一所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回到土耳其后，他曾为共产主义期刊《光明报》（*Aydınlık*）工作，并因此被判处了一段时间的监禁。后来他通过政治大赦出狱并担任公职。

《卡德罗》旨在成为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平台。凯

末尔主义意识形态基于一种假设，即世界基本的社会政治冲突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而是富有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因为发达国家能将从它们的殖民地剥削来的赃物分给它们自己的工人阶级。民族独立运动是解决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之间冲突的唯一方法。土耳其的独立战争和凯末尔主义构成了这些运动发展的一种模式。《卡德罗》也支持国家主义理论。国家主义认为，尽管阶级斗争在土耳其并没有完全出现，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斗争肯定会出现；但是，凯末尔主义可以通过实行国家主义政策防止阶级斗争在土耳其立足。

1932年6月到1934年5月出版的另一本期刊是艾哈迈德·哈姆迪·巴萨尔 (Ahmet Hamdi Başar) 创办的《合作社》(*Kooperatif*)。20世纪20年代，巴萨尔曾尝试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一个穆斯林商会，但他关于土耳其社会结构和发展战略非正统的原创观点使各届政府都不待见。他后来成为民主党 (Demokrat Parti) 的创始人之一，但其思想在该党中仍无法获得认可。他的期刊《合作社》解释了农业社的原因，倡导建立合作社。他的主要观点是，作为土耳其最大消费群体的农民不应为工业发展埋单；国内企业质量低、价格高，又通过高关税避免外国的竞争。

第三本期刊是1933年10月至1940年由许塞因·贾希德·亚尔琴 (Hüseyin Cahit Yalçın) 出版的《知识分子运动》(*Fikir Hareketlei*)。它以欧洲为中心支持自由民主制，努力反映当时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法西斯主义 (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 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由于土耳其也受这些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上述三本期刊的专栏作家和为日报写专栏的自由派人士艾哈迈德·阿加奥卢，互相猛烈地

攻击对方的观点。许多土耳其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受到了这股潮流的影响，因而认为凯末尔主义本身应该提升为意识形态；共和人民党的第三次大会（1931年5月10日）接受了六项原则。

1931年成为共和人民党秘书长的雷杰普·佩克尔（Recep Peker），在1932年访问意大利时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阿塔图克的秘书哈桑·里扎·索亚克（Hasan Rıza Soyak）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当雷杰普·佩克尔回来时，他甚至建议改变共和人民党的计划和管理模式，以使其同纳粹主义接轨。他交给伊诺努的报告后来被呈给阿塔图克，阿塔图克很鄙视这种做法并拒绝了他的要求。

在共和人民党基层工作多年后，赫夫泽·奥古兹·贝卡塔（Hıfzı Oğuz Bekata）开始通过其创办于1933年的《时代》（Çığır）期刊来影响年轻一代。一开始他的主题受极权主义的影响，他认为需要成立一个共和人民党的青年组织。尽管共和人民党在1935年会议上原则性地接受了这一理念，但这一计划从未付诸实施。

尽管共和人民党受欧洲泛滥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或由于某些方面的吸引力，它有时会倾向于极权主义原则，但从未为其所控。显而易见，阿塔图克自己是这一发展的主要阻挠者，1935年关闭《卡德罗》就是一个例子。《卡德罗》持坚定的反个人主义立场，日益反民主，甚至用凯末尔主义的名义为自己辩护。阿塔图克非常生气，要求其负责人卡拉奥斯曼奥卢停刊。（卡拉奥斯曼奥卢是著名的小说家，后来被任命为土耳其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在坚持极权主义的同时，它援引土耳其的独立战争作为殖民地的模式，这也同阿

塔图克谨慎的外交政策相悖。

1936年6月15日，阿塔图克免去雷杰普·佩克尔共和人民党秘书长的职务，这是一个暗示从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转变的事件。此后，内政部长自动履行了共和人民党秘书长的职务，各省的省长也成为共和人民党省一级支部的领导人，这一举动令人们想起了德国纳粹党吞并政府时的情形。然而，共和人民党的历史学家和议员法希尔·吉里特利奥卢（Fahir Giritlioğlu）认为，土耳其不是转变为极权主义国家；相反，共和人民党被整合进官僚机构，并因此丧失了权力。在极权主义国家，政党组织渗入并控制所有的国家机关以及公民和社会机构；阿塔图克时期正好相反，共和人民党的组织在某些地区是如此薄弱，几近不存在。

凯末尔主义区别于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对妇女权利的强调。法西斯主义理想的女性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作为母亲和家庭主妇，土耳其共和国则为培养出女大学生感到非常骄傲。所有的报纸大力宣传土耳其各行业出现的第一位职业女性：第一位女律师（1927年）、法官（1930年）、市议员、牙医和医生（1926年）、飞行员、大使（1932年）以及国会议员（1935年）。在1935年的选举中，18名女性当选为议员；这仅仅发生在土耳其妇女被赋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年后。这在很多欧洲国家，包括那些有长期民主传统的国家，也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正因为共和人民党的政策，今天土耳其职场上才可能有比许多发达国家还多的职业女性。

伊斯梅特·伊诺努在1923年至1924年担任总理，然后从1925年到1937年一直担任该职，最终于1937年10月25日不得不辞职。那时土耳其力求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生存，因此，

作为第一次和第二次伊诺努战役胜利的指挥官以及《穆达尼亚停战协定》和《洛桑条约》的缔造者，伊诺努被授予共和国政治管理大权似乎是很自然的。因此，历史学家谢夫凯特·叙雷亚·艾德米尔曾称阿塔图克为“独一无二的”人，伊诺努则被称为“第二”人。这两大强势人物多年来和谐共处，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土耳其，也表明了他们之间的高度默契。当然，在外交和经济政策（伊诺努比阿塔图克更拥护国家主义）方面，他们不是没有分歧。长年的共同工作可能导致他们的关系趋于恶化，而且阿塔图克生病后更易动怒，从而使情形更加糟糕。实际上，阿塔图克肝硬化的症状第一次发生在1936年。最终，他们于1937年分道扬镳；而且，在阿塔图克去世前一年，杰拉尔·巴亚尔担任总理。到1938年，阿塔图克已经没有什么精力过问政治，显然他把自己日益衰竭的精力集中在哈塔伊问题上。

阿塔图克时期的外交政策

1931年，阿塔图克第一次用“国内和平、世界和平”（Peace at home, peace in the world）概括他对外交事务的态度；其外交政策始终坚持这一思路。实现完全独立以前，土耳其被迫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但这些外交政策是完全以和平为宗旨的。例如，从1926年起，由于摩苏尔问题而恶化的土耳其与英国的关系开始有所改善，并以1936年英王爱德华八世的非正式访问而达到顶峰。

尽管苏联是共产主义政权，但土耳其却与苏联保持着一种友好的关系；这通过1921年《莫斯科条约》（Moscow Treaty）和1925年《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Friendship and Non-

Aggression Treaty) 的签订得以加强。1932 年土耳其加入国际联盟时, 曾向苏联保证这不会影响土耳其对苏联的友好政策。实际上, 苏联自己也很快对国联采取积极态度, 并于 1934 年加入。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人们普遍担心意大利的扩张主义。这导致土耳其与其他巴尔干国家 (包括希腊) 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30 年韦尼泽洛斯正式访问安卡拉, 并与阿塔图克举行了会谈; 1934 年, 土耳其、罗马尼亚、希腊和南斯拉夫在雅典签署了《巴尔干公约》(the Balkan Entente)。保加利亚由于不满《纳依条约》(the Treaty of Neuilly) 而未参与, 但仍保持与土耳其的友好关系。

当战争即将到来时, 海峡非军事化的不公平性日益明显, 其安全成为最重要的问题。1936 年, 土耳其申请重新考虑洛桑会议搁置下来的海峡主权问题。那年在瑞士的蒙特勒镇举行了一次会议, 并达成了一个条约; 据此, 土耳其对海峡的主权及保护海峡的权利得到认可, 国际海峡委员会解散。

尽管在《国民公约》划定的土耳其国界内且其人口大部分是土耳其人, 但《安卡拉条约》(the Treaty of Ankara) 并没有将哈塔伊省 (包括安提阿和亚历山大勒塔) 划归土耳其。一个独立于叙利亚的特殊政权建立, 以保护土耳其人的权利。1936 年, 当法国同意三年内结束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时, 哈塔伊问题再次出现。土耳其向国联提出申请, 请求允许哈塔伊决定自己的未来。根据大会协商的结果, 1938 年 9 月 2 日举行公民投票, 哈塔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建立。塔伊富尔·舒克曼 (Tayfur Sökmen) 被选为总统, 阿卜杜勒拉赫曼·梅莱克 (Abdurrahman Melek) 当选总理。1939 年 6 月 23 日, 土耳其凭借其与法国签订的条约吞并了哈塔伊。

阿塔图克时期的经济政策

新共和国的经济，不仅饱受战争的蹂躏，而且农业和工业都很落后。从阿塔图克时期一开始，甚至在国家主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原则之前，国家就在鼓励和支持私营企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例子是1927年5月28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的《鼓励工业发展法》（the Law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Industry）。根据《洛桑条约》的规定，关税被冻结到1929年，这限制了政府对国内产品的保护范围。然而，低利率的贷款由工业银行（İş Bankası）提供给私营企业，这个银行是由1924年印度穆斯林支持独立战争的资金建立的。1925年成立的土耳其工矿银行（Türkiye Sanayi ve Maadin Bankası）用来组织发展国有企业，如从奥斯曼帝国继承来的工矿企业；同年颁布了一部建立制糖厂的法律。在此期间和国家主义被正式采纳为国家政策之前，很多可能受国家支持的纺织厂由私营企业建立。1929年之后，国家通过提高进口关税率来确保对国内企业进行更有效的保护，无论是国有的还是私营的。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特点是外国投资的国有化。那时，土耳其人仍受《色佛尔条约》后遗症的影响，对条约对土耳其独立造成的威胁仍然记忆犹新。甚至在《洛桑条约》之后，西方帝国主义仍被认为是主要的威胁；而且，共和国的管理者敏锐地意识到，外国投资可能成为扩张主义的一个桥头堡。因此，提供公共服务的外国企业，如铁路、码头、自来水厂、电力和煤气设备企业，一有机会就被国有化了，世界经济衰退也推动了这一策略的实施。

这一时期的第三个特点是优先关注铁路建设，这在国家极

其有限的资源中占了很大份额。1923 年有 3350 公里铁路；到 1939 年，又建设了另外 3000 公里的铁路。这一时期建设的铁路包括：安卡拉—开塞利—锡瓦斯—埃尔祖鲁姆线、萨姆松—锡瓦斯线、宗古尔达克—迪亚巴克尔线、巴勒克埃西尔—屈塔西亚线、开塞利—乌卢克什拉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土耳其集中精力建设高速公路。因此，铁路建设几乎被荒废；但在阿塔图克时期，铁路是优先选择，因为蒸汽机需要的煤炭是一种国内资源。优先关注高速公路建设将提高对石油的需求，这反过来也产生了一种进口依赖型经济，这在战时尤其不利。此外，一旦安纳托利亚被侵，破坏铁路比破坏高速公路更容易阻击敌人的前进。二战前的一段时间，这些是阿塔图克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战争爆发时，实施这些措施的必要性就更显而易见了。当然，这些措施不仅为预防一般的战争，更是为应对帝国主义针对土耳其的具体行动。

这一时期的第四个特点是，所有企业都承诺尽量少使用外国贷款，即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内资本。同时，土耳其货币在整个这一时期都很稳定；由于诸如赤字开支等措施没有被采用，因此通货膨胀几乎不存在。现在土耳其民众已经熟悉了通货膨胀，并且已适应了其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和社会影响。保持来之不易的独立以及防止外来干涉，是依靠国内资本政策背后的原因；只有在真正必要的时候才使用少量的外国贷款。

经济学家科尔库特·博拉塔夫 (Korkut Boratav) 将这一时期区分为三个子阶段。

(1) 1923 ~ 1929 年。这一时期进口秩序井然，且私有企业得到鼓励。这一时期的经济对进口开放；由于关税被《洛桑条约》冻结直到 1929 年，因此关税不能给予国内产品有效

的保护。

(2) 1930 ~ 1932 年。这一时期是过渡时期。在这期间土耳其采取了保护政策来支持私有企业的发展，在土耳其市场上国内产品代替了进口产品。工业化是以私有企业为基础的，多亏了海关独立，国内生产的产品才可以避免国外的竞争。由于这些发展，进口替代的趋势开始。然而，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使依赖于私有企业的土耳其工业难以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因此，受苏联的鼓舞，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开始出现。

(3) 1933 ~ 1939 年。土耳其着手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得到繁荣发展，并建立了很多工厂，例如，马拉蒂亚 (Malatya)、开塞利、埃雷利、纳兹利和布尔萨的纺织厂；盖姆利克的缫丝厂；伊斯坦布尔的玻璃和皮具制造厂；伊兹密特的造纸厂；卡拉比克 (Karabük) 的钢铁厂；埃斯基谢希尔的制糖厂；开塞利的飞机制造厂。1933 年建立的苏美尔银行 (Sümerbank) 是工业化的领导机构。1935 年，建立了矿冶研究所 (Maden Tetkik Arama) 和赫梯银行 (the Hittite Bank)，来资助和发展采矿业。然而，1936 年，正当第二个五年工业发展计划将要开展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阻止了它的实施。(在二战期间，土耳其军队从 12 万扩充到 150 万人。) 从 1930 年到 1939 年，土耳其工业的平均增长率为 11.6%，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水平。1929 年，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是 11%，1939 年达到 18%。这些发展的实现，使用了极少的外国贷款，因而没有产生贸易逆差。所以，土耳其的工业基础得以建立。

第二十六章 对阿塔图克及其革命的评价

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很少有人能像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土耳其那样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潮流和人民的生活。他既是军人又是政治家，是反抗协约国集团的独立战争和反对君主制的国内战争的军事及政治领袖，而且两者都取得了胜利。他的领导不仅使土耳其脱离了分裂和亡国的进程，而且使土耳其在洛桑会议上成为与欧洲诸国同享合法地位的独立国家。他终结了古老的奥斯曼帝国，又接着建立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在建立现代土耳其社会的过程中，他成为革命性变革的导师，创造了新的字母、大学和立法体系，影响了艺术、宗教及性别关系。因此，土耳其人抑制不住对他的深厚感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他的客观评价。在阿塔图克去世已过半个多世纪后，时间的久远将会促成客观的评价，以克服近年来兴起的负面批评。

这些批评有两个来源：一是亲沙里亚（pro-Sharia）集团，二是“公民社会”和“第二代共和人士”（second republicans）。后者认为阿塔图克应对1980年“9·12”军事政变的镇压措施负责，仅仅因为这些活动是以凯末尔主义的名义进行的，而公然不顾这些政策与凯末尔主义原则相矛盾的事实。他们继续以相同的方式谴责早前1960年5月27日和1971年3月12日的军事政变。这些集团认为它们是民主的真正捍卫者，并以某种方式成功地同亲沙里亚集团建立统一战线。它们采用巧妙的语言

和心理方法将阿塔图克的业绩混同于9月政变的行凶者，从而否定凯末尔主义运动的革命特征，将其简化到普通军事政变的地位。

要真正理解阿塔图克运动，第一步是明确它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凯末尔主义革命不是军事强人采取的一系列专制措施，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改革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而且在他去世后很快就会被推翻。然而，在半个世纪后，阿塔图克革命依然坚立不倒，这表明它表达了并基于土耳其人民所理解和共同支持的动机，因此它或许可以被称作土耳其革命。

发动革命的必要性前面已有论述。色佛尔会议后，土耳其人民惊恐地发现他们被赶出了鲁米利亚，而且将他们驱逐出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的不可阻挡的进程也将开始。如果土耳其人满足于1922年的胜利和《洛桑条约》，这一进程一有机会就可能重启。事实上，寇松侯爵曾明确提醒伊斯梅特帕厦，事情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为阻止这一进程以及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土耳其人必须变成欧洲人。

革命的必要性已经确定，尚需明确其本质。这不仅仅是阐释六项原则或箭头（共和人民党的标志），还要分析革命特征的三个方面。

革命的哲学特征

在哲学层面上，凯末尔主义革命是一场启蒙运动，是一项文化和知识变革的教育事业，旨在将国家从中世纪带入新时代。它效仿并受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启发；后者以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为基础，植根于希腊-罗马文化。凯末尔主义革命作为

一场启蒙运动，在苏阿特·西那诺卢 (Suat Sinanoğlu) 的《土耳其人文主义》(*Turkish Humanism*, 1980 年) 一书中得到了最好、最全面的解释；其中人文主义被定义为“无限的思想自由”，即人类知识不受任何教义或超自然观念的限制。保守派对民族身份丢失和复制外国价值观的担忧在此情境下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外国价值观的复制在思想解放的社会是无法实现的。这样的社会将发展自己的认同和特点。人文主义者支持积极的价值观，如对人类、自然、艺术和国家的热爱。阿塔图克既是人文主义者，又是政治家，他的行动即是证明：即使在解放战争最危急的时候，他也反对发动圣战；对于战败被俘的敌军总司令特里库皮斯，他以礼相待；拒绝从希腊国旗上走过；他曾公开表达对在加里波利战败的澳新军团 (Anzac) 士兵的尊敬与同情。当极权主义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盛行时，尽管他圈子里的很多人都受影响，但阿塔图克完全反对这种意识形态，并邀请被从德国清除出来的自由主义者、犹太人和左派学者来土耳其。

凯末尔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模式

革命的发展政策是一个整体，即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单纯引进技术、机器、设备、仪器和工厂对发展来说是不够的，因为创造这种技术的原动力是西方科学；不了解科学，任何技术进步都将是无根基的、不实际的。因此，要完全掌握这种技术，学习科学知识是必需的。

在最高层面上，科学近似于哲学。因此，土耳其也必须吸收西方哲学及其所属的人文科学，还有社会科学。然而，要想使哲学繁荣发展，它同艺术和文化的关系就不应该被忽视。所

以，技术、科学、哲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个人和机构不应受社会、政治及宗教教义的限制，思想自由，尊重科学、文化和艺术以及在这些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对于发展来说是本质性的。

根据凯末尔的整体发展观，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建立同锡瓦斯—埃尔祖鲁姆铁路的建设是同样重要的事件；建立音乐学院与创造新字母同建设纳兹利纺织厂或埃斯基谢尔制糖厂一样重要。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对阿塔图克来说，文化事务相比之下可能更有意义。

同作为对立面的物质主义的发展相比，整体发展可能更容易理解。某些石油丰富的阿拉伯酋长国即是参照。由于有石油资本，这些国家能够进口技术、汽车、飞机、计算机；事实上，当海水被处理成饮用水和农业用水时，所有工厂都能在沙漠上繁荣起来。然而，尽管这些国家享受着 21 世纪技术带来的好处，但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体制基本仍停留在第一个千年。进口的技术和其他科学设备没能使他们的民族整体上进入现代时期或建立现代社会。

1950 年以后，尽管不像这些阿拉伯国家那么糟糕，但土耳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放弃了整体发展的思路，从而陷入了物质主义的发展模式。从那以后，土耳其重视高速公路—大坝—工厂建设项目，文化和社会发展则退居其次。

阿塔图克的意识形态：六项原则

阿塔图克及其共和人民党的六个箭头——世俗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革命主义和平民主义——前两个已详细介绍过，共和主义不仅是阿塔图克心中的政府体制，而

且是民主的理想形式。事实上，当极权主义在欧洲兴起时，阿塔图克拒绝采纳法西斯主义，坚持其民主原则，因此土耳其相对来说比一般的欧洲国家更民主。正因如此，142 名被德国大学开除的学者喜欢到土耳其避难。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科学界的精英如此无知和绝望，以至于他们离开一个独裁政府又来到另一个专制国家。

从那时起，土耳其的民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没有达到欧洲民主的水平。因此，欧洲人和很多土耳其人批评土耳其的民主，并发现它的很多缺陷。

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的理想状态是和平共处。它宣布放弃侵略和领土扩张政策，阿塔图克将此哲学概括为“国内和平、世界和平”。

民族主义也与种族主义无关。他在宣言中提到，“说自己是土耳其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阿塔图克用了“说”而不是“是”，这表明：土耳其共和国的所有公民都是土耳其人，无论他们是希腊人、切尔克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及阿拉伯人。

凯末尔的民族主义不是右倾的，也不是保守的。它不集中在地区强权或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右翼民族主义的野心则一般局限在地区事务，并强调经济、政治及军事目的。根据凯末尔的民族主义，土耳其应该同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并驾齐驱，无论是人文、文学和艺术、人权和科学，还是军事和经济事务。

革命主义 凯末尔主义革命是通过整体发展的有效政策将启蒙传播到整个土耳其和全体人民的一种方式。这一长期目标尚未实现，但只是迟早的事情。到那时，革命主义仍将是土耳其的议程，并需要以热情和毅力来追求革命目标。

平民主义 平民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为了保护人民、推动福利，这不应同为了赢得选举而取悦民主或拉选票的方式相混淆。“人民”的概念可以包含所有阶级和社会团体，但主要指包括农民、工人和所有低收入人群在内的弱势群体。平民主义旨在提高各个层面的标准，从而实现物质和文化的社会公义。

直到1945年，阿塔图克革命仍旧在一党制的有利环境中发展。当然，在这种环境中，更容易实施那些刚开始不受欢迎但后来被认为具有长期效益的项目。必须承认，在多党制的环境中，反对拉选票却同时支持平民主义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一旦革命普遍发展并获得民意支持，在这样的环境中仍能取得进步。然而，土耳其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来维护改革，哪怕它不掌权；而且，所有党派都应该在原则上予以支持。

国家主义（国家直接干预经济） 国家主义是从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政策。20世纪20年代，新兴的土耳其资产阶级不能单靠自己实现工业发展；此外，土耳其经济也受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家主义被用来缓解这种状况；而且，由于这些相应的政策，阿塔图克时期及之后的年代建立了扎实的工业基础。进一步说，其效益还体现在为受雇于政府企业的工人提供住房、学校、社会和文化环境，即国家的社会功能得以确立；直到1980年，国家主义满足了他们大部分的需求。

国有企业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20世纪80年代，一场世界范围的非国有化运动兴起，并因苏联解体而得势。不仅在前共产主义国家，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努力依然且仍将继续。

至于土耳其，尽管其资产阶级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仍不如发达国家那样强大。因此，国家主义仍保持其功效。

与公众的观点相反，国有企业未必是低效而无利的；政府有能力使国有企业变得高效。如果政府允许它的企业负担不必要的债务，没有进行必要的投资，雇用了多余的人员或没有雇用有效的管理人员，那么这明显缺乏使这些企业赢利和变得高效的动机。今天，如果国家垄断的特克勒（Tekel）公司能够为每个谷物商店提供拉克酒（Rakı）而不能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啤酒和火柴，肯定有潜在的动机。这个动机便是政府希望由私营企业生产啤酒和火柴，才更容易销售出去；然而，只有特克勒公司生产拉克酒，才可以恰当地分配与生产。

支持国有企业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无论有多少选民认为国有企业不盈利，但公共调查表明它们创造了就业机会。因此，土耳其选民不可能支持希望扩大私有化的政党。这也增加了激进党派获得选票的可能性，并通过反对票而受益；这一点儿也不利于土耳其民主制的发展。至少，直到土耳其经济发展到与欧洲同样的水平，国家主义仍需存在；这是因为全面私有化与多党制之间的关系很难调和。

第四部分

伊斯梅特·伊诺努和他的多党制

第二十七章 战前和战争年代； 伊诺努时代

伊诺努总统

1938年11月10日，世界史上的伟大人物和土耳其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去世。大约一年前，他已经任命杰拉尔·巴亚尔为总理，结束了自1925年以来阿塔图克担任总统、伊诺努担任总理的阿塔图克-伊诺努政府。假如伊诺努还是总理，他继任阿塔图克总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他们之间关系的疏远，一些人对此还是心存怀疑的。在阿塔图克患病晚期，两名内阁成员内政部长苏库鲁·卡亚（Sükrü Kaya）和外交部长陶菲克·鲁斯图·阿拉斯（Tevfik Rüştü Aras）反对伊诺努担任总统，并同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主席阿布迪尔哈勒克·仁达（Abdülhalik Renda）、总参谋长费夫齐·查克马克（Fevzi Çakmak）和杰拉尔·巴亚尔协商，看他们之中是否有人可以提名为候选人。然而，伊诺努在政府官员、共和人民党和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有着强大的影响，因此这三个候选人没有认真考虑这一提议。此外，费夫齐·查克马克表达了武装部队的观点，公开声称共和国的下任总统是伊诺努。于是，1938年11月1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选举伊诺努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

伊诺努重新确认了杰拉尔·巴亚尔为总理，苏库鲁·卡亚

和陶菲克·鲁斯图·阿拉斯则都没有在新政府中任职。然而，不到一年后，随着对其幕僚事务的调查，杰拉尔·巴亚尔被迫辞职，1939年1月25日，雷菲克·萨伊达姆（Refik Saydam）成为新总理。

从总统任期初始，伊诺努就表明他主张一个比阿塔图克时代更多元、更民主的政府。1938年12月6日在卡斯塔莫努共和人民党大会的开幕式上，以及1939年3月2日在伊斯坦布尔大学，伊诺努提到将共和人民党转化为包括每一个共和国公民的机构，人民政府的政策将得以实现。

1939年5月，共和人民党第五次大会决定，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成立一个“独立小组”以监察国家政策，这由阿里·尼哈特·塔尔兰（Ali Nihat Tarlan）领导，包括共和人民党大会选举出的21名代表。自1931年以来在大国民议会中就存在独立代表的事实促成了它的成立。此外，为改革共和人民党，从1936年以来内政部长自动成为秘书长的程序被废除了。

1939年选举前夕，党代表被邀请到安卡拉，发表关于议会候选人的意见。像卡泽姆·卡拉贝基尔、费特希·奥克亚尔、侯赛因·贾希德·亚尔琴（Hüseyin Cahit Yalçın）等人，曾在阿塔图克时期疏远了共和人民党，现在又被列为共和人民党的候选人并接着选入议会，这反映了更宽松的氛围。

1938年12月26日，在共和人民党的扩大会议上，阿塔图克被追认为“永远的领袖”，伊诺努则被授予“民族领袖”和“终身主席”的称号。没有伊诺努的同意，这些称号的授予是不可能的，这也反映了明显的言行不一。当独立小组证明能够有效行使监督功能时，现有政策之间的矛盾也变得很明显了。战争的威胁很可能是导致这些不一致的原因。当这个国家面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时，由于阿塔图克去世而产生的权力真空表明，牢固地控制国家被认为是必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

多年来，意大利和德国一直推行侵略政策。1935 ~ 1936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后来的埃塞俄比亚），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殖民地。1936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根据《凡尔赛和约》，这一地区实行非军事化。1938年，德国在奥地利内政崩溃后吞并了它，并随即提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英国、法国同德国和意大利在慕尼黑举行和平会谈；作为最后的妥协，同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1938年9月29日）；然而，仅仅六个月后，德国便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3月31日，英国和法国表明了明确的立场，声明要维护波兰领土完整，以遏制德国猖獗的扩张主义。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入侵并占领了阿尔巴尼亚。这是一个同土耳其密切相关的变化，促使了土耳其、英国及法国友好关系的形成。土耳其与英国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并经1939年5月12日的互助宣言得以巩固；《土耳其-法国宣言》（Turco - French declaration）也在随后签订（1939年6月23日）。为防止地中海发生战争，这些宣言最终导致1939年10月19日三国签订了互助条约。

同时，在莫斯科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英法的代表试图与苏联结盟。然而，这些只是英法的低级官员半心半意的尝试，他们没有权力满足苏俄的要求。这使斯大林对西方更加警惕，同时也证实了他对西方更想让苏联与德国相互斗争的

怀疑。因此，1939年8月23日，当希特勒向斯大林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瓜分波兰领土时，斯大林接受了这一提议；世界为之震惊，这被视为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签订条约的标志。事件的这一转变使土耳其非常不安，因为它坚持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成了最后的导火线；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9月17日，苏联出兵占领波兰东部。

尽管1939年9月已经宣战，但直到1940年5月10日德国袭击法国之前，法德前线一直没有军事行动。在这些年间，法国社会缺乏共识。一部分法国左派、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民主的途径建立社会主义，另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则倾向于革命。然而，对于大部分法国右派来说，无论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政权都是一种厄运。因此，很多右派团体更倾向于同法西斯主义的联系，一些人甚至认为希特勒对法国的威胁比法国左派还小。这一情形导致法国宣战后没有限制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者，反而掀起打击法国共产党的运动，共产党被宣布违法。德国对法国的闪电战开始后，法国军队迅速溃败；尽管法军还可以继续战斗，但受亲希特勒的右派影响，法国政府向德国求和。

同时，意大利对法国和英国宣战，土耳其参战的问题走向前台。土耳其宣布中立（1940年6月14日），理由是这同他们跟苏联的协议冲突；直到战争临近结束，伊诺努一直持这一观点。由于保加利亚是德国的盟国，土耳其在德国的实际前线处于一个艰难的位置。1941年春，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更导致这种情况的恶化。从那时起，土耳其与纳粹德国直面相对。当时的的问题是希特勒为了获取中东的石油是否会进攻土耳其。

然而，希特勒蒙骗了所有人，准备进攻他的真正目标苏联。在发动进攻四天前，德国与土耳其签订了《土耳其-德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the Turco - German Friendship and Non - Aggression Pact）。还特别指出，这不会损害土耳其同英、法签订的条约。政治家和媒体意见分歧，一些人支持英国，一些人支持德国；在整个危险时期，土耳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政策。

1941年和1942年德国对苏联的深入进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估计有2000万苏联人丧生，大约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但他们拒绝投降。苏联从英国和美国获得了大量的援助。最终，德国的攻势开始衰退。1942年11月，苏联开始反攻。1943年1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被迫投降。同年，盟国在北非战场上开始获得主动权，并在意大利登陆。

这时，英国领导下的盟国开始逼迫土耳其参战。1943年1月30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秘密前往土耳其，在亚达纳与伊诺努会谈。年底，伊诺努应邀去开罗同罗斯福和丘吉尔会谈，并以1939年的互助条约为由督促土耳其参战。丘吉尔坚持要土耳其支持在巴尔干开辟一条新的战线（通过这种方式阻止红军获得东欧的控制权）。伊诺努以土耳其军队的武装和设备比较落后为由加以反对。尽管盟国提供了一些援助，但对于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土耳其的非机械化军队只拥有少量现代化武器，是不可能同德军抗衡的。

尽管德国军队节节败退，而且德国城市每晚都遭到盟军的狂轰滥炸，但是他们仍然顽强战斗。例如，临近战争结束时，他们成功地向伦敦和英格兰南部发射了V-1无人机和V-2导弹。

盟军在法国而不是巴尔干开辟了新的战线；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土耳其也已于4月停止了对德国的铬铁供应，并于1944年8月2日断绝了与德国的所有关系。

在战争完全结束前，同盟国同意建立一个取代国联的新组织联合国，以维护世界和平。为此目的，在旧金山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成员国的要求是已经同德国和日本宣战，并没有说必须是积极参战；土耳其已于1945年2月23日对德日宣战。不管怎么样，德国于1945年5月7日、8日无条件投降。据说直到最后，希特勒仍然希望加入西方国家同盟，来进攻作为共产主义堡垒的苏联。战后不久，苏联与西方的关系便迅速恶化；但那时，第三帝国及其控制欧洲的梦想已经被摧毁了。

土耳其和伊诺努因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受到指责。根据土耳其签订的国际条约，当苏德战争爆发的时候，土耳其就应该参战。然而，由于土耳其军队装备和武器的劣势及现代技术的缺乏，使得参战变得毫无意义。很可能，伊诺努害怕被德国打败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尽管这将只是普通的战败，但东色雷斯的某些领土会被德国占领，这样会危及土耳其及革命本身。要解放被占领的土耳其领土可能需要苏联介入，而苏联对土耳其的扩张主义目标是很明显的。面对这些变数，伊诺努有很好的理由尽可能保持中立，坚决反对任何冒险主义。

经济政策

1940年1月18日，在杰拉尔·巴亚尔总理辞职后上台的雷菲克·萨伊达姆政府颁布了《国家保护法》（the National Protection Law），以保持对经济和控制市场的价格。于是，一种战时经济发展起来。1942年雷菲克·萨伊达姆突然去世后，苏

克鲁·萨拉吉奥卢 (Şükrü Saraçoğlu) 成为总理 (1942 年 7 月 9 日), 白赛·乌斯 (Behçet Uz) 担任商务部长。那时, 物价基本得到控制; 但由于采取限制增加产量和进口的措施, 很多产品很难买到, 从而导致黑市贸易猖獗。

为设法杜绝黑市贸易, 新政府采用相反的方法, 放开市场价格。副部长依法制定的条例及其相关机构被废除。物价飞涨, 1942 年的总通货膨胀率达到 90%, 1943 年为 75%。农民、商人和企业家的情况有所好转, 低收入的城市居民则处于绝望之中。土耳其人不适应通货膨胀, 并且产生了严重的不安情绪。由此国家开始对因战争而积累的巨额财产征税。

1942 年颁布《资本税》(the Capital Tax), 对资产阶级的资本而不是收入进行一次性的征税。那些在一个月內不能筹集到税收委员会规定钱款的人, 首先会被编入军营, 而后被派往埃尔祖鲁姆的阿士克勒 (Aşkale) 从事破岩等强制性劳动。这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首先, 强迫人们进行体力劳动是一种原始的理念。其次, 种族和宗教歧视使非穆斯林, 以及在较低程度上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 (Sabatayists), 比穆斯林摊派到更高的税款。被派往阿士克勒的人几乎都是非穆斯林。再次, 允许付款的时间太短, 以致他们不能通过变卖财产来筹钱。因此, 房产价格随着人们的竞相抛售而下跌。随着国外对这一极端措施的批评, 这一法律于 1944 年初被废除。

1943 年 6 月通过的《农产品税法》(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ax Law), 也被视为战争环境下的一项特别措施。农民交付实物或相当于他们产量 10% 的现金。这种税收类似于什一税, 但直接付给国家而不是中间人。这项法律在 1946 年也被废除。

乡村学校

奥斯曼人对安纳托利亚的公共工程没有任何兴趣。因此那里没有基础设施，更别说公路了。成千上万个孤立的小村庄散布在艰苦的山区，那里的村民在原始的环境中已经勉强生活了数百年。

到 1940 年，尽管土耳其的一些乡镇已经实施了一些如教育和公共工程这样的进步措施，但整体上安纳托利亚的农村地区还没有享受到共和国的好处。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科技水平和精神状态仍处于中世纪甚至更原始的时代。81% 的土耳其人生活在农村，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土耳其人仍然处在很低的生活水平。根据 1935 年的人口普查，只有 23.3% 的男性和 8.2% 的女性识字；在 4 万个村庄（后来更精确地确定是 6 万个）中，31000 个村庄都没有学校。现有的农村学校多数是只提供最基本课程的三年制学校。由于共和国很穷，而且村庄散布于广阔的山区，因此还没有公路、学校和电；即使建了学校，来自城镇的教师也不愿意忍受农村的艰苦生活。在阿塔图克时代，军人从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那些达到中士或下士军衔的农村人，经过培训成为农村教师。

乡村学校 (Village Institute) 的试验进一步发展，建立了一种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推动安纳托利亚教育的强大组织。随着 1940 年 4 月 17 日《乡村学校法》(the Village Institute Law) 的公布，农业部规定的十一个区创办了乡村学校。创办于 1937 ~ 1938 年的三所教师培训学校也被转变成了乡村学校，其学生来自五年制农村学校的毕业生。这些学生接受五年制课程教育，包括文化 - 理论课程和应用型的技术 - 农业课程。在应用型的

技术 - 农业课程中，学生通过为学校建造房屋学习砌砖、建筑和木工，通过在学校菜地里劳动学习畜牧和农业的新方法。男女学生一起学习和工作。

毕业生被派回他们自己地区的学校。教师的派遣提前三年公布给相关村庄，以便提前建学校，并为任命的教师修建住房。国家给每个教师分配 60 土耳其里拉的资金，以及农业应用课程所需的土地和农具，因而教师可以自己种植作物。在最初的六年，教师的薪水固定在 20 土耳其里拉。1942 年，在靠近安卡拉的哈桑奥兰村 (Hasanoğlan) 创办了高等教育学院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到 1948 年，这种学院的数量增至 21 所。到 1954 年，这些学校共培养了 25000 名教师。在二战条件非常不足的情况下，土耳其能够在很短的时期内培养 25000 名教师。这一伟大成就是伊斯梅特·伊诺努、哈桑·阿里·于杰尔 (Hasan Âli Yücel, 教育部长) 和伊斯梅尔·哈基·通古奇 (İsmail Hakkı Tonguç, 基础教育主任) 相互协作的结果。

农村实现现代化也很重要。这些学校的毕业生知道一些木工和建筑工知识，懂得一些医疗知识，而且能够解决村民在管理村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此外，由于他们是当地人，因此能够理解村民的问题和精神世界，很容易和村民交流，基本没有适应问题。乡村学校的毕业生中有很多著名的小说家，如法克尔·巴伊库尔特 (Fakir Baykurt)、麦哈茂德·马凯尔 (Mahmut Makal) 和塔里普·阿帕伊登 (Talp Apaydın)。如果说现今阿塔图克的革命已经扎根并取得了进步，那么乡村学校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十八章 伊诺努建立多党制

国际环境

二战的结束不仅标志着德国称霸欧洲和日本称霸远东梦想的破灭，同时也意味着它们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此后，民主-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在国际舞台上相互对抗。

1939年，土耳其已经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靠拢。那时，同德国结盟的苏联对土耳其有扩张主义倾向；但当苏联遭到德国的攻击时，它成了西方民主国家的盟友。然而，苏联并没有宣布放弃其扩张主义政策。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希望重获一战前沙俄控制的领土，这意味着将从土耳其、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割地，并吞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苏联觊觎的土耳其领土是指沙俄经过1878年《柏林条约》获得的部分，奥斯曼帝国通过1918年《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将其收回。然而，尽管斯大林重新获得了其他有争议的领土，但土耳其部分仍捉摸不定。

1945年3月19日，苏联宣布将不会与土耳其续签1925年签订的《土苏友好与互不侵犯条约》，而是将通过谈判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土耳其同意这一提议，苏联关于共同防御海峡的意图变得更加明显。当苏联正式提出这一要求时，土耳其断然拒绝。同时，格鲁吉亚的一些教授发表了一份声明，大体意思

是安纳托利亚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应当收回；在保加利亚，“修复”与土耳其的边界也成为一个问题。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尚未恶化；为了破坏土耳其在西方国家眼中的形象，斯大林强调土耳其很晚才参战及其向德国出售铬铁的问题。只要西方国家没有打破与苏联密切的战时关系，土耳其就得忍受在国际上的孤立；但最终土耳其恢复了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是美国。“密苏里号” 舰造访伊斯坦布尔是土美两国恢复友好关系的标志。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向国会宣布，为防止土耳其和希腊遭受苏联威胁，他提出了一项援助政策（即后来的杜鲁门主义）。同年，先是《土耳其 - 美国军事援助协定》（Turkish - US military aid agreement）签署；接着是1948年在马歇尔计划框架内的一项经济援助协定。美国提供的援助是为了防止欧洲滑向共产主义一边。1949年，土耳其加入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

向多党制的过渡

在这一情形下，伊诺努决定开始向多党制过渡。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时，他都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来推动这一目标；甚至有时不顾本党内的意向，坚持建立多党制。

伊诺努恪守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他对全局的理解。为赶上以多党制为主要体制的欧洲，土耳其也必须接受这一体制。当然，这将有利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因为已接受西方价值的土耳其能够更加自然地依靠西方的支持来抵抗苏联的威胁。然而，也存在其他的考虑。在欧洲，政治民主制通常允许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政党的存在；而在土耳其，这一体制是不对左派开放的。不仅禁止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而且对共产主义

和社会主义采取刻意、夸大的敌视态度，禁止和处罚所有的社会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土耳其刑法》第 141 条和第 142 条规定了极重的惩罚，例如，对“共产主义宣传机构”的负责人处以七年半至十五年的监禁，而且法院会毫不犹豫地执行这些惩罚。表面原因是 1945 年苏联已提出对有关海峡、卡尔斯和阿达尔汗的要求。从那以后，土耳其安全部队的实力由于杜鲁门主义、加入欧洲委员会以及不久后加入北约而得到显著增强。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向土耳其提出了一项外交声明，宣布放弃其对有争议领土的要求，并准备与土耳其签订一项友好条约。然而，这种气氛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甚至到今天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土耳其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纳泽姆·希克梅特，由于是共产主义者且逃到苏联，多年来他的诗歌完全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人们甚至不敢承认拥有他的作品。甚至今天，他的诗歌都不能出现在学校的课本里，而《色佛尔条约》的签订者里扎·陶菲克的作品却可以。“俄国沙拉”在土耳其被含混地称为“美国沙拉”，这对来访的美国人来说肯定十分惊讶。尽管这种不健康的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受美国麦卡锡主义（1949~1953 年）的影响，但土耳其表现得更加明显且持续时间更长。

这些对左派的反感，可能也源于那些没有真诚地或仅仅片面理解阿塔图克革命和“无限的思想自由”的人。他们故意或在很多方面无意识地用一种极端的反共立场来掩饰他们的想法和情绪，对乡村学校培养共产主义的指责就是典型的例子。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对政治和文化自由的限制使土耳其民主制与西方民主形式相比存在缺陷。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国际社会对土耳其的尊重。相比之下，在阿塔图克时代，土耳其

的政治体制不是比欧洲原则落后而是先进得多，土耳其因此也获得了相应的国际尊重。

建立多党制的第一步始于伊诺努在1945年5月19日青年和体育节（the Youth and Sports Festival）上的祝词，应该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在战后整个欧洲赞成民主制的背景下，一些不满于一党制的共和人民党成员也开始鼓噪政治体制的改革。四名持这一论调的大国民议会代表——杰拉尔·巴亚尔、阿德南·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福阿德·柯普吕吕（Fuat Köprülü）和雷菲克·科拉尔坦（Refik Koraltan），于1945年6月7日向共和人民党提出了“四人议案”（Dörtlü Takrir）。在这项议案中，他们尤其强调需要营造一种有利于党内自由讨论的环境。

那时，由伊诺努和农业部长谢夫凯特·拉希德·哈提卜奥卢（Şevket Raşit Hatiboğlu）拟定的《土地改革法》（Çiftçiyi Topraklandırma Kanunu）草案列入了大会议程。根据该法的第17条，为了给少地或无地的农民提供土地，政府有权征用大地主的土地。如果需要的话，所有的土地都可以征用，除了那些少于50德南（dönüms, 5万平方米）的土地。根据第21条，赔偿金将根据确定的地税估价而不是市场价值来决定。这一特殊规定在拥有土地的代表中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当该草案在大国民议会中讨论时，来自西安纳托利亚艾登省的大地主阿德南·曼德列斯带头反对该法律。在数次议会的开幕词中，阿塔图克曾强调给无地农民提供土地的必要性，但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或者可行的措施。现在，伊诺努坚决地从事这项事业。或许因为他不仅考虑农民的社会利益，而且希望在多党制的环境中获得政治支持。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他就被完全误解

了；因为在农村地区，地主阶层掌控着公众舆论。《土地改革法》于 1945 年 6 月 11 日由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其主要缔造者哈提卜奥卢非但未能在之后的政府中获得任何地位，而且在 1948 年第二届哈桑·萨卡 (Hasan Saka) 政府中，来自亚达纳的大地主和《土地改革法》的反对者贾维特·奥拉尔 (Cavit Oral) 被任命为农业部长。不用说，上文提到的第 17 条从未执行，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也只限于一部分国有土地。

民主党的建立

尽管民主党的建立不完全是反对《土地改革法》的结果，但这一因素在该党的建立和获得普遍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6 月 12 日，伊诺努确保共和人民党否决《四人议案》。他希望共和人民党内的不满者能够分裂出去，并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他希望这一举动有三大利好。第一，保证多党制的确立；第二，可以摆脱共和人民党内部不必要的反对因素；第三，这次分裂将不会产生反革命政党的危险。然而，巴亚尔和他的同僚对从共和人民党中分离出去并不很感兴趣，认为成立新的政党是一种充满未知因素的冒险。最好是留在共和人民党内，并逐步控制它。他们很清楚自由党发生了什么，尽管得到了阿塔图克的保证，巴亚尔并不想步自由党的建立者费特希·奥克亚尔不幸的后尘。

在《四人法案》被否决后，阿德南·曼德列斯和福阿德·柯普吕吕开始为《瓦坦》(Vatan) 撰写反对文章，支持民主化。共和人民党认为这是违反党纪的行为，从而将他们开除出党 (9 月 21 日)。杰拉尔·巴亚尔支持两位同僚的方式表明，他对成立新党的前景不甚肯定。他选择从大国民议会 (9 月 28

日) 而不是共和人民党辞职, 尽管这导致他失去了作为大国民议会代表的可观薪水。

尽管如此, 伊诺努仍固执地坚持建立新党。1945年11月1日, 他在大国民议会的开幕式上直言国家急需一个反对党, 全然不顾商人努里·德米拉(Nuri Demirağ) 已经组建了民族发展党(Milli Kalkınma Partisi) 的事实(德米拉是一个保守分子, 于是伊诺努故意忽略了这个政党的存在)。最终巴亚尔取得胜利, 于12月1日宣布他们将建立一个政党。12月3日, 他从共和人民党辞职。第二天, 他接受了伊诺努的邀请, 与后者进行了私人晚宴会谈。

1945年12月4日发生了“《坦报》事件”(Tan Incident)。《坦报》由扎克利亚(Zekeriya Sertel) 发行, 以支持社会主义左派而著称。那时, 西尔特尔准备开始发行一本新的期刊《视角》(Görüşler)。它的出现被广而告之, 也得益于阿德南·曼德列斯和福阿德·柯普吕吕都是其撰稿人。那天, 一些“青年人”高喊反共、反俄的口号, 袭击并捣毁了《坦报》的出版社, 以及出售左派作品的书店。警察没有干预, 人们指责共和人民党煽动甚至组织了这一野蛮和非法事件。民主党可能受到警告, 要与左派势力保持距离。

事实上, 很明显, 共和人民党想完全与左派脱离关系。1946年, 有三个左派政党被关闭: 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 Party) 在3月, 土耳其社会主义党[the Turkish Socialist Party, 埃萨德·阿迪尔·米斯特卡普里奥卢(Esat Adil Müstecaplıoğlu) 为主席] 和土耳其社会主义工农党[the Turkish Socialist Workers' and Peasants' Party, 谢菲克·许斯尼·德伊梅尔(Şefik Hüsnü Deymer) 为主席] 在12月。在其总理

任期内，雷杰普·佩克尔 (Recep Peker) 曾说要使农村学校“更具民族性”，这表明反左派非常流行。

1947 年，一场针对左派学者尼亚兹·贝尔克斯 (Niyazi Berkes)、佩尔泰夫·奈利·博拉塔夫 (Pertev Naili Boratav)、穆扎费尔·谢里夫 (Muzaffer Şerif) 和贝希杰·博兰 (Behice Boran) 的污名指控在安卡拉大学文史地学院酝酿，先是学生的游行示威，最终升至大学行政部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和法庭。其中三位著名的学者被迫离开学校。博兰没有离开土耳其；但是贝尔克斯去了加拿大，博拉塔夫去了法国，而且他们在新学术生活中都取得了成功。曾经欢迎因遭法西斯迫害而逃亡的德国教授的土耳其，现在却迫害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

民主党于 1946 年 1 月 7 日建立，巴亚尔担任第一任主席。该党吸纳由于各种原因心怀不满的人们，因此很快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从它的名字可以看出，民主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民主化。共和人民党政府为应对关于选举制的批评，在土耳其政治史上首次推行了单级选举。同时，政府还赋予法院对新闻报纸的管辖权，从而结束了政府关闭报纸的权力；大学也被授予自主权。

为了获得农民和工人的支持，共和人民党取消了农产品税 (Toprak Mahsulleri Vergisi)，并且依法为工人建立了劳工和社会保障部 (Minister of Labour and social security)。伊诺努“终身主席”的称号被撤销；不同的阶级和商会可以成立自己的政党。共和人民党通过巧妙的方式将 1947 年选举提前至 1946 年，从而使反对派政党没有时间来组织。

1946 年 7 月 12 日的选举是单级制的，但不在法庭的控制之下。实行公开选举，秘密检票。选举采取多数获胜制，也就是

说，即使一个政党在某省仅仅领先一票，它也将赢得该地区在议会中的所有席位。民主党为 465 个议席仅仅召集了 273 位候选人，且只获得其中的 66 个席位。显而易见，选举过程并不公正。因此，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的关系恶化，这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大国民议会的氛围中。

1946 年选举后

在新政府中，伊诺努任命雷杰普·佩克尔代替苏克鲁·萨拉吉奥卢担任总理。佩克尔政府使土耳其里拉贬值，即著名的《9月7日决议》（7 September Decisions）；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当时，币值的任何变动都是极大的事件。美元对里拉的汇率从 1:1.4 上升到 1:2.8。在议会讨论中，雷杰普·佩克尔总理被曼德列斯激怒，称后者的批评是“精神病的表现”；同时，他还指责杰拉尔·巴亚尔煽动群众叛乱。民主党的议员集体离席抗议。伊诺努介入，在跟巴亚尔进行私人会谈后，事情得以平息。

1947 年 1 月，民主党第一次大会召开，通过了一份正式声明《自由公约》（Hürriyet Misakı）。根据该公约，如果民主党的某些政治要求不被接受，民主党代表将拒绝参加大国民议会。概括起来，民主党要求：废除与宪法冲突的法律；颁布《选举法》以确保选举公平进行；国家总统不能同时担任政党主席（如伊诺努）。然而，无论民主党的反对多么激烈，仍遭到了雷杰普·佩克尔同样严厉和强硬的回应；他称民主党威胁退出国会为“共产主义阴谋”。伊诺努很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多党制的不祥征兆。作为调解人，在巴亚尔与佩克尔多次会谈后，他发布了《7月12日宣言》（the 12 July Declaration）以调和双方

的关系。尽管宣言确实使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佩克尔拒绝改变其过激行为。事实上，他还没有接受多党制。因此，伊诺努采取反制措施，以消除佩克尔在共和人民党内的消极影响；这导致在共和人民党内以尼哈特·埃里姆 (Nihat Erim) 为首的年轻代表投票反对佩克尔 (the 35's Movement)。几天内，佩克尔和他的支持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试图反对伊诺努，但佩克尔最终辞职。哈桑·萨卡政府成立 (1947 年 9 月 9 日)。

共和人民党内调和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持续冲突，在民主党内表现得更加明显。支持过激政策的人控制了民主党，并且指责民主党的官员太过软弱。1948 年 3 月这一紧张局势达到顶峰，一些代表和他们的支持者被驱逐出去。这些人先是在大国民议会中建立了一个独立民主小组 (Independent Democrats' Group)，然后于 1948 年 7 月 20 日建立了民族党 (Millet Partisi)，创立成员包括费夫齐·查克马克元帅 (Marshal Fevzi Çakmak)、希克梅特·巴尤尔 (Hikmet Bayur)、凯南·厄内尔 (Kenan Öner)、奥斯曼·博吕克巴希 (Osman Bölükbaşı) 和萨迪克·阿尔多安 (Sadık Aldoğan)。费夫齐·查克马克担任党主席。民族党指责民主党与政府勾结，是一个不合格的反对派。然而，民主党的这次分裂，正如 1950 年选举结果证实的那样，并没有导致基层支持者的明显减少。尽管如此，到 1950 年选举时，民主党的地位由于失去了一半的议席而被削弱。

居纳尔塔伊政府

哈桑·萨卡总理与雷杰普·佩克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纵容激进策略。然而，他缺少完成民主化事业的意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948 年颁布的新选举法，它没有包括对选举的司法

控制权。因此，民主党抵制地方选举和补选。1949年1月15日，哈桑·萨卡辞职；塞姆斯汀·居纳尔塔伊（Şemsettin Günaltay）继任总理。

居纳尔塔伊是在第二立宪时期被卷入伊斯兰主义思潮的历史学家。在投信任票时，他承诺建立健全的民主制。然而，实际上，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在宗教领域。1948年，为培训伊玛目-哈提普（带领人们在清真寺祈祷的宗教官员），设立了10个月的课程。1951年，民主党政府准备将这些课程改造成等同于中学级别的宗教培训学校课程。此外，居纳尔塔伊政府采取同之前共和人民党相同的政策，使宗教成为小学的选修科目。为与这一目标保持一致，神学院成为安卡拉大学的一部分。1956年，宗教成为中学的常规课程；那些父母不愿意让其上宗教课程的可以免修。1967年，宗教成为高中的一个科目；1974年，德育成为中学和高中的必修课程。尽管这些措施不同于阿塔图克时期，但并没有破坏世俗主义原则。

真正破坏世俗主义原则的是1980年9月12日军政府的宪法修正案，这使所有的宗教课程都成为强制性的。于是，不恰当的措施被强加于那些不愿意让孩子上宗教课程的父母，以及那些持不同信仰的人身上。尽管这些宗教课程是以“宗教文化”的名义提出来的，但很明显，各式老师在不同的课堂上将其变成了宗教灌输课程。同样违背世俗主义的是大量伊玛目-哈提普学校的存在。

1949年6月20日，受民族党的指责（民族党指责民主党为妥协对立派），民主党举行第二次大会，通过了《国家保证誓言》（Milli Teminat Abdi）。根据这一誓言，如果出现任何篡改选票的事件，人们将有权利通过合法途径来保护自己；无论

哪届政府，都将招致“全国敌对”。使用“敌对”（husumet）这个词引来了共和人民党的嘲笑，戏称这个誓言为“国家敌对誓言”。1950年2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提出了一部新的选举法草案。第一次在土耳其政治史上实现了对选举的司法控制。由于民主党的支持，这部法律得以通过。然而，这部法律最主要的缺陷在于，它规定采用简单多数制（first past the post）而不是比例代表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数制在1950年的三次选举中都不利于共和人民党。

在1950年5月14日的选举中，民主党获得了55%的选票，而共和人民党只获得了41%的选票。很明显，共和人民党选举失败，但它并没有被完全击溃，而是仍保持着大量的选票。然而，多数制将这一失败转变成了灾难，因为民主党赢得了85%的席位（408个代表），而共和人民党只获得了15%的席位（69个代表）。民主党宣布这一胜利是新时代的开始。这实际上是土耳其政治生活的分水岭。随着革命时代的一党制在1945年结束，土耳其的第二届民选政府在没有动乱的情况下移交给了反对党。这是伊斯梅特·伊诺努与共和人民党的一大成就，也是民主党的胜利。

对伊斯梅特·伊诺努的评价

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伊诺努都成功地维护和坚持了凯末尔主义革命的原则。此外，他的贡献对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建立了乡村学校和多党制。甚至有人认为，正是乡村学校的广泛设立使凯末尔主义革命成为不可逆转的进程。

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确实是根据凯末尔主义整体发展的概念采取的一项大胆措施，这也是土耳其应努力实现的普世理念。

无论掌权与否，伊诺努这些年来都以极大的耐心坚持和保护这一体制，就像一个人在干旱的土地上培育纤弱的花朵。1960年5月27日的政变打倒了他的政治对手；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尽快恢复多党制。他也阻止了由塔拉特·艾德米尔（Talat Aydemir）煽动的两次军事政变尝试。不过，多党制在土耳其有多成功，以及它对民主制（平等和自由）的贡献有多大，仍是有争议的话题。

无论如何，伊诺努任期内也有其消极的方面：资本税的种族主义方面侵犯了基本的人权；纳泽姆·希克梅特被囚禁了很多年；《坦报》事件；清除安卡拉大学文史地学院的教授；削弱乡村学校；在没有社会主义左派参与的情况下建立了多党制。毫无疑问，伊诺努对这些主要缺陷负有政治上的责任。或许且很有可能，伊诺努并不希望这些事件发生，甚至为这些事件所困扰，但是他的掌权没能阻止这些事情发生。伊诺努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是其时代的“国家领袖”，但是他不像阿塔图克那么强势，既没有后者的政治影响力，也没有他超凡的人格力量。

第二十九章 民主党时代

民主党的第一次连任和第一项抑制性措施

民主党时代以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和远大期望开始。杰拉尔·巴亚尔被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选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他辞去了民主党的领导职务，将其职权交给了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雷菲克·科拉尔坦被选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主席，福阿德·柯普吕吕担任外交部长。

当民主党还是在野党时，就已承诺将罢工的权利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然而，在掌权后不久，这些承诺就被忘得一干二净；相反，民主党将其所有精力都集中到发展经济上。无论如何，那几年的环境适合土耳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同时，由于使用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数量的增加，土耳其的农业产量有了极大的提高（使用的拖拉机数量：1924年为220台；1930年为2000台；1948年为1756台；1950年为9905台；1956年为43727台）。耕地面积从1948年的950万公顷扩大到1956年的1460万公顷，大约增长了50%。二战后受美国的鼓励，土耳其开始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农村地区得以进入以前无法进入的市场。

1952年2月18日，土耳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是土耳其外交事务的重大成就。土耳其已派军队加入联合国军，参

加朝鲜战争，因而克服了英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对土耳其加入北约的反对。在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加入欧洲委员会后，这一发展巩固了土耳其在欧洲同盟中的地位，结束了它在外交上的孤立期。所有事情都朝着非常有利于土耳其和民主党政府的方向发展。

尽管形势这么有利，民主党，或更具体地说是曼德列斯和巴亚尔，还是有一种莫名的不安与烦恼。1954年选举使民主党取得了比1950年更大的胜利，但他们可能还是感觉自身的地位不太稳固。为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巴亚尔和曼德列斯得了“伊诺努恐惧症”，即担忧伊诺努的威望。

1951年8月8日，人民之家被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收归国有。直到那时，它们一直是共和人民党的组织，这在一党制时代不是一个缺陷；但在多党制中，作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组织，它们不应从属于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共和人民党在执政时不愿意将人民之家作为教育部的附属机构——根据规定，它应该继续发挥其以前的功能。然而，民主党在国有化后忽略了最重要的规定，这些文化中心（478个人民之家和4322个人民之尾）仅仅被作为物质资产划归给财政部。这个组织的教育和文化功能被忽略和否定，启蒙进程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即使今天，也没有建立有效的组织来填补它的空缺。考虑到土耳其绝大多数学校仍然缺少图书馆、礼堂等文化设施，这次打击的严重性变得更加明显。不幸的是，民主党政府似乎更多地希望削弱共和人民党的力量，而非致力于教化民众。1954年2月，民主党政府将所有乡村学校转变成小学教师的培养学校，从而完成了自共和人民党执政末期开始的毁坏乡村学校的进程。

1953 年，民主党政府采取了另一项措施来破坏共和人民党；它颁布了一项法律，没收共和人民党所有被称为“非法所得”的财产，并将其交给财政部（1953 年 12 月 14 日）。这一行动旨在限制主要反对党的活动，但民主党好像不仅反对共和人民党，而且反对任何反对党。它以反革命和反凯末尔主义为由取缔了民族党（1953 年 7 月 8 日）。

当 1954 年选举临近时，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对那些公开批评政府的记者施加严惩。那些遭审判的记者被剥夺了为他们的作品辩护的权利，这种不公平的政策在民主党内也激起了反抗。19 名民主党代表参加了一场要求“证据权利”的运动，这被曼德列斯当作笑话，运动无果而终，这 19 名代表或从民主党辞职或被开除。在这 19 名代表中，知名人士包括图兰·居内什（Turan Güneş）、埃克雷姆·阿利詹（Ekrem Alican）、费夫齐·吕特菲·卡拉奥斯曼奥卢（Fevzi Lütfü Karaosmanoğlu）和埃克雷姆·哈伊里·于斯蒂恩达（Ekrem Hayri Üstündağ）。这些人于 1955 年年底成立了自由党。

在 1954 年 5 月 2 日的选举中，民主党获得了 57% 的选票，共和人民党获得了 36% 的选票；后者在大国民议会中的席位份额减少到 1/3。事情更加恶化。进行投资和发放信贷没有任何整体规划，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给民主党赢得政治上的优势。这反过来引起了通货膨胀和外汇瓶颈，导致商品短缺。民主党政府拒绝考虑甚至蔑视实行计划经济的建议。此外，土耳其 3 亿美元的贷款申请被美国拒绝。

1955 年，民主党援引《国家保护法》着手制定治安和司法措施，实施价格调控和配给制。所有的政府官员和雇员，在履行 25 年的公职后，“如果需要”可以解职退休。因此，大学教

职工和法官受到失业的威胁，很多人被清理出去。严厉的监禁被用来对付持异议的记者。1955年夏，共和人民党的秘书长卡西姆·居莱克（Kasım Gülek）在黑海地区旅行时，在斯诺普被捕，并被带往伊斯坦布尔监禁了一天。1956年，居莱克对里泽一家店主的访问被法庭认为是反政府示威，因而被判处了六个月的监禁。

塞浦路斯问题

从1954年起，塞浦路斯问题被提上土耳其的政治议程。希腊一直索要塞浦路斯的控制权，后来成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土耳其也决定提出自己的要求。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举行示威游行，支持与希腊合并（Enosis, Union with Greece），随后发生了血腥的恐怖活动。1955年，英国在伦敦举行会议来评估这一形势。

1955年9月6日，伊斯坦布尔的报纸报道了阿塔图克位于萨洛尼卡的住宅被炸的消息。那天晚上，整个伊斯坦布尔成千上万的希腊房屋、公司、教堂及墓地遭到袭击、抢劫或破坏。由于这些事件是同时发生的，所以人们怀疑这些事件是蓄谋已久的。一开始警察没有干预，到后来则无法阻止这些暴力活动了。这场事变最终在军队的干预下于午夜结束。事后，政府颁布了《戒严法》（Martial Law）。由于这些事件的爆发被当作共产主义者的一次阴谋，很多左派人士被捕，且只有在监禁数月后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再后来，1960年5月27日政变后，亚细亚达高等法院（Yassıada High Court）宣布，时任总统杰拉尔·巴亚尔、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内政部长纳米克·盖迪克（Namık Gedik）和外交部长法廷·吕什蒂·左卢（Fatin

Rüştü Zorlu) 应对这一事件负责。很明显,当时在伦敦参加塞浦路斯会议的左卢传回安卡拉的讯息激起了9月6~7日的事件,讯息称:“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坚持自己的权利……对相关人士的强力行动命令将极其有效。”亚细亚达法庭得出结论:民主党的组织被用来发动这些事件,因为它们在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的很多地区同时发生。⁴希腊政府在萨洛尼卡逮捕了一些土耳其人,他们因投掷炸弹而被判刑。其中一个人后来曾在土耳其担任省长职务。很显然,9月6~7日的事件类似于1945年的《坦报》事件,都是国家使用非法手段的不幸例子,只是此次规模更大。民主党拒绝了议会的调查议案。只有纳米克·盖迪克从内政部长的职位上辞职。

土耳其最初索要整个塞浦路斯(口号是“塞浦路斯是土耳其的,且永远是土耳其的”),经重新评估后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从而提出了土耳其与希腊分割该岛的新要求(新口号是“要么分割,要么灭亡”)。然而,根据土耳其、英国和希腊于1959年2月13日和19日在苏黎世和伦敦签订的条约,塞浦路斯于1960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塞浦路斯宪法中包含特定条款:在所有三个签字国的保证下,政府和议会将授予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特殊权利。这三个签署国——土耳其、希腊和英国——享有特权地位,在该条约遭到侵犯时有权进行干预。英国将保留它的空军基地,允许土耳其和希腊分别派驻一支军队。由一个联邦德国的法官领导的宪法法庭将监督这个条约的实施。大主教马卡里奥斯(Makarios)被选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总统,法泽尔·屈奇克博士(Dr Fazıl Küçük)当选为副总统。塞浦路斯问题暂时得以解决了,但这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结论。不久之后,在苏黎世和伦敦达成的条约被希腊的行动推翻了。

1957 年选举：民主党偏离民主轨道

1957 年民主党再次赢得多数票，但其总票数下降到 48%，得到了 424 个席位。共和人民党获得了 41% 的选票（178 个席位）；共和民族党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Party，由奥斯曼·博吕克巴希（Osman Bölükbaşı）领导] 和自由党各自赢得了 4 个席位。

1958 年，面对无法解决的经济危机，民主党政府（无法获得外国贷款）被迫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条件。1958 年 8 月 4 日，这些措施被用来稳定土耳其经济，美元对土耳其里拉的汇率从 1:2.8 上升到 1:9。《国家保护法》的措施停止实施；为抑制通货膨胀，国有企业提高了它们产品的价格。一直打算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民主党，由于私营企业不愿意接管，并且/或者不愿意将它们的资本投资到新的企业，从而不得不扩大公有企业的范围。然而，私营企业的工业投资最终增加了。总体上，工业旨在生产迄今为止一直进口的产品，从而用国内产品（进口替代品）满足已经确立的市场需求。例如，当由于外汇短缺无法进口卫浴五金、电池和集中式供暖设备时，必须在国内自己生产。

1958 年秋，民主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压制性措施。那时，稳定措施被用来解决经济危机；里拉的大幅度贬值已使物价飞涨，对大多数的公众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尽管多数票制对其不利，共和人民党还是在 1957 年的选举中胜利地赢得了大国民议会的很多席位。面对继续恶化的经济形势，共和人民党很可能赢得下一届选举。然而，曼德列斯和他的支持者认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交出权力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非常巧合的是，国外发生的两件不同事情也被民主党作为加强镇压反对派的理由。一件是 1958 年 7 月 14 日发生的伊拉克革命。民主党政府打算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密切关系，并希望届时土耳其成为该地区的领导国家。困难在于，在与北约的联系、与美国的关系及在冷战中的地位上，土耳其不愿做出任何妥协。但是，阿拉伯民族民主主义者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巴勒斯坦。因为美国和西欧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支持者和盟友，对土耳其来说，如果不放弃它与美国及西欧的同盟关系，它就不可能与这些阿拉伯国家（1952 年共和革命以来受纳赛尔掌权下的埃及领导）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由于其他阿拉伯国家是以封建政权来统治的，对它们来说，巴勒斯坦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保护自己免受共和的、民主 - 民族主义运动对其地位可能造成的威胁更重要。因此，它们更愿意与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所以，只有作为西方国家的盟友，土耳其才能出面同伊朗和伊拉克一起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以抵制共产主义在中东的扩散。巴基斯坦和英国也是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美国则给予外部支持。在个人层面上也是如此，民主党领导人已经跟伊拉克皇室成员和努里·赛义德（Nuri as-Said）总理建立了友好关系；伊拉克官员通常会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度假。

1958 年 7 月 14 日，伊拉克军队突然发动军事政变，法赛尔国王（King Faisal）和努里·赛义德总理被杀。民主党政府对这种剧变非常担忧。伊拉克和叙利亚边界附近的土耳其军队处于警戒状态；据称，曼德列斯考虑过对伊拉克进行军事干预，但被美国劝阻。针对黎巴嫩和约旦对西方支援的请求，美国派军队前往黎巴嫩，英国派军队前往约旦。亚达那的因切利克（İncirlik）军事基地被美军用以登陆黎巴嫩。

民主党政府认为伊拉克革命是由外部煽动的；然而，根据土耳其反对派的看法，这是对政府压迫的反抗。苏联正式对土耳其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外交政策提出抗议。1959年3月5日，美国与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剩余成员签署相互援助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如果土耳其遭到攻击，美国将给予援助。美国接受这一责任跟土耳其与北约有关，但这个条约包含了为防止直接和“间接进攻”而进行干预的理念。因此，如果土耳其发生政变或其他动荡，应土耳其政府的要求，美国能够派军队对土耳其进行干预。

伊拉克革命的各种消息，加剧了民主党政府对革命的担忧。然而，与美国签订的双边协定肯定给了民主党领导人一些保证，这也助长了其在对待反对派时的自满与虚张声势。

外交事务中第二件促使民主党镇压反对派的事件于1958年5月31日发生在法国，在民族危机时带领法国抵抗德国占领的领袖戴高乐当选为总理。阿尔及利亚一直被当作法国的领土而不是殖民地，自1954年以来一直被血腥的叛乱战争所笼罩。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生，作为二战救星的戴高乐临危受命解决这一严重的民族问题，并达成和平。此后，他在法国国会和选民的支持下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结束了法国传统的议会制，采用半总统制。戴高乐作为有魅力的战争领袖，成了所谓的“民主独裁者”（democratic dictator）。受法国变革的启发，曼德列斯选择性地忽视了戴高乐掌权的背景。土耳其没有这些问题，无论是曼德列斯还是巴亚尔，都不会被认为是民族救星。

1958年9月6日，在巴勒克埃西尔的演讲中，曼德列斯指控反对派试图发动类似伊拉克的革命，并恐吓心怀此意的人。9月21日，他在伊兹密尔发表演讲，言语中明显表现出将戴高乐

主义作为土耳其模式的希望。他还指出，如果国家官员反对，民主将被终止。伊诺努并不想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政府的意图已经很明显，1958年10月12日曼德列斯在马尼萨发起祖国阵线（Vatan Cephesi），以针对反对派的“仇恨与敌视阵线”（Hate and Enmity front）。之后，祖国阵线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涌现。这只是名义上的“祖国阵线”，其成员实际上都加入了民主党。广播（时为国家所垄断）每天播报创立者和新成员的名单，这使政治局势更加紧张。

反对派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受这些变化的冲击。1958年11月24日，自由党决定与共和人民党联合。1959年1月12日召开的共和人民党第十四次大会通过了《第一目标宣言》（the First Aims Declaration）。条款中最重要的是：建立社会政府、出版自由、罢工和建立工会的权利、两院制议会、宪法法庭、比例代表制、大学自主、最高司法法庭和国家广播系统的公正性。这些原则后来成了《1961年宪法》的基本原则。

民主党政府似乎到了一个紧要关头，不能容忍反对派领导的思想在全国自由传播。早在1952年，民主党开始采取措施，阻止反对派领袖（主要是伊斯梅特·伊诺努和卡西姆·居莱克）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这体现在警察和宪兵、地方行政人员、检察官和法庭的强制性措施，也体现于民主党成员的敌视行为。1952年10月，在爱琴海的旅行途中，伊诺努于伊兹密尔遭到袭击；阿克希萨和马尼萨发生了抗议游行。伊诺努计划于10月8日达巴勒克埃西尔；该省省长在市郊与他会谈时表示，如果伊诺努进入该市，那么他对将要发生的事件概不负责，并且不会为伊诺努提供保护。伊诺努因此取消了他的访问。1954年4月18日，在梅尔辛举行的一次露天会议上，伊诺努遭

到民主党徒的攻击，被迫跳墙逃生。这类事件继续发生，且日益严重。1959年4月30日，在伊诺努的另一次爱琴海旅行中，乌沙克省省长竭力阻止伊诺努访问独立战争的总部；警察局长和宪兵司令由于不听令都被解除了职务。当天晚上民主党召集了来自一些工厂的支持者，第二天他们阻止伊诺努乘坐的汽车前往火车站。当伊诺努试图步行穿过人群时，一块石头砸中了他的头部（当时他75岁）。这类事件在他的整个旅行中一再重演。在伊兹密尔，共和人民党的所有活动都被禁止；民主党徒还破坏了《伊兹密尔民主报》（*the Democratic Izmir*）的编辑部。

5月4日，当伊诺努乘车从机场到伊斯坦布尔时，用木棍和石头武装的民主党徒聚集在托普卡比区。交通部部长用他的车拦下伊诺努。伊诺努的车停下后，随即被暴徒包围。当交通部部长劝说伊诺努上他的车时，一名陆军少校正好看到；尽管他当时不执勤，但却命令附近的士兵（当时他们仍满足于做旁观者）用他们的步枪清路，让交通部部长的车离开。媒体被禁止报道这些事件，从而导致报纸的空栏。尽管在亚细亚达法庭上曼德列斯和巴亚尔都被宣布对此不负有法律责任；但毫无疑问，作为民主党领袖，他们对这一事件及类似事件负有政治上的责任。

“5·27”政变的原因

同一年（1959年），共和人民党秘书长卡西姆·居莱克在盖伊克利和恰纳卡莱遭遇了有组织的暴力袭击。1960年春天发生了耶希尔希萨尔事件（*the Yeşilhisar Incident*）；当伊诺努试图到开塞利时，那里也发生了暴动。

民主党政府看到不能通过威胁迫使反对党取消其巡回演

讲，从而决定采取措施彻底消除它所面临的问题。在 1960 年 4 月 12 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民主党指控共和人民党“密谋反政府的武装暴动”，并认为某些媒体通过错误、扭曲的报道支持这些阴谋。这份宣言还声称，民主党核心会议已经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在 3 个月内查出这些事件的真相。这项议案于 1960 年 4 月 18 日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上通过。同一天，伊诺努在议会中做了两场演讲，他声称共和人民党自身已实现从革命向民主的转变，因此共和人民党绝不可能怀有政变的想法。他同时提醒，新成立的委员会将成为凌驾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之上的非法组织，有权下达镇压命令；这种情况确实会带来革命，但其因素在共和人民党之外。他的名言是：“这是让民主政权偏离其真正道路的危险行为，它将会成为一个压迫政权。如果坚持这条道路，就是我也不能救你们……当情势需要时，革命将成为民族的合法权利。”

调查委员会由 15 名成员组成，全部来自民主党。调查委员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下令禁止：

- (1) 所有政党的活动（尽管只调查共和人民党）；
- (2) 所有涉及委员会活动的出版物；
- (3) 所有涉及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关于委员会工作争论的出版物。

《乌鲁斯》（*Ulus*）和《伊兹密尔民主报》通过全文刊登伊诺努的演讲来反抗这一禁令。通过这些方式和其他渠道，伊诺努的演讲在全国被人们所熟知。他在大国民议会中曾公开宣称没有屈服的打算。他也曾指出，摆脱危机的途径是进行自由且民主的选举；曼德列斯将伊诺努关于“革命可能发生”的

警告解释为共和人民党的革命意图，于是他劝说民主党采取进一步措施。

1960年4月27日，一项法律授予调查委员会特权：允许它查封任何出版物，关闭报社和期刊，预防和决定进一步调查的所有政治活动；为此目的，可以动用所有国家机构。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反对调查委员会的这些预防措施和决定，将被判处1~3年的监禁；泄露调查委员会有关工作的人，将被监禁6个月至1年。调查委员会将执行刑法程序中的初级阶段调查功能。

伊诺努的回应是：“你们说已经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并将付诸实施……所有实行迫害的非法政府都在执政时发表过类似的声明。已经走上这条道路的密谋者一定在想，土耳其没有类似大韩民族的自尊。”（韩国独裁者李承晚在学生和民众游行示威的压力下被迫于1960年4月21日辞职。）仅仅因为这次演讲，伊诺努被禁止参加大国民议会第十二次会议。

4月28日，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学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警察无法驱散人群，不得不招来军队。这造成1名学生死亡、40人受伤；西迪克·萨米·奥纳尔（Sıddık Sami Onar）校长也被袭击。政府颁布了戒严令，宣布大学停课。对媒体的禁令导致谣言被夸大，并广为流传。第二天，安卡拉政法学院的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当警察不能解决时，军队被再次召来。政府不得不采取日益严酷的措施。与此同时，曼德列斯通过广播发表演讲；他对爱琴海进行访问，从伊兹密尔来见他的民众中获得安慰。4月30日，宪法学教授阿里·福阿德·巴什吉尔（Ali Fuat Başgil）建议杰拉尔·巴亚尔，辞职的时间已到。巴亚尔的回答是：“不，立法机关投不信任票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镇压的时代。”

同时，军队也出现了不满的迹象。正准备退休前度假的军队总司令杰马尔·古尔塞尔将军（General Cemal Gürsel）给国防部长埃特海姆·曼德列斯写了一封信，说总统和政府应该辞职。5月21日，军事学院的学生在安卡拉的阿塔图克大街游行示威进行抗议，政府的唯一反应是宣布军事学院放假。

曼德列斯没有因为民主党大会和民主党核心会议的劝服而改变他选择的道路。1960年5月27日，政变发生了。主要由年轻军官组成、自称为全国统一委员会（the National Unity Committee）的团体推翻了政府。

全国统一委员会（1960 ~ 1961 年）

全国统一委员会（Milli Birlik Komitesi）由来自各个武装部队的38名军官组成，其主席是受军队爱戴与尊敬的杰马尔·古尔塞尔将军。

内阁成员、民主党的议员和很多民主党成员被逮捕，并将由亚细亚达的民事法官组成的高等法院进行审判；亚细亚达是马尔马拉海上靠近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岛屿。指控包括：政府成员贪污，1955年塞浦路斯危机期间在伊斯坦布尔煽动针对希腊人的暴乱，煽动对共和人民党领袖的袭击，颠覆宪法和为了党派目的动用政府机构。很多人被定罪判刑，有些较轻，有些则较重。1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11人，包括前总统杰拉尔·巴亚尔（由于年纪太大）被改判无期徒刑。对前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前财政部长哈桑·波拉特坎（Hasan Polatkan）和前外交部长法廷·吕什蒂·左卢的死刑判决，被全国统一委员会批准并执行。

全国统一委员会希望制定一部推动民主制的新宪法，并尽

早实现自由选举。然而，全国统一委员会中有 14 名以阿尔帕斯兰·蒂尔凯希（Alpaslan Türkeş）为首的成员，在某些他们认为必要的改革没有完成之前拒绝交出权力。1960 年 11 月 13 日，一场内部政变突然发生；这 14 名成员被驱逐出全国统一委员会，并被派往国外任职。

1961 年 1 月 6 日，制宪会议开始运作。它由全国统一委员会和代表大会（the Representative Assembly）组成，后者的成员来自除了民主党以外的其他政党、职业和商业团体，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制宪会议制定的新宪法于 1961 年 7 月 9 日公民投票时以 60.4% 的支持率通过。10 月的选举采用了比例代表制。尽管共和人民党是最大的党，但并没有获得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直到 1965 年初，土耳其一直由伊诺努担任总理的联合政府执政。

对民主党的评价

民主党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创造经济发展的活力和热情。其不足是，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缺少发展规划，使得财政濒临破产。这很可能是引起 5 月 27 日政变的一个因素。

如上所述，民主党的其他消极特点和政策包括：

- (1) 关于民主的原始或专制观念，不承认反对派政党的权利，总体上采取镇压政策；
- (2) 废除人民之家和乡村学校，从而损害了文化的发展；
- (3)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态度，例如谋杀伊诺努的企图和 9 月 6 日或 7 日政变；
- (4) 总体上与反对派的敌对关系；
- (5) 在与美国缔结的一系列双边协定（书面的和口头的）

中对土耳其独立的忽视，这使后者有很大的行动自由；

(6) 在宗教方面，共和人民党已经做了某些让步，但民主党在这方面做了更大的让步；因此，尤其是曼德列斯成了反对派的巨大希望。

有关第四点，民主党的追随者指责伊诺努应对他们之间的持续冲突负责。当然，伊诺努从未停止过战斗；但作为执政党，建立更好关系的责任便落在民主党领导人身上。例如，在 1949~1950 年共和人民党执政期间，尽管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之间相互敌视，但伊诺努曾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建立友好关系的环境；这在《7 月 12 日宣言》中有实质性的表现。曼德列斯和巴亚尔很少做出这样的努力；即使有的话，也只是在表面上。众所周知，分化发生于社区、村庄、咖啡厅和清真寺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国家的统一。

另外，民主党的一个积极方面是通过建立地方组织使普通人参与政治，这有利于人们受到民主教育。甚至共和人民党和其他政党都可能受到了这一发展的积极影响。然而，民主党基层支持者政治觉悟的提升并没有在民主党组织内部带来任何进步，不似在共和人民党内部出现的有趣而民主的进步。

当共和人民党垮台并成了反对党时，习惯于共和国初期掌权的很多党员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共和人民党的组织分崩离析，似乎已经解散了。这种情况在 1950 年共和人民党的第八次大会上也出现过。伊诺努再次当选总统，但他精心挑选的秘书长候选人尼哈特·埃里姆 (Nihat Erim) 没有当选。相反，大多数人选了卡西姆·居莱克 (Kasım Gülek)，他对人礼貌、友好，性格令人愉快。从本质上讲，伊诺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官僚，他不是很赞成这一选择。但居莱克已经被

代表们推选为秘书长；反过来，后者努力复兴共和人民党。卡西姆·居莱克一直担任秘书长到1959年，随后的议会拒绝授予总统和中央党部更多的权力。1959年当共和人民党在组织上变得更加强大时，伊诺努重新确立了对该党的支配地位；居莱克没能再次当选秘书长。

第五部分

军事干预及其影响

第三十章 20 世纪 60 ~ 70 年代

“5·27”政变相当于一场革命，扩大并巩固了阿塔图克和伊诺努所建立的民主基础。新的政府以 1961 年宪法为基础重组，但保留了国民公约和 1924 年宪法的原则，例如，所有的共和国公民无论种族和宗教都是土耳其人，并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也建立了新的分权制衡体系来防止独裁政治。尽管 1980 年 9 月 12 日政变之后起草了新宪法，但根据 1961 年宪法所建立的大多数制度仍然存在。

1961 年宪法确立了一系列的理念和机构，例如，社会国家、罢工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多元化发展道路、宪法法庭、最高司法委员会、国家规划组织、土耳其广播电视和共和国参议院。土耳其科技研究所（The Turkis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出口发展中心（Export Development Center）及国家生产力中心（National Productivity Center）也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宪法法庭监察立法体系，如果对颁布法律没有限制，至少也对暂时由多数票通过的法律实施有所阻碍。最高司法委员会确保了司法体系的独立。土耳其广播电视的自主权防止广播电视被任何一个执政党利用为宣传工具。国家规划组织，尽管没被授权阻止随意投资，但至少也有阻止实施不可靠计划的权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上议院即共和国参议院并不是完全积极的产物。首先，参议院的存在延缓了立

法进程；其次，参议院选举（因为每两年更换三分之一的成员）产生了一种始终处于选举前的状态。因此，在 1982 年宪法中，共和国参议院被取消。

尽管没有写入 1961 年宪法，“5·27”政权也采用了比例代表制；这是多党政治的基石，从多党制一开始就使用。1960 年 5 月 27 日建立的制度和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被 1971 年 3 月 12 日和 1980 年 9 月 12 日的反革命政变所破坏；但除参议院外，它并没有被彻底根除。

这应归功于伊斯梅特·伊诺努与共和人民党，因为是他们 在 1945 年坚持建立了多党制体系。土耳其也应感谢全国统一委员会和军队，因为它们带来了更加现代化的民主。伊诺努与共和人民党对此也做出了贡献，因为对于社会文化和知识的发展来说，1950~1960 年斗争影响下产生的这一社会变革是必要的。从一个更加实质性的意义上来讲，这是他们的《第一目标宣言》。无论如何，1961 年大国民议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是由共和人民党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

伊诺努在总理任期内以民主的名义所做出的另一个伟大贡献是，他镇压了塔拉特·艾德米尔（Talat Aydemir）两次未遂的军事政变（1962 年 2 月 22 日和 1963 年 5 月 21 日）。塔拉特·艾德米尔是一名军官，1960 年没能够加入全国统一委员会，后来又认为 1961 年政府所带来的秩序是不够“革命的”。

“5·27”政府对当代多元民主的态度，使土耳其收获良多；这适时地给予了共和人民党的左派运动以生存空间。1961 年，12 名工会主义者建立了土耳其工人党（Türkiye İşçi Partisi）。1962 年，穆罕默德·阿里·艾巴尔（Mehmet Ali Aybar）成为其领导人。在其 1964 年的党纲中，还不能使用

“社会主义”一词，因而采用了“亲劳工的计划国家主义”（pro-labour planned étatism）。然而，后来土耳其工人党可以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

1964年，纳泽姆·希克梅特的诗歌首次发表在道昂·艾夫奇奥卢（Doğan Avcioğlu）的《方向》（*Yön*）杂志上。尽管诗歌是因为“政治立场正确”被选取的，但发表共产主义诗人作品的行为本身对新闻自由来说就是一种进步。

1965年选举前夕，为防止失去土耳其工人党的选票，共和人民党宣称自己为“中间偏左的政党”（left of centre）。这一概念逐渐演化为“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和“民主左派”（democratic left）。

多元主义也使伊斯兰主义的右派能逐渐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建立政党。然而，因为这些政党秘密或公开地支持沙里亚体制，对一些人来说，他们的存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民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5·27”政变后，民主党被一项法庭决议取缔。正义党（Adalet Partisi）和新土耳其党（Yeni Türkiye Partisi）兴起，二者争夺原来民主党的选民，这导致了它们在1961年选举中的分裂。后来，正义党在苏莱曼·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的领导下完全赢得了民主党的选民，并且继续赢得1965年和1969年的选举。

尽管某些方面有所不同，通观20世纪60~70年代，正义党是民主党的继续，直到1980年才表现出同共和人民党及左派的对立。全国统一委员会因为处决了曼德列斯、左卢和波拉特坎，同样延续了这一对立性。那时，死刑作为一种能够引起人们对被处罚者厌恶和怜悯情感的古老惩罚方法，已经或正在被

当代社会所抛弃。此外，这成为后来政治处决的先例，包括：塔拉特·艾德米尔及其副手费特希·居尔灿 (Fethi Gürcan)、德尼兹·盖兹米什 (Deniz Gezmiş) 及其副手侯赛因·伊南 (Hüseyin İnan)、尤素福·阿斯兰 (Yusuf Aslan)，以及 1980 年 9 月 12 日政变后被处决的人。当然，这并不能掩盖他们行动的严重性，因为他们被判处有期徒刑。

正义党继续反对作为土耳其民主基石的 1961 年宪法，这引起了 1971 年 3 月 12 日和 1980 年 9 月 12 日的反革命军事政变。

1968 年，当法国大学生首先发起反对现状的运动后，这种运动迅速波及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土耳其的大学也引发了一场运动。然而，这场运动在其他国家迅速消失；但在土耳其，运动得以巩固，并越来越受激进左派意识形态的影响。正义党政府不是通过法庭对这一运动采取合法行动，而是宁愿被认为更倾向于支持所谓的突击队 (komando) 或理想派 (ülküçü) 的激进右派青年组织的行动；后者实际上对左派采取了暴力行动。

当时左派政党在选举中收效甚微。打着“中间偏左政党”旗号的共和人民党，得票率从 37% 下降到 29%；土耳其工人党仅获得 3% 的选票，幸亏当年采取了比例代表制，才使其在议会中获得 15 个席位。在 1969 年选举中，土耳其工人党与共和人民党的得票率进一步下降（前者为 2.6%，后者为 27%）。

1960 年的“5·27”政变唤醒了左派知识分子关于进步的新土耳其即将到来的希望；但各届选举使他们的希望黯淡，一些人开始对民主化进程失去希望。代议民主制被嘲笑为“甜饼民主” (sweetie-pie democracy) 和“菲律宾民主” (Filipino democracy)；“一个无议会的反对派” (a non-parliamentary opposition) 的说法开始流行，一些人甚至希望进行亲社会主义

的军事政变。新闻业的道昂·艾夫奇奥卢和国家民主革命运动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movement) 的领袖米赫里·贝利 (Mihri Belli) 都持这种观点, 尽管他们立场不同。

同时, 右翼的正义党也存在自己的问题。1969 年选举中, 正义党以 47% 的选票获胜组建政府; 但从那以后, 经济不断恶化直至停滞。1970 年 8 月 9 日, 政府被迫采取 1958 年以来第一次里拉贬值的措施, 这导致美元对土耳其里拉的汇率从 1:9 升至 1:15。很明显, 德米雷尔政府和正义党总体上支持工业资产阶级而非农业资产阶级。1970 年 12 月 18 日, 40 名代表脱离正义党成立民主党 (Demokratik Parti), 费鲁赫·博兹贝伊利 (Ferruh Bozbeyle) 任主席。这一分裂是由指控德米雷尔的外甥“虚报出口额” (hayali ihracat) 的非法行为所引起。

1970 年, 这种情况逐步升级, 恶化成为暴力和政治动乱。6 月 15 ~ 16 日, 伊斯坦布尔的工人罢工, 举行游行示威, 抵制将会限制革命劳工联合会 (DİSK, Devrimci İşçi Sendikalan Konfederasyonu) 行动的法律草案。学生的游行开始变成类似“城市游击队”的行动, 包括抢劫银行和反美行动。大学校园也成为重大事件的发生地。1971 年 3 月 3 日, 德尼兹·盖兹米什的土耳其人民解放军 (the Turkish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和他的同谋者 (安卡拉的大学生) 绑架了 4 名美国军官。当安全部队开始在中东科技大学校园里寻找这些失踪者时, 该校成了学生与安全部队的战场。最后, 总参谋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向政府递交了 3 月 12 日备忘录 (12 Mart Muhtırası), 认为政府和议会应对当前的情况负责, 因为它们没能实现阿塔图克和宪法所确定的改革。宣言认为, 土耳其需要一个“强大而值得信任的”超政党政府来实现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 德米雷尔被迫辞职。

1971 年 “3·12” 政变

从这些情况来看，大体局面已经形成，即一个左翼政变即将发生。然而，谣传说，随着左翼政变的预备，“高级官员”也已经筹划他们的政变来予以阻止。这一传言成为事实，政变发生后，筹划左翼政变的军官（5 名将军、1 名海军上将和 35 名上校）立即被撤职。尼哈特·埃里姆（Nihat Erim）从共和人民党辞职，建立了一个“超越政党”的政府。

11 名部长组成智囊团来实施改革，政府整体上承担修改某些被埃里姆视为“奢侈品”的宪法权利的任务。埃里姆处于一种既要让左派满意又要迎合右派的境地，因为政府仍然要同正义党占多数的大国民议会保持一致，并且通过它来颁布法律。4 月，逐步升级的左派青年组织（urban guerrillas）的恐怖活动，为其提供了支持右派和实行戒严的借口。

以色列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被绑架后，政府下令实行宵禁，并且在市内挨家挨户搜查私人住宅。左派知识分子、工人和大学生被捕，并遭到集体审判。内阁中的智囊团直到 12 月一直摇摆不定，希望能实施一些改革；但只要正义党控制大国民议会且军队中的保守分子（被称为 Cevdet Sunay - Memduh Tağmaç - Faik Türün 的团体）控制国家，这就会是一个渺茫的期望。随后，智囊团辞职，埃里姆组建了新的政府。

所有留下来的人都是为了完成右翼的目标，例如，镇压左派（后来，被用作审讯中心的伊斯坦布尔的 Ziverbey Kiosk，成了有名的拷问室），以及修改宪法。新产生的宪法修正案限制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土耳其广播电视的自主权被废除；政府有权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规（kanun hükmünde kararname）；成

立国家安全法庭；土耳其工人党和民族秩序党（National Order Party）被取缔。

共和人民党内部也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在伊诺努宣布了“中间偏左”的政策后，共和人民党在 1965 年和 1969 年的选举中选票进一步减少。有人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从而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然而，布伦特·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仍努力保护这一政策，并写了一本名为《中间偏左》（*Left of the Center*）的书。1966 年共和人民党的左派获胜，埃杰维特当选为秘书长。由图尔汗·费齐奥卢（Turhan Feyzioglu）领导的共和人民党右翼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但在 1967 年第四次大会中被击败。因此，48 名保守代表脱离共和人民党建立了信实党（Güven Partisi），剩下的共和人民党右翼在凯末尔·萨特尔（Kemal Satır）的带领下争夺党内领导权。

伊斯梅特·伊诺努最初带着怀疑的目光看待 1971 年 3 月 12 日政变；然而，当尼哈特·埃里姆成为总理时，他决定支持政府。这导致伊诺努和埃杰维特的分道扬镳，因为埃杰维特将“3·12”政变视为对共和人民党“中间偏左”立场的一次打击；随后处于权力的边缘，而不是反对德米雷尔政府。因此，他认为支持这一政府完全不能接受，并辞去共和人民党秘书长的职位以示抗议。伊诺努接受了右派的立场，此后同共和人民党保守派的凯末尔·萨特尔合作。共和人民党的基层则支持埃杰维特。

1972 年 5 月 5 日在共和人民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伊诺努在党委会投信任票期间公开声称“要么是他，要么是我”，这一形势走到了尽头。大多数人支持埃杰维特；第二天，伊诺努辞去担任了 33 年之久的共和人民党主席职务。5 月 14 日，埃杰维特当选主席。凯末尔·萨特尔和他的支持者分离出去，在

尝试建立自己的政党后加入信实党。

1973 年，杰夫代特·苏纳伊 (Cevdet Sunay) 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军队打算让当时的总参谋长法鲁克·居莱尔 (Faruk Gürler) 担任总统。为此目的，居莱尔辞职，并被苏纳伊派往参议院任职。然而，埃杰维特和德米雷尔联合起来，以确保退休的海军上将法赫里·科鲁蒂尔克 (Fahri Korutürk) 而不是居莱尔当选总统，这标志着“3·12”政府的结束。那年 10 月 14 日，大国民议会举行选举。

共和人民党在选举中获得 33.3% 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正义党获得 29.8% 的选票成为第二大党。政策更加偏右的救国党 (the National Salvation Party) 取代了民族秩序党 (the National Order Party) 的位置，赢得 48 个席位。让人惊奇的是，埃杰维特领导下的凯末尔主义政党 (共和人民党) 和最右翼的伊斯兰主义政党 (救国党) 建立了联合政府 (1974 年 1 月 25 日)。埃杰维特政府废除了对种植罂粟的禁令 (埃里姆政府在美国的授意下引进的)，并对那些在“3·12”政府执政期间被判罪的人实行大赦。

1974 年 7 月，塞浦路斯再次成为土耳其外交的关键问题。受意大利在将塞浦路斯归入希腊的军事独裁政府的鼓励，塞浦路斯斗士国家组织 (EOKA) 发动政变，推翻了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Archbishop Makarios) 政府。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的处境更加危险。土耳其同希腊、英国和美国代表举行了会议，但毫无成效，并没有就和平解决这一问题达成一致。当塞浦路斯独立的其他保证人打算接受这次政变的既成事实时，考虑到以前希腊屠杀土耳其人的情况，土耳其行使了在《苏黎世协定》和《伦敦协定》中规定的权利加以干涉。

1974 年 7 月 20 日，一支土耳其远征军在吉尔尼 (Girne/

Kyrenia) 登陆, 战胜了希腊国民警卫队, 完成了土耳其的第一个和平行动。停火后, 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土耳其 - 希腊 - 英国会议, 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于是, 土耳其军队于 8 月 14 日进行了第二次和平行动, 控制了塞浦路斯的北部领土。1975 年 2 月 13 日, 这一地区首次成为塞浦路斯土耳其联邦 (Turkish Federated State of Cyprus)。当与希腊裔的塞浦路斯政府谈判失败后, 独立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ern Cyprus) 于 1983 年 11 月 15 日宣告成立。同时, 由于希腊野心的失败导致军政府倒台, 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 (Constantine Karamanlis) 领导的文官政府建立。时至今日, 希腊仍然仗着西方国家对土耳其的偏见, 拒绝接受解决这一问题的任何可行性办法。另外, 土耳其由于其巨额外债以及在美国 (少数集团对国会施压) 和欧洲薄弱的游说实力, 无法有效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迄今为止只得到了土耳其的承认; 由于苏联分裂, 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很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塞浦路斯事件产生了两大反应。第一大反应是亚美尼亚恐怖组织地下解放军 (ASALA) 暗杀土耳其外交官的活动。有 34 名外交官被杀, 10 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行凶者没有被绳之以法, 这成了国际丑闻。1983 年, 亚美尼亚地下解放军计划在巴黎奥利 (Orly) 机场放置炸弹, 暗杀 8 名土耳其航空公司乘客 (其中一些人是法国居民); 凶手被抓, 亚美尼亚地下解放军恐怖行动突然停止。第二大反应是美国下令禁止向土耳其出口武器, 这一禁令一直持续到 1978 年 9 月 26 日。

1974 年 9 月, 由于无法同救国党继续维持合作关系, 埃杰

维特递交了辞呈，但是共和人民党无法找到同意提前进行选举的合适搭档。另外，德米雷尔的正义党没能组建右派联盟，因为民主党激烈地反对德米雷尔任总理，从而拒绝与正义党合作。结果导致了持续 213 天的危机。其间，政府由超越政党的萨迪·厄尔马克 (Sadi İrmak) 内阁负责，这个内阁获得了 17 张信任票。最后，德米雷尔采取了分化右派的政策，并且在退出民主党的 9 名代表支持下成立了自称为“民族主义阵线” (the Nationalist Front) 的联合政府。该政府分配给由阿尔帕斯兰·蒂尔凯希 (一名被全国统一委员会驱逐的激进官员) 领导的极右的民族行动党 (Milliyetçi Hareket Partisi) 3 个内阁席位，尽管事实上他们在大国民议会中只有 3 个席位。这个国民阵线让人联想到曼德列斯时期的祖国阵线，因而产生了一种不参加国民阵线就会被怀疑的感觉。

事实上，1973 年“3·12”政权垮台后，大学内外的左派和右派运动又爆发了激烈冲突。每当一方的武装激进分子控制了某个学校，他们就拒绝另一方进入校园，并阻止他们上课。血腥事件时有发生。在许多事件中，大学的管理层、警察和司法部门都避免进行干预。

德米雷尔表面上对这些事件漠不关心，他评论游行示威：“道路尚未被踩烂。”但事实上，他继续支持右派的激进组织。反对埃杰维特的暴力行动仍在进行，如 1975 年的盖雷代 (Gerede) 共和人民党会议、塔克西姆会议和伊兹密尔的奇利 (Çiğli) 机场事件，一直持续到 1977 年选举。1977 年在伊斯坦布尔，“不知名的凶手”在革命劳工委员会 (DİSK) 的五一会议上再次开枪；在接下来的慌乱中，有 34 人丧命。

在 1977 年的选举中，共和人民党以比 1973 年更高的选票

(41.4%) 再次成为第一大党。然而，这仍不足以单独组建政府。当共和人民党的少数派内阁不能赢得信任票时，德米雷尔组建了仅仅存在了 5 个月之久的第二民族主义阵线。之后，埃杰维特从正义党“调离”11 名代表（他们中每个人都被任命为内阁部长），从而于 1978 年 1 月成功组建了政府，这一政府持续到 1979 年 10 月。埃杰维特政府面临很多经济和政治问题。1973 年 10 月，世界能源危机爆发，引起了原油及相关产品价格的飙升。土耳其的整个管理层，包括埃杰维特，害怕来自选民的负面反应，小心谨慎地不让价格提高影响到消费者。为此，德米雷尔采取了以高利率获取资金的方法，称之为可转换的储蓄存款（*dövuze çevrilebilir mevduat*），这导致了巨额的外债。这一政策的累积结果是基本必需品如食用油和液化气的短缺。

同时，暴力事件不断增加。1978 年 12 月 22 日，由于某些不确定的原因，国家安全部队没能控制卡赫拉曼马拉什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几乎发展到内战的程度。109 人丧生，500 栋私人住宅和营业场所被毁。这些事件被称作右派与左派间的冲突，但实际上是阿拉维派穆斯林与逊尼派穆斯林间的冲突，这是长期以来忽视世俗化的结果。在城市，暴力事件不再只限于学生和青年组织。很多左派或右派的著名人士，如工会会员、公共检察官、教授、记者和警察局长，在很多事件中被一些不知名的人袭击或杀死。一些受害者并不支持任何激进的观点，也不支持左派和右派的斗争。这些犯罪案件绝大多数没有破案；或者像著名的《米莱特报》（*Milliyet*）编辑阿卜迪·伊佩克奇（*Abdi İpekçi*）一案，出于某些原因凶手不能被监禁。

1979 年 10 月，当共和人民党在中期选举中失败后，布伦特·埃杰维特辞去总理职务，德米雷尔以正义党少数派内阁组

建了新政府。由于得到了其他右翼党派的支持，它被称作第三民族主义阵线或“隐秘的民族主义阵线”（the veiled Nationalist Front）。除了实行稳定计划以复兴受打击的经济外，这届政府别无选择。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受命制订稳定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即1月24日决议（the 24 January Decisions, 1980年）；1971~1973年他曾为世界银行工作，时任副总理和国家规划组织的执行副部长。结果，土耳其里拉不断贬值，美元对土耳其里拉的汇率从1:47上升到1:70；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由自由市场来决定，经济被置于外向型轨道。为使这一整套经济政策生效，有必要冻结工人工资；但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这一措施很难成功。然而，1980年的“9·12”政变促进了1月24日决议的实施，尤其是关于限制工资增长的措施。当布伦特·乌卢苏（Bülent Ulusu）政府因为“9·12”政变进行重组时，图尔古特·厄扎尔被任命为负责经济的部长和副总理就不足为奇了。他于1983年当选为总理。

暴力和恐怖事件持续不断。军队的总司令，1980年“9·12”政变的领导人凯南·埃夫伦（Kenan Evren）将军说，由于前两年的恐怖主义，每天大约有20人丧生，总共有5241人死亡。埃夫伦指出，政变的另一个原因是法赫里·科鲁蒂尔克总统任期结束后出现的危机，也就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无能；选举不断，却无法选出一位共和国的新总统。事实上，这已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正义党与共和人民党要么不能，要么不想就总统候选人达成一致。拒绝接受一个妥协的候选人符合正义党的利益；根据宪法规定，参议院主席、正义党的伊赫桑·萨布里·查拉扬吉尔（İhsan Sabri Çağlayangil）将代理共和国的总统职务。无论任何事情，两党都坚持决不赞同一致。

第三十一章 20世纪80年代

1980年“9·12”政变

9月12日凌晨，土耳其军队在凯南·埃夫伦将军的带领下发动了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军事政变。这次政变比前一次更激进。政府和议会被解散。主要政党的领袖——德雷米尔、埃杰维特、埃尔巴坎和蒂尔凯希——被逮捕；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在埃夫伦的领导下，四大武装部队（陆军、海军、空军和宪兵部队）的总司令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成为最高的行政和立法机构。到1981年底，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268部法律；其中51部是全新的，其余的是对现存法律的修改。1981年10月16日，军政府通过解散所有的政党而变得更加强硬。如果德米雷尔和埃杰维特在政变后联合起来，军政府可能会被迫变得更温和些。果真如此，他们的对抗性政策就更不可宽恕。

军政府的目标是结束9月12日前的“无政府状态”。这被认为是1961年宪法确定的“过度”自由和分权制衡体系的结果。这使我们想起“3·12”政变背后同样的原理，军队认为此次还不够激进。现在，随着立法体制的彻底变革和新宪法的制定，一个“有纪律的民主制”（disciplined democracy）的全新时代开始。

1981年6月29日，一部新法律得以通过，建立了国民代表

大会，它将由两院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协商议会（the Consultative Assembly）。协商议会的成员将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从非党派的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发挥咨询作用。协商议会主要作用是起草新宪法，但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宪法的最终形式。制定的条款强烈地反映了军政府的观点。行政队伍将更加庞大。政府有权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KHK）；共和国总统虽然仍不担负政治责任，但被赋予一系列前任所没有的权力。与公民权和自由相关的部分强调的不是权利与自由，而是例外的情况。将宗教课程作为学校必修课的规定，是对世俗主义的打击。数十年来享有学术和管理自主权的公立大学，现在被剥夺了自主管理权。所有的大学都将由高等教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集中管理，其成员分别由共和国总统（7名成员）、部长委员会（7名）、大学校长委员会（7名）和总司令（1名）任命。共和国总统将指派部长委员会的1名成员担任主席，一种有无上权力的“超级校长”。大学校长由共和国总统任命，学院院长由高等教育委员会任命。（具体细节参见《高等教育法》）所有的系和所的主任都是任命的，而非选举产生；所有的团体、委员会和教工会议都只具有咨询功能。

“9·12”政府的另一个独裁表现是《社会团体法》（the Law of Associations）的成立。社会团体的运行受严密的规定和各种文件的制约；一旦违反，就会被罚款和处罚。警察负责监督社会团体的活动，使这一情况更加恶化。最终结果是打击那些想要成立协会组织或保留现有组织的人。

土耳其的问题是，尽管已经过去20年了，但“9·12”政变所确立的立法体系中不民主的方面或多或少依然存在。原因是，在其大约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多党体制总是倾向于右派。

左派从未超过 1977 年选举中共和人民党所获得的 41% 的选票。右派则总能获得至少 60% 的多数票。共和人民党或其他左派政党从来没有掌权，除非作为与右派联合政府的合作党，或者从右派政党“转移代表”，1978 年选举中就利用了右派的分裂。除了最低水平的多党政治能使其掌权外，右派对民主从来不感兴趣。右派不喜欢表面上看似反对右翼政府的“3·12”政变和“9·12”政变，但却因这些政变产生的右翼的威权政策和措施而高兴；当它掌权时，至少不会反对他们。民族行动党的领袖阿尔帕斯兰·蒂尔凯希打算效仿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模式，他的一些同事在 1980 年政变后被监禁了 4 年半。尽管他们被监禁，但他们的思想仍很有影响力。

最近，欧盟利用土耳其申请加入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实行与“哥本哈根标准”（Copenhagen criteria）相一致的民主化改革。然而，这次民主化是零碎的，而且主要由欧盟的利益所主导，因此“9·12”政权的很多缺陷都保留了下来。

1982 年 11 月 7 日，为新宪法举行公投。按规定，赞同宪法就意味着选埃夫伦为总统，任期 7 年。拥护宪法的宣传可以进行，并由埃夫伦亲自领导；反对宪法的宣传则被禁止。不投票的选民将失去为期 5 年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至于总统，埃夫伦是唯一的候选人。91% 的选民投票支持宪法；可以肯定地说，很大一部分选票是为了结束埃夫伦的军政府。

这次政变结束了所谓的“无政府状态”及与之相伴的流血事件。但是，人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些数字是难以置信的：65 万人被逮捕，23 万人遭到审判，517 人被判处死刑，49 人被处死。171 人由于严刑拷打而丧命。大约 3 万人因被认为是“不可信的”而失去工作，有 3 万人逃离土耳其。记者加起来被判了

3315 年的监禁。由于伊赫桑·多拉麦吉 (İhsan Doğramacı) 教授的知识或可能的合作态度, 埃夫伦任命他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主席; 他曾是新大学体系和学分制的创立者, 这些一般被认为是左派的政策, 从而为戒严令所取消。许多学者被校方解雇, 也有学者辞职抗议。因此, 大学失去了很多顶级的学者。幸运的是, 很多学者在几年后重返学校。工会的状况也不好。两个工会联盟, 革命劳工联合会和民族主义工会 (MİSK), 以及它们的分会都被关闭。很多会员被控告和判刑。由于这次镇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政策, 工薪阶层的购买力急剧下降,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状况才有所好转。德米雷尔后来评论“9·12”政变之后秩序的迅速恢复, 用质疑的口气暗示: 在此之前的无秩序, 至少是部分“有计划地”服务于政变。

这一政权有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特征。我们早就发现, 1971 年 3 月 12 日政变时军队中存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 并且右派占据优势。很显然, 这种趋势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仍在继续; 在美国的鼓励下, 埃夫伦和军方的大多数人都认为, 伊斯兰教可能是治愈共产主义的良药。因此, 对左派的镇压伴随着创造新意识形态的努力, 即所谓的“土耳其 - 伊斯兰” (Turkish - Islamic) 综合体。这一概念的实施包括: 强制推行宗教教育, 在阿拉维派 (非正统的伊斯兰信仰) 的村庄建立逊尼派的清真寺, 从非常保守的群体 (包括宗教兄弟会) 中任命大学校长和其他学术人员。埃夫伦自己就是一个雄辩的演说家, 经常在他的声明中使用宗教文献; 同时, 他也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热情而忠诚的凯末尔主义者。的确, 所有的大学每年都被要求开设一门名为“凯末尔主义原则和革命史”的课程。至今, 这仍是整个教学计划中每年必须有的唯一课程。右派被选来教授这一

课程，他们实际上是反凯末尔主义的。这些矫饰使著名的凯末尔主义者、《共和报》（*Cumhuriyet*）的编辑纳迪尔·纳迪（Nadir Nadi）非常恼火，以至于写了一本名为《我不是凯末尔主义者》（*I am not a Kemalist*）的书。

国际社会对这一政权的反应不一。美国政府对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感到惊愕，害怕这些情况发生在土耳其，因而对此次政变感到高兴。空军司令塔赫辛·沙辛卡亚将军（General Tahsin Şahinkaya）在政变前一天出现在华盛顿，似乎表明这次政变反映了美国的意志。另外，欧洲对这次政变表现冷淡，欧洲委员会对土耳其代表设置了诸多限制。

1981年1月1日，希腊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尽管1980年土耳其无条件接受希腊返回北约军事集团，但同年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u）的泛希腊社会运动党（PASOK）上台却使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棘手问题更加恶化。这包括领海问题、共同拥有的大陆架问题（希腊的很多岛屿在安纳托利亚大陆架上）、飞行情报区航线问题（FIR）和武装某些在1923年《洛桑条约》中已经非军事化的希腊岛屿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爱琴海地区。此外，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在东色雷斯的土耳其人和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塞浦路斯问题当然也在其中。为阻止希腊将其领海扩展到12海里，土耳其宣称希腊的行为将会引发战争。当塞浦路斯民族问题的谈判毫无进展时，希腊开始努力将这一问题搬到国际会议上，土耳其裔的塞浦路斯政府则宣布独立（1983年11月15日）。埃夫伦政府被西欧拒之门外，因此它选择同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国家发展关系，包括

那些属于伊斯兰会议组织 (Islamic Conference Organisation) 的国家。

政党生活的恢复

1983 年春，军政府决定结束对政治生活的限制。然而，为确保以前的弊病不会重现，军政府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措施。例如，为此目的，之前的政党领袖的政治自由被限制。为了防止政党的大量出现，设置了 10% 选票的门槛。全国票数低于 10% 的政党在议会中没有代表权。这一限制是众多小党派的梦魇，至今仍旧如此。新党成立，但面临西西弗斯式的苦难。一些政党因为同之前的正义党或共和人民党类似，从而被关闭。许多创立者和议会候选人被否决，从而急需寻找代替者。最后，三个政党可以参加选举：图尔古特·厄扎尔 (Turgut Özal) 领导的祖国党 (Anavatan Party)、内杰代特·卡尔普 (Necdet Calp) 领导的人民党 (Halkçı) 以及图尔古特·苏纳尔普 (Turgut Sunalp) 领导的民族主义 - 民主党 (Milliyetçi Demokrasi)。这三个政党的领导人都被认为与军政府有密切关系。厄扎尔曾是乌卢苏政府的一名部长。内杰代特·卡尔普是总理的一名高级幕僚。图尔古特·苏纳尔普是一名退休的将军。埃夫伦倾向于苏纳尔普的民族主义 - 民主党；选举前，他在电视广播中呼吁人民不应该给祖国党投票。我们不能确定这篇声明的确切影响，但无论如何祖国党获得了 45% 的选票和一半多的议会席位。人民党获得了 30.5% 的选票，民族主义 - 民主党仅获得了 23% 的选票。厄扎尔是一位杰出的实用主义者；当埃夫伦来总统府拜访他时，他以拥抱相迎。总体上，他及其领导的政府与埃夫伦和军队相处时没有太多困难。他在许多方面令人震惊，包括过

于熟悉礼仪和演讲、同伊斯兰主义关系密切 [1977年他曾是伊斯兰救国党 (Islamist National Salvation Party) 的候选人, 他的兄弟卡尔库特 (Korkut) 是该党的一名领袖]、对文化缺乏兴趣、放纵腐败、便宜行事 (他很少召开内阁会议)。然而, 在意识形态方面, 他与埃夫伦观点一致。

1983年, 亚美尼亚恐怖组织地下解放军犯下最后一次暴行, 这也标志着其暗杀行动的结束。然而, 第二年, 土耳其却面临着新的威胁: 库尔德工人党 (Kurdistan Labour Party, PKK) 的恐怖行动开始。这是一个由阿卜杜拉·厄贾兰 (Abdullah Öcalan) 领导的在封建和部落环境中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它最初只是安卡拉地区的一个小派别, 但很快介入对一些库尔德部落和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左翼团体的恐怖活动。此后, 这个组织进行了很多暗杀行动。1984年8月15日, 它袭击了两个城镇, 攻击军队和警察局。这是对国家本身的攻击; 但很显然, 厄扎尔政府并不是很重视 (当时他正在度假, 并认为没有必要缩短假期)。事实上, 这一事件一直持续到1999年, 导致3万人死亡。死伤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更多的问题是生活在恐怖威胁下的疾苦民众、村庄的毁坏、作为东部省份经济支柱的畜牧业发展停滞、紧急状态下很多自由的丧失、财政的枯竭 (这些钱本来可以用来促进发展), 以及民众大规模地向城市移民。

只有在1987年才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库尔德工人党以小规模力量在崎岖的地形中采用边打边跑的战术; 令人惊奇的是, 他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非常安全, 因此很难通过军事打击迅速结束他们的活动。据说, 厄贾兰住在大马士革的一栋别墅里, 且在贝卡谷地拥有集训营, 而贝卡谷地是由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领土。由于其他复杂的原因, 欧洲的某些机构并不

把库尔德工人党当作恐怖组织，而认为它是为自由而斗争的组织；这一倾向因为限制使用库尔德语以及土耳其民主的缺陷而加强。于是，库尔德工人党能够很容易在欧洲的库尔德人中建立，确保对其行动的各种支持。最后，“提供安乐计划”（Operation Provide Comfort）在给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提供支持的同时，似乎也给库尔德工人党以支援。1991 年海湾战争后，伊拉克人开展了打击其北部库尔德人抵抗组织的行动；在随后的动荡中，有 50 万人涌入土耳其边境。应土耳其的要求，上面提到的机构组织起来，帮助提供食物和帐篷。后来，难民被劝说返回他们的家乡。然而，有人认为，有必要推行计划 - 2（Operation - 2），由美 - 英 - 法空军在伊拉克北部上空巡逻；但是很明显，这一计划不仅鼓励库尔德人采取措施建立自治的库尔德国家，而且鼓励库尔德工人党在伊拉克北部营地的活动。因此，恐怖活动的数量从 1984 年的 160 次和 1991 年的 1494 次，上升到 1993 年的 5717 次和 1994 年的 6357 次。

在国内政治舞台上，选民开始破坏军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在 1984 年 3 月 25 日的地方选举中，祖国党保持了其选票比例。但是，人民党只获得了 8% 的选票，民族主义 - 民主党获得了 6.5% 的选票。另外，两个“新”党，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DP）和真理党（the True Path Party, TPP）分别获得了 22% 和 13% 的选票。社会民主党由埃达尔·伊诺努（Erdal İnönü）领导；他是一名彬彬有礼、举止优雅教授，且是著名的伊斯梅特·伊诺努总理的儿子。在这样一个姓氏的领导下，选民不难把社会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等同起来。另外，前正义党的选民似乎分流到了祖国党和真理党。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做了理智的选择；1985 年底，两党以社会民主人民党的

名义联合 (the Social Democratic Populist Party, SDPP)。同时,共和人民党前领袖布伦特·埃杰维特的妻子拉赫香·埃杰维特 (Rahşan Ecevit) 建立了民主左派党 (the Democratic Left Party)。同德米雷尔一样,根据宪法,埃杰维特被禁止参与政治已经10年;但由于共和人民党内严重的党派之争,他决定自己行动。

解除政治禁令的压力逐渐增加。社会民主人民党积极地制定宪法修正案。厄扎尔抵挡不住压力,但提出对这一问题进行公投;同时,他及其党派则公开进行反对解除禁令的行动。他公开宣称,解除禁令就是“怀念无政府状态”。这明显是埃夫伦的路线。结果,禁令通过微弱的多数票被解除(1987年9月6日)。之前的政治领袖们——德米雷尔、埃杰维特、蒂尔凯希、埃尔巴坎,大批地重返政界,并领导支持者成立新的政党。尔后,厄扎尔做出了两项动议。他要求提前举行选举(比本来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并且按照自身利益修改选举法。选举于1987年11月29日举行。祖国党获得36%的选票,社会民主人民党获得25%的选票,真理党获得了19%的选票。厄扎尔善于操控,他要求大国民议会举行特别会议来修改宪法,以使地方选举能够提前5个月举行。……因为他无法召集足够的多数派,于是要求对这一问题进行公投。他以辞职相威胁(结果他并没有辞职),但仍然没有获得通过。祖国党的衰落加剧。

1989年3月26日的地方选举证实了厄扎尔的忧虑。尽管他以辞职相威胁,但是祖国党仅排到第三的位置:社会民主人民党获得28%的选票,真理党获得26%的选票,祖国党获得22%的选票。社会民主人民党沉浸在喜悦之中。他们赢得了最重要的几个城市的市长职位: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亚达那。

1989 年 11 月，埃夫伦的总统任期临近结束，厄扎尔采取了另一个策略。一些人希望对宪法进行修订，以便使埃夫伦再做一届总统。伊诺努对此予以反对。德米雷尔希望，总统由人民而不是议会选举产生。当 11 月临近时，厄扎尔成为候选人。考虑到祖国党是议会的多数派，他确信自己能当选。然而，从多党制开始就形成了一种观念，总统应该是无党派的，且应由几乎一致的投票选举产生。而且，厄扎尔想占据阿塔图克曾经的位置，也令许多人震惊。真理党一度支持反对派的观点，全体代表从议会辞职抗议。然而，伊诺努反对这一观点，尽管反对派抵制选举。人们认为，集体辞职多少违背了 1980 年以后盛行的非对抗性政治环境。1989 年 10 月 31 日，厄扎尔当选总统。

随着厄扎尔当选总统，祖国党领袖和总理职务出现空缺。厄扎尔指定大国民议会主席耶尔德勒姆·阿克布卢特 (Yıldırım Akbulut) 为继任者。阿克布卢特是一个无关紧要且有点呆板的人；像伊诺努所说的那样，厄扎尔将继续“遥控”政府。真理党拒绝投信任票。不出所料，厄扎尔非常热衷于政府事务——他是如此活跃，以至于有人怀疑，尽管根据宪法土耳其的政府体系是议会制，但厄扎尔的任期将其变成了实际上的半总统制（与法国一样）。厄扎尔对前属的政党仍十分感兴趣，甚至在 1991 年使他妻子塞姆拉·厄扎尔 (Semra Özal) 当选该党在伊斯坦布尔的主席。最终，厄扎尔认为，阿克布卢特不利于祖国党的发展，并在 1991 年 1 月 15 日的党会上支持梅苏特·耶尔马兹 (Mesut Yılmaz) 成为候选人。梅苏特·耶尔马兹随后被选为党的领袖，并出任土耳其总理。耶尔马兹比阿克布卢特机敏，也比厄扎尔更加独立。公众要求

提前选举的压力很大，因此政府和国民议会决定于1991年10月20日提前举行选举。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

从过去到现在，很多人认为厄扎尔是一个天才，他是在土耳其掌权的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这一赞美主要集中于其经济政策上。几十年来，土耳其几乎一直处于管制经济中。一些事情，如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外汇管制的解除、人们可以在数不清的类似报亭或烟亭的“自助中心”买卖外汇，以及大型证券交易所在伊斯坦布尔的建立（1986年），在几年前是很难想象的。厄扎尔的勇气和决心是不容置疑的，但他的这些措施并不完全是独创的。这是里根和撒切尔时代实行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措施。由于在世界银行工作过（1971~1973年），因此他很了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他的政策只有在土耳其是全新的。关于这些政策的价值，需要根据其对土耳其人民的影响来评定。

这些政策的实施开始于上文提到的1980年1月24日决议。“9·12”政府下令禁止罢工；取缔许多工会，且打击剩余工会；工人工资的调整不是根据劳资双方的协商，而是根据高级仲裁委员会（the High Council of Arbitration）的决议。当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时，工资和收入基本被冻结。农业补贴也是这种情况。另外，1980年7月，利率的自由化导致大量小银行通过提高利率来吸收存款。利率变得如此高，以至于很多人卖掉了他们的房子、土地和其他财产以便获得高额利息。1982年中期，整个经济体系崩溃，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导致厄扎尔从军政府辞职。为保持经济

的外向型模式，土耳其里拉被迫每天贬值。这样做的弊病是高通货膨胀率持续了 20 多年。在写作本书时，1 美元大约相当于 160 万土耳其里拉。

在投资方面，厄扎尔的政策集中到能源、通信、高速公路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国家的电话系统得到了显著改善和提高。造价昂贵的高速公路获得优先发展权，据说厄扎尔将铁路等同于共产主义。相对于公路而言，对铁路建设的忽视在土耳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二大桥，即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大桥 (Fatih Sultan Mehmet Bridge)，于 1988 年建成。市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使他们能够加大对公共设施的投资。像他之前的曼德列斯和德米雷尔一样，厄扎尔并不担心财政政策；除了举借外债以外，他还增加了国内借贷，发行更高利率的国债，卖给银行和公众。很自然，外国投资者也对这些债券感兴趣。银行业成为日益有利可图的行业。此外，从金融投资所得的大部分收入都是免税的。据估计，1993 年，银行利润的 40% 源于对国债的投资。1991 ~ 1992 年，500 强企业的同比利润是 45%。为增加对国债的投资，一些银行甚至从国外借债。逃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税收管制不是很有效，没有足够的雇员来防止逃税，也没有合理的调度。

因为土耳其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很多投资都是由国家进行的。1980 年以后，私有化成为一种全球潮流；厄扎尔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尤其是 1985 年以后为这一目标做了很多努力。不幸的是，结果总是不那么理想。例如，一些公共企业和工厂被低价出售给亲信。还有一些工厂被拆掉并用作房地产开发，这些做法导致了失业和贫困。事实上，某些国有

企业长期亏损通常是实施私有化的糟糕借口，因为这些亏损通常是政府自己管理不善的结果。

凯末尔主义的复兴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凯末尔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兴。众所周知，在土耳其，人们非常爱戴和尊敬阿塔图克。第一次来土耳其的游客通常会被他的“无处不在”而打动。他的名字、照片、半身像和雕像随处可见。那是因为，他是给土耳其带来现代化的凯末尔革命独一无二的标志。笔者认同土耳其人民对他的爱戴与尊敬。然而，这种爱戴与尊敬阻碍了人们对他的真正理解，这也是事实。两方面的情况提高了人们对阿塔图克的理解水平。一是，埃夫伦将其非凯末尔主义甚至反凯末尔主义的政策表现为凯末尔主义的；如上文所述，这激怒了像纳迪尔·纳迪那样明确的凯末尔主义者。二是，一群作家开始时标榜“公民社会的倡导者”（proponents of civil society），后又以“第二代共和主义者”（second republicans）自居；他们接受了埃夫伦对凯末尔主义的表面理解，又同他一道批评阿塔图克。很快，这些团体与伊斯兰主义者建立了联盟，反对阿塔图克是他们的共同立场。这令凯末尔主义者很不安，从而促使他们努力理解阿塔图克的真正立场。结果在第二十六章的分析中已经给出。

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就此停止。凯末尔主义开始转变成社会和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这一发展具体体现在：穆阿迈尔·阿克索伊（Muammer Aksoy）教授及其朋友于 1989 年 5 月 19 日建立了凯末尔主义思想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Kemalist Thought）。大约七个月后，阿克索伊被暗杀；很显然，将凯末

尔主义上升为成一种意识形态和组织被认为是对现状的严重威胁。同年,《自由报》(*Hürriyet*, 有着最高发行量的日报)的总编切廷·埃姆吉(Çetin Emeç)、图兰·杜尔桑(Turan Dursun)及巴赫里耶·于丘克(Bahriye Üçok)教授也被杀害。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是凯末尔主义者;刺客则似乎凭空消失了。当1993年曾调查过许多腐败案的著名记者乌古尔·穆姆久(Uğur Mumcu)也被杀害时,他在安卡拉的葬礼转变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999年,艾哈迈德·塔内尔·科什拉里(Ahmet Taner Kışlalı)教授成为新的受害者。2000年,在阿克索伊被杀10年后,一些不幸的人因被怀疑暗杀这些凯末尔主义者而被捕。他们已被判罪;但是,只有找出多年来一直活动且为这些人提供庇护的人,并将他们送上审判席,司法过程才算结束。同时,凯末尔主义思想协会已成为土耳其最大的公民社会组织,拥有500个分支机构和10万名成员(2002年)。

外交政策

1984年12月,日夫科夫(Zhivkov)政府突然决定消除国内土耳其少数派的文化身份(大约有90万人,或占总人口的10%),土耳其与保加利亚的关系迅速恶化。这些土耳其人被迫使用保加利亚名字,土耳其出版物被禁止出版和销售,土耳其人的墓地也遭到破坏。保加利亚政府也希望土耳其对被迫移民的保加利亚土耳其人敞开国门。厄扎尔在对抗中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大约30万保加利亚土耳其人选择离开。这自然给土耳其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因此,土耳其的边境再次对移民关闭。保加利亚土耳其人的境况直到1990年初共产主义政权的结束才有所改善。那时,他们甚至能够建立自己的政党。

1987年4月14日，厄扎尔政府申请加入欧共体。欧共体委员会有关土耳其申请的报告总体上对土耳其不利，这份报告于1989年底公布且被该委员会的各部长接受。它强调了土耳其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失业、结构性差异）和政治问题（人权问题、民主问题、与希腊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委员会并没有将谈判的大门关上，并暗示加入关税同盟将是土耳其加入欧共体的重要一步。土耳其的面积及其同欧洲巨大的文化和宗教差异，是影响欧共体决定的重要因素。

1989年苏联解体对土耳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它将土耳其人民的灵魂从一种几乎病态的心理中解放出来，即由于强烈的内部和外部“培植”而产生的共产主义的危险。第二，它打开了与俄罗斯在各个领域积极而互惠互利关系的蓝图。第三，它开启了土耳其与苏联的突厥语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这些情况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尽管或许不如浪漫的图兰主义者（Turanist）所想象的那么密切。例如，除了阿塞拜疆以外，生活在这些共和国的各民族的语言和土耳其语很相似但又不同于土耳其语。这个问题使有些人感到失望，但与它们的关系看起来很有希望。

第三十二章 20 世纪 90 年代

海湾战争

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军队占领科威特，作为伊拉克邻国的土耳其也受到影响。厄扎尔似乎一直有扩张的想法（称为新奥斯曼主义，New Ottomanism），因而积极地加入战争。据报道，他曾以赌徒的方式简练地说道：“我们投入一，应当得到五。”他宣称中东的格局将被改变，并希望土耳其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他紧盯着摩苏尔及其石油。这完全违背凯末尔主义传统的谨慎外交政策和睦邻友好政策。当安理会于 8 月 6 日决定对伊拉克实行禁运时，土耳其第一个响应，关闭了基尔库克 - 尤穆尔塔勒克（Kirkuk - Yumurtalik）的输油管道，并停止与伊拉克的商贸活动。8 月 12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批准在边境地区布置作战武装力量。好奇的是，厄扎尔感到有必要于 9 月 5 日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取得类似的决议。同时，公众舆论称，厄扎尔正在与外国政治家，包括乔治·布什总统，进行非常积极的电话外交。总理阿克布卢特和外交部长阿里·博泽尔（Ali Bozer）在整个事件中几乎不存在。在 8 月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和 11 月同布什总统的会谈中，厄扎尔不允许土耳其的其他官员参加。美国要求土耳其在三个方面给予支持：第一，美国要求使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来打击伊拉克；第二，美国要求土耳其在伊拉克边境集结军队，迫使伊拉克

分散军事力量；第三，美国要求土耳其派遣一支小分队，参加在沙特阿拉伯集合的联合军队。土耳其满足前两个要求，在边境地区集结了18万名士兵，牵制了伊拉克8个师的兵力。

在推行第三个要求时，厄扎尔陷入了困境。他专横、冒险的违宪行为导致了一场骚乱。反对派和许多报纸都在批评他。这些动荡不仅发生在内阁，而且发生在祖国党内部。最后，军队也反对他。10月，阿里·博泽尔和国防部长萨法·吉拉伊（Sefa Giray）先后辞职。12月3日，总司令内吉普·多鲁姆塔伊（Necip Torumtay）辞职；他宣称，自己不能继续担任这一职务，因为他被要求做违反自身原则和公职理念的事情。这一辞职似乎表明，在军政府之后，军方将再度返回政治领域。然而，这是一种抗议而不是对权力的要求，并且它有广泛的支持。总体上，海湾战争对土耳其来说是一场灾难。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禁运，不允许恢复商贸关系。据官方估计，2000年土耳其在伊拉克的经济损失达到1000亿美元。战后，尽管美国及同土耳其相邻的阿拉伯国家采取了很多补偿性措施，但都是小规模。或许比经济因素更重要的是，战争加剧了之前提到的库尔德民族问题。

1991年10月20日选举

在掌权8年后，祖国党输掉了选举；土耳其在朝远离“9·12”军政府的方向上又迈进了一步；这多少与厄扎尔有关。这次选举的胜利者是德米雷尔领导的真理党，获得了27%的选票。祖国党以24%的选票位居第二，社会民主人民党以21%的选票居第三位。对于1989年赢得地方选举的社会民主人民党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要找到这一突然变化的准确原因并不

容易，一种说法认为民众更喜欢德米雷尔而非埃达尔·伊诺努。德米雷尔曾经试图树立一个父亲般的形象，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和煽动家。他几乎承诺了任何事情——两把钥匙（房子钥匙和车钥匙）、绿卡（免费医疗）、在 500 天内通货膨胀率降低到 10%。社会民主人民党曾与人民劳工党（the People's Labour Party）结成参选联盟，后者被认为是一个库尔德党。这个联盟可能在某些方面增加了社会民主人民党的选票，但在其他方面则减少了其选票。更糟糕的是，一些人民劳工党的代表通过他们的就职仪式来展现库尔德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人民党不得不要求他们从该党辞职。

德米雷尔与社会民主人民党成立了联合政府——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德米雷尔及其政党没有选择与其意识形态更相近的祖国党作为合作伙伴，这表明社会民主人民党是“9·12”政变的共同受害者这一点更重要。这一事件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作为民主党和正义党继承者的真理党同作为共和人民党继承者的社会民主人民党似乎和解了。政府的计划产生了很高的期望。他们准备制定一部新宪法，并且审查“9·12”政权的所有立法以使政府民主化。这包括：禁止严刑拷打；恢复劳工和工会权利；建立更加独立的司法体系；废除高等教育法，并恢复大学自治。不幸的是，真理党 - 社会民主人民党联合政府的历程却是令人失望的。他们并没有制定新宪法，仅仅通过了一个解除国家对广播和电视垄断的修正案。他们仅仅修订了包括刑事诉讼程序在内的几条法律，而且被“9·12”政权解散的政党得以恢复。重建的共和人民党选举德尼兹·巴伊卡尔（Deniz Baykal）为主席。厄扎尔给新政府制造了各种困难，新政府则通过制定某些“擦边”法律（by-pass law）予以回击。

德米雷尔总统和奇莱尔总理

1993年4月17日，厄扎尔由于突发心脏病去世。大约一个月后（5月16日），德米雷尔在伊诺努的支持下当选总统。伊诺努因没有坚持推选一个更中立的人担任总统而受到批评；但是很明显，他认为他抵挡不住德米雷尔对总统职位的渴望。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尽管德米雷尔与厄扎尔是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同学且有同样平常的地方背景，但他在某种程度上更遵守宪法规定。另外，德米雷尔通常支持总统制更适合土耳其的观点，认为总统应由公众选举产生。那些了解德米雷尔野心的人不难推测出，他认为自己是总统制下最合适的总统候选人。

随着德米雷尔当选总统，谁来担任真理党主席的问题出现了。在德米雷尔被禁止参与政治期间，曾任真理党主席的候萨梅丁·金多鲁克（Hüsamettin Cindoruk）被认为是最可能的候选人，不过他本人似乎不情愿。当其他党员坚持推举他为候选人时，他与德米雷尔进行协商；不过很明显，他没有从德米雷尔那里得到鼓励，因而宣布不会参与竞选。这意味着来自海峡大学（Boğaziçi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坦苏·奇莱尔（Tansu Çiller）将成为真理党的主席，她曾于1991年被选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很明显，德米雷尔看中她已有一段时间了。她是一个很有野心且固执的人，曾在美国待过很多年。她丈夫在伊斯坦布尔银行破产时担任该行的董事长，因而为公众所知。在奇莱尔被选为党主席后，她受命组建新内阁。同社会民主人民党的联合政府重新恢复。

在即将对奇莱尔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时，锡瓦斯发生了一件

重大的悲剧性事件。7月2日，35人被一些狂热的伊斯兰主义者折磨了将近4小时后在他们的旅馆内被烧死；这些人大多数是前往参加锡瓦斯文化节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很多警察、宪兵和军事人员到了现场，但他们的表现差强人意。在这一事件期间，德米雷尔宣称：“军队和人民不应该相互对立。”事件发生后，奇莱尔试图缩小事件的影响，称“没有伤到酒店周围的任何公民”。这并不容易让人相信，但这里的“人民”和“公民”指的是凶残的暴徒。这一观点也说明了国家安全部队的无能。很多人提到自由派作家阿齐兹·涅辛（Aziz Nesin）出席文化节引发的愤怒，他早前曾对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表示同情；但这更多的是解释而不是借口。许多为奇莱尔成为土耳其首任女总理而感到高兴的人，对她的首次表现感到失望。锡瓦斯事件在很多方面同1909年的“3·31”事件和1930年的梅内门事件类似。

6月6日，埃达尔·伊诺努宣布了他退出政坛的决定。在9月的党会上，穆拉特·卡拉亚尔琴（Murat Karayalçın）当选主席，并给伊诺努以荣誉主席的头衔。众所周知，伊诺努对物理学比对政治更感兴趣；但共和人民党的政治家总是想利用他有名的姓氏。另外，他发现他们的坚持很难拒绝，亦或许是他有某种责任感。后来，德尼兹·巴伊卡尔领导下的共和人民党在1999年选举中因为没有达到10%选票的最低要求而没能进入议会，阿尔坦·奥依曼（Altan Öymen）成为领袖。然而，第二年，巴伊卡尔又赢回了领导权。那些批评他、讨厌他和对他失望的人都转而支持伊诺努。巴伊卡尔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但他也无力阻止。大约一年的时间，他都在考虑在新党中担任某些角色问题，并参加了一些会议，但最后他宣布不参与寻求组

建新党的事宜。或许他意识到，面对现行政策，他除了礼貌地接受外别无选择，也可能是《自由报》有关他不正当家庭行为的不利言论影响了他的决定。

奇莱尔的总理任期真可谓多事之秋。祖国党代表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提出要求国会调查奇莱尔财产的动议（1994年）；她被指控在上一届德米雷尔政府担任负责经济的部长时期赚了700万美元，并用这笔钱在美国进行房地产投资。很显然，她并没有在1993年的财产公报中公开这些财产。由于当时社会民主人民党正与真理党联合并支持奇莱尔，因此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其他人也曾试图在议会中发起对她贪污的调查；但或许因为曾经有针对祖国党领袖梅苏特·耶尔马兹类似的指控（双方同意不压制他们的动议），或许因为政治合作的必要性，这些动议无果而终。

另一个重大事件是经济灾难。厄扎尔政府不负责任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包括赤字开支和大量借款（在1988年和1993年外债从410亿美元上升到670亿美元），引发了严重的危机。美元对土耳其里拉的汇率突然从1:15000上升到1:38000，并且出现了银行挤兑现象。著名的“4月5日决议”（5 April Decisions）就是其产物。国营企业生产的产品价格平均增长了50%。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0%，开始征收临时税，国债利率接近400%。银行存款需要国家来保障。更糟糕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召来制定支援协议。所有这些情况带来的痛苦和混乱是可以想象的。作为左翼联合政府的合作党，无论是在阻止不负责任的政策方面还是在减轻中产阶级或底层人民的负担方面，社会民主人民党都没有发挥显著作用。这种情况在后来所谓的左翼党与右翼党的联合执政时期继续存在。

1994 年 3 月 27 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产生了引人注目的结果。真理党以 21.4% 的得票率处于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祖国党，获得了 21% 的选票。更令人惊奇的是，由内吉梅丁·埃尔巴坎 (Necmettin Erbakan) 领导的伊斯兰主义的福利党 (the Welfare Party) 以 19% 的选票位居第三，并从社会民主人民党手里赢得了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市长职位。社会民主人民党仅排在第四位 (获得了 13.6% 的选票)，伊兹密尔的市长竞选输给了真理党的候选人。社会民主人民党 (及其继承者，新组建的共和人民党) 的选票减少，伊斯兰主义者选票增加，这种趋势在 1995 年大选中变得更加明显。这必须予以解释：一个原因是领导阶层的软弱；另外，社会民主人民党似乎既没有支持底层人民的福利事业，也没有更好地坚持凯末尔主义的原则。尽管伊诺努有政治光环，但总体上，他以及卡拉亚尔琴和希克梅特·切廷 (Hikmet Çetin) 的政治个性都非常软弱。共和人民党的领导人德尼兹·巴伊卡尔似乎有强硬的个性，但是他企图取悦所有人，并在实际过程中拒绝实施左派政策，包括凯末尔主义。这意味着他没能取悦任何人，因为在实施右派政策方面他无法与右派政党竞争。

另外，伊斯兰主义者选票的增加可以首先归因于民众对老牌政党没能为人民提供就业、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抗议。其次，由于其支持者 (在土耳其和欧洲) 的慷慨，伊斯兰主义者有大量可支配的资金。据说，他们也从沙特阿拉伯或利比亚这样的国家获得经济援助。再次，他们成功地组织当地支持者，挨家挨户地推动竞选活动，通常给予食物作为礼物。最后，很明显，他们完全因为宗教原因获得许多选票。但是，笔者认为仅仅靠这些选票并不足以扭转局势。

1995年，社会民主人民党有了重大发展。该党与共和人民党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共和人民党的名义下合并。共和人民党的主席巴伊卡尔和卡拉亚尔琴也同意希克梅特·切廷担任主席。然而，这一妥协仅持续了很短的时间；9月10日，巴伊卡尔被选为主席。巴伊卡尔想要显示他并非对奇莱尔唯命是从，结果导致两人无法就继续维持联合政府的条款达成一致。奇莱尔选择辞职，但仍旧无法组建新的联合政府，因此她不得不与巴伊卡尔达成妥协——巴伊卡尔想提前选举，选举于12月24日举行。选举的结果是福利党胜利，它获得了21%的选票；祖国党位于第二（获得20%选票），真理党第三（获得19%选票），埃杰维特的民主左派党（DLP）第四（获得15%选票），共和人民党仅位于第五（获得11%选票）。共和人民党勉强获得了出席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所必需的至少10%的选票。

另一个重要的事件是与欧盟签订了《关税同盟协定》（1995年3月6日），该协定于1996年1月1日生效。奇莱尔和巴伊卡尔称赞这一事件是向正式加入欧盟迈出的伟大一步，反过来，他们也希望在选举中获得成功。但很明显，选民对“4月5日决议”的印象更深，并投出相应的选票。评论者很快指出，为换取希腊对土耳其加入关税同盟的默许，土耳其没有就欧共体公布南塞浦路斯入会谈判的日期提出任何异议。协定的签订与公布就在同一日。评论还指出，北塞浦路斯已经被“出卖”了。于是，这些事件在北塞浦路斯引起了动荡，德米雷尔总统和登克塔什总统（President Denktaş）签订了一个《共同宣言》（Common Declaration），确认土耳其对北塞浦路斯的继续保护（1995年12月28日）。

福利党选举的胜利给政府造成了严重的困境。1974年，

之前的伊斯兰主义政党救国党与埃杰维特的共和人民党组建的联合政府掌权，当时很多人对此感到震惊。然而，救国党在联合政府中是“下级”合作党，并且埃杰维特担任总理。现在的问题是埃尔巴坎成了总理。一般人认为，这在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是不能接受的。令很多人感到欣慰的是，尽管很多其他政党与伊斯兰主义团体“有联系”，福利党仅获得 21% 的选票，剩余的 79% 选票都不属于伊斯兰主义者。问题是，在奇莱尔和梅苏特·耶尔马兹之间有激烈的竞争；后者有各种关于奇莱尔贪污的卷宗，并想借此推动议会进行调查。另外，福利党准备投票反对这一行动，以换取真理党愿意与其组建联合政府。另一个问题是，埃杰维特和巴伊卡尔极度讨厌对方，无法和睦相处。

埃尔巴坎 - 奇莱尔政府

起先，埃尔巴坎找不到联合政府的合作党；真理党 - 祖国党内阁在耶尔马兹总理的领导下建立。后来，奇莱尔取代耶尔马兹。然而，宪法法庭裁定，信任票没有达到法定人数。这一事件，再加上祖国党拨弄奇莱尔个人财富问题，使联合政府结束（1996 年 6 月 6 日）。因此，当埃尔巴坎被委托组建政府的任务时，真理党则面临对奇莱尔总理任期内滥用自由决定资金的调查。福利党投票反对这一行动，从而说服奇莱尔参与联合政府；尽管在选举中，她保证真理党将是世俗主义的政党。这一决定在真理党内部引起了小规模骚动。4 名代表加入祖国党，10 人反对信任倡议，5 人弃权。

有些西方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土耳其对伊斯兰主义（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如此敏感。他们通常认为，伊斯兰主义政党类似

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中西欧与土耳其在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世纪及其制度和习惯是几个世纪之前的事情，如宗教法、裁判所、巫术迫害等。土耳其的中世纪有所不同且比较温和，但在很多方面与西欧无法分离。1993年锡瓦斯悲剧中被活活烧死的人们，可以被认为是中世纪的行为浮现的具体例子。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宗教法是属于遥远的过去的事物；但是在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地方，沙里亚（伊斯兰教的经典法）仍然有效，而且一些地方（包括土耳其）的穆斯林积极地要求恢复沙里亚。用石头砸死犯通奸罪的妇女，目前仍是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做法。它们通过“炼狱般”的教养方式施加在穆斯林儿童身上的巨大压力，不是一个笑话。以民主的名义保护伊斯兰主义者政治自由的西方人，应把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在21世纪，沙里亚和伊斯兰主义中没什么东西是可以被视为民主的。

同上文的西方观察者一样，反凯末尔主义的第二代共和党人（Second Republicans）通常认为，土耳其夸大了伊斯兰主义的威胁；伊斯兰主义者在经历“软化”和“民主化”的过程，其政党正在接近或已经达到了类似欧洲基督教民主党的阶段。在这些人看来，关于伊斯兰主义者将接管土耳其且土耳其将成为另一个伊朗的观点是偏执的；土耳其永远不会成为另一个伊朗。然而，当人们翻阅历史时惊奇地发现希特勒在德国这样的国家掌权、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兴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亚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在奥地利赢得大选，便会得出结论：对特定的人类社会将来会发生什么或一定不会发生什么的确切预言，充其量只能算是假设。果真如此，那么坚持预防某

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不会轻易地被当作妄想而摒弃。

在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整个立法体系都是世俗主义的；发动伊斯兰主义运动并不容易，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因此，伊斯兰主义者通常要有高超的掩饰能力。例如，埃尔巴坎能够建立两个保守的伊斯兰政党，但都被解散了。由于宪法法庭禁止埃尔巴坎参与政治，他的追随者建立了第三个和第四个政党（美德党和幸福党）。埃尔巴坎称他的政治路线为“民族观念”（*Milli Görüş*）。“*Milli*”一词现在的意思是民族，但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表示宗教团体；人们无法确定埃尔巴坎和他的追随者们所指的是哪个含义。此外，埃尔巴坎的第四个政党的名字（*felicity*）可能喻指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asr-ı saadet*）。据说，当伊斯兰主义者声称坚持凯末尔主义或世俗主义时，便意味着“*takiyye*”，即在压力下撒谎或冒犯真主；这显然不是罪。当然，一直隐藏并不容易。众所周知，埃尔巴坎的一些追随者们已经“爆发”，透露了他们的真正意图。埃尔巴坎曾说过，伊斯兰主义者迟早能够获胜，唯一的问题是采取血腥的还是不流血的方式。

由于福利党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不占多数，以及凯末尔主义的因素，埃尔巴坎远不能自由行动。他经常表达他对“西方俱乐部”（*the Western Club*）的厌倦，但他并不能轻易地改变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结构。他试图发展“另一种路径”。建立一个穆斯林军事同盟或者一种不用美元的穆斯林共同市场的想法很难实现，但他成功地建立了八国组织（*D-8*）。1996年10月22日，他首次宣布这一组织参照七国集团模式，他称之为“*M-8*”，包括了主要的伊斯兰国家，即土耳其、伊朗、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有

趣的是，当埃及不愿意基于宗教原因建立一个组织并且提出反对后，“M”改成了“D”[代表“发展”（development）或“发展中”（developing）]。八国组织的第一次峰会于1997年1月4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这个组织的目标有很多，包括推动民主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和加强商贸关系。它的主要机构是外交部长理事会（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埃尔巴坎也访问了很多伊斯兰国家，包括伊朗和利比亚。对利比亚的访问是一次灾难：当面对电视镜头和媒体时，卡扎菲指责土耳其处理库尔德问题的方式。更值得注意的是，埃尔巴坎显然非常难堪和不舒服，但却没说一句话予以反击（10月6日）。评论者指出，这是因为1989年福利党从利比亚接受了一笔50万美元的财政支援；并且/或者他们被指称都属于某些伊斯兰组织，而卡扎菲的地位比埃尔巴坎高。埃尔巴坎非常谨慎，不想与美国对抗，他派一名部长到华盛顿，提议两盟国应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12月24日）。埃尔巴坎也非常热衷于通过公共部门建立重工业，但由于国库的巨大债务压力，以及联合政府的合作者奇莱尔是坚定的新自由主义者，这些计划并不完全可行。

埃尔巴坎政府时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比如：有关两个宗教领袖的性丑闻；苏苏尔卢克事件（the Susurluk incident）；一些福利党代表和市长“大发脾气”，表达他们对凯末尔主义共和国的憎恨；埃尔巴坎在官邸为51名宗教领袖设斋月晚宴（1997年1月12日）。然而，更重要的是福利党加快伊斯兰主义者对公共职业的渗透进程，主要针对政府各部、市政府、国有企业、学校和警察队伍。这一进程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些人通常是伊玛目学校的毕业生。伊玛目学校开始于20世纪

50 年代，但几乎所有的政府都设法增加其数量，以证明它们的宗教信仰。伊玛目学校分为两级：中级（第 6 年至第 8 年）和高级（第 9 年至第 11 年）。它们的工作主要是培养伊玛目，但被禁止参加工作的女孩也可以进入伊玛目学校学习。由于其毕业生可以去任何一所大学学习，且伊玛目学校数量众多，以至于这些学校成了普通学校之外的又一选择。20 世纪 90 年代，大约有 400 所伊玛目学校，约有 12 万名学生。据说，埃尔巴坎曾将这些学校称为“我党的后院”。知道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更有可能进入政府工作，许多父母因此更喜欢伊玛目学校。

1996 年 11 月 3 日，警察学校校长侯塞因·科卡达（Hüseyin Kocadağ）驾驶的一辆奔驰汽车在苏苏尔卢克（Susurluk）附近与一辆卡车相撞。汽车上有一名乘客阿卜杜拉·查特勒（Abdullah Çatlı）正在被土耳其警察通缉，因为他参与了谋杀作为福利党成员的七名学生，并帮助穆罕默德·阿里·阿加（Mehmet Ali Ağca）从监狱逃跑；后者刺杀了著名的记者阿卜迪·伊佩克奇（Abdi İpekçi），且后来试图暗杀教皇圣若望·保禄二世。国际刑警组织以贩毒和杀人罪也在通缉查特勒。第三位乘客是来自乌尔法的真理党代表塞达特·艾迪普·布贾克（Sedat Edip Bucak），也是布贾克部落的首领。第四位乘客是模特贡贾·乌斯（Gonca Us）；她和查特勒都使用了不同的名字和假身份证。他们和科卡达都死了，布贾克则活了下来。显然，他们车上携带有很多带有消音器的枪支。他们出动似乎为某一阴谋活动。这件事情很快成为涉及政府本身的一大丑闻。真理党的内政部长不得不于 11 月 8 日辞职；很明显，他涉嫌为“他们的”在逃提供假证件。

为此，举行了很多审判，形成了两份政府报告，以及一个

议会审查。故事相当复杂，且明显涉及一些秘密组织，如由北约建立旨在防止苏联入侵的意大利剑兰组织（Gladio）。“自然”人选的都是极右分子。在一些事件中，这些组织似乎卷入了非法活动。很明显，他们在土耳其的秘密行动首先是抵抗亚美尼亚地下解放军，后来是抵抗库尔德工人党。这表明，他们在奇莱尔政府时被广泛使用，并且卷入了贩毒和类似黑手党的活动。为此，耶尔马兹领导的祖国党成了主要的控告人。在整个事件的最后，很多人被判刑，但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事情的根源尚未触及。然而，毫无疑问，这类活动遭到了强烈打击。同样明显的是，该事件是埃尔巴坎 - 奇莱尔政府垮台的原因，他们试图缩小它的影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民众对贪污有组织的反抗，比如，在所有大城市发起名为“一分钟的黑暗是为了持续的光明”运动。从1997年2月1日到3月9日，每天晚上9点熄灯一分钟，有时伴有敲锣、吹号等活动。

军队的介入

1997年2月28日，军队介入，但与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军事政变相比，这是一次“软化的”军事干预。事实上，在某些领域，它甚至被幽默地称为“一次后现代政变”。2月28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总司令和各部队的指挥官要求实行十八项旨在限制宗教原教旨主义发展的措施。很显然，埃尔巴坎、奇莱尔和德米雷尔已被告知将发生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非常紧张，持续了九个小时。军队礼貌而坚决，只允许在措辞上修改会议记录。更重要的要求包括：关闭由宗教兄弟会运营的学校、地产和基金会；减少伊玛目学校的数量，使其达到与需要的伊玛目相适应的程度；终结原教旨主

义者对官僚结构、司法、学校和大学的渗透；采取措施限制源于伊朗的颠覆活动；将义务教育从 5 年延长至 7 年。该委员会声称，内部违背世俗主义原则的活动导致了新的紧张和制裁。从法律上讲，这十八项措施仅仅是该委员会的建议，但政府感到必须遵守。军队也希望推翻政府，但只能通过施加心理压力来实现。

很可能，最重要甚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要求是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这意味着，所有的土耳其人都能接受更好的教育；通常被剥夺接受更先进教育的女孩儿将在文化和社会方面有所提升；而且，中级伊玛目学校将被关闭。1973 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义务教育的时间为 8 年，但一项临时法律推迟了它的实施。这个临时法律持续了将近 1/4 个世纪；这些年来，没有一个政党，甚至阿塔图克建立的政党（共和人民党）也没有重新提出这一问题。这是土耳其政治的悲哀。伊斯兰主义团体掀起暴动，反对关闭中级伊玛目学校。在 14 岁而不是 11 岁开始宗教教育，对他们来说大不相同。然而，土耳其国内外很多非伊斯兰主义者也反对军事干预，他们认为这是不民主的；显然，他们没有考虑神权政治有多民主，以及儿童教育的不足。

于是，一方面军队开始监督 2 月 28 日决议的实施，另一方面则监督伊斯兰主义者的活动。但是，由于埃尔巴坎掌权，情况是非常反常的。据后来披露，总司令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西方工作组”（Western Working Group）来研究伊斯兰主义者的活动。收集到的信息在一系列简介会上被传达给各种团体，包括记者、法官、检察官和外交官。最初的会议是 1997 年 4 月 29 日针对记者的发布会，持续了 3 个半小时；武装部队新的防御概念也被公开。根据这个新的概念，国外威胁已经减弱；来自

库尔德工人党和伊斯兰主义的国内威胁同样危险，应该受到重视。5月21日，高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武拉尔·萨瓦什（Vural Savaş）透露，他将在宪法法庭控告福利党，因其反世俗主义活动而要求将其解散。5月中旬，很多工会和雇主联合会发起了一项公民倡议，要求埃尔巴坎政府辞职。四名真理党的部长从他们的职位上辞职，很多来自真理党和福利党的代表也从他们所属的政党辞职。面对所有这些压力和政变正在接近的谣言，政府试图通过在埃尔巴坎和奇莱尔之间“调换”总理位置来挽救危机。1997年6月18日，埃尔巴坎向德米雷尔总统递交了辞呈，同时还向他递交了一份福利党和真理党（也包括第三少数党）的宣言，表明奇莱尔-埃尔巴坎政府肯定能获得信任票。然而，德米雷尔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梅苏特·耶尔马兹，理由是国家需要一个能消除混乱的政府。

耶尔马兹能够同埃杰维特的民主左派党和侯萨梅丁·金多鲁克的民主土耳其党（the Democratic Turkey Party）建立联合政府。巴伊卡尔宣称在三个条件下将支持政府：举行提前选举，实施八年学校教育计划，解除国会对某些被指控贪污的代表的豁免权。耶尔马兹政府在7月赢得信任票。8月16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经过持续23小时的激烈辩论后，通过了实施八年义务教育的议案。1998年1月16日，宪法法庭以9比2的表决结果决定，因其反世俗主义的活动解散福利党。在同样的决议中，包括埃尔巴坎在内的七名代表失去了议会席位，并且五年内禁止参与政治。埃尔巴坎的追随者已经准备成立名为美德党（the Virtue Party, VP）的新党，并聚集在埃尔巴坎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的同学雷贾伊·库坦（Recai Kutan）的领导下。这个政党也被解散。埃尔巴坎的追随者又成立了一个政党——幸

福党 (the Felicity Party)。然而，这时内部出现了分裂；更加进步的人士成立了一个不同的政党——由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 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 (the Party of Justice and Development)。埃尔多安的座右铭是：“我们已经改变了。”

同时，国家安全法庭在其月会中继续强调，原教旨主义是对土耳其安全的最大威胁。禁止女学生戴头巾的运动开始在所有大学推行，尽管这在很多地方引起了抗议活动。一些学生开始以戴假发取代戴头巾。但是，也有很多人遵守了这一禁令。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伊玛目-哈提普学校，现在仅限于中级学校，入学人数也急剧下降。很显然，很多父母和学生开始把伊玛目-哈提普学校的文凭看作找工作时的负担而不是资产。1998年4月21日，时任伊斯坦布尔市长也曾是福利党领袖之一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因在锡尔特 (Siirt) 发表激进演讲而被判处了10个月的监禁。驻伊斯坦布尔的美国总领事对他进行了一次同情的探视。另外，国务院通过决议，经审判他不适合继续待在现在的职位。四年后的2002年，高等选举委员会 (the High Electoral Council) 宣布，埃尔多安因为同样的指控而没有资格领导“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该委员会也规定，他不能参加2002年11月3日的选举。

耶尔马兹政府倒台，埃杰维特掌权

对一位代表的腐败指控导致了政府的倒台。1998年秋天，一位黑手党领导人与一位祖国党部长之间通电话的录音带被交给媒体。这些录音带的内容表明这位部长正试图“敲定”一家银行的出售，并想利用黑手党达到这一目的。这一事件被提交

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共和人民党支持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的议案，耶尔马兹辞职（11月25日）。在这一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危机后，埃杰维特通过祖国党与真理党的支持组建了一个少数派内阁（1999年1月11），并且计划提前举行选举。

从1997年2月28日开始，军队是政治领域里非常活跃的因素。1998年9月16日，军队总司令阿蒂拉·阿泰什（Atilla Ateş）在叙利亚边境附近做的演讲中宣称，不能容忍叙利亚给厄贾兰提供政治庇护。这公开宣告了对叙利亚不友好行为的不可容忍，并带有军事行动的含义（为什么没有早些发生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耶尔马兹政府支持这一宣言，因此叙利亚不得不将厄贾兰驱逐出境。1998年10月21日，两国政府在亚达那签订协议，叙利亚承诺不再支持库尔德工人党。与此同时，厄贾兰已经到了俄罗斯，但俄罗斯不愿收留他；尔后又去了意大利，并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土耳其的引渡要求被拒绝，但意大利政府不能给予他无限期的庇护。土耳其的舆论非常愤怒，与意大利的关系必将受到影响。厄贾兰试图获得希腊的庇护；虽然有些事希腊不愿公开面对，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肯尼亚内罗毕的希腊大使馆给予了他秘密的庇护。不久，他的行踪被发现。在美国的帮助下，他被诱出大使馆，并且被土耳其的特工扣押；他们将其带回了土耳其（1999年2月16日）。意大利政府的矛盾行为，尤其是希腊政府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两个国家都是土耳其北约盟国的事实，在土耳其、希腊和其他地方引起了诸多评论。

1999年5月31日，厄贾兰的审判在国家安全法庭开始。厄贾兰宣称他并没有受到虐待，并向库尔德工人党的受害人家属道歉（他们很多人出席了审判）。然而，他也威胁称：库尔德

工人党得到了 140 多个国家的支持，尤其是意大利、俄罗斯、叙利亚、希腊和德国。如果他被处决，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将会制造流血事件。相反，如果他被宽恕，他会尽最大的努力阻止这些冲突。6 月 28 日，国家安全法庭宣布：厄贾兰被判处死刑。最高法院同意了这一判决，但并没有执行；因为政府认为，最好不要将这一判决呈送给对死刑有最终决定权的大国民议会。与此同时，库尔德工人党的活动也停止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最终停止。以伊拉克北部为基地的库尔德工人党时不时地进行武装袭击，或许表明是厄贾兰之外的人或势力控制着库尔德工人党。

借着战胜库尔德工人党的光环，埃杰维特的民主左派党在 1999 年 4 月 18 日的大选中以 22% 的选票位居第一。巴伊卡尔的共和人民党仅仅获得了 9% 的选票，没能获得任何议会席位；因为《选举法》要求最少获得总选票的 10%，才能进入议会。埃杰维特同德夫列特·巴赫切利 (Devlet Bahçeli) 的民族行动党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 NMP) 和梅苏特·耶尔马兹的祖国党组建了联合政府。他的妻子拉赫香 (Rahşan) 称，为组建这一政府，埃杰维特必须克服对同民族行动党和极端民族主义联合的担忧。但很显然，这比同伊斯兰主义的美德党联合要好得多。鉴于耶尔马兹和奇莱尔的不和，同时跟祖国党和真理党联合也是不可能的。这届政府在 2002 年选举前继续执政。一个重要因素是萨德丁·谭坦 (Sadettin Tantan)。他是祖国党的代表，曾经是杰出的警官，后来出任内政部长。由于他的领导，警察开始打击犯罪和贪污。各种名称的“运动”进行了 30 多次，其中一些涉及著名的商人和政治家。其中一桩案子牵涉到德米雷尔兄弟的孙子亚赫亚·穆拉特·德米雷尔 (Yahya

Murat Demirel), 他被指控“掏空”了他自己的银行。其中一项证据是, 监控摄像机拍到他晚上从银行里搬出几麻袋钱。耶尔马兹再也无法忍受谭坦的行为, 尤其是当触及他的利益时。2001年6月5日, 谭坦被调到另一个政府部门。谭坦同时从其职务和祖国党辞职, 以示抗议。

新的大国民议会在两个方面是引人注目的。在共和国历史上(如果排除“9·12”事件), 阿塔图克的共和人民党第一次没有代表进入。共和人民党的选民更喜欢投票给民主左派党。很显然, 人们更欣赏埃杰维特享有盛誉的诚实和爱国主义, 而非巴伊卡尔的肤浅。在土耳其, 政党领袖通常指定各级候选人的提名, 因此他们可谓全权在握。同样, 选民们通常投票给政党领袖, 而不是政党。当然, 政党领袖通常不大会受选举失败的影响; 但在这个大概是最“有教养的”和最“民主的”的共和人民党中, 人们“自然”认为巴伊卡尔应当辞去他的领导职务。这次他照做了; 不像奇莱尔和耶尔马兹那样, 虽然他们的政党选票急剧下降, 但最后成功挤进了议会。然而, 或许因为该党的阿尔坦·奥伊曼(Altan Öymen)作为领导人太软弱了, 还有该党组织结构的不民主, 巴伊卡尔在15个月后的2000年重新担任该党领导职务。这让许多凯末尔主义者很恼火。

这届新议会的第二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性梅尔韦·卡瓦克奇(Merve Kavakçı)的出现; 她是从美德党中被选为代表的, 并且戴着伊斯兰主义的头巾, 身穿束腰长袍。在大国民议会中没有那样着装的先例, 且没有公共部门的女性雇员或女学生被允许那样穿衣。然而, 在第一次参加会议的就职大会时, 卡瓦克奇就那样着装。民主左派党代表随即也做了没有先例的事情: 他们齐声鼓掌并大声呼喊, 将她赶了

出去，以示抗议。大国民议会的主席宣布休会；此后，卡瓦克奇选择不再出现。后来发现她接受了第二国籍；非常有趣的是，那不是个伊斯兰国家而是美国。她这样做没有得到土耳其当局的同意。因此，她被开除了土耳其国籍。她在国会中提出的议案也被取消了。

那年夏天，一场巨大的灾难袭击了土耳其。1999年8月17日，一场7.4级的地震，以格尔居克（Gölcük）为中心，摧毁了一个最重要的工业区 [伊兹密特、阿达帕扎勒（Adapazarı）、格尔居克、亚洛瓦（Yalova）]。成千上万的家庭和工厂被毁。地震发生在凌晨3点，几乎所有人都在睡觉，所以导致许多人死亡。据估计，共有1.6万人死亡，4万人受伤。这个惊人的死亡人数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腐败和渎职造成的。许多被摧毁的建筑都建在本不该用来修建房屋的地方，除非采取特别的防护措施；许多房屋在修建时不符合建筑标准。

年末，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盟峰会决定邀请土耳其作为候选成员国（1999年12月10日）。这是欧盟早期政策的逆转。7月11日，欧盟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汤姆·斯宾塞（Tom Spenser）还公开宣称，欧盟没有打算接纳土耳其。为了从土耳其获得利益而不这样说是不诚实的。他说，如果不是正式会员，某种包括非常密切关系的形式是可以接受的。1998年12月，在卢森堡召开的欧盟峰会宣称，目前土耳其成为正式会员是不可能的。很明显，土耳其地震灾难在软化欧盟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上发挥了某些作用。更具体地说，希腊对地震受害者的援助，为发展两国政府间的某些友好关系创造了机会，这特别体现在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杰姆（İsmail Cem）和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ios Papandreou）之间。然而，欧盟声明中对塞浦路斯和

爱琴海问题的论述引起了严重的疑虑。这是作为促进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呢，还是成员资格将以这些问题的解决为条件呢？贾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和君特·费尔霍伊根（Gunther Verheugen）被迅速派到土耳其来消除这些误解。在他们与埃杰维特谈判后，已处于亲欧盟媒体“不要错过这趟列车”压力下的政府接受了这一邀请。埃杰维特飞往赫尔辛基，参加拍摄所谓的欧盟“全家福”——所有参加者的照片。

第三十三章 新千禧年

新总统和经济灾难

苏莱曼·德米雷尔结束了他作为共和国总统的七年任期。由于没有一个单一的政党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因此谁接替他的问题变得很重要。德米雷尔从1964年当选正义党主席起，即使不执政时也一直处于土耳其政治的前台。多年来，他似乎更加成熟且具有政治家的风度。因此，修改宪法以使他可以参选第二任期，很自然地获得了一些支持。没有人比他昔日的强劲竞争对手埃杰维特更支持这一原则。然而，经过投票，这一议案被否决了；显然，很多议员认为土耳其已经受够了德米雷尔。尔后，政府提名了一个不会引起争议的总统候选人：宪法法庭主席艾哈迈德·内吉代特·塞泽尔（Ahmet Necdet Sezer）。塞泽尔——一个文雅的、谦逊的、严肃的人——被选为总统（2000年5月5日）。但是，如果有人曾认为塞泽尔易于控制，那么他们则是大错特错了；后来证明他是一个坚持原则且意志坚定的总统。

经济灾难是由他与埃杰维特在2001年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的一场争论引起的。从1999年12月开始，土耳其经济就设法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稳定模式发展，包括固定税率。在危机之后，像往常一样，有很多人认为这一经济模式是错误的。无论如何，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价格3天下

降了 29.3%。这一年，土耳其里拉贬值了 130%，通货膨胀率上升到 90%，并且有 150 万人失业。面对这些痛苦和混乱，埃杰维特邀请经济学家凯末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ş）回国；他们早先已认识，且后者曾担任世界银行的助理主任。结果证明，他不仅仅是以专家的身份回到土耳其。3 月初，他被任命为政务部长，并且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这些贷款似乎是他个人的成就，他成了经济“沙皇”。他能够命令大国民议会“十五天内通过十五项法律”。土耳其政府后来顺从地遵守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令及其所推出的法律；对于欧盟的要求，也是如此。在此情况下，政府和国民议会表现出的这种奴性是非常明显的。毫无疑问，某些法律带来了一定的进步；但可以确定地说，很多条款主要是为“世界强国”的利益服务的。这些法律在农民（占总人口的 45%）中造成了大混乱，使他们几乎得不到公共支持。然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农业部门几乎都是享受补贴的。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对土耳其的多党政权以及对全球化进程的消极评价。选举到来时，那些同样将农业置于险境的政党还要从这些人中拉选票。这一事件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地方是德尔维什成为各大媒体的宠儿。他打网球、慢跑及他的美国妻子都成了新闻头条。毫不夸张地说，他被视为民族的救星。

2001 年 6 月 22 日，宪法法庭决定解散美德党。一个月后，埃尔巴坎的追随者在雷贾伊·库坦的领导下，建立了幸福党。然而，很多追随者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和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不同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埃尔多安的亲密盟友都曾经是埃尔巴坎的追随者，但正义与发展党宣称它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政党。它宣称已经“改

变”了。现在正义与发展党已经掌权，并支配了议会 2/3 的多数票；这可以看出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对于笔者来说，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埃尔多安和居尔放弃了埃尔巴坎的反帝国主义论调，并且倾向于取悦西方。此外，毫无疑问，正义与发展党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寻求引进沙里亚的伊斯兰主义政党。自然，这是很难实现的目标，需要逐个、逐步地实现。同欧盟和美国一样，土耳其的世俗舆论需要被“引导”。在欧盟的某些团体中，“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权可能被认为有益于发展，因为它将解决土耳其获得欧盟完全成员资格的问题。

埃杰维特政府的崩溃

2002 年，埃杰维特已 77 岁。更严重的是，据推测，他正遭受着一种叫作“肌无力”病痛的折磨；这意味着，如果他不服用大剂量的可的松，将不能进行长时间的活动。由于长时间维持这样的治疗，突然停药很危险，所以只能逐步减轻药物剂量。在正式访问美国期间，为了处理繁多的议程，埃杰维特可能服用了大剂量的可的松。这次访问从 2002 年 1 月 14 日开始，以 16 日他与布什总统的会谈为高潮。

不管上面的推测是否准确，5 月 14 日，埃杰维特病倒并被送往医院治疗。整个 5 月和 6 月初，他不得不取消所有的公开活动。有关他丧失行政能力的流言开始在媒体上传播，同时要求他辞职；人们指责他不负责任，占据总理职位却无法履行总理的职责。早在 3 月中旬，媒体已经报道，美国驻安卡拉的大使皮尔森 (Pearson) 已拜访过联合政府的三位领导人，确定凯末尔·德尔维什的支持率及其政策。据说，皮尔森不满地发现，对德尔维什的支持率并不是很高。埃杰维特病倒后不久，5 月 9

日，德尔维什对一个记者说，现在政治的不稳定是有害的，提前举行选举不会影响到经济发展——事实上，他们将厘清形势。同时，埃杰维特更换了医生和治疗方法，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从后来的发展看，人们并没有预料到他身体状况的好转；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杰姆（İsmail Cem）正准备接替他担任民主左派党的主席和总理职务。当这没能实现后，显然经过一阵的犹豫，伊斯梅尔·杰姆决定脱离民主左派党。

7月8日，在侯萨梅丁·厄兹坎（Hüsamettin Özkan，埃杰维特的得力助手）、伊斯梅尔·杰姆及凯末尔·德尔维什等部长的带领下，民主左派党开始出现辞职现象。在一个几乎完全基于对埃杰维特及其妻子的个人效忠的政党中，这是一件大事。不清楚反叛者希望多少人从议会中辞职，但最终在136名代表中有63人辞职。在伊斯梅尔·杰姆的带领下，这63个议员组成了新土耳其党（the New Turkey Party）。在这次大分裂之后，联合政府丧失了议会中的多数派地位。而且，民主左派党在联合政府中成为最小的政党。因此，民族行动党的主席德夫列特·巴赫切利将很“自然”地担任总理。但是，甚至在民主左派党解体前——事实上一天前，7月7日——巴赫切利效仿德尔维什宣称，如果存在政治不稳定性（或者由于埃杰维特的去世），将于2002年11月3日提前举行选举。或许，巴赫切利考虑在民主左派党进行必要改革（例如，有序地更换领导人）前进行选举，从而利用民主左派党的内部混乱所带来的选举优势。民意测验显示，正义与发展党支持率领先；但除了民主左派党外，所有政党都盲目乐观，甚至在临近11月3日选举时，都没有考虑降低进入议会最少需获得10%选票的门槛。温文尔雅的德尔维什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抛弃了埃

杰维特后，他也抛弃了伊斯梅尔·杰姆；在置身事外一段时间后，他于8月23日加入了巴伊卡尔的共和人民党。如果他的行为不是很有原则性，没有人怀疑这是精明的。他或许研究了民意测验，并相应行事。毫无疑问，巴伊卡尔认为土耳其“经济救星”的加入是共和人民党的一大战略资源，尽管其追随者和同情者多有担忧。

为了完全理解这些变化，考虑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有益的。2001年9月11日后，布什政府对恐怖主义宣战。布什政府似乎自始至终都考虑将土耳其军队作为重要的地面辅助部队来达到其目的。看起来，埃尔多安和居尔也愿意不仅在伊拉克问题上，而且在其他外交问题上满足美国的这些期望。另外，埃杰维特政府在满足经济和社会要求时却不那么热心。但是，当涉及土耳其与伊拉克对抗或对塞浦路斯和爱琴海问题做出重大让步时，这届政府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因此，美国政府很有兴趣看到埃杰维特及其政府去势，并且举行提前选举。他们是如何积极推动这一目标的，还需要未来的研究来揭示。

温和政治的结束？

当民主左派党分裂时，埃杰维特起用舒克吕·辛纳·居雷尔 (Şükrü Sina Gürel) 代替伊斯梅尔·杰姆，用马苏姆·蒂尔克 (Masum Türker) 代替凯末尔·德尔维什。于是，内阁有了更多的民族主义特点，与埃杰维特以前的形象更加一致。

选举结果令人震惊。只有两个党突破了10%以上选票这一限制，进入了大国民议会。一个是正义与发展党，另一个是共和人民党。前者获得了34%的选票和2/3的席位，使其能够进行宪法改革。后者可能获得了“凯末尔主义者”的选票，约

19%。民主左派党只获得1%的选票，从而被彻底击败。然而，至今埃杰维特仍然领导该党。真理党获得9.5%的选票，祖国党获得5%的选票，民族行动党获得8%的选票。奇莱尔和耶尔马兹从领导职位上辞职；巴赫切利承诺下一次党大会不再出来竞选，不过还是被选为主席。

这一大动荡该如何解释呢？毫无疑问这是对经济危机及其灾难的反应。这似乎是对所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谴责。主要政党没有一个在其计划中公开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但一些党派在其竞选演说中提到过。尤其是杰姆·乌赞（Cem Uzan）领导的青年党（Young Party）。乌赞是一个拥有80多个公司且经常被指控存在腐败行为的家族的姓氏。杰姆·乌赞决定建立青年党，并由于其积极的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及其家族对报纸和电视台的控制而获得7%的选票。研究可能会证明正义与发展党强调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并且/或者选民在某种程度上将该党与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另外，应该指出的是，那些强烈而真诚的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纲领的社会主义政党，总共只获得了处于临界值的票数。这种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倾向，以及选民不愿意给真正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党投票，反映了土耳其多党政治的困境。

土耳其对外交政策的两个定位是这个国家的又一重要问题。一是欧盟成员资格的定位。这将允许欧盟通过其政策对土耳其施加影响，尤其是土耳其的“核心”利益。第二个定位是不允许在其边境建立库尔德国家的决心。由于土耳其东南部居住着库尔德人，这被认为是对土耳其稳定的巨大威胁。在笔者看来，这是非理性的恐惧，因为这一地区很早就有阿拉伯人居住，而

且在其边界附近还有两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都没有造成任何问题。第二个定位以及土耳其的债务，使美国能够把许多政策强加给土耳其。

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前景

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有所进展，但这一进程是异常曲折的。这种关系对双方的影响都是很明显的。对于欧盟来说，土耳其地处中亚和中东，控制着海峡和通往高加索的大桥，其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上，土耳其巨大的市场、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巨大的投资潜力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土耳其的军队也被当作重要的战略资源。

另外，对土耳其来说，加入欧盟被认为是解决其经济问题的一种途径，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前途，以及民主制良好运转的保证。尤其是，自 1987 年图尔古特·厄扎尔总理申请入盟以来，这已经成为土耳其人的梦想，被认为是根治所有弊病的良药。

然而，土耳其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客观障碍是巨大的。一个主要困难是经济的欠发达。一大部分经济是“未注册的”——例如，逃税和非法就业非常普遍。官方统计的失业率是 10%，但真正的失业率更高。人均收入很低（2004 年是 2232 欧元），分配也很不均匀。农业整体上很落后，且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处于停滞状态。另一个困难是土耳其教育的落后。很多儿童，尤其是女孩，没有被送到学校上学。直到 1997 年，义务教育只有 5 年，现在是 8 年。教室非常拥挤，教师薪酬偏低，学校设备不足，学校和公共图书馆也很缺乏。第三个客观困难是土耳其是穆斯林社会，而欧盟是基督教社会。

很多人认为，土耳其和欧盟都是世俗国家，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很明显，尽管都是世俗国家，宗教情怀也都在弱化，但欧盟是基督教文化，土耳其是伊斯兰教文化。第四个困难是土耳其巨大的人口规模。土耳其有 7000 万人口，而且人口增长率很高；如果土耳其加入欧盟，其在欧洲议会的代表人数将仅次于德国——且这只是暂时的。

这不是讨论欧洲对穆斯林，尤其是土耳其人古老偏见的地方。但很明显，这些偏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无论如何，对于那些看到欧盟不愿接受土耳其为正式成员国的人来说，这是明显的。2005 年秋，谈判开始，计划至少持续 10 年的时间；很多重要的迹象表明了这种不情愿。与欧盟和其他成员国的谈判不同，它们是“没有固定时限的”。土耳其劳工在欧盟的自由流通在可预见的未来已被否决。法国和奥地利已表示，即使谈判最终决定支持土耳其入盟，它们仍将提交给本国公民投票决定。这里我们应当记住 2005 年欧洲宪法在法国全民公决中的惨败，以及荷兰选民在某种程度上对土耳其入盟的厌恶。但也应当指出，不管对土耳其入盟有多不愿意，欧盟已经排除了直接拒绝的可能。一种现在被广泛宣传的观点，例如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认为，可以在土耳其与欧盟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至今，大多数欧盟政治家都声称，土耳其将加入欧盟，这可能会给它们控制土耳其和从土耳其获得额外特权提供机会。

很多年来，被土耳其媒体所激励的大多数土耳其人，认为加入欧盟是一个肯定会实现的美好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欧盟提出的一些要求，这种心情逐渐消沉下来。尤其是随着欧盟同意希腊人的塞浦路斯加入，欧盟迟早会要求结束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以及土耳其驻扎在那里的军队，这变得日益明显。这也被认为是土耳其不会被欧盟接纳的迹象。如果土耳其真的加入欧盟，那么坚持用希腊人的塞浦路斯压制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将失去其意义，塞浦路斯“问题”也将因此解决。

第二个不安的来源是，欧盟要求将库尔德人和阿拉维人转变成被认可的合法少数民族。根据土耳其人的观点，《洛桑条约》规定，只有非穆斯林人才是“少数民族”。库尔德人和阿拉维人可能有某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将由民主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解决，而不是“少数民族化”。

第三，欧洲议会已通过了一个决议，迫使土耳其承认所谓的“亚美尼亚种族屠杀”（Armenian genocide）。许多西方国家议会也“不可避免地”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土耳其的观点（绝大多数人所持的）是，当然确实存在相互屠杀，但种族屠杀的指控在这么多年之后都无法证实，今天更无法查账。至于1915年很多亚美尼亚人被迫从安纳托利亚迁移到北叙利亚和伊拉克（当时是奥斯曼的行省），这是一项必要的政策，因为战时很多亚美尼亚人加入敌对一方（俄国）。

尽管进展这么不顺，土耳其政府近些年来仍坚定地宣传加入欧盟的信念。很多人怀疑，政府已经或正在意识到这种乐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政府这样做，第一可以阻止军队干预政治；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如果政府可以表明正成功地带领国家走向入盟之路，就可以得到选民支持。于是，“土耳其的入盟”似乎成了欧洲和土耳其政治家双方玩弄的“游戏”。

对很多土耳其人来说，这些事件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就像给土耳其致命打击的《色佛尔条约》死灰复燃一般。对他们来

说，“不惜任何代价加入欧盟”相当于自我毁灭。他们希望拥有一个更加独立的土耳其，自力更生，脱离债务羁绊，保持外交政策自主。然后，或许可以与欧盟建立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更加健康的关系。

因此，可以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已变得有点混乱。需要一段时间来看清土耳其将走向何方。

结 语

作为本书最后的分析，让我们首先弄清土耳其在哪些领域的发展存在不足。

从1950年开始，土耳其在某种程度上搁置了阿塔图克时期的整体发展模式，代之而起的是只注重物质的发展模式。战略调整的结果是，基础设施和生产领域有了巨大的进步。相比之下，教育、文化和公共卫生领域则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有所倒退。1994年，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评估中，土耳其在173个国家中处于第68位。土耳其的人类发展指数没有达到53个发达国家所处的第一类水平，而是排在65个发展到中等水平的国家所处的第二类。根据人类发展指数，土耳其人均花在学校里的时间是3.6年。然而，伊拉克和阿塞拜疆是5年，伊朗是3.9年，叙利亚是4.2年，希腊和保加利亚是7年，俄罗斯是9年。这些统计数据表明，在教育领域，土耳其落后于其所有的邻国。在学校的这3.6年的时间里，每个土耳其人所受的教育质量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农村学校原始的条件——在小学和初中，教室过度拥挤，图书馆、文化和体育设施匮乏——是明显的事实。土耳其要从由过分重视物质发展导致的落后状态赶上来，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

公共医疗服务也需要在质量和公众获得两个方面得到极大改善。事实上，“人口爆炸”已经丧失了原有的一些推动力，这可能对国民健康状况有积极的影响。

强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出现，已经引起了土耳其社会精神上的大分裂。未来，这股潮流能获得足够的动力，足以危及全国统一意志，并威胁阿塔图克革命的成果。这一变化可能减少了土耳其成为发达国家的机会。

对于土耳其来说，要实现成为发达国家的梦想，政治家必须更具有政治家的风度，更加负责且更愿意做出让步。如果各政治集团能搁置它们之间的小争议，且以较少的情绪和更多的理性考虑行事，那么很可能土耳其就不需要遭遇当代史上的三次军事政变，而且很可能达到了更高的发展水平。

1999年东安纳托利亚的武装暴动被平息，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库尔德民族问题。我们现在应看看土耳其发展的积极方面。

相对来说，土耳其人在历史舞台上后来者，但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的土耳其，尽管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但似乎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世俗、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我们迅速地回顾一下土耳其的历史，足以发现其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由于世俗的体制，土耳其社会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从中世纪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1946年到1980年，经常成为多数党的独裁政权的政党制，已经使多元主义的概念和实践被接受。法律面前男女平等是世俗主义的最大成就。1926年和1934年制定的法律确保了平等权利及时贯彻，并改变了土耳其的社会结构。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目前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如上所论，世俗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将土耳其从中世纪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世俗主义及与其互补的启蒙运动，土耳其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知识分子阶层，并建立了文化、科学和艺术机构。由于这些机构的建立，土耳其正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尊

重。土耳其现在拥有知名的出版社，成熟的报纸、期刊和杂志，繁荣的戏剧公司、电影产业，各种高质量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大学，音乐学院、歌剧院、芭蕾舞团，以及艺术和科学团体。这些在一百年前几乎不存在。1934 年出版了 1530 本书，到 1994 年这一数字达到了 7224 本。

土耳其在农业、工业和公共工程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资产阶级有所发展，尽管无论是文化还是资本积累上都无法与西方资产阶级相提并论，但已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只有时间可以证明土耳其是否会基于其弊端和优点对欧洲关税同盟说“是”，即土耳其的资本主义能否在欧盟内与其对手竞争。

文献介绍

研究奥斯曼帝国有很多英文资料可以使用。最近一本很受欢迎的书是贾森·古德温（Jason Goodwin）的《地平线的主人》（*The Lords of the Horizons*, 2000），这本书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进行了总体概述。此类型的其他书籍报刊有罗德·金罗斯（Lord Kinross）的《奥斯曼的世纪》（*The Ottoman Centuries*, 1977）和贾斯汀·麦卡锡（Justin McCarthy）的《奥斯曼土耳其人：1923年前的历史导论》（*The Ottoman Turks: An Introduction History to 1923*, 1996）。

关于早期奥斯曼时代的全面研究著作有斯坦福·J. 邵（Stanford J. Shaw）的《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史》（*Th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1, up to 1808, 1976）和哈利勒·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ık）的《奥斯曼帝国：古典时代，1300~1600年》（*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 - 1600*, 1973）。在奥斯曼帝国通史方面，赛尔丘克·阿克辛·索梅尔（Selçuk Akşin Somel）的《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词典》（*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2003），是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当然，标志性的《伊斯兰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2nd edition）是一份珍贵的资料。由罗伯特·曼特兰（Robert Mantran）主编的《奥斯曼帝国的历史》（*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 1989）是由许多法国学者撰写的奥斯曼帝国通史。在土耳其语的著作中，伊斯梅尔·哈基·乌

赞查希勒 (İsmail Hakkı Uzunçarşılı) 的《奥斯曼帝国史》(*Osmanlı Tarihi*, vols I - IV) 是到坦兹马特之前的一部通史。对于那些对经济和社会史感兴趣的人来说, 哈利勒·伊纳尔哲克和唐纳德·凯特利特 (Donald Quataert) 所编的《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社会史, 1300 ~ 1914 年》(*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 - 1914*, 1994) 值得推荐。

关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前半期的土耳其, 最著名的英文著作是伯纳德·刘易斯 (Bernard Lewis) 的《现代土耳其的崛起》(*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1961)。斯坦福·J. 邵和艾泽尔·K. 邵 (Ezel K. Shaw) 的《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和现代土耳其》(*Th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将土耳其的历史叙述到 1975 年。对于那些想深入研究的人来说, 邵的各卷作品包含大量有价值的文献。尼亚兹·贝尔克斯 (Niyazi Berkes) 的《世俗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1964, 1998) 从现代化的角度对土耳其的历史做出了总体评价。

关于坦兹马特时期的历史, 可以参考罗德里克·戴维森 (Roderic Davison) 的《奥斯曼帝国的改革, 1856 ~ 1876 年》(*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56 - 1876*, 1963)。谢里夫·马丁 (Sherif Mardin) 的《青年奥斯曼思想》(*The Genesis of Young Ottoman Thought*, 1962) 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史和政治史做了研究, 它论述了 19 世纪 60 年代的革命运动。他的另一部土耳其语作品《青年奥斯曼人的政治思想, 1895 ~ 1908》(*Jön Türklerin Siyasi Fikirleri, 1895 - 1908*, 1964) 研究了 1908 年以前的统一进步协会。恩维尔·齐亚·卡拉尔 (Enver Ziya Karal) 的《奥斯曼帝国史》(*Osmanlı Tarihi*, vols V - VIII) 是土耳其语

作品中研究 19 世纪的标版。

关于第一立宪时期（1876 ~ 1880 年）的历史，参考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的《第一立宪时期》（*The First Constitutional Period*, 1963）。对于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统治时期（1876 ~ 1909 年）的历史，一部很受欢迎的作品是琼·哈斯利普（Joan Haslip）的《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的生活》（*The Sultan: The Life of Abdul Hamid II*, 1958）。系统的研究可以参考塞利姆·德林吉尔（Selim Deringil）的《受保护的领域：奥斯曼帝国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合法化，1876 ~ 1909》（*The Well-Protected Domains: Ideology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76 - 1909*, 1998）。最近出版的一部优秀的法文作品是弗朗索瓦·乔治恩（François Georgeon）的《苏丹哈里发：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Abdülhamid II . Le Sultan Calife*, 2003）。

关于第二立宪时期（1908 ~ 1914 年）的历史，除了最后的几年，在弗罗兹·艾哈迈德（Feroz Ahmad）的《青年土耳其人》（*The Young Turks*, 1969）中都有论述。另一本资料是纳伊姆·吐尔番（Naim Turfan）的《青年土耳其人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Young Turks*, 2000）。辛纳·阿克辛（Sina Aksin）的《青年土耳其人和统一进步协会》（*Jöl Türkler ve İttihat ve Terakki*, 1980）是用土耳其语写的关于这一时期的简史。尤素福·希克梅特·巴尤尔（Yusuf Hikmit Bayur）的《土耳其革命史》（*Türk İnkılabı*, 3 vols）是有关共和国革命前这段历史的标准土耳其语教材。

对于那些对亚美尼亚问题感兴趣的人来说，土耳其人的观点可见于卡穆兰·居林（Kamuran Gürün）的《亚美尼亚档案：

被揭露的无罪神话》(*The Armenian File: The Myth of Innocence Exposed*, 1985)。亚美尼亚方面, 理查德·霍瓦尼西安 (Richard Hovannisian) 在《亚美尼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Armenia*, 4vols) 中做了进一步研究。

关于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 斯坦福·J. 邵的五卷本《从帝国到共和: 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 1918 ~ 1923 年》(*From Empire to Republic: The Turkish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1918 - 1923*, 2000) 有深入研究。扎基·萨勒汗 (Zeki Sarıhan) 的《独立战争日记》(*Kurtuluş Savaşı Günlüğü*, 4vols, 1993) 是关于这一战争非常详细的编年史。拙著《伊斯坦布尔政府和民族解放战争》(*İstanbul Hükümetleri ve Milli Mücadele*, 2vols, 1976, 1992), 部分以英国档案资料为基础, 论述了这一时期前半部分的历史 (1918 ~ 1920 年)。谢拉费丁·图兰 (Şerafettin Turan) 的《土耳其革命史》(*Türk Devrim Tarihi*, 4vols, 1991) 是研究解放战争和共和国历史 (直到 1960 年) 的优秀土耳其语作品。

集中关注冲突中希腊一方的两部客观作品是: 迈克尔·卢埃林·史密斯 (Michael Lewellyn Smith) 的《艾奥尼亚观点: 小亚细亚的希腊, 1919 ~ 1922 年》(*Ionian Vision: Greece in Asia Minor, 1919 - 1922*, 1973, 1998) 和迪米特里·佩恩茨鲍罗斯 (Dimitri Pentzopoulos) 的《巴尔干半岛的人口交换及其对希腊的影响》(*The Balkan Exchange of Populations and its Impact on Greece*, 1962, 2002)。

关于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者阿塔图克, 在研究现代土耳其的历史中居于中心地位。早期比较流行的凯末尔传记是哈罗德·考特尼·阿姆斯特朗 (H. C. Armstrong) 所作的《大灰

狼》(Grey Wolf, 1932)。金罗斯写了第一部全面的传记《阿塔图克：一个民族的重生》(Atatürk: The Rebirth of a Nation, 1964)。现在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安德鲁·曼格(Andrew Mango)的《阿塔图克》(Atatürk, 1999)。法文著作有亚历山大·叶瓦科霍夫(A. Jevakhoff)的《凯末尔·阿塔图克：西化之路》(Kemal Atatürk. Les chemins de l'occident, 1989)。一部优秀的土耳其语传记是谢夫凯特·苏雷亚·艾德米尔(Şevket Süreyya Aydemir)的《伟人》(Tek Adam, 3 vols, 1963)。关于阿塔图克时期的文化反思,可参见萨伊梅·格克苏(Saime Göksu)和爱德华·蒂姆斯(Edward Timms)合著的《浪漫的共产主义者》(Romantic Communist, 1999),它描述了诗人纳泽姆·希克梅特的生活和作品。

费罗兹·艾哈迈德从伯纳德·刘易斯停下的地方继续前进。他的《土耳其的民主制尝试, 1950~1975年》(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 1977),是关于那一时期的一部优秀而详细的著作。这本书的土耳其语版《民主进程中的土耳其, 1945~1980年》(Demokrasi Sürecinde Türkiye 1945-1980, 1994),把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叙述延长了十年。安德鲁·曼格的一部简洁且具有分析性的作品《今天的土耳其人》(The Turks Today, 2004),把土耳其的历史(用英文)叙述到2003年。土耳其方面,我们有杰姆·亚伊内维(Cem Yayınevi)的《土耳其史》(Türkiye Tarihi, vol. 3: 1600-1908; vol. 4: 1908-1980; vol. 5: 1980-2003)。埃里克·J. 许理和(Erik J. Zürcher)的《土耳其：一部现代史》(Turkey: a Modern History, 1993)是一本简短的手册。

对于那些对土耳其外交政策感兴趣的人来说,威廉·海尔

(William Hale) 的《土耳其外交政策, 1774 ~ 2000 年》(*Turkish Foreign Policy, 1774 - 2000*, 2002) 是一部可靠的资料。在土耳其有两部巨著: 巴斯·奥兰 (Baskın Oran) 主编的《土耳其外交政策年鉴》(*Türk Dış Politikası*, 2001), 这部作品在即将出版时被翻译成了英文; 还有菲利普·J. 罗宾斯 (Philip J. Robins) 的《西装与制服: 冷战以来的土耳其外交政策》(*Suits and Uniforms: 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2003), 书中研究了一些历史个案。

译名对照表

Abdülaziz, 阿卜杜勒·阿齐兹

Abdülhamit II, 阿卜杜勒·哈米德
二世

Abdülmecit, 阿卜杜勒·迈吉德

Afghani, Jamal al-Din al-, 阿富汗
尼, 哲马鲁丁

Afyon, 阿菲永

Ahmet III, 艾哈迈德三世

Akbulut, Yıldırım, 阿克布卢特,
耶尔德勒姆

Akçura, Yusuf, 阿克丘拉, 尤素福

Aksoy, Muammer, 阿克索伊, 穆阿
迈尔

Alemdar Mustafa Pasha, 阿莱姆达
尔·穆斯塔法帕厦

Aleppo, 阿勒颇

Alevis, 阿拉维派

Alexandretta, 亚历山大勒塔

Ali, Hüseyinzade, 阿里, 侯赛因
扎德

Ali Pasha, Tepedelenli, 阿里帕厦,
泰佩代伦利

Alp, Tekin, 阿尔普, 泰金

Amasya Resolutions (1919), 《阿玛
西亚决议》(1919年)

Ankara, 安卡拉

Ardahan, 阿尔达汉

Armenians, 亚美尼亚人

ASALA, 亚美尼亚地下解放军

Aşkale, 阿士克勒

Association of Kemalist Thought, 凯
末尔主义思想协会

Atatürk (Mustafa Kemal), 阿塔图
克(穆斯塔法·凯末尔)

Austria - Hungary, 奥匈帝国
ayan, 阿扬

Aydemir, Talat, 艾德米尔, 塔
拉特

Azerbaijan, 阿塞拜疆

Baghdad, 巴格达

Baghdad Pact, 巴格达条约

Bahçeli, Devlet, 巴赫切利, 德夫
列特

Baku, 巴库

Batum, 巴统

- Bayar, Celal, 巴亚尔, 杰拉尔
- Bayezit II, 巴耶塞特二世
- Baykal, Deniz, 巴伊卡尔, 德尼兹
- Beirut, 贝鲁特
- Bektashi, 贝克塔希派
- Berkes, Niyazi, 贝尔凯斯, 尼亚兹
- Berlin, Treaty of, 《柏林条约》
- Bosnia - Herzegovina, 波斯尼亚 - 黑山
- Brest - Litovsk, Treaty of, 《布列斯特 - 拉脱维亚条约》
- Bristol, Admiral, 布里斯托尔上将
- Britain, 英国
- Bulgaria, 保加利亚
- Bursa, 布尔萨
- Bush, George W., 布什, 乔治 W.
- Byzantine empire, 拜占庭帝国
- Caliphate, 哈里发制
- Calthorpe, Admiral, 卡索普上将
- Capitulations, 让步协定
- Cavit Bey, 贾维特贝伊
- Çelebi, Evliya, 切莱比, 埃夫利亚
- Çelebi, Katip, 切莱比, 卡蒂普
- Cem, Ismail, 杰姆, 伊斯梅尔
- Cemal Pasha, 杰马尔帕厦
- Cemal Pasha, Mersinli, 杰马尔帕厦, 梅尔西雷
- Cevdet, Abdullah, 杰夫代特, 阿卜杜拉
- Chanakkale, 恰纳卡莱
- Churchill, Sir Wiston, 丘吉尔, 温斯顿爵士
- Çiller, Tansu, 奇莱尔, 坦苏
-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统一进步协会
- Constantine, King, 康斯坦丁国王
-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 Corpo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urkey, 土耳其开发公司
- Council of Europe, 欧洲委员会
-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
- Çukurova (Cilicia), 丘库罗瓦 (奇里乞亚)
- Curzon, Lord, 寇松侯爵
- Cyprus, 塞浦路斯
- Declaration of Freedom, 《自由宣言》
- Demirel, Süleyman, 德米雷尔, 苏莱曼
- Democrat Party, 民主党
- Democratic Left Party, 民主左派党
-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
- Derviş, Kemal, 德尔维什, 凯末尔

- Dervishes, 苏菲团体
- devshirme, 德米舍梅
- Dodecanese, 多德卡尼斯
- Doğramacı, Professor Ihsan, 伊赫桑·多拉麦吉教授
- Eastern Anatolia Defence of Rights Association, 东安纳托利亚保卫权利协会
- Ecevit, Bülent, 埃杰维特, 布伦特
- Ecevit, Raḥşan, 埃杰维特, 拉赫香
- Edip Adivar, Halide, 埃迪普·阿德瓦尔, 哈利代
- Edirne, 埃迪尔内
- Enderun school, 帝国学校
- Enver Pasha, 恩维尔帕厦
- Erbakan, Necmettin, 埃尔巴坎, 内吉梅丁
- Erdğan, Recep Tayyip, 埃尔多安, 雷杰普·塔伊普
- Erim, Nihat, 埃里姆, 尼哈特
- Erzurum, 埃尔祖鲁姆
- Eskişehir, 埃斯基谢尔
- Ethem Cerkez, 埃特海姆, 切尔克斯
- European Union, 欧盟
- Evren, General Kenan, 埃夫伦, 凯南将军
- Fazil Pasha, Mustafa, 法泽尔帕厦, 穆斯塔法
- Fehmi, Hasan, 费赫米, 哈桑
- Felicity Party, 幸福党
- Ferit Pasha, Damat, 费里特帕厦, 达马德
- Fethi Okyar, 费特希·奥克亚尔
- Fevzi Pasha, 费夫齐帕厦
- Firka-yı İslahiye, 改进师
- Free Republican Party, 自由共和党
- Freedom Party, 自由党
- Freedom and Accord Party, 自由和谐党
- Freemasonry, 共济会
- Fuat Pasha, Ali, 福阿德帕厦, 阿里
- Galip, Ali, 加利普, 阿里
- Gallipoli, 加里波利
- Gökalp, Ziya, 格卡尔普, 齐亚
- Göktürk kingdom, 突厥汗国
- Gül, Abdullah, 居尔, 阿卜杜拉
- Gülek, Kasim, 居莱克, 卡西姆
- Gulf War, 海湾战争
- Günaltay, Şemsettin, 居纳尔塔伊, 塞姆斯汀
- Gürel, Sükrü Sina, 居雷尔, 舒克吕·辛纳

Gürsel, General Cemal, 居尔塞尔,
杰马尔将军

Hakki Pasha, 哈基帕厦

Hamid Bey, Köprülü, 哈密德贝伊,
柯普吕吕

Hamidiye Company, 哈密德耶军团

Hareket Army, 机动部队

Hatay, 哈塔伊

Hejaz, 汉志

Helphand, Alexander, 海尔芬德,
亚历山大

Hikmet, Nazim, 希克梅特, 纳
泽姆

Hilmi Pasha, Hüseyin, 希尔米帕
厦, 侯赛因

Huns, 匈奴

Ibn Khaldun, 伊本·赫尔敦

Iman - Hatip schools, 伊玛目 - 哈
提普学校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önü, Erdal, 伊诺努, 埃达尔

İnönü, İsmet (İsmet Pasha), 伊
诺努, 伊斯梅特 (伊斯梅特帕
厦)

Islamism, 伊斯兰主义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İzmir, 伊兹密尔

İzzet Pasha, 伊泽特帕厦

Janina, 雅尼纳

Janissaries, 近卫兵

Jelali Revolt, 杰拉里叛乱

Justice Party, 正义党

Kadro, 卡德罗

Kavakçı, Merve, 卡瓦克奇, 梅
尔韦

Kamil Pasha, 卡米尔帕厦

Karabekir, Kazim, 卡拉贝基尔,
卡泽姆

Karahan state, 卡拉汉国

Karaosmanoğlu, Yakup Kadro, 卡拉
奥斯曼奥卢, 亚库普·卡德里

Kars, 卡尔斯

Kayser, 开塞利

Kemal, Mustafa, 凯末尔, 穆斯
塔法

Kemal Namik, 凯末尔, 纳米克

Kemal, Yusuf, 凯末尔, 尤素福

Kemalism, 凯末尔主义

Koç, Vehbi, 科奇, 韦赫比

Konya, 孔亚

Köprülü, Fuat, 柯普吕吕, 福阿德

Korutürk, Admiral Fahri, 科鲁蒂尔

克, 法赫里海军上将
 Kurds, 库尔德人
 Kütahya, 屈塔西亚
 Kutan, Recai, 库坦, 雷贾伊
 Lausanne, Treaty of, 洛桑条约
 League for the Defence of the Rights
 of Anatolia and Rumelia, 安纳托
 利亚和鲁米利亚保卫权利协会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Liberal Union Party, 自由统一党
 Libya, 利比亚
 Liman von Saners, Field - Marshal,
 利曼·冯·桑德斯元帅
 Lloyd George, David, 劳合·乔治,
 大卫
 Lynch concession, 林奇特许权
 Macedonia, 马其顿共和国
 Mahmut II, 马哈茂德二世
 Mahmut Pasha, Damat, 马哈茂德帕
 厦, 达马德
 Maraş, 马拉什
 Mecca and Medina, 麦加和麦地那
 medreses, 神学院
 Mehmet II, 穆罕默德二世
 Mehmet V (Reshat), 穆罕默德五
 世 (雷沙特)

Mehmet VI (Vahdettin), 穆罕默德
 六世 (瓦希代丁)
 Mehmet Ali Pasha, 穆罕默德·阿里
 帕厦
 Menderes, Adnan, 曼德列斯, 阿
 德南
 Mentese, Halil, 门泰谢, 哈利勒
 Mersin, 梅尔辛
 Meslek, 梅斯莱克
 Mithat Pasha, 米哈特帕厦
 Moderate Liberal Party, 温和自由党
 Montreux Convention, 蒙特勒公约
 Mosul, 摩苏尔
 Motherland Front, 祖国阵线
 Motherland Party, 祖国党
 Mudanya conference, 穆达尼亚会议
 Mudros, Armistice of, 《穆德罗斯
 停战协定》
 Muhtar Pasha, Gazi Ahmet, 穆赫塔
 尔帕厦, 加齐·艾哈迈德
 Mülkiye School, 米尔基耶学校
 Murat V, 穆拉德五世
 Mustafa IV, 穆斯塔法四世
 Nadir Pasha, Ali, 纳迪尔帕厦, 阿里
 Nation Party, 民族党
 National Forces, 国民军
 National Import and Export

- Corporation of Turkey, 土耳其国家进出口公司
- National Pact, 国民公约
- National Protection Law, 国家保护法
- National Salvation Party, 救国党
-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国家安全委员
- National Unity Committee, 全国统一委员会
- Nationalist Democracy Party, 民族主义 - 民主党
- 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 民族行动党
-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 Navarino, battle of, 纳瓦里诺战役
- Nazim Pasha, 纳泽姆帕厦
- Nedim Pasha (Mahmut), 尼迪姆帕厦 (马哈茂德)
- New Turkey Party, 新土耳其党
- Niyazi Bey, 尼亚兹贝伊
- Nizam-i-Dedid, 新秩序
- Nizip, 尼吉普
- Nur, Riza, 努尔, 里扎
- Öcalan, Abdullah, 厄贾兰, 阿卜杜拉
- Orthodox Church, 东正教
- Osman, 奥斯曼
- Ottoman Bank, 奥斯曼银行
- Ottoman Democratic Party, 奥斯曼民主党
- Ottomanism, 奥斯曼主义
- Özal, Turgut, 厄扎尔, 图尔古特
- Palestine, 巴勒斯坦
- Party of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正义与发展党
- Peker, Recep, 佩克, 雷杰普
- People's Houses and Room, 人民之家和人民之屋
- People's Labour Party, 人民劳动党
- People's Party, 人民党
- People's Socialist Party of Turkey, 土耳其人民社会党
- PKK, 库尔德工人党
- Plevne, 普列文
- Populist Party, 人民党
- Progressive Republican Party, 进步共和党
- Rauf Orbay, 劳夫·奥尔巴伊
- Refet Pasha, 雷费特帕厦
- Reliance Party, 信实党
-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共和人民党

Riza, Ahmet, 里扎, 艾哈迈德

Rumelia, 鲁米利亚

Sabahattin, Prince, 萨巴赫丁亲王

Sait Halim Pasha, 赛义德·哈莱姆
帕厦

Sait Pasha, 赛义德帕厦

Saka, Hasan, 萨卡, 哈桑

Sakarya, battle of, 萨卡里亚战役

Salih Pasha, 萨利赫帕厦

Salonika, 萨洛尼卡

Sami, Bekir, 萨米, 贝克尔

Samim, Ahmet, 萨米, 艾哈迈德

Samsun, 萨姆松

San Stefano, 圣斯蒂法诺

Saraçoğlu, Şükrü, 萨拉齐奥卢, 苏
克鲁

Satır, Kemal, 萨特尔, 凯末尔

Saydam, Refik, 萨伊达姆, 雷菲克

Sekban-i-Dedid, 塞克班军团

Selim I, 塞利姆一世

Selim III, 塞利姆三世

Seljuk kingdom, 塞尔柱王国

Sened-i İttifak, 行为协定

Serbia, 塞尔维亚

Şevket Pasha, Mahmut, 谢夫凯特
帕厦, 马哈茂德

Sèvres, Treaty of, 《色佛尔条约》

Sezer, Ahmet Necdet, 塞泽尔, 艾
哈迈德·内吉代特

Sharia, 沙里亚

Sheikh Sait, 谢赫·赛义德

sipahis, 西帕希, 骑兵

Sivas, 锡瓦斯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社会民
主党

Social Democratic Populist Party
(SDPP), 社会民主人民党

Suavi, Ali, 苏阿维, 阿里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 苏莱曼
大帝

Sunay, Cevdet, 苏纳伊, 杰夫代特

Suphi, Mustafa, 苏普希, 穆斯塔法

Susurluk incident, 苏苏尔卢克事件

Syria, 叙利亚

Talat Pasha, 塔拉特帕厦

Tamerlane, 帖木儿

Tantan, Sadettin, 谭坦, 萨德丁

Tazimat, Proclamation of, 《坦兹马
特法令》

Tekel, 特克勒

Tersane conference, 德沙那会议

Tevfik Pasha, Riza, 陶菲克帕厦,
里扎

- Thrace, 色雷斯
- Timariots, timar system, 封建骑兵, 提马尔体制
- Topkapi palace, 托普卡帕宫
- Tripolitania war, 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
- True Path Party, 真理党
- Türkeş, Alpaslan, 蒂尔凯希, 阿尔帕斯兰
- Turkic peoples, 突厥人
- Turkish Grand National Assembly (TGNA),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
- Turkish Hearth (Türk Okagği), 突厥之家
- 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ern Cyprus,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 Turkism, 土耳其主义
- ulema, 乌里玛
- Uyghurs, 维吾尔
- Uzan, Cem, 乌赞, 杰姆
- Vahdeti, Dervish, 瓦赫代蒂, 德维希
- Vahdettin, 瓦希代丁
- Van, 凡城
- Venezelos, Eleftherios, 韦洛斯, 埃莱夫塞里奥斯
- Village Institutes, 乡村学校
- Virtue Party, 美德党
- Welfare Party, 福利党
- Wilson, Woodrow, 威尔逊, 伍德罗
- Workers' Party of Turkey, 土耳其工人党
-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 Yassıada trial, 亚细亚达审判
- Yıldız Palace, 耶尔德兹宫
- Yılmaz, Mesut, 耶尔马兹, 梅苏特
- Young Turks, 青年土耳其党
- Young Party, 青年党
- Yozgat, 约兹加特
-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 Zeki Velidi Togan, 泽基·韦利迪·托甘
- Zorlu, Fatih Rüştu, 左卢, 法廷·吕什蒂

译后记

这是一位土耳其的顶级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历史著作。书稿初用土耳其语写成，并在土耳其重要的报纸上发表，书稿已经再印好几版。之后又被翻译成英文；作者在英文稿中加入了当代部分的三个章节。这些事实都是对该书价值的客观说明。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选择翻译此书。既看重其由土耳其作家完成，又欣赏其为国际学界所接受。在大部分情况下，该书的作者是客观的；对世俗主义和民主价值的倾向，反映了土耳其高级知识分子的一般观点。还有，作者在字里行间也透露着对阿塔图克的敬拜。译者认为，在强调历史著作的客观性的同时，作者在具体处境中的价值观是可以理解的。译者选择此书的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其可读性。由于曾在报刊发表，所以文字比较简洁明了。然而，由于经历了从土耳其语到英语的转译，也难免有一些词句的误差。

该书是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全球学研究中心及土耳其研究中心系列出版物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三位译者又有机会在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或长或短的工作，这一经历有助于我们体会和理解土耳其社会的一些独特性。在此，译者特别感谢郭长刚教授的倡导和支持，感谢上海大学世界史一流学科的资助。三位译者都属于刚刚涉入土耳其研究的年轻学者，尽管有的经验稍微丰富些。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也在不同的环境中开始学习土耳其语，集中地阅读土耳其的历史著作。处

在一个东西文化的交汇点上，我们深感，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相互了解太少了。它们同样都曾经是世界性的帝国，又同样都是新兴的经济体。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人可以加入这一研究的行列，并推动两国之间的人文和学术交流。最后，译者也特别感谢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提供的良好环境，感谢秘书 Nurdan Çağatay 女士在译名方面的具体帮助。

由于学养或疏忽导致的一些细节问题，则请读者们指正。

2014 年 8 月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畔

作为近来关于土耳其历史的重要作品，本书应是在叙述土耳其从 1789 年至今演变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充满重要的细节，文笔优美……必备佳作。

——《选择》(Choice)



甲骨文官方微信



定价：59.00 元